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追寻现代中国

1600-1912 年的中国历史

黄纯艳 译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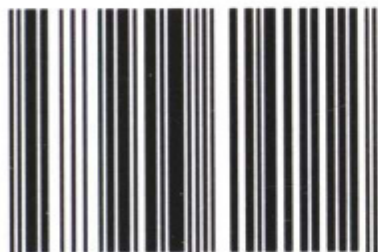
 上海远东出版社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ISBN 7-80661-411-7



9 787806 614112 >

www.ewen.cc

定价: 25.00 元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追寻现代中国

1600-1912 年的中国历史

黄纯艳 译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 年的中国历史/(美)史
景迁著;黄纯艳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ISBN 7-80661-411-7

I. 追... II. ①史... ②黄... III. 中国—历史—
研究—1600~1912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005 号

出版说明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层出不穷和令人眼花缭乱的
新生事物令我们兴奋和浮躁，以至于常常淡忘了历史。而一个在自己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浸了数千年的民族，一旦梦醒，对外开放，也似乎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历史之外的现实与未来。然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怎样健忘和忽略，我们都将无法逃避地承接历史的因果。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

交流。

由于史景迁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译难度较大,我们虽已做了精心的译校,但仍可能挂一漏万,错误难免。为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歉意。

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动荡和灾难。人类灵魂深处似乎存在着永远无法抑制的躁动和暴戾,以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达于完美的宁和。然而,每个国家的人们又都表现出爱美的情愫,求知的激情,文雅的风度,丰富的情感,以及对正义的向往,它们穿透黑暗,使世界充满光明。人们孜孜不倦地努力,以期认识这个世界,使自己免受它的蹂躏,更有效地构建它,将它变成使子孙后代没有饥饿,没有恐惧的乐园。

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丰富而奇异。现在,作为一个国家,它也与其他国家一起投身到寻求稀有资源,

展开贸易往来,扩展知识领域的行列。长期以来,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对中国茫然无知,即使到今天,不同的语言、习俗和看法仍然使人们感到隔膜。中国国内人口超过十亿,它所承受的内在压力使身处局外的我们只能臆测,其政治生活摇曳不宁,文化气氛收放不定,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友好微笑的背后常常分明看出对外来影响的敌意,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中国的真实本质仍困惑不解。

了解中国并没有终南捷径,就像没有捷径了解任何文化,甚或是我们自己。但这还是值得去努力,因为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惊异,且能使人颇获教益。本书的立意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了解它的过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探究应该回溯多远确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久远绵长,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将近四千年——能够保持其活力,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下自己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于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

本书的叙述始于1600年,因为我认为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我将本书取名《追寻现代中国》,是想藉以强调以下宗旨:

第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统治者和针砭时弊的批评家都反复寻求经久之策,以巩固国家边防,理顺官僚制度,克尽地利人力以免受外国干涉,培养敏锐而严格的知识工具以衡量政治行为的功效和道德。

第二,虽然中国不必追从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但中国仍像保持自己永恒的价值观念一样,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去适应和改造它。我们将要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

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第三,本书仍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非其结果。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如果我们用这种开放的意识使用“现代”这个概念,就不难发现“现代”的含义也是随着人类生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并不能简单地将“现代”的意义等同于当代世界,而把过去托付给“传统”,把将来交给“后现代”。我倾向于认为在1600年或更早——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不论是那时,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

第四,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将能弄清中国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十七世纪的晚明和清初,中国政府就以握有超越一切的真理之名行使权力,限制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追求。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国也宣称,他在走自己的道路。但是适应用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的同时,它又竭力使其人民不受腐化风气的熏染,这无疑是在重演十九世纪谨慎探测的一幕。在单一的政体中统治十亿公民,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在十八世纪,中国首次出现沉重的人口压力,从那时开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经济和民间社会管理的影响。

其他很多领域里也都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规定女性低微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和行为;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孩子们尊重长辈和义务观念的教育方式;作为组织单位的家庭的力量;当地社区某些人获取和拥有可恣意滥用的权力的能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自1600年以后都能以各种形式看到。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审美追求和语言创新,掌控巨微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程序,都同样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至今莫不如此。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我们的叙述还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劳作的中国人是怎样频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抗争国家权力,1644年,1911年,还有1949年,对现状的绝望,对过去的缅怀,加之对未来的热切渴望,摧毁了旧的秩序,开创了通往新秩序的扑朔迷离的道路。有了对过去那些斗争活动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加敏锐地理解现在中国内部彼此对立的力量,以及这个不平静的国家最终能否有机会在现代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1989年秋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征服与巩固	1
第一章 晚明	6
1. 明朝的余辉	6
2. 城镇与农村	11
3. 堕落与困境	16
4. 明朝的崩溃	21
第二章 满人的征服	27
1. 清的崛起	27
2. 征服明朝	33
3. 适应对中原的统治	39
4. 阶级与反抗	45
第三章 康熙的巩固	62
1. 三藩之乱:1673—1681	62
2. 台湾和海上中国	67
3. 绥服士人	72
4. 确立边界	78

5. 复杂的遗存	83
第四章 雍正的权威	89
1. 经济结构	89
2. 税收问题	97
3. 中央与权力渠道	101
4. 道德权威	106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与乾隆政权	113
1. 如日中天	113
2. 十八世纪的儒学	118
3. 《红楼梦》	123
4. 乾隆的晚年	127
第六章 中国与十八世纪的世界	135
1. 管理“外夷”	135
2. 外国人与中国法律	141
3. 鸦片	146
4.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150
第二部分 分裂与改革	171
第一章 与西方的首次冲突	177
1. 中国儒士的回应	177
2. 中国政治的回应	181
3. 英国人的武力反击	187
4. 新的条约体制	193
第二章 内部危机	202
1. 南北社会的动荡	202
2. 太平天国	206
3. 外国的压力	215

4. 捻军之乱	218
5. 回民的暴动	222
第三章 改革以求中兴	229
1. 儒士的改革	229
2. 确立外交政策	234
3. 传教士问题的出现	239
4. 海外华人	246
第四章 清朝晚期新的震荡	255
1. 自强运动和甲午战争	255
2. 1898 年的维新运动	262
3. 民族主义的三个面向	269
4. 新兴的力量	277
第五章 清朝的覆灭	297
1. 清朝立宪	297
2. 新铁路、新军队	302
3.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307
4. 清朝的覆灭	313

征服与巩固

第一部分

十

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但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现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现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晚明的国家与经济像结构稀松的织物，开始从许多点上分崩离析：赋税收入的锐减使军费供给陷入窘境；军队的逃散加快

了敌对部落的入侵；西方白银的涌进给明朝经济带来意外的压力；官仓疏于管理，年景不佳导致农村人口营养不良、疾病蔓延；不满于政府统治而纷纷起来作乱的流民为了生存拼合成了若干强劲的武装。到1644年，所有这些因素拧成一条致命的绞索，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送上了自缢的道路。

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北部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满人在预备征服全国以前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统治中枢，他们的胜利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随着这些制度的实行，以及大量归降或被俘的明人成为其政治顾问、士卒、工匠及农夫，满人于1644年不失时机地进军中原。

数十万大军横扫全国的历程足以向我们展示中国地域的辽阔，这一点当年满人在征服活动中一定感同身受。明朝国内的农民叛乱武装及众多的政府残余势力各自割据一方，对抗满人的征服。满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进军方式正是遵循了中国的地形特征，同时也顺应了将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紧密融入新的国家结构的需要（在中国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长期分裂后，共产党于1949年统一全国时选择的进军时机和路线可谓满人入关的惊人再现）。

实现对中国这样辽阔国度的征服只有将众多的汉人支持者纳入满人的行列，依靠汉人管理者在满人的旗帜下实施统治。当一些明王室后裔仍负隅顽抗时，大部分汉人已接受了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承诺基本上维持汉人的传统信仰和社会结构。即使满人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那也是随即结束，满人新建的清朝岿然屹立，直到1912年始终维持着对中国的统治。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不论清朝还是其前后的统治者——巩固国家需要致力于广泛的战略、经济及政治措施的建设

设。清朝长治久安局面的主要缔造者是1661~1722年间在位的康熙皇帝。他有条不紊地巩固了中国南部、东部、北部和西部边防,同时还完善了其祖先入关前建立的尚欠成熟的若干制度。康熙特别致力于恢复有效的科举制度,改进国家可靠的情报传递渠道,努力赢得那些心怀异志的士大夫的支持,缓解满汉间在政府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在经济领域中他成绩甚微。尽管在他统治期间商业和农业兴旺发展,但税收并未得到有效保障,这也成为了清朝始终存在的一大弊端。

康熙的儿子即位后,在此基础上锐意进取,特别注重改革税收制度,管理文化生活,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强化中央权力结构。但是,十八世纪末,随着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精神世界也日趋崩溃。国家机器的无能和腐败削弱了其反应能力,对于国内的问题它无力直面解决,而只能迁延逃避。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随着富于挑衅性的西方商人远航到中国海岸,并受到中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约束,中国既定的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应同样显得异常的迟钝和无能。清政府在外交及其他方面不能随机应变地适应形势,为十九世纪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埋下了祸根。那些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十分崇敬中国的十八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开始鞭辟入里地考察中国的衰落。他们指出,如果中国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那么终有一日,它必将走向毁灭。

第一章 晚 明

1. 明朝的余辉

1600年的中华帝国仍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从德里到巴黎,并不乏盛大的典礼和庄严的仪式,但是这些都城无一能够自诩其宫殿的复杂精妙堪与北京媲美。紫禁城蜿蜒环抱的高墙,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以及宽敞华丽的大理石庭院象征着中国皇帝的权威。鳞次栉比的宫殿,设计精细,寓意深刻;威严的阶梯、宽大的门户、宏伟的拱门一律朝南,这一切都向所有的来访者展示着中国天子的特殊地位。

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力图建立系统的官僚机构,以扩大税源,更有效地管理日益扩大的疆域,同时为王室带来农业和贸易资源。但是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已臻于成熟,千年的传统使其能够协调运行,丰富而稳定的律令体系将官僚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律令体系足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

问题。

这个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在北京，为皇帝服务。京城中这部分精心设置的官僚集团将国家事务分由六部执掌，分别负责财政、人事、礼制、刑法、军事和公共工程。在北京还有一些博学资深的学士，帮助皇帝处理礼仪事务，奉职修史，教化皇室子弟。在宫廷供事的官员则与为数庞大的宫廷职员一样谨慎而恭敬地为皇帝的个人需求而工作。这些人包括后宫嫔妃及侍候她们的太监、皇室子弟及侍女、禁卫军、御厨、马夫、清洁工、挑水工等。

中国官僚系统的另一部分由分配到明朝十五个省供职的官员构成。这些职位也同样经过精心设置，最上层是省府官员，依次而下，分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州府官员和各县的官员。县官之下是维护治安的士卒、驿站的邮差，以及定期向农民征税的税吏。还有一群官员即御史则负责监察包括北京和各省在内的整个官僚系统成员的品行。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较大的城市都以砖石构筑，给人以坚不可摧的感觉，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并非如此。除了少数著名的宝塔外，中国也见不到基督教大教堂和穆斯林城市中的清真寺尖塔那样直插云天的高耸建筑。但是这种低矮的建筑风格并非说明财富与信仰的匮乏。中国有很多富丽堂皇的佛寺和道观，显现着人们对自然的尊奉，还有很多供奉祖先的祠堂和祭祀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的孔庙。在中国东部的城市和穆斯林主要居住区的西部地区伊斯兰教寺院星罗棋布。中国还有一些犹太教堂，那是早期来华的犹太旅行者的后代们集会之所。那些零散分布的基督教信徒使人们还保留着对早在一千年前传入中国的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依稀记忆。中国城市建筑及宗教场所缺乏高大宏伟的气派丝毫不代表中国人缺乏公民的荣耀和对宗教的漠视，其根源恰恰在

于政治。中国政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中国政府既不可能允许与之比肩的权力中心存在,也不可能放任独立自主的城市发展。

回头审视,我们可以看到,自 1368 年开始统治中国的明王朝的政治顶峰在十七世纪初已告终结。然而在 1600 年前后中国的文化生活却繁荣兴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如果枚举十六世纪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较欧洲的社会,不难发现,同一时期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逊色。中国没有一位剧作家可与莎士比亚比肩,但是 1590 年代汤显祖所创作的生动曲折的青春爱情、家族关系、社会矛盾等题材的戏剧,剧情之细腻丰富、跌宕起伏都不稍让于《仲夏夜之梦》或《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中国没有一部作品能及已成为欧洲文化经典的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但是创作于 1590 年代的《西游记》以其对传奇惊险的取经过程的成功描写而成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小说。小说中的英雄孙悟空——一只陪伴唐僧远赴印度取经的赋予了人性的顽皮猴子,至今仍是中国人民间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必与欧洲作进一步的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的作家、哲学家、诗人、画家、宗教理论家、史学家和医学家都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其中很多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经典。

在所有这些成就中,也许短篇故事和通俗小说最充分地代表了明朝社会的活力。因为这些作品面向一批城镇中的新读者群,将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创作活动聚焦于日常的生活细节。在一个主要由男性主宰的社会里,这些也说明了具有读写能力的女性数量的不断增长。明朝晚期的社会理论家们指出,女性中文化知识的普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增强道德伦理,促进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的管理不无裨益,这些也都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风化。另一些对女性独立性增强持批评态度的

人则认为,这一现象会破坏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

这些问题在中国另一部伟大的小说——一位匿名作家写于1600年代的《金瓶梅》中得到一一体现。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社会生活,清晰率直地渲染性欲。小说通过男主角(他通过商业及与官府的勾结获取财富)与其五个代表人性不同方面的妻妾的关系刻画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说,《金瓶梅》可以当作寓言来欣赏——一个道德领域里的寓言——阐述贪婪与自私是如何毁灭那些本来拥有无数幸福良机的人。这部小说也有深入写实的一面,与这方面为数不多的佳作一样揭示中国大家族里的勾心斗角和冷酷无情。

小说、绘画、戏剧,以及宫廷生活的概貌和官僚机构的运作,无不显示了晚明帝国的辉煌与富庶。那些殷实豪族大多离开乡村,住在较大的商业城镇里,通过建立以男性世系为基础的宗族血缘组织凝聚在一起。这些血缘组织通常拥有大量土地,为兴办义学、在艰难时期赈济同宗,以及家族成员祭祖的宗祠的维持提供经费。豪门高墙之中是难以描述的富足。巨大而精巧的花园不仅使人享受装饰的美感,供人休闲娱乐,而且为花园的主人及其家人出产水果、食物和鲜花。豪门大家的府中充斥着中国工匠的作品。这些工匠有时受雇于官府工场,而更多的是在行会控制的小工场里劳作。为女人们增添秀色的丝绸织锦,使丰盛的晚宴更为体面的清白瓷都备受富人们的钟爱。亮丽的漆器、翠绿的玉饰品、轻巧的窗格、雅致的象牙制品、优美的景泰蓝、光泽的紫檀家具使富人们的府宅熠熠生辉。雕刻精美的木制或石制笔架、华贵的纸张、能研磨出最纯正墨汁的墨和砚,所有这一切在文人们未下一笔时就已营造出了一个肃穆而美好的氛围。明朝晚期,人们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标准已趋成熟,那些新贵们也可以让富有声誉的古玩商们把自己的豪宅装饰得高雅得

体。但毫不奇怪,这些复杂而奢华的享受也伴生出一个地下造假系统,蒙骗那些粗心大意者。

与宅院的豪华陈设相互辉映的是永不停息的觥筹交错的喜悦气氛。辣虾、豆腐、脆皮鸭、水煮栗、糖果、清茶、爽口的美酒、果脯以及新鲜的水果和果汁等各种美味佳肴鱼贯而入呈上宴席,人们于杯盏往来之间畅谈文学、宗教和诗歌。盛宴刚罢,乘着奔涌的酒兴,一幅上乘的画作就可能在这样的家庭聚会中问世。试图探求古代名家真谛的客人也在酣饮心悦之余挥毫泼墨。

居于社会经济上层的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因为饱读经书而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这些经典一直可以上溯到孔子之前的三代。当理论家们就教育对于女子是否有益争论不休时,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富家子弟能够享受。他们大约六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接着又进入学校学习或延请私塾先生,每天背诵、解读、钻研经典,到二三十岁,他们或许有能力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及第以后,便开始进入艰难、荣耀而又前途无量的仕途,从地方官一直做到天子脚下的京官。法律禁止女性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在那些氛围良好的家庭中,女子也常常跟着她们的父母和兄弟学习写诗。青楼的妓女则通常都精于吟诗弹唱,通晓技艺,藉以博得那些饱读诗书的主顾们的青睐。大户人家的女子还能聘请女性私塾教师,与别的女性一起参与各种文化生活,交流诗作,相互拜会——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因为十世纪时活字印刷在中国就已得到发展,为私人的广泛藏书创造了条件,各种哲学、诗歌、历史和道德训诫的读物自然也广泛传播。

在十六世纪仍然有一些正统文人对通俗的娱乐作品不屑一顾,但这些作品还是广为传播,形成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现

象。与自己喧闹嘈杂的生活相比，城市居民们在这些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中找寻到了恬淡自然的本性和井然有序的生活。这种怡然自得的感觉在剧作家汤显祖于 1598 年创作的《牡丹亭》中达到了极至。汤显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剧中人物——富于学养的太守杜宝之口表达出来。杜宝因政务的顺利而心旷神怡：

山色好，
讼庭稀，
朝看飞鸟暮飞回，
印床花落廉垂地。

卸却公职，忘掉案牍，人们的闲情逸致被平和而有序的思绪唤起，随心所欲地享受返朴归真的愉悦：

红杏深花，
菖蒲浅芽，
春时渐暖年华，
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①

饱览花红柳绿、小桥流水的春色，确实是令很多人陶醉的时光。只要国家的边境安宁，官僚机构顺利运转，农民勤苦劳作，工匠们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也许明朝的繁盛将长久延续。

2. 城镇与农村

明朝城镇的气氛——特别是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繁忙而兴旺。其中一些城镇是热闹的政治中心，地方政府的官署设置于此，履行其征税和行政管理职责。另一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市场和贸易决定着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多数

城镇都有环绕的城墙，入夜以后即关闭城门，实施管制。

与世界其他地区城镇一样，中国的城镇也可以根据其功能及专业化程度来分类。例如，地方市镇是棺材匠、铁匠、裁缝和面点师们聚居之所。他们的零售店销售一些特殊的商品，如工具、酒、首饰，以及祭祀用的香、蜡烛、冥钱等。市镇还设有歇脚的客栈。较大的市镇更是商旅云集，富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此采购，市镇中有染布作坊、制鞋匠、铁匠铺、制作爆竹者，还售卖竹子、细布和茶叶。来这里旅行的人还能找到浴室和旅馆，可以出钱召妓。在城市的等级结构中，比市镇层次更高的是整合几个市镇贸易的城镇。城镇中有销售各种文具、皮革制品、装饰用的灯笼、供奉在神坛上的雕刻品、面粉、铁器等店铺，以及印章雕刻匠和出售漆器的人。在这里，客人们可以找到当铺及当地经营现钱汇兑的“钱庄”，租一顶轿子，造访舒适豪华的妓院。^②当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顾客们更为富有，于是财富也时而剧烈、时而潜移默化地蜕变为颓废、势利的风气和剥削行为，与此相伴的是市场特殊奢侈商品的日增月长。

在市镇之下，处于城市等级结构底层的是若干规模很小的乡村草市。由于居民的贫困和分散，草市并没有很多店铺和匠人，只是定期的集市，其中的大部分商品是那些游动不定的小贩售卖。草市上既没有富人们定居，也没有设置任何官署。因此，最简易的茶楼、路边的货摊、不定期的庙会都可能成为人们唯一的娱乐场所。然而，这些很小的草市却发挥着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们是各种消息和传闻的集散地，是说媒相亲的场所，起着简单的社会教化的作用；是当地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游方于各地的剧团演出之处；是官府税务征收点，同时在非常时期还发挥着分散和减轻灾荒的作用。如果以明代城镇的发展来代表诸如商品交换、服务行业、建筑风格及其复杂的内

涵,国家管理机器的构成等所有方面的状况,未免以偏概全。同样,据此也显然不可能概见农村丰富多样的发展状况。实际上,中国城乡之间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因为城郊的农业耕作常常就在城外,有时甚至在城墙之中。在农忙时节,工匠们也可能在土地上耕作。在青黄不接时,农民也会在城镇里干些零活。

淮河横贯于中国的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区域,其以南地区的农村最为富庶。这里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使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成为可能。这个地区无数的河流、沟洫和灌渠纵横交错,滋润着青翠繁茂的菜园和禾苗茁壮的稻田,也灌注了众多盛产鱼鸭的湖泊和池塘。季节性的泛滥淹没稻田,为土地不断补充所需的养分。在江南地区,农民种桑养蚕,生产茶叶和很多其他能带来副业收入的产品,使农业经济呈现多元化的结构。在华南地区,除了基本的农作物以外,还出产甘蔗和柑橘。在山峦叠嶂的西南地区,竹林和名贵的木材也能带来副业收入。在中国的南方,水路运输快捷而便宜。农村以血缘为纽带的强有力的宗族组织把各个社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虽然淮河以北的地区也不乏富庶的乡村,但总体而言,那里的生活要艰苦得多。冬季异常寒冷,冷空气从蒙古呼啸南下,侵蚀大地,淤塞河流,狂风挟带着细沙,吹打着那些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的人们。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小米,在耕作过度的土地上,只有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在分布零散的农村,人们辛勤地收集人畜粪便,为土地补充肥力。苹果、梨等水果,大豆、棉花等作物长势良好。但迨至十六世纪末,树木大量被砍伐,土地裸露,含带泥沙的黄河水流,蜿蜒曲折地穿过广阔的平原,奔向大海,成为一股不可预测的力量。没有南方的堤坝、稻田和沟渠的阻碍,盗贼武装可以横扫北方的乡村,骑兵部队游弋于行动缓慢的步兵的前面和侧翼,为其提供警戒和

保护,抵抗来自要塞的反击部队。北方农村的宗族组织也更为薄弱,村庄之间大都相互孤立,社会生活更是各自为阵。吃苦耐劳的自耕农与殷实富裕的地主或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的生活水平并无天壤之别。

中国农村社会的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将地主和农民截然分开。例如,每位富裕的地主都生活在较大的城镇里,而许多财产规模较小的地主则住在农村,出租其部分土地,或雇佣短工耕种土地。与此相似的是,无数的自耕农占有超过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土地,也可能雇佣季节性的短工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另一些占有的土地不能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人,则可能租种一些土地来聊补生计,或在农忙时节偶尔去打短工。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兼营手工业,正是这些手工业将农村家庭与市场网络联系起来。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比想象的更为复杂。政府希望对每一笔土地交易都能征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税之后就在契约上盖上官府的红印。毫不奇怪,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费用往往私下定立契约。土地买卖的定义也因而变得模糊不清。大多数土地买卖也就约定俗成地理解为卖方以后可以用买方最初的购买价赎回土地,或卖方在买方获得土地耕种权后的一定时期内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如果地价上涨,土地无法耕种,被水淹没,或者在上面建了房,这种法律和财产上界定的模糊就常常引起家族的争端甚至仇杀。

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小农都显现了他们勤劳和遭受了不虞之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谋求生存的能力。遭受旱涝灾害时,有各种互助方式,借贷、赈济等能帮助他们及家人渡过难关。也许去做些零活,如当看门人、

灌溉工或纤夫等藉以度荒。小孩也订立或短或长的契约，到富裕人家做家仆。女孩子则可能卖到城里，甚至最终沦落妓院，但至少她们能够保全性命，家里也可以少一张嘴吃饭。但是，如果除了所有这些苦难，而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结构也开始瓦解的话，那么情况就真正变得无可救药了。如果市镇彻底凋敝，如果绝望的人们开始结成团伙在农村游荡，夺走农家用以过冬的仅有储备，偷走他们精心储藏以备来年春播的最后一点种子，穷蹙无计的农民只能抛弃土地——不论土地是租借的还是私有的——加入到流民的行列之中。

十七世纪初，尽管富裕的精英阶层的生活仍然繁荣奢华，但整个国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政府没有有效地赈济城市里的贫困居民。虽然城镇将农村穷困人口拒之门外，其危机也可能从内部爆发。高额的税收和不稳定的工作使数千苏州的纺织工人陷入绝望，并于1601年发动罢工，他们烧毁房屋，对其痛恨的当地暴吏施以私刑。同一年，在苏州的西南方，江西省境内的瓷都景德镇也有数千名工人因为待遇太低及明朝宫廷的贪得无厌，提高御用的精美“龙碗”的生产配额而发起暴动。一名窑工跳入熊熊燃烧的瓷窑自尽，这恰恰凸显了他的同伴们所面临的困境。在同一时期，很多别的城镇也都可以看到多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动荡。

城市和乡村都不再太平。明朝晚期，农村也时有反叛事件发生。在早些时候，这被视为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使然。这些常常伴随着暴力的事件主要有两种形式：订立了契约的佃农或奴仆反抗主人，试图获得人身自由，以及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他们认为不公平的地租。

尽管暴乱还只是一些偶发的事件，尚未普遍发生，但这足以向富有阶层发出严重的警报。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满怀热情

地描述了官宦们欢悦的生活，而对农村的庄稼汉则不无嘲讽，故意用低俗的词句描写了乡野农夫们粗鲁的生活：

泥滑喇，
脚支沙，
短耙长犁滑律拿，
夜雨撒菘麻，
天晴出粪渣，
香风腌鲊。^③

这首曲子听起来诙谐有趣。但是，那些醉心于汤显祖戏剧的听众们还未意识到，当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劳作的民众一旦试图推翻他们的统治者时，将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3. 堕落与困境

表面看来，晚明时期的文化和经济生活繁荣富庶，然而其社会结构中已寓含着衰败的危机。危机的根源之一正是来自国家的统治中心。1572—1620年在位的万历皇帝即位之初在才智不凡、经验丰富的大臣们的辅佐下确是一个勤政尽责的统治者。但是自1580年以后，万历帝蛰居紫禁城，深居简出。与朝臣在立太子问题上的争执使他日渐厌倦朝政，森严的宫廷护卫使他无法实现巡幸各地、亲帅三军的愿望，对朝中大臣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也甚感厌烦。他连续多年不上朝理政，停罢经筵，不批阅奏章，甚至朝中官员出缺也不增补。

万历帝不理朝政导致本来仅限于管理宫廷日常事务的太监权力膨胀。在中国，宫廷中使用太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明代的太监数量超越历代，万历朝时京城有一万多名太监。由于

皇帝深居于紫禁城这个只有皇族及其侍从们生活的封闭世界里，太监便成了联系外朝与宫内的主要渠道。大臣有事要上奏皇帝，首先要取悦太监为之转奏。太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索取回报的机会。随之，心怀叵测的大臣们就向那些有权势的太监献媚行贿。

到1590年代，太监们结成阉党，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万历帝派遣太监们到各省收税，使其权势日益嚣张。他们以高压手段办理案件，对地方的富家大族施暴，指挥厂卫恣意妄为，监禁、拷打，甚至杀害他们的政敌。太监权力的泛滥在魏忠贤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最初侍奉万历之子的王妃，随后机敏地攫取权力。1620年代，当万历的孙子在位时，魏忠贤已操纵了朝中大权。在其权倾一时之际，他令人编撰史书，毁贬他的政敌，下令全国各地为其建立生祠。

虽然批评皇帝及其宠臣的人通常是会有危险的，但一些大臣和有识见的士大夫们还是为朝廷的现状忧虑。士大夫们从理论上探寻导致朝政败坏的根源，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朝政的败坏因于道德的普遍沦丧、教育制度存在的痼疾，以及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的膨胀。在很多批评者眼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初哲学家王阳明。王阳明在其书中提出，伦理认知的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道德本性之中，因此，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凭借良知去理解客观事物的真谛。正如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写的：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④

他还说道：“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但王阳明也积极提倡知行合一。在其弟子们讲学授徒的活动中，王阳明

的学说导致了有悖世俗的乖张行为。他们拒绝传统的教育方式,呼吁新的平等主义。

为了抵制这一潮流,十六世纪晚期一些严守儒家正统道德观念的士大夫们开始聚合成若干探讨哲学的书院。在这里,他们准备科举考试,宣讲伦理道德。他们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由宣讲伦理道德进而涉及政治。对政治的讨论又随之催生政治改革的愿望。到1611年,在所有的书院中,创立于1604年的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东林党人竭尽全力使腐败的大臣从京城的高位上被罢黜。1620年万历帝去世,东林党地位剧升。在明光宗、熹宗两朝,很多东林党人应诏入仕。皇帝期望他们用其学说经世治国,巩固国家边防,增强国内经济。但是他们孜孜不倦的道德训诫使新皇帝感到厌倦。一位东林党的领袖又触犯了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深受皇帝宠信,魏曾因报复而将一名资深的大臣打死在宫中,皇帝竟然也对他未加斥责。

皇帝的缄默使魏忠贤更有恃无恐。1624—1627年间,魏忠贤与其一群朝官中的党羽对东林党成员们同时发动可怕的袭击。很多东林党人被杀或被迫自杀。虽然魏忠贤自己最终也被治罪,并于1627年自杀,但朝廷的威信已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也许是无法挽回的。这正如一位东林党领袖得知前来逮捕他,自知难逃一死时写给他朋友的绝命书中所感叹的,我原为朝廷首辅,首辅蒙羞即朝廷蒙羞。^⑤

学术和政治上的所有这些纷争加剧了外交和经济领域里业已存在的危机。十六世纪的中国已经面临着一系列威胁,游牧的蒙古族赶着牛羊从北方和西北向北京步步逼近,海盗则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明朝初期还通过互市和外交控制着蒙古,现在蒙古军队却频频攻击中原。一次,蒙古军队还俘获了御驾亲征

的明朝皇帝,还有一次,他们的骑兵几乎直逼北京城门。到十六世纪晚期,尽管明王朝试图加固长城,增强戍守,但还是只能依靠定期贡市才能阻止蒙古的侵袭。在东南沿海地区,海盗集团劫掠中国城市。海盗势力有时多达数百股,既有众多的日本人,也包括大量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有从位于澳门的葡萄牙哨所逃脱的黑奴。这些海盗集团随意抢掠,劫夺男女以勒索赎金。

虽然至 1570 年代,海盗侵扰的狂潮已被遏止,但日本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1590 年代,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入侵朝鲜。战斗异常艰难。明朝将朝鲜视为忠诚可靠的同盟而不惜代价给予保护,毅然出兵,支援正处于困境中的朝鲜人。三个国家都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日本国内发生内乱,同时朝鲜的海军有效地截断了日本的供给线而使日本不得不于 1598 年从朝鲜撤军,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澳门又代表着中国面临的另一种新的问题。这个位于广州西南的一个半岛顶端的小镇于 1550 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被葡萄牙人占领。1660 年代,明朝廷下达了禁止中国商人与好战的日本开展直接贸易的禁令,葡萄牙人乘虚而入,充当了中国与日本的中间商。他们在市场上收购中国的丝绸,然后转销给日本,再从日本贩易白银,往来贸易,谋取利润。中国的银价高于日本,这使葡萄牙人一次的往返贸易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本来收购中国的丝绸。葡萄牙人使白银持续不断地涌入中国,这本身仅仅是十六世纪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的大规模白银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核心是墨西哥和秘鲁,其银矿资源的丰富令人难以想象。它们都处于西班牙人的占领下,白银的开采要获得西班牙皇室的特许。1570 年代,当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新基地,美洲的白银也开始流入中国。这个新

的白银来源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蚁聚马尼拉。他们售卖中国的布匹和丝绸,带回白银,更为白银涌进中国的潮流推波助澜。随着白银流通的推广,贸易的活力也渗透各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投入到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来。万历皇帝国库白银的储存也日见增长。然而,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为中国商人增殖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城市经济畸形增长瓦解了传统的经济模式等。明朝晚期在稳定通货方面的努力也告失败。

万历帝的统治随着他于 1620 年的去世而终结,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因多种因素开始衰退。中国商人的势力日益兴盛,他们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创办了汇兑银票的钱庄。而此时,他们也遭受了战争的侵扰。中国政府以农业为根基,从未有效地实现对商业的税务监管,但是中国的商人们却遭到巡视各省的腐败太监及其党羽的勒索,甚至没收财产。政府在抗洪和赈灾方面的无所作为给地方带来严重的危机,使能够有效保障税收的地区越来越少。

万历皇帝统治晚期,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在位期间,中国农民的境况也日益恶化。信奉新教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打败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其贸易帝国日益扩大,国际贸易的格局也随之改变。中国的白银进口量急剧下降,进而刺激了白银的囤积,导致了银铜比价的下降。1630 年代还是一贯铜钱换一盎司白银,到 1640 年已变成一贯铜钱换半盎司白银,也许 1643 年已变成一贯换三分之一盎司。这对农民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必须以白银纳税,而他们在市场上售卖农作物所换得的只是铜钱。^⑥

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异乎寻常的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通常使农作物的生长季节缩短两周,使得饥荒变得日益频繁(有时把

十七世纪称为“小冰期”。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的农耕区都受到类似的影响)。当自然灾害和税收增长与过度征兵、士兵的逃亡、赈济制度的废弛、水利工程几乎全部毁弃等现象相伴发生时，国家所承受的负荷，以及接踵而至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所有的危机都迅疾爆发时，不论宫廷权贵，还是朝中和地方的官僚都对时局束手无策。

4. 明朝的崩溃

在十七世纪的前十年中，明朝廷逐渐丧失了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其赖以生存的赋税结构也随之瓦解。同时，明政府财政匮乏，无力供养军队以抗击势力日增、辖地日广的满洲地区女真部的进犯。朝廷一方面对尚可控制地区的人口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大量裁减对朝廷威胁还较小的西北地区的雇役。李自成就是朝廷为节省支出而裁减的驿卒。

李自成以前曾在酒馆做事，还做过铁匠铺的学徒，是那个时代居无定所、性格刚烈的陕西人的典型代表。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贫瘠的省份，位于黄河大转弯的内侧，北部的荒凉山区一直延抵长城。陕西至北京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从华盛顿特区到芝加哥，但陕西省为山脉环抱，易守难攻，历来成为各种反叛势力积蓄力量，揭竿而起，进而侵犯丰饶富庶、人口稠密的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天然堡垒。

1630年，李自成一度在陕西西部入伍从军，但朝廷再一次令他失望。由于被克扣了军饷，李自成和其他士兵发动了兵变。在随后的几年中，李自成逐渐脱颖而出，成为这些数以千计的离开家园的造反队伍的自然领袖，证实了自己拥有的军事家的天然智慧。1634年，在陕西南部的一条山谷里，起义军被一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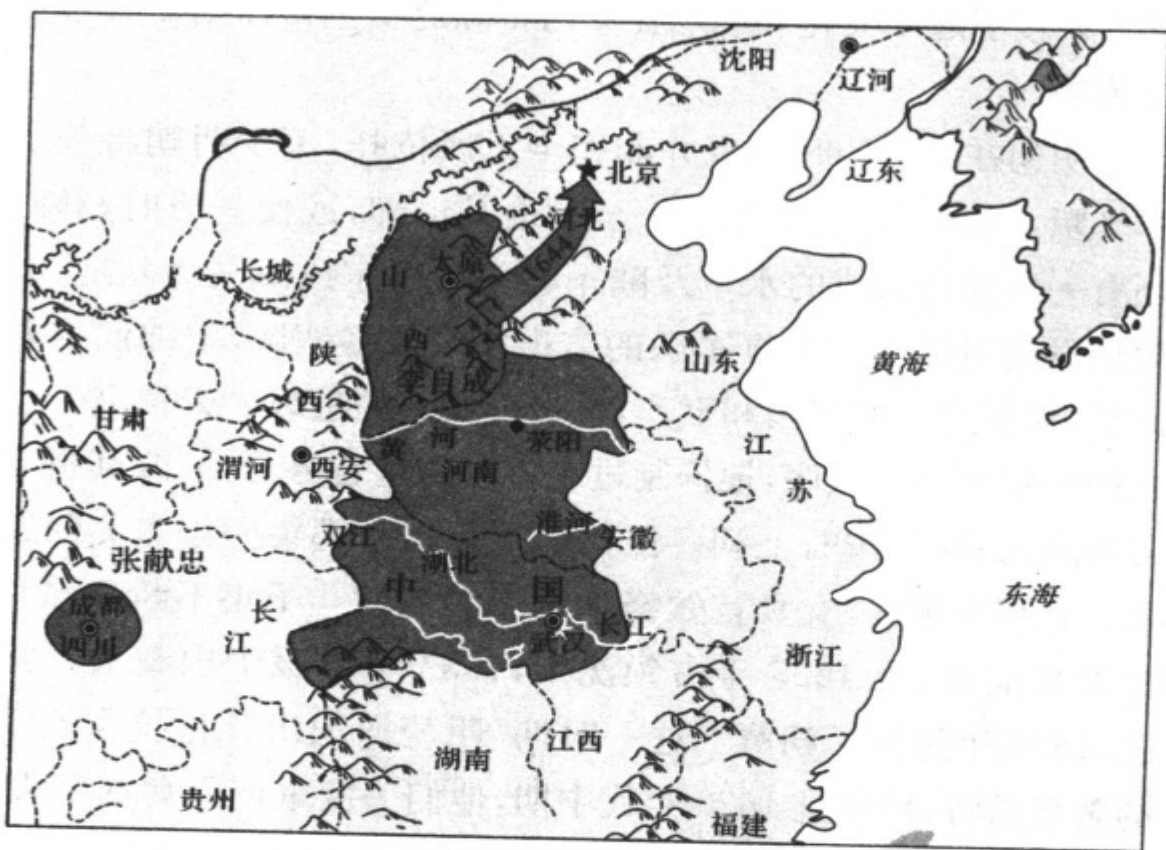
干的明政府将军打败，李自成也被俘。李自成在承诺把他的军队撤回荒凉的陕北地区后被释放，但这个协议因一位地方官员处决了三十六名反叛者而破灭。李自成起而报复，杀死地方官员，率部上山。到1635年，他的势力发展得空前强大。在黄河南岸的河南荥阳举行的起义军首领们的秘密会议上，李自成便是与会的首领之一。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部分势力最大的起义军首领还分割了各自在华北的势力范围，并准备联合进军北京。但事实证明这些鱼龙混杂、纪律松散的军队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是十分困难的。起义军联盟占领并掳掠位于京城之外的明朝皇陵，监禁在那里服役的护陵者，但到1635年末，联盟已开始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当时在位的崇祯帝（即万历帝的孙子）闻讯后服丧祭祀，向祖先谢罪，并逮捕了几名主管官员，处决了护陵的太监。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李自成要一同参与掳掠的起义军将皇陵中演奏礼乐的太监分给自己。起义军之间的争吵显示了起义军的暴烈及其联盟的脆弱。俘获这些太监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虽然勉强应允，但却捣烂了太监们所有的乐器。李自成后来还是杀死了这些命运不济的太监。

在随后的几年里，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各自的部队游历于华北和华中，不断转移，偶尔相互合作，但通常是相互争夺明政府和其他反叛势力的地盘和人员，彼此长期不和。到1640年代初，他们各自建立了根据地。与李自成一样，张献忠也曾在明朝陕西的军队中服役，后来开了小差，他在长江上游的腹地、四川省富饶的中心——成都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李自成则在湖北建立了根据地，其势力范围覆盖了陕西和河南大部分地区。

李自成和张献忠之乱以及与之同时伴生的瘟疫使中国饱受创伤。据一些亲历者记载，瘟疫使很多地区农村人口损失过半。

一位学者描述 1642 年浙江的情况道，疫情大面积出现，十之八九的人户未能幸免。最甚者，十至二十人之家，无一人不染疾病，甚至无一人获治。最初，死者尚得人棺殓葬，随着死者益众，后来皆弃之荒野，最后只能任其停尸床榻。一位目睹河南省疫情的人记载道，1643 年夏的一座大城市里，街上人气无存，充耳听到的只是苍蝇的嗡嗡。⑦



晚明农民起义示意图

瘟疫夺去了无数的生命，也促使人们对传统的中医理论进行反思，尽管未能探寻到新的疗方，但当时的医书发展了一项治疗流行病的新理论。1642 年，一位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夫写道，中国不惟受到气候多变的影响，也导致了使天地失衡的邪气的侵扰。气本是自然界的中和之物。他写道，邪气通常出现于战争和饥荒之年，看不见，听不到，却恣意肆虐，使百姓蒙

难。如果百姓起而与之抗争，它们便各使其性，生出各种疾病。当疾病发作，人们有时脖子肿大，有时头面浮肿……有时腹泻不止、间歇发烧，或是内腹绞痛，满身脓胞，出现皮疹，皮肤瘙痒，身长疖子。^⑧虽然这些诊断分析无助于确定疾病性质，但在证明1640年代中国遭受了多种灾难方面仍有其重要性。也可能是满族人早期入侵时把病菌带给了没有天然抗体的汉人，一如欧洲人入侵引起了天花和麻疹在墨西哥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

明朝在最后的时期也并非完全无所依托，不少明朝将领率军平叛，间或打败起义军——至少迫其退却，或使其暂时归降。还有一些独自为战的水军及陆军将领以山东或海岛为基地，有效地发动对辽东的女真军队的袭击。在很多地区，士绅们招募武装，保护自己的家园和财产，抗击起义军的进攻。崇祯皇帝也试图整顿朝廷的秩序，他抑制过度膨胀的宦官势力，一改其祖父万历帝的状况，按时上朝。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东北问题上。在那个地区，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正不断巩固和扩大其地盘，于1625年占领沈阳，1632年收服了内蒙大片地区，1638年降服了朝鲜。这一时期，明朝涌现出几位抗击女真的著名勇将，特别是1620年代中期，他们一度重创了女真军队，并收复数座城市。但是北京的派系争斗和捉襟见肘的财政使明朝无法实现平定东北的大业。

明朝的著名将领当首推袁崇焕，他的经历可以视为明朝晚期种种危机的见证。作为中国南方一个受传统教育的文人，袁崇焕年轻时即入朝为官。1622年，袁崇焕到东北南部视察，自信他能守卫通向北京的要径。袁崇焕从他一个认识一些西方人的厨师那里了解了有关西洋火器的丰富知识。作为兵部的大臣，他有能力凭藉辽河抗击努尔哈赤。1628年，他被任命为整

个东北地区的军事统帅,但是次年他出于猜忌,处死一位很有才干的下属。1630年,当女真军队攻至北京附近时,袁崇焕被诬陷私通敌方,并被指控为叛国罪。朝中的政敌、被他处死的下属的朋友,以及宦官集团都一致与他为敌,使袁崇焕毫无澄清自己的机会。结果他被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刑法中最羞辱、最痛苦的处罚方式:在北京的市中被千刀万剐。后来的文人把他奉为中国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来纪念。袁崇焕的后继者无一人才干能及他。袁崇焕死后,虽然仍有一些北方的将领效忠明朝,但很多将领开始投靠敌方。对袁崇焕的诬告现在正开始在他们身上变为真真切切的现实。

最后不是女真的清政权而是起义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1644年,李自成对北京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率领数十万大军,席卷华北,洗劫敢于抵抗的城镇,收编投降的军队。他还发动了一场高明的宣传战,揭露明朝统治的贪婪残暴,许诺将给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带来和平与富庶。1644年4月,他的军队兵不血刃地进入北京,北京的城门向他洞开。据记载,崇祯皇帝听说起义军入城后摇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当无一人应诏时,崇祯皇帝走到紫禁城外的皇家花苑。花苑里有一座小山,皇帝和他的嫔妃们过去常常登临山峰,俯瞰北京全景。这次皇帝没有登上小山,而是在一棵树上自缢而死。明朝自1368年统治中国以来,历经兴衰,其末代皇帝最后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注释：

- ① 汤显祖著，伯尔契(Cyril Birch)译：《牡丹亭》，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2页。
- ②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51页。
- ③ 前引汤显祖著，第34页。
- ④ 王阳明著，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传习录》，见陈荣捷《〈传习录〉及其他新儒家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6页。
- ⑤ 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Coodrich)、房兆楹(Fang Chao-ying)编：《明人传记辞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08页。
- ⑥ 这是中国正在浮现且可描绘的与全球经济首次相互撞击的时期。有关白银危机理论的资料可参见亚特威尔(William Atwell)的《1530—1650年的国际金银流通与中国经济》(载《过去与现在》第95卷[1982年5月]第68—90页)、《中日“十七世纪危机”的考察》(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2期[1986年2月]第223—224页)、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载《晚期中华帝国》第7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6页)。Richard的《财富之泉：1000—1700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245页)一书修订了危机理论。
- ⑦ 邓斯坦(Helen Dunstan)：《明朝晚期的疫情：一项初步考察》，载《清史问题》1975年第3期，第29—30页。
- ⑧ 前引邓斯坦文第39—40页。席文(Nathan Sivin)的《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一书论述了传统中医的基本前提，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章 满人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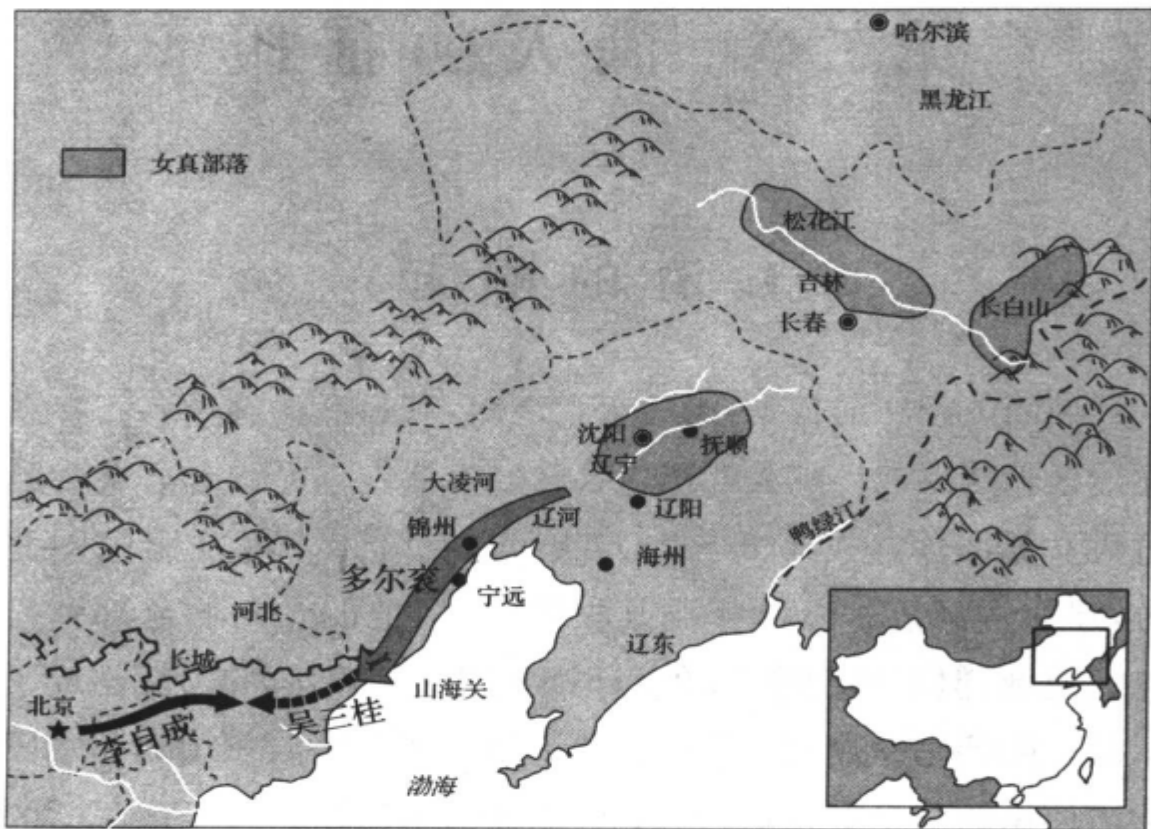
1. 清的崛起

当明王朝江河日下,濒临灭亡之时,其最后的继承者正在东北地区勃然兴起。满人的祖先是曾经生活在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古代女真部落。在 1122—1234 年间,女真人一度征服中国北方,建立了金朝。1234 年当其失败以后,他们又向北退却到松花江流域,但至明朝晚期,他们再次对中原和朝鲜的边境构成了威胁。明朝用以控制女真族的政策是形式上将其领地划归中国边防体系的一个部分,赐给封号,给予贸易特权。

至十六世纪晚期,女真人已经分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一部分生活在松花江流域,主要过着渔猎生活。另一部分在处于长白山地区的中朝边界北部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在那儿过着农耕与狩猎并行的生活。还有一部分迁徙到肥沃而广阔的辽河东部地区,与汉人移民杂居,从事定居农业,并从事皮革、马匹和奢侈商品的贸易。辽河地区的女真人的部落组织基本上趋于瓦解:虽然他们繁衍生存的城镇,诸如抚顺、沈阳,曾经是往日金朝的心脏地带,他们仍然大量地接受了汉人的生活方式。

为满人征服明朝奠定了基础的努尔哈赤 1559 年生于长白山地区女真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年轻时曾到北京给明朝廷朝贡,并进行贸易,还因为帮助明朝抗日而被赐予册封。但大约在 1610 年,因为明朝攻击和羞辱他的家族成员,试图摧毁他的经

济基础，他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



满族势力兴起示意图(1610—1644)

大约正是这一时期访问过努尔哈赤大本营的朝鲜外交使节记录下了当时女真人武器和防御工事的简陋状况、努尔哈赤率直的性情和强壮的体格、与众不同的发型和服饰，以及他的一些将军们佩带的厚重耳饰。如果说努尔哈赤给来访者的最初印象是粗鲁，那么不久他就显示了自己的才干。1610—1620年间努尔哈赤的权力随着他对邻近女真和蒙古部落的征服而不断增长，对于这些部落，他通过武力征服或联姻结盟的方式进行统治。他将军队和自己的家族以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旗帜相区别的八旗制度组织起来。八旗既是战争期间的作战单位，又是日常管理百姓的民政组织。他还招集大量工匠制造武器和盔甲，创制女真文字。1616年，他迈

出意义重大的一步，自立为汗，成为第二个“金”朝的统治者，藉以唤起女真人逝去的荣耀，掀起对明朝廷的挑战。两年后，他对汉人与部落组织解体的女真人居住的辽东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军事打击。

明朝统治者把辽东视为中国的版图，并派驻由明朝将领统帅下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恩威并施，诱使明朝将领归降，还让其雇请的汉人顾问起草慰问信，向这些将领致意。例如，他写给明朝抚顺的指挥官：“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①努尔哈赤以锐意改革的统治者面目出现，许诺将带给汉人更好的生活，试图以此瓦解明朝在辽东的影响，并蛊惑生活在辽西地区的人们也加入自己的新王国。“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他在一封在农村广为散布的信中写道，“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种”。^②在另一些场合中，努尔哈赤宣称，他将施行一个理想的君王应有的仁政，而这显然是万历晚年的统治中被疏忽了的。他还说，他将永不会让“富人粮谷烂于仓中”，却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尔哈赤严格训练军队，尽力阻止掳掠和侵害辽东百姓的行为，公开处罚违纪的士卒。对那些归降的汉人中的读书人，努尔哈赤都拔擢到日益壮大的女真官僚机构中供职，他还厚待归降的明朝大臣，与其联姻，赐予封号，居以高位。他的军队于1621年攻陷沈阳和辽阳。1625年他定都沈阳。不久辽东全境及辽西部分地区都已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努尔哈赤命令归降的男子必须仿照女真人，剃光前额，留起长辫，虽然各地接受命令的程度不一，但是他最初还是很少遭到被征服汉人的公然反抗。当一些汉人对女真人鼓乐相迎时，另一些人却往井中投毒，试图孤注一掷，消灭努尔哈赤的军队。汉

人与努尔哈赤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业已解体的女真人的命运难以一言以蔽之。有的按照承诺得到奖赏,有的从他们城市的家园中来到乡村为女真人耕作,还有的人被奴役,或被迫成为佃农。另有一些,特别是那些懂得大炮技术的人,被纳入军旅,编为“绿营”兵。虽然炮兵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它在女真人后来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早在1622年,努尔哈赤就曾想挥师绕过战略要津山海关(这里是长城直抵中国北方海滨的终点)进攻明朝。若非辽东爆发了一系列反叛,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可能已经将其付诸实施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暴动不得而知,但存在着多种可能。随着大量的女真军队来到辽东,辽东的耕地压力日益严重。粮食和食盐的短缺导致了供给的危机,一些地方出现了饥荒。粮食实行定量配给,女真统治下的汉人不得不花一部分时间无偿为雇主干活,三人一组,耕种五亩土地。在辽东的很多地区,既是出于控制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缺乏房屋,女真人搬进汉人的家中,与之同住同吃。这激起了汉人的再次反抗,他们放火,往井里投毒,杀死女真的妇女和孩子,藏匿粮食,甚至逃进山里。一些汉人杀死边防士兵,试图逃到南方,被抓获者都被女真人处死。

一方面明朝廷并没有试图利用这些反抗,另一方面这些反抗都被努尔哈赤镇压下去了。女真人被警告“日夜守护,勿与村中汉人杂处”。^③在城镇中,他们被隔离居住,禁止进入汉人街区,或与汉人家庭交往。女真人得到命令,时刻携带武器,而汉人拥有武器则是非法的。在判罪时,努尔哈赤对所有的女真人十分宽仁,而对汉人则极尽苛严。汉人及其家人甚至因为偷窃而被判死罪。1625年,爆发了第二次汉人的反抗,结果遭到了更加野蛮的镇压。

明朝将领对汉人两次反叛都无动于衷,却于1625年末开始

对努尔哈赤发动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击,并于1626年开始多次重创女真。同年末,努尔哈赤去世。按照女真习俗——此习俗起源于中亚的蒙古人——他没有将领土和大汗称号传给某个人,而是将其分封给最有才干的子侄。

毫不奇怪,这样的继承方式的结果将导致权力之争。获胜者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统领正黄和镶黄旗的皇太极。皇太极的即位得到了汉人谋士的帮助,因而较之他的父亲,他采取了对汉人更为有利的政策,吸纳更多汉人的传统制度。皇太极仿照明朝,设立六部,在新的官僚机构中任用汉人。名义上,各部长官都是女真贵族,但他们常常不参与军政事务,将这些事务交给汉人下属执行。

皇太极废除了努尔哈赤制定的用以处罚汉人的户籍制度,沿袭汉人传统方式,在辽东推行科举制度,下令改革女真文字,以更好适应新时代的文字记录、户口统计、赋税征收的需要。叛离明朝前来归顺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的很多人是带领着自己的队伍归降这位新即位的汗。虽然他的一些大臣抱怨朝廷里充斥了粗鄙的汉人,但是皇太极还是非常真诚地接纳汉人。

无论粗鄙与否,明朝派到鸭绿江口和山东北部防守的高级将领叛投女真,为皇太极补充了新的力量。1637年他沿袭努尔哈赤的制度,建立两个汉“旗”,1639年汉“旗”增至四个,1642年增至八个。1635年从背叛明朝,效忠皇太极的蒙古人中建立了八个蒙古“旗”。因此,到1640年代早期,女真的统治者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军事和行政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士兵再勿需轮番服役,而可以登入户籍,庇护妻子,管理耕作。

在此之前,皇太极于1636年迈出了比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朝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他决定抹去其羽翼未丰的政权与打上女真烙印的部落历史的联系,消除臣事明朝的记忆。他

宣布建立新王朝，国号为“清”。此后清统治了关外地区及其周围各族，势力与疆域都超越金朝。“清”的字面意义就是“纯洁”或“洁净”，从1636年至1912年满人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一直被历代满人统治者沿袭不变地作为国号。在皇太极统治下，女真的族称被代之以“满”。“满”是一个新的术语，虽然其确切含义尚不知晓，它可能取自佛教术语“妙吉祥”，喻示着清王朝万象更新。

现在，皇太极准备去征服更广袤的土地了。1638年，他征服了朝鲜，迫使其国王断绝了对明朝的宗藩关系并将其儿子送到清为质。在国内，随着李自成和张献忠等起义军对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控制，明朝失败的命运已一目了然。满人的军队从北京的北边越过长城，肆掠京师周围，兵锋所及，抵达山东大片地区。他们掳掠妇女儿童，强征牲畜、丝绸和银两，所过之处，城市皆化为焦土。

与此同时，尽管满人踌躇满志，但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变得日益懈怠了。一部分满人厌倦战争，安于辽东舒适的城市生活。他们沉溺于从未闻知的奢侈享受之中。战士们既不能如往昔一样勇猛作战，也不愿屈尊务农，农业收成不稳。皇太极也感叹到，年轻人甚至狩猎也不再愿意了，只是“身处闹市，自娱自乐”。如果应召赴战，将会是“将士安坐营帐，奴仆奔赴疆场”。^④

满人对大凌河南岸的军事重镇锦州城展开了十年的围攻，在被明朝戍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后，1642年终于攻克了该城。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鼓舞了满人的士气。锦州陷落后两位才能卓越的明朝将领降清并得到厚待。但是通往北京的要道山海关仍然由明朝骁勇善战的将领吴三桂把守着。1643年皇太极突然去世，他五岁的第九子继立，由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摄政。

满人进一步扩张的机会看来仍然渺茫，但是1644年春，李

自成率军从他刚刚占领的北京出发，越过北京东面的平原，攻打他视之为明朝最后一位有力的抵抗者吴三桂将军。吴三桂调回山海关的军队，西向迎击李自成。摄政王多尔衮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集合小皇帝的军队，率领满、蒙、汉各旗，迅速南下，势如破竹，直入中原。努尔哈赤的梦想转瞬之间成为了现实。

2. 征服明朝

在满人和李自成东西夹击之下，吴三桂陷入绝望的境地。他求生的唯一希望就是与两个对手中的一个结盟。主张与李自成联盟的人认为，李自成是汉人，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承诺改变明朝晚期专权滥政的局面，而且他将吴三桂的父亲扣为人质。然而李自成性格乖张，残暴不仁，粗鲁无文，而且1644年占领北京后，其军队的所作所为也令吴三桂这样富裕而有学养的官员难以认同。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城掳掠蹂躏，攻击和抢劫明朝官员的府第，绑架其家人，勒索赎金，或收取巨额的保护费。虽然李自成宣布建立新的王朝，他却无力控制自己北京城内的部将，吴三桂对李自成能否统一全国甚为怀疑。

而与满人结盟的不利就是他们与汉人并非同一族类，其先民女真是汉人传统所鄙夷的半开化的边疆民族，而且他们在中国北方扩张的早期，也确实曾经洗掠一些占领的城市。但他们也有令人认可的地方，他们建立“清”政权时就许诺重建秩序：建立六部制度，重开科举，成立汉“旗”，大量任用汉人为高官——所有这些都是令吴三桂鼓舞的信号。他们在厚待明朝归降大臣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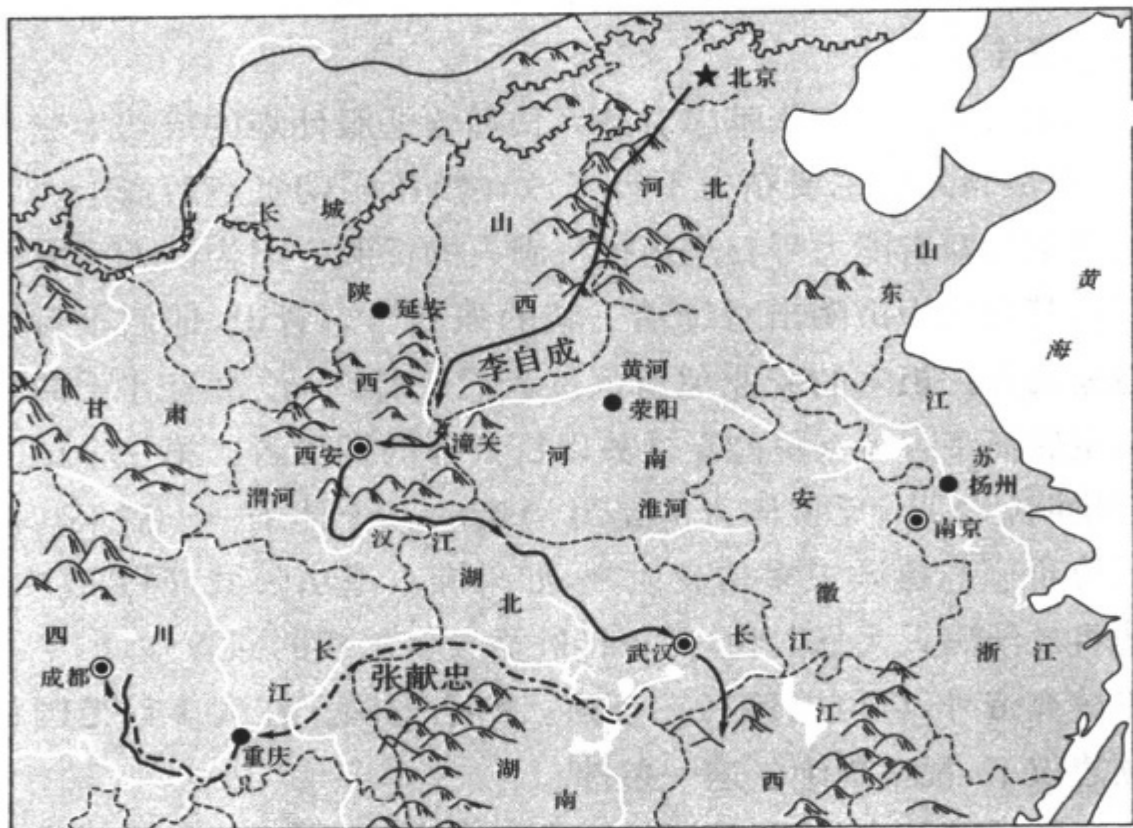
据民间传说，因为李自成抢夺了吴三桂的一个爱妾，并据为己有，吴三桂将军转而与满人同舟共济，打败李自成派出攻

击自己的军队，邀请多尔衮共同收复北京。作为报复，李自成处决了吴三桂的父亲，将其头颅悬在北京城头示众。但是李自成军队的士气很快凋谢，甚至1644年6月3日他的登基典礼也已无法挽回局面。次日，他满载掳掠的财物，率军西逃。6月6日，满人和吴三桂进入北京，小皇帝在紫禁城登基，年号为顺治，即“服从统治”之义。小皇帝采用的这个具有汉人传统含义的年号显示满人现在正式宣告，他们奉天承运，统治中国。

虽然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于4月自缢而死，满人爱新觉罗·福临荣登大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朝已经彻底灭亡。大批皇室成员在李自成到来前已逃离京城，数以百计的明皇室旁系子弟散居中国各地，坐拥巨额家产。自1368年以来传承不断的明朝朝运不会轻易灭亡。虽然吴三桂在绝境中与满人结盟，但数以万计的汉族士大夫和明朝旧臣仍然愿意为明朝国运战斗，乃至捐躯。

满人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追捕各地的明朝宗室后裔，但是他们进入北京时曾经宣称他们是明崇祯帝理所当然的复仇者，他们也必须追剿反明势力。李自成是其首要目标。李率军向西南逃至二十年前他揭竿反叛的陕西西安。清军在巩固了对陕西省的控制后，1645年春，巧妙地采用钳形攻势合击李自成。李自成被赶出了西安，率领人数大减的跟随者沿汉江向东南逃往武昌，渡过长江，最终被尾追而至的清军在江西省北部的山区逼入绝境。1645年夏，李自成在那里去世，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试图偷窃食物时被农民打死。

正当清军与李自成酣战之时，第二支主要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已经撤出其华中的根据地，溯长江西上，穿过深山峡谷进入四川省。在重庆短暂地盘踞一段时间后，又西进定都于富饶而



反明起义军溃退示意图(1644—1647)

利于防御的成都。1644年12月，他在成都宣布建立“大西国”。虽然张献忠的确建立了一个由文人学士组成的文官机构（很多人是被迫上任的），举行科举考试，铸造货币，但是他的统治也注定并不比李自成更长。张献忠还建立了由一百二十个营组成的复杂军事系统以保卫自己的政权。相对于满人而言，对张献忠最初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流窜的南明势力。

随后几年中，张献忠似乎逐步陷入妄自尊大而又凶残暴虐的奇异的个人世界中。他给他的军队制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不仅要征服中国南部和东部，而且要打算征服蒙古、朝鲜、菲律宾和安南。在四川，他对自己以为企图背叛的人加以令人发指的处罚，数千当地文人及其家属被砍头或致残，他甚至大批残杀自己的士兵。最后，他于1646年末放弃成都，烧毁了大部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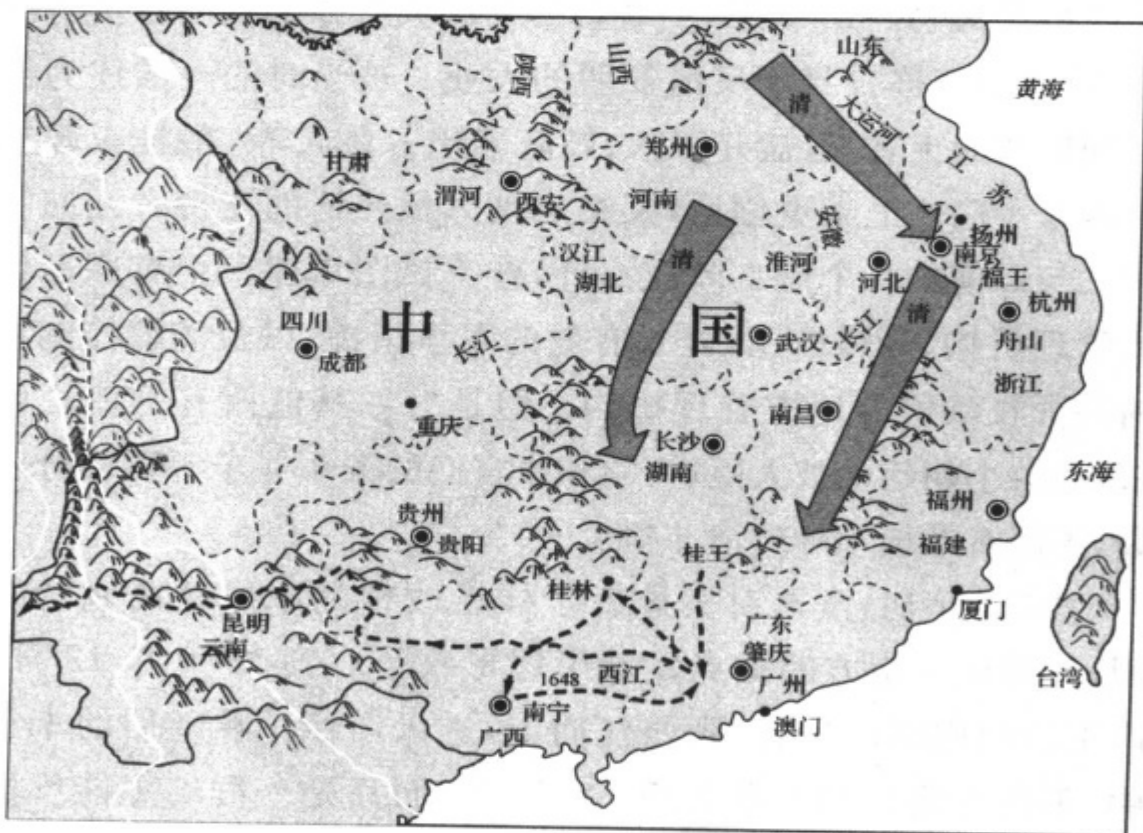
市。他一路西进时也实行骇人听闻的焦土政策。1647年1月，他被清军所杀。

消灭李自成和张献忠对满人长远的征服计划的成功十分重要，但是满人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镇压明朝皇室后裔上。明朝皇室后裔有能力号召全国抵抗满人的征服。因为汉人士大夫们从其教化中熏陶出对统治王朝的强烈尽忠意识，他们很自然地起而保护祖宗的家业免遭入侵者的劫掠，一位富有才干的明皇室后裔幸存者有可能凝聚数以百万计的拥护者。第一个试图召集明朝军队，反抗满人的是万历帝的一个孙子——福王。福王曾希望与摄政王多尔衮谈判，如果满人退出长城，回到辽东，他将送给满人大量财物，并每年进贡。多尔衮的回答是，如果福王放弃帝号，将可以保有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在大多数爱国将领建议下，福王拒绝了这一条件。

随后的几个月里，福王忙于准备南京的防务，他的朝廷中的群臣却结党争斗、相互攻讦，政府低效无能，万历朝也曾经深受这一弊端之苦（只是万历朝还有东林党与魏忠贤两个集团之间两败俱伤的权力斗争）。当南明将领和大臣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时，满人的军队沿着大运河长驱南下，并于1645年包围了富庶的商业城市扬州。南明军队配置了数门大炮守城，坚守了七天。但是他们最终被满人更优越的大炮和旺盛士气打败。扬州城遭受了十天耸人听闻的洗劫。满人想藉此杀鸡儆猴。与扬州相反，南京的守军几乎未做抵抗，早在6月就已举城向满人投降。福王被俘，送至北京，并于次年去世。

随着福王的去世，明宗室纷纷称王，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有两兄弟（是明太祖的后裔）试图在东部沿海继续领导抗清活动，一个在福州（台湾岛对面），一个在富饶的南方贸易港口广州。在福州称王者1646年底被俘遇害，1647年广州被满人攻陷，他的弟弟

也于是年被处死。明太祖的另一个后代往来于东部沿海地区，领导一系列失败的抗清活动，先后在厦门和舟山岛建立据点，甚至一度漂泊海上。1653年他废除了名号。随后东部沿海地区的抗清领导重任转移到最后一位南明称王者——桂王肩上。



南明诸王的失败示意图(1644—1661)

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各政权纷纷失败后，桂王成为了恢复明朝的最后希望。桂王是万历最后一个幸存的孙子，北京陷落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衣食无忧的青年，没有任何行政和军事的实践经历。张献忠起义军侵扰湖南时，他被迫逃离这块祖先的封地，来到广州西部的肇庆。一群逃亡的臣僚不顾桂王母亲的反对，于1646年底拥戴他即位。而桂王的母亲认为他过于年轻、柔弱，难以当此大任。被清军赶出广东省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桂王及其小朝廷流亡于广西各地，其中在桂林和南宁停留较

多，清军仍穷追不舍。

清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征服了北京至广州之间一千五百里的地区，对如此辽阔地区的征服不可避免只能是局部的。那些既痛恨满人入侵，又不满足于南明屈辱无能的汉人志士因而得以乘隙招兵买马。1648年，一些曾经与满人合作的前明官员再次叛清，转而宣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大业。被当时的人描述为满是嚼槟榔的土著人、盐井工人、妓院老鸨各色人等^⑤的桂王政权在满人于广州遭受重创后，又突然被大批热情的支持者迎回肇庆。与以前的几个流亡政权一样，桂王试图重建一个有序运作的管理机构，开科取士，建立有效的军事指挥，以及能够控制乡村并征收赋税的地方管理机构。但是一如其他所有的流亡政权，他的小朝廷也被大臣、将领和宦官们的派系斗争弄得四分五裂，不能有效地领导反清斗争。

1650年初，清军对宣称忠于桂王政权的中原地区剿抚并用，并对桂王南方的据点发动了钳形攻势。到1650年12月，桂王政权逃离广东省，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随后的十年中，不再有略具制度意义的小朝廷了，而只是一群幻想能反抗外族占领的流亡者聚合在一起，不断地向西退却，由广西而贵州，由贵州进入重峦叠嶂的云南，最后越过中国边界，进入缅甸。

缅甸国王最初还为明朝的遗民提供避难，不久又改变想法，屠杀了桂王的大部分随从，并拘禁了桂王及其家人。1661年，正是昔日明朝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充当清军的先头部队，进入缅甸。缅甸人拱手将南明朝廷的人交给吴三桂，吴三桂将他们押回中国。1662年，这位明朝最后的“皇帝”和他唯一的儿子在云南被勒杀。清政府再也不必担心有针对其统治的“合法”的反抗者了。

3. 适应对中原的统治

1644年满人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1662年又处死最后一个称王的明皇室后裔,但是军事的胜利并非意味着他们已经解决了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多尔袞作为顺治朝的摄政者,沿袭了辽东时期建立的满汉杂糅的制度体系,使中原六部制度与满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相兼并行。现在他必须调适制度以应对幅员辽阔的帝国的统治。

至少在一个问题,即满人的服饰和发型方面,多尔袞决定让汉人适应满人,而非满人适应汉人。进入北京的次日,多尔袞就颁布命令,宣布此后所有的汉人都须剃光前额,在脑后编一条满人式样的发辫,就像努尔哈赤在辽东实行过的那样。波澜汹涌的反抗使多尔袞不得不取消了命令,但是次年6月又命令军中的汉人必须剃发留辫。这是为了在战斗中更容易识别敌人,保证归降者将来对清朝的忠诚。但是多尔袞的幕僚们觉得这还不够。1645年7月多尔袞重新颁布命令:所有的汉人男子必须在十日内剃发蓄辫,违令者斩。汉人别无选择,正如命令以通俗的语言总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①

明朝汉人男子将精心梳理的长发视为男子气概和优雅风度的象征,他们十分痛恨多尔袞的命令。在很多地区,这条命令导致他们起而武装反抗满人,虽然这时他们已经臣服,但是多尔袞仍然坚持不改。满人又进一步命令汉人接受满人的服饰——高领的、在右肩上扣的紧身上衣——不许穿着明朝宽松的长袍。另一项与汉人习俗不同的是,满人妇女严禁像汉人女子若干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缠上小脚。尽管缠足会带来痛苦,这一习俗还是从上层社会波及普通农民,对汉人而言,小脚已经成为对女

性的一个审美尺度。数以万计的女子忍受着缠足之苦。满人拒绝追从缠足习俗,既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立,又给满汉的通婚制造了一个有效的障碍,因为汉人男子认为满人女子的天足缺乏性感。

在北京的宫中,满人裁减了曾充斥于明朝皇宫的数以千计的宦官。这些宦官作奸弄权,危害国家。虽然宦官仍旧作为皇室女眷的侍从而保留着,但是宫廷的其他事务(特别是财务)都交给1620年代和1630年代在辽东掠为奴仆的汉人管理。宦官还被剥夺了明朝时期准军事的宫中侍卫身份。旗人组成的禁卫军取而代之,受命警卫宫廷。这些人中很多是襄助努尔哈赤建立女真政权的将领的后代。

满人八旗被分别安置于北京的皇宫外,这样皇帝及其家人就处于最忠诚的军队拱卫之下。北京的汉人居民被强制安置于城南,虽然在最初的强制安置中会带来痛苦,但是城南很快就商业兴隆、人气旺盛。除此之外,满人在华北没收了成千上万亩良田以供给军队和赏赐将士。虽然也有被没收的富裕的前明官员的财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地原为明皇室所有。据统计,四万满洲旗人每人大约获得六亩土地,其中满人的显官权贵获赐的封地更大。

为了进一步隔离汉人和满人,多尔衮下令将华北的汉人农民大量迁徙。意识到可以乘王朝更迭之机大肆兼并的精明汉人地主抢占无主荒地。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骚乱和破坏。数以千计的农民离乡背井,成为流民或盗贼。然而很多满人自己无能耕种土地,不久便以各种形式将自己的封地租佃给汉人。有些契约使汉人如农奴似地依附于主人。当没有耕畜时,佃农被迫自己拉犁。满人入关不到二十五年,北京周围方圆一百五十英里之内大约有五百万亩土地被满人强占。满人的土地占有中既

未滋生出成熟的封建制度，也未发展任何形式的奴隶生产，结果还是传统的汉人农耕方式——租佃制，甚至土地的私有又逐渐复苏。

在行政体制和对待士人的政策方面，满人大多沿袭了汉人的旧制。六部制度在清朝仍然设置，各部分别执掌民政、财政、礼仪、军事、司法和公共工程，只是并设两位长官，一个满人，一个汉旗人或汉人文官。各部侍郎的设置也同样实行多民族共治，兼用满汉，四位侍郎中满、汉各两人。作为联络六部和内廷的环节，清朝也保留了“大学士”制度。顺治在位的早期共七位大学士共同执政：两位满人、两位汉人，还有三位新近归服的前明大臣。

忠于清朝的学养深厚的汉人儒士被授以各部的官职，或内阁大学士。为了吸纳新人进入官僚机构，清朝重新实行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当年有三百七十三人及第，主要是北京地区及邻近的山西省和山东省的生员。为了扩大取士的地理范围，1647年又录取了二百九十八名，应试者主要来自重新被征服的江苏省和安徽省。考官的选择说明多尔袞深知汉人的敏感：虽然两个是汉旗人，一个是饱学的满人，第四个却是1644年才归顺清朝的典型汉人文官。

满人用他们的军队摧毁了明朝的反抗，巩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但他们逐渐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一套与明朝相似的官僚系统。他们最初将明朝的十五省分为二十二省，后来又逐渐减少数量，并将明朝最大的三个省都一分为二，使之更易于管理。十八省中每省都设一名巡抚，在清朝前期大部分巡抚都由汉旗人充任。多尔袞深信，这些人对新政权的忠诚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他们有汉人血统，说汉语更便于让其全国的汉人同胞接受。各省在巡抚之下又设有掌管经济的布政使和掌管司法的按察使，

还设有一些监察御史。省以下是置署于较大城市中的州府官员，管理辖下的县官，而地方县官——西方人所知道的“地方官员”——他们负责日常管理和城乡赋税的征收。

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中，满人势力所及仍十分有限，虽然清朝在大多数省城都驻扎了军队，但新王朝的生存从根本上说还是有赖于国内三种势力的微妙平衡。首先是满人，即以前的女真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基于与早期女真的血缘关系和作为努尔哈赤后代而获得的贵族爵位。满人试图通过狩猎和骑射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他们使用满语和满文来强化自己自然的文化特征。虽然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不得不让汉人官僚使用汉文书写公文，但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被翻译成满文。满人还保持了自己宗教活动，由男、女萨满法师在寺庙中主持，禁止汉人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和汉人八旗，他们大多数都出自入关以前归顺满人的蒙、汉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布于北方和西北边境地区，汉人八旗在对中原的统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也有清晰的等级之别，这些等级部分是基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赐予的册封，部分则是基于其归顺的时间——归顺得最早的通常享有最高的地位。很多八旗汉人通晓满、汉两种语言，他们既吸收了满人尚武的文化，又保持了汉人自己的社会风习。他们的拥护对于满人来说是最为宝贵的。如果没有这部分旗人，也许就没有满人的征服大业及这一事业切实的巩固。

第三种就是汉人。汉人基本上有四种选择：与满人合作，主动地或是被动地；反抗满人，同样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别。有些人，如吴三桂，选择了主动与满人合作（尽管他从未加入八旗）；有些人选择了主动反抗满人，并死于抗击满人的战斗；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被动地反抗。但是更多的人见风使舵，与新的统治者被动合作。

那些富家大族希望能守住祖宗的家业，如果得偿此愿，则又进而希望子孙能参加科举，在新政权中谋得一个美差。但是，当1648年广州数以千计已经归降的汉人又反戈一击，重举反清复明大旗时，满人教训颇深，他们有理由对这群人的忠诚保持谨慎的态度。而当1650年代著名将领郑成功攻打南方重镇南京时，富饶的江南地区数以万计的汉人纷纷背叛清朝。虽然他们的反抗很快被清军镇压，但那一刻仍是危机四伏。在南方，满人最初并未积极地直接出面统治，而是在明朝势力消亡后，以吴三桂和另两个归顺已久的汉人将领管理辽阔的疆域，实际宛若独立王国。

满人认识到明朝的分崩离析根源于朋党之争及宫内的尔虞我诈。但是他们自己也未能克服这一弊病。例如，镇压张献忠和李自成叛乱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两个贵族出生的将领，后来被莫须有地指控为作战不力和叛逆罪而下狱，神秘地死在北京满人的监狱里。摄政王多尔衮挥霍无度，专横跋扈，僭权擅政，控制了几个旗，驱逐其将领，将死去政敌的遗孀占为己有，向朝鲜索要小妾，计划在北京以北的热河建造宫殿。多尔衮1650年在一次狩猎中去世，满人权贵们随即开始了瓜分其权位的斗争，清朝政权也濒临瓦解。

然而年仅十三岁的顺治皇帝聪明机智，已有能力巩固自己的皇位。虽然是成长于满洲皇宫的地地道道的满人，但是顺治远比其身边大多数满人大臣更能适应汉人的方式。顺治的机敏足以摆脱接替多尔衮的辅政大臣的羁绊，在军事上他也有足够的精明才干进一步打击南明的支持者，取得最后胜利。他还认真学习汉语，并成为汉族小说和戏剧的爱好者，又深受一些在宫中为他传习佛教的虔诚的汉人和尚的影响。在去世以前的最后岁月里，顺治皇帝狂热地迷恋上一个年轻的妃子，完全冷落了皇

后。同时他把大权交给宦官，并恢复了清朝入关以后曾经废除了的几个宦官机构。顺治此举的用意不得而知，可能是使内廷更加清静，以免身边的满人侍卫和奴仆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知朝中的贵臣。

另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就是顺治与耶稣会士汤若望成为亲密的朋友。耶稣会士自晚明从欧洲来华，积极传教和发展信徒。一些耶稣会士被张献忠掳掠到四川，另一些追随流亡的南明诸王政权。汤若望属于一小群 1644 年仍在北京并决定冒险留下的传教士。他有很高的科技素养，多尔袞任命他掌管司天监。朝廷希望修定全国的历法，如果历法测算十分精确，则将大大有益于顺治的天子形象。汤若望获得宠爱或许是顺治皇帝表达其独立个性的另一种方式，也或许是他重新看到了他幼年时即去世的父亲形象。因为顺治将六十岁的汤若望称为“玛法”（爷爷），定期召他参与宗教和政治会议，甚至允许他在北京修建教堂。

1661 年，在宠爱的妃子去世不久，顺治也突然去世，可能死于天花。但是受命为顺治年幼的儿子辅政的四位满人大臣不仅没有为顺治的去世感到哀痛，反而几乎立即对其进行诋毁。他们宣称有顺治的遗嘱，并在全国大力宣扬。根据这些辅政者的说法，顺治曾经自责背离了祖宗的军事原则，宠幸宦官，重用汉人超过满人。“明朝亡国，”遗嘱说道，“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①

四位辅政大臣之一、能征善战的将领鳌拜很快独揽了大权。四位辅臣断然改变了顺治朝的政策。他们处决了为首的宦官，废除了宦官机构，建立了一个由满人掌管的有效的皇室侍卫系统取而代之。他们坚持在乡村实行更为苛严的税收政策。在处理发生在江西的一桩著名案件中，他们下令调查了一万三千余

名富裕汉人的情况，至少有十八人被公开处决，数千人被削除功名。

另一方面，汤若望也被捕下狱，满人擢升高位，汉人大臣遭受屈辱。为了对在台湾的最后一股反清势力实行物资封锁，切断中国东部沿海居民对他们的支持，辅政大臣们强制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无视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灾难，将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二十里。例如，作为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1661—1663年间福建省有八千五百个农民和渔民死亡。至1660年代末，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实行的以多种方式平缓地适应汉制的政策也几乎要在新的满人本位政策的名义下被废除了。

4. 阶级与反抗

在清朝巩固统治的初期，给不同经济和社会集团的竞争留下了诸多机会。我们已经简要地叙及了李自成宣称要带给中国人一个和平富庶的新时代。李自成和张献忠痛恨士大夫和官僚，对他们大开杀戒。在中国的另一一些地方，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引发了人们潜在而深刻的仇恨：例如，农民杀死地主，洗劫和焚烧富人的家园，城镇居民也攻击城中官员，甚至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军共同战斗。一些豪门巨族里的佃户也成群暴动，杀害他们的主人，抢掠其财富，鱼肉一方。穷困的士兵们起而哗变。渔民们加入海盗集团，在沿海往来掳掠。在李自成等首领被杀以后分散的小股农民起义军在整个顺治朝仍继续长期袭扰，不断引发慌乱和动荡。妇女们也脱颖而出，成为军事统帅，名噪一时。下级官员反对其长官的意见，固守反抗政策，导致了清军对其守卫的城市的洗劫。

阶级斗争的观点设定了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划分和人

们对自己社会定位的自觉认识,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似乎仍缺乏这些现象。对于每一个可以看见社会矛盾的事件,都可以找到阶级界线被打破的反例。李自成政权的官员中就有几个出生富裕之家的颇有成就的文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富裕地主也可能受到农民军的保护。逃往山区的文人也利用当地村民,发展反抗满人扩张的网络。逃亡的明朝诸藩王在群山绵延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穷苦民众的支持。城镇居民也保护当地官员。在一些缴获的明朝的产业上,满人将土地分给在此耕种的贫困佃农,给他们提供了以前不曾梦想过的走向富裕的希望。说到那些女将,情况同样复杂。其中一个女将叫秦良玉,是四川省西部土著部落首领的妻子。秦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习文练武,丈夫去世后她率领本部军队远赴北京抗击满人,后来又与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作战。她的女婿也是一名军事将领,战死于河南省。秦良玉晚年被流亡的桂王封为侯。^⑧

正如我们所见,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仍然难以划出阶级界线。我们关于阶级的历史意识主要来自于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研究,这一转变的实现是城市资产阶级通过暴力和代议制逐步从顽固的贵族手中获得政权。在这里我们很难辨识模糊不清而且相互交织的阶级界线。

明清时期,中国不存在世代传承的贵族阶层。甚至最辉煌朝代的统治家族的后裔在其王朝覆灭后也不再保有封爵和声望。因此在明朝存续期间,明太祖及明朝历代皇帝的男性后代享受着令人尊重的封号,以及富裕而悠闲的生活,福王和桂王就是其中的两个。但是,前朝元代(1271—1368)的贵族并不能与他们共存于世。同样,1644年以后,明朝的贵族也未得以保留。满人有其自己的贵族划分,他们出自努尔哈赤、其他著名将领以及清朝初兴之时就归顺的得力汉人将领的后裔。但是,满人独

特的政策规定,在九等爵中,赐封爵位的家族当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个承袭者的爵位即降低一等,这样,三等爵的继承者就降为四等爵。最后——若非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绩而幸蒙皇帝的提升——曾经显贵的家族都将回到平民百姓的行列。

中国还是存在一个“上层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既不由贵族血统,也不由一定的经济地位界定——满人征服中原时保留了这个阶级的地位。上层阶级的地位由四个因素形成:财富、血缘、交游和官位。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仍然是土地,但是清朝的上层阶级还占有大量的银锭(中国官方规定的交换手段)、丰富的古籍、字画、美玉、瓷器等收藏,以及绢帛、巨大的宅院、城市的不动产或来自典当和药房的商业利润。

血缘系统——有时称之为宗族或同宗——将不断扩大的家族联结成相互支持的网络。由各家凑集的一定数量的财产作为代代相传的族田,族田的收入用于宗庙和宗族墓地的修缮,以及族学教师的报酬。富家大族之间的儿女联姻都是父母间认真地商谈,留存下来的大量族谱说明了整个系统是如何严肃地进行维护和管理。

在清代,进入仕途的门径几乎完全控制在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因而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着人们是否能跻身仕途,获得功名权势。在正常的时代,很少有人能通过军功获取高官厚禄,仅凭万贯家财或与王公贵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获高官者为数更少。清朝统治者保持了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这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道路,必须背诵和钻研一批指定的关于孔子及其早年门徒言论的经典,以及这些经典的注疏。这些经典都用文言文写成,其语法和结构均与白话文不同。因此,一个家庭如果能花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已取得了功名的教师那里读书,或者

开办家学，聘请同样资历的私塾教师，显然就会更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获取高官厚禄。即便他们未能获得官职，科举及第也可以使他们免去劳役，或在打官司的时候免除肉体处罚。

最后，虽然在派系倾轧的朝廷，或盗匪横行和内战连年的乡村做官不无风险，但为官几年仍然可以通过俸禄、津贴及特别收入获得大量财富，除去当初谋求官位所费的成本后，还可买田置地，投资于孩子的教育。而且，致仕回乡，享受为官所得的官员，仍然可以凭借其为官的资历，得到当地地方官员的保护。

因为上层阶级的财富主要仍来自于土地，因此就有可能与土地上的佃农产生矛盾。正如明朝官员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甚至武装反抗地主。如果地主收回租地，佃农就可能成为盗匪，或演化为其他形式的社会动乱。但是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与佃农的战争，因为农民中也存在很多不同的阶层。因此，在1640年代，无论什么时候“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都必须从当地细致的经济分层及人际关系中寻求原因。李自成和张献忠反抗特权的叛乱更多的是广泛弥漫的挫败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然，而非无地者与地主的矛盾。

在这些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关系还是有显著的变化。摄政王鳌拜可以以胁迫或暴力手段强令江苏的地主们按时纳税，但是满人清丈富裕汉人的土地，以建立公平的地税制度的尝试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清丈工作十分浩繁，而且只能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汉人实施，这就使清丈工作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地主们用无限止的拖延、隐匿、抱怨耗费太多等手段，使调查工作无法细致准确地进行。地税制度改革的失败使那些在动乱年代积聚了大量土地的家庭能够继续占有更多的土地。

一些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曾讨论到，满人征服者与汉人上层

阶级形成联合,使农村的“封建关系”得以延续不断,而扼杀了城市中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也很难得到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允许一些家庭更为富裕,但是很多士绅出身的汉人改革者——通常与晚明东林党改革家们一脉相承——还是反对这些政策,力图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建立更为公平的税收制度,甚至不惜牺牲本阶级的利益。这些改革者们最初的失败可以归因于1644年后在朝中任职的不再是他们的同道,昔日的同道很多都于1645年去世了。但是到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些建议终于得到了贯彻,只是这些改革者们已无福享受到应得的荣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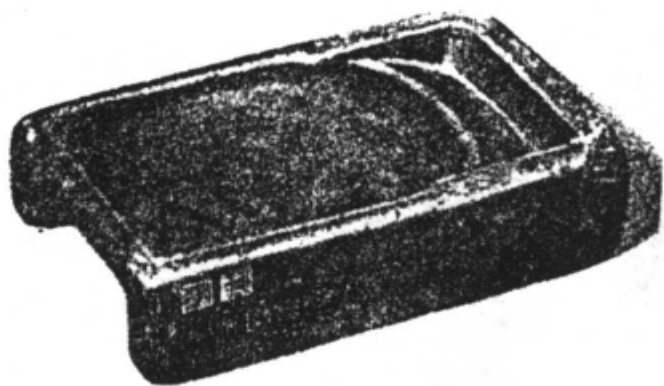
特别是在长江下游中国最富裕的江苏省,这里也是满腹经纶的儒士官僚云集之地,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满人存在着对抗。在这一地区,反抗领袖有时还能得到当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支持。换句话说,在极具号召力的上层阶级的领导下,不同的阶级可以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很多事件中,满人剃发的命令起了催化作用,但是更甚的是文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即不惜一切忠于明朝,恪守民族意识和忠勤于明朝的理念使其可以忽略旧王朝曾有的弊端,将富人和穷人迅速地团结在一起。一些文人用浪漫的爱情来比喻他们的追求:其对已经灭亡的明朝的情感恰似出生高贵的青年才子对梦中情人的爱。有时候又比喻成一对青年伴侣,为了彼此的情感,要么拿起武器投入到毫无希望的抗清大业中,要么自杀殉情。满人要想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获得彻底的安全感就必须消除这种民族意识,然而1660年代满人强硬的排汉政策恰恰再次激发了这种民族意识。

注释：

- ① 梅谷(Franz Michael)著：《满人统治中国的起源》，纽约 1965 年版，第 121 页。
- ② 罗斯(Gertraude Roth)著：《1618—1636 年间的满汉关系》，见史景迁、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编《从明到清》，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 页。
- ③ 前引罗斯著，前 18 页。
- ④ 前引罗斯著，第 30 页。
- ⑤ 司徒琳(Struve)著：《南明：1644—1662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9 页。
- ⑥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宏伟的事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58 页。司徒琳(Strove)著，第 47 页、第 58—61 页。
- ⑦ 奥克斯南(Robert Oxnam)著：《马背上的统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2、56 页。
- ⑧ 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秦良玉传》，载《清朝时期中国杰出人物》，华盛顿特区 1943 年版，第 168—1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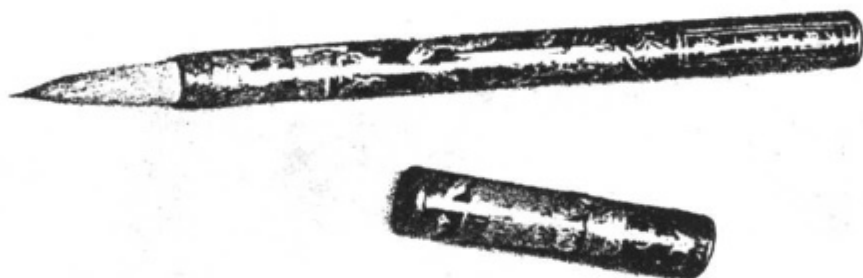
佚名,正在赏玩画竹的两个人,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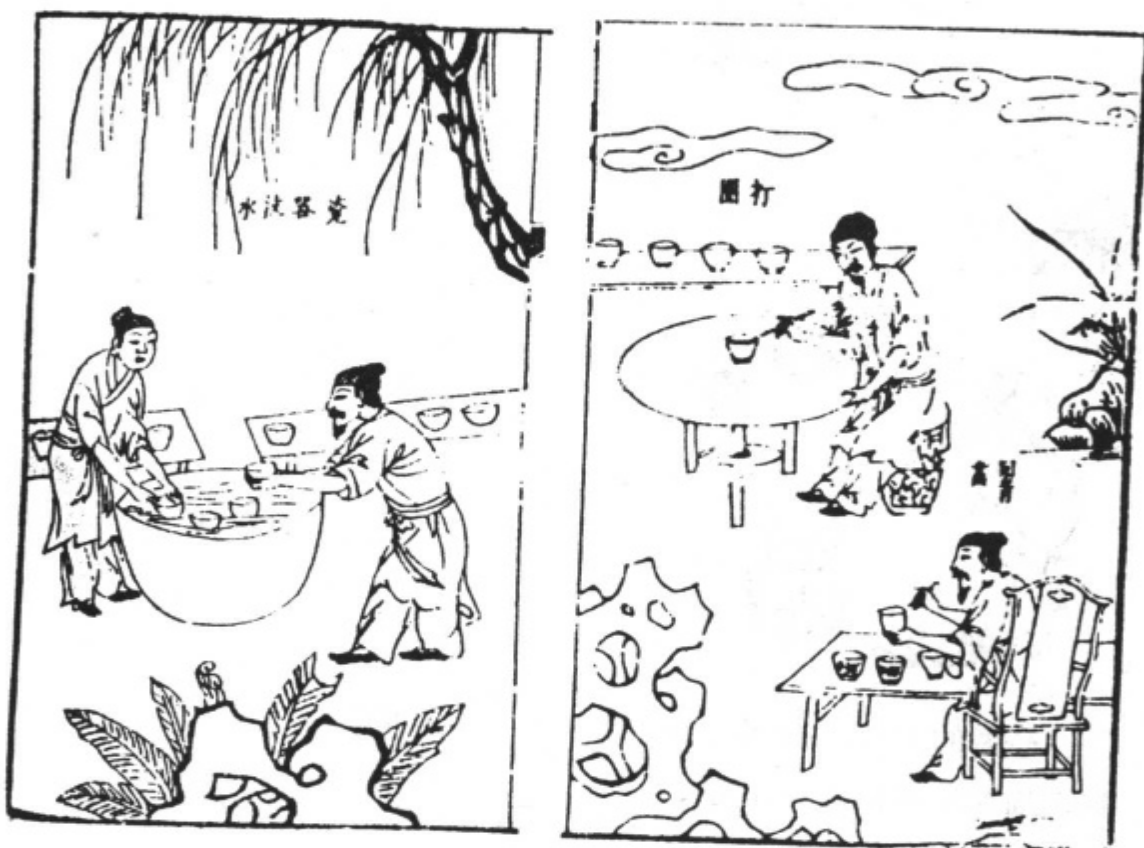
砚台,晚明。砚台的一侧题有:“我将自己献给你,珍视如碧玉;让我与黄金和谷物同列,是对我的侮辱。”



墨,晚明。以松烟灰和动物胶混合铸成,墨的一面是梅花,另一面是《诗经》篇名“摽有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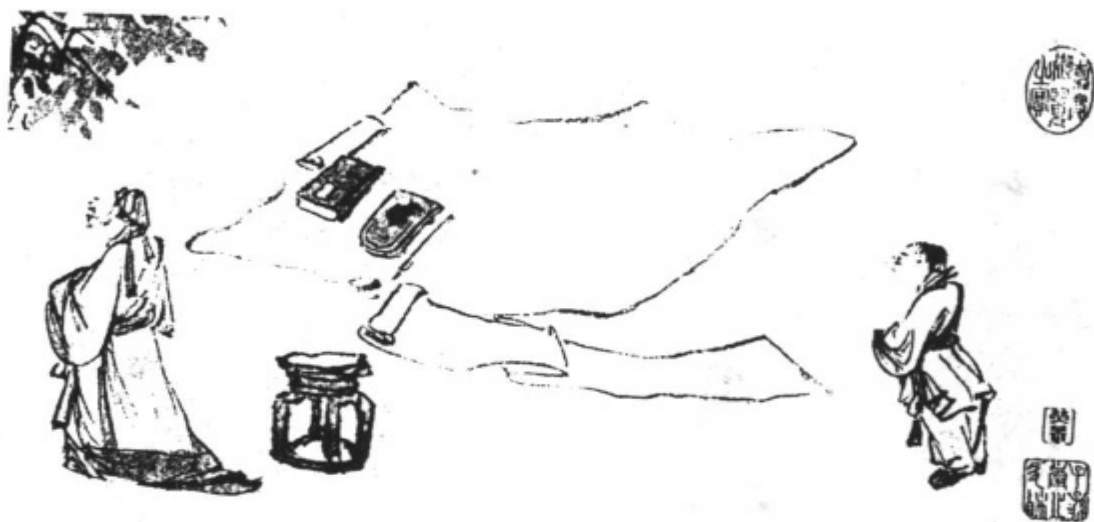
上漆木管毛笔、笔帽，晚明。



木版画瓷器，江西景德镇产品，晚明。虽然风格独特的青白瓷风行于世，是贵重的出口商品，但微薄的工酬使景德镇窑工于1601年起而暴动。

左图：两个人在烧制以前，将绘好的瓷器浸在缸里上釉。

右图：工人们正在加工有深蓝色图案的瓷器。



高傲的文人：在创作于 1520 年的一幅手卷中，画家唐寅用辛辣的格调描绘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



吴为(1459—1508),四海为家的江湖艺人。



女真部落首领努尔哈赤统帅女真和蒙古联合反明。

左图:1586年,努尔哈赤骑马与相邻部落作战。

右图:努尔哈赤登上后金的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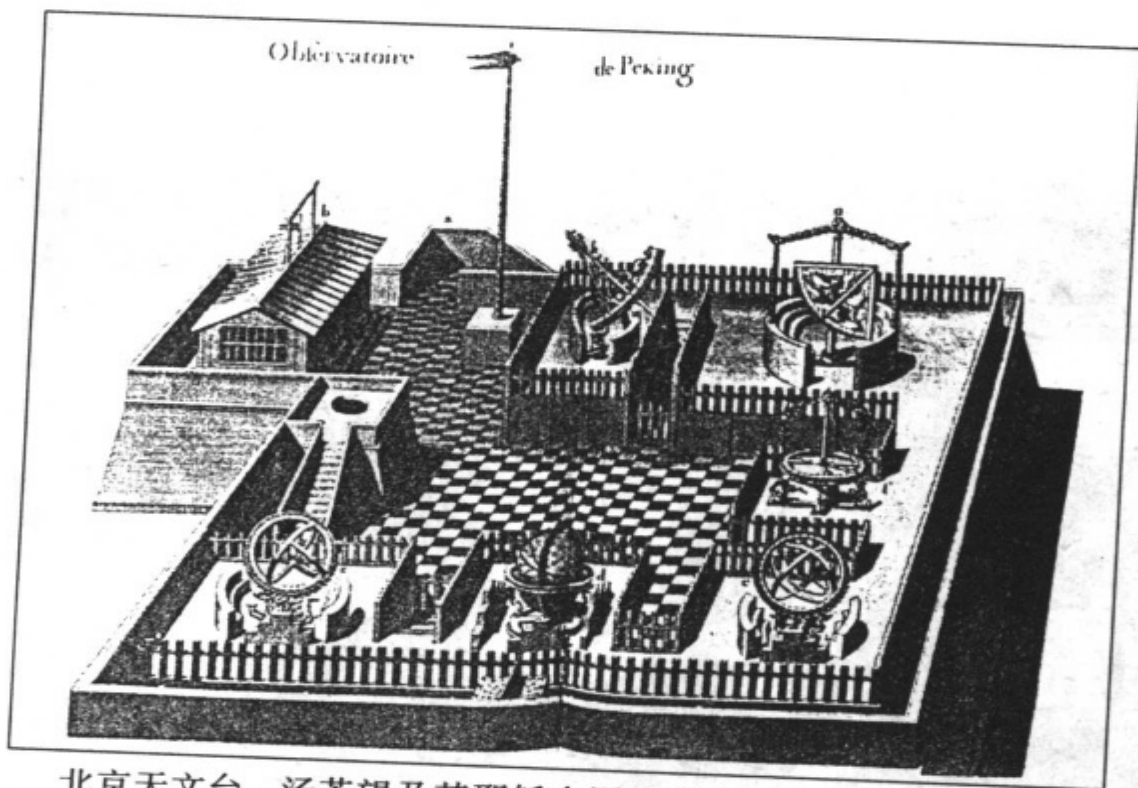


1673 年伦敦的雕版画, 图中所示为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汤若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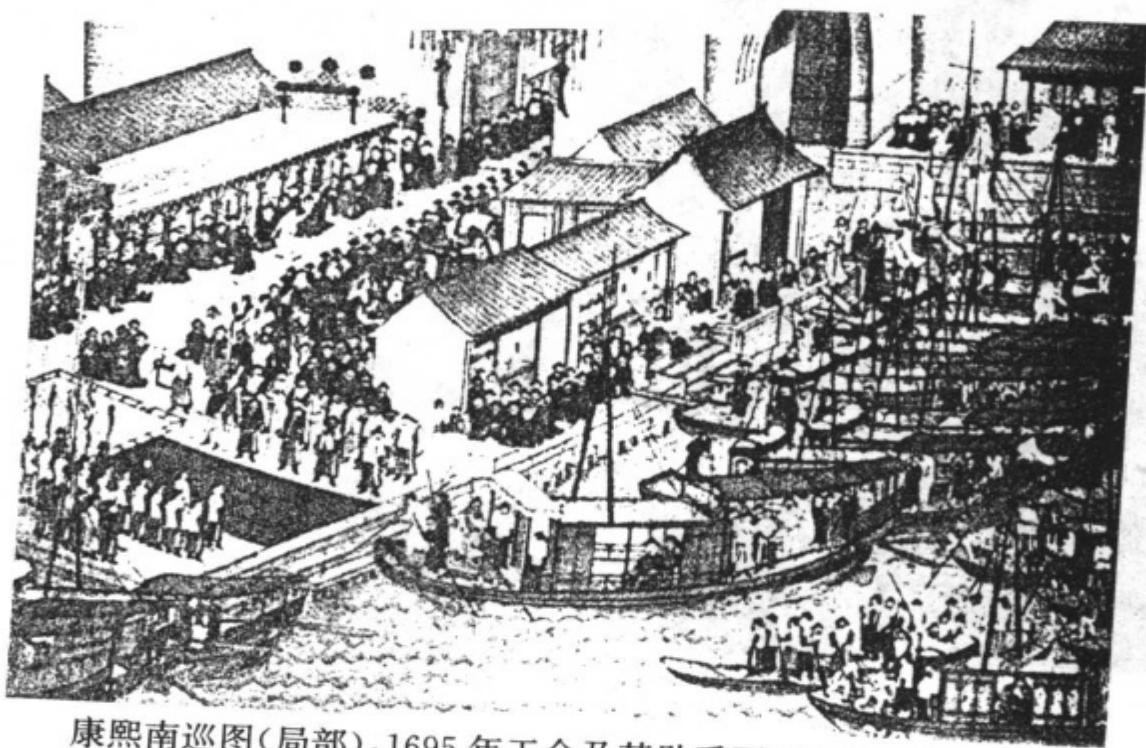
上图: 利玛窦(左)和他的中国信徒。

下图: 穿着中国朝服的汤若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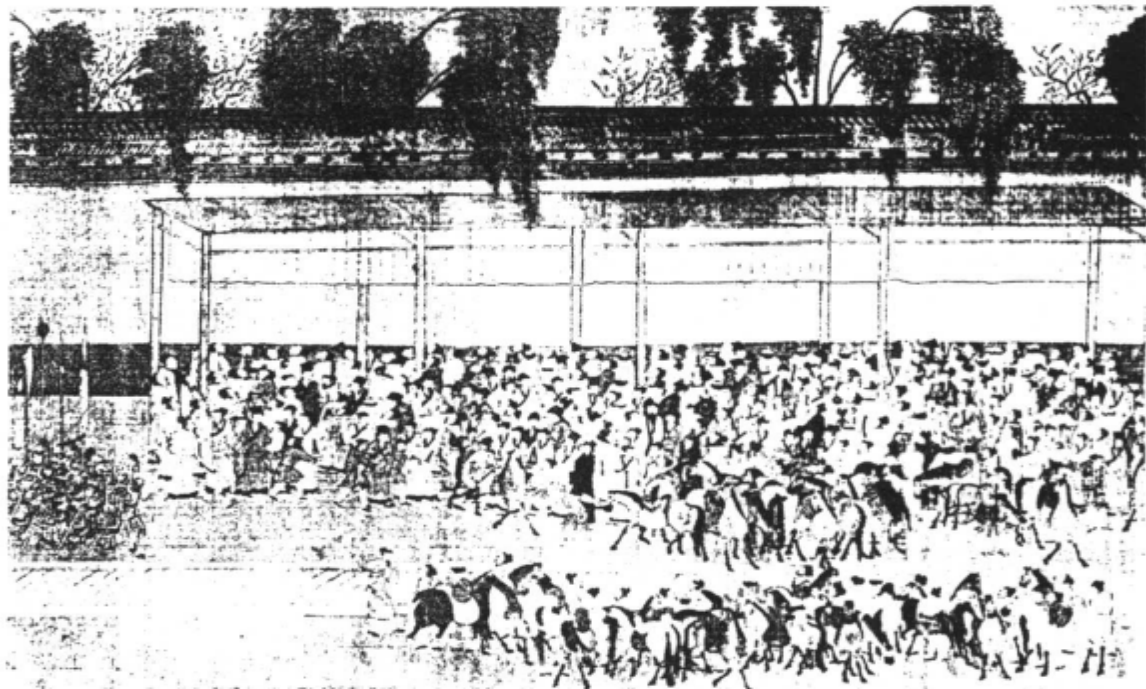
北京天文台。汤若望及其耶稣会同道南怀仁在北京东城建造天文台,有六分仪、四分仪和其他天文观测仪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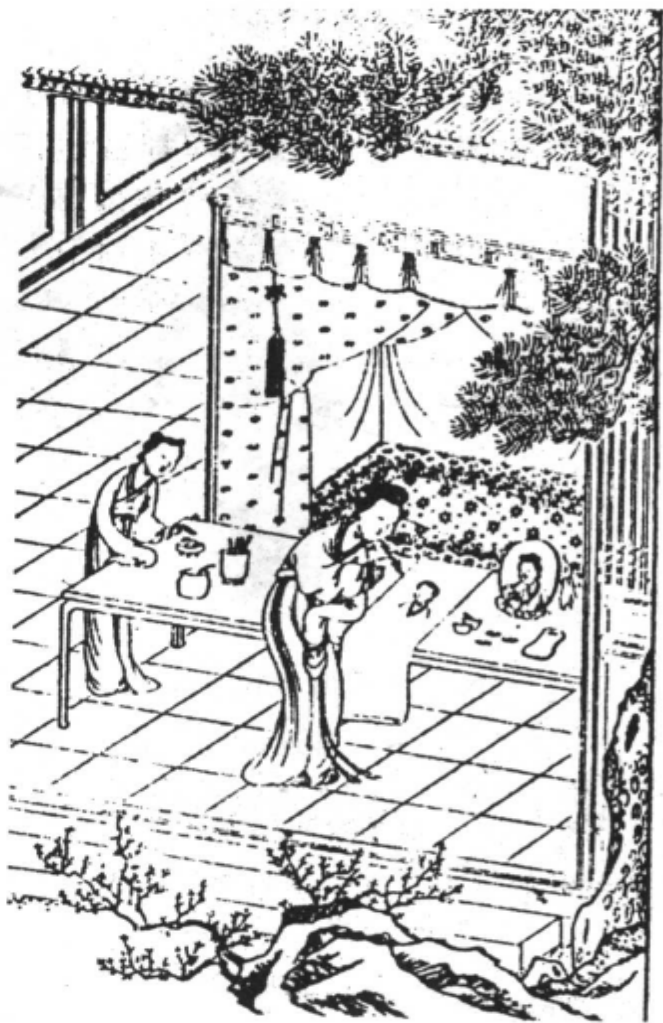
康熙南巡图(局部),1695年王会及其助手画,画卷反映了康熙在苏州登岸的情形。



康熙读书画像,饱读儒家经典的康熙被誉为“明君”。



科举应试者焦急地等待放榜,明朝。科举考试对于清朝前期统治者笼络文人,使其改变对明朝的忠诚,转而忠于新王朝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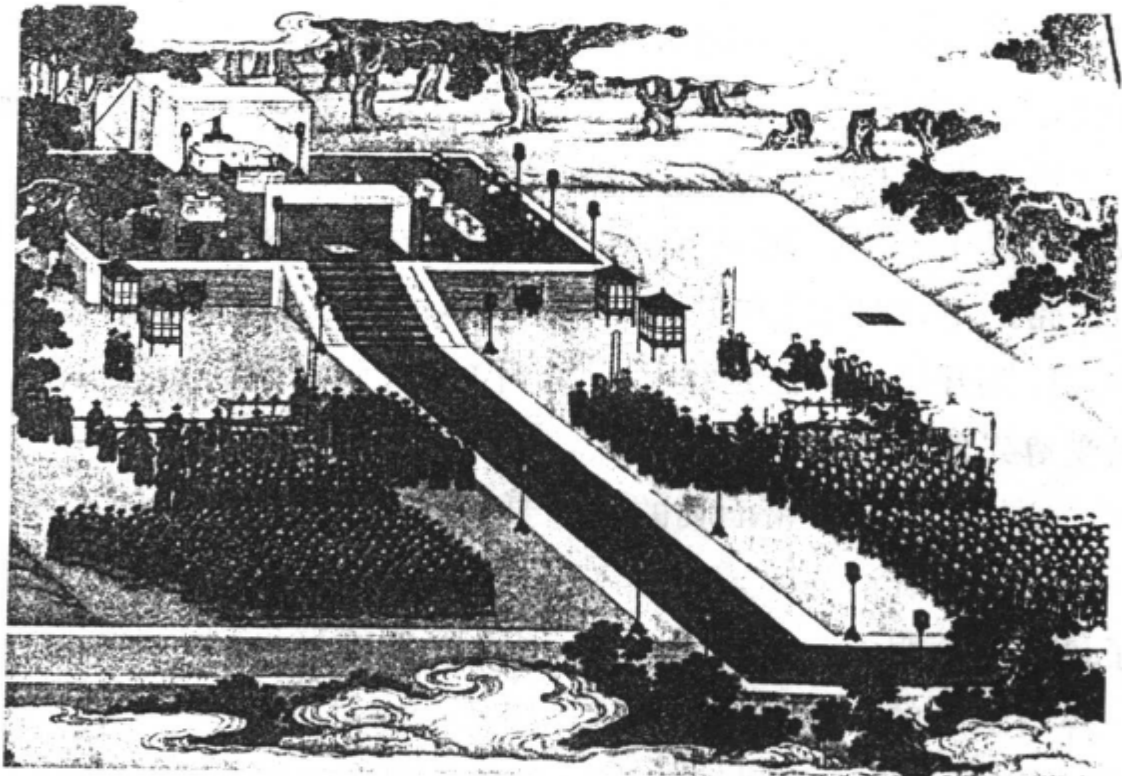


汤显祖所写戏剧《牡丹亭》画面。剧中女主人公为自己画像,女仆在一旁观看。

石中
之
意
何
如
矣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的《鸟与石》，1692年。八大山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画家通过其作品隐晦地表达他们对清朝的敌视。



佚名,雍正皇帝在农坛供奉牺牲。这幅局部的画卷描绘了雍正皇帝在北京农坛举行春祭。

第三章 康熙的巩固

1. 三藩之乱：1673—1681

清初的几位皇帝都生活在权臣的阴影之下，他们若想长保帝位，就必须迅速成熟起来。顺治十三岁时利用多尔袞突然死去之机掌握了权柄。顺治的儿子康熙第一次试图从鳌拜手中夺权时也是十三岁。1669年，他十五岁时在其祖母和一帮满族侍卫的帮助下，以跋扈和欺君之罪将鳌拜下狱，鳌拜不久死于狱中。康熙开始了自己延续至1722年的统治，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皇帝之一。

这位年轻的皇帝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将整个中国都统一到满人的统治之下。虽然1662年吴三桂已在西南地区消灭了最后一个明朝藩王——桂王，但是这个地区并未与中央融为一体。遥远的距离和亚热带山区绵延的山脉使骑兵作战十分困难，数以百计的非汉民族的边境部落将顽强地保卫自己的领地，而且缺乏忠诚可靠的管理者，这些因素都使顺治和多尔袞不愿将满人的势力伸入到这一地区，而是将中国西南和南方分封给1650年代末率军平定这里的三位汉族将领统治。

其中的两位即尚可喜和耿继茂都是1633年归顺满人的汉八旗，一直是满人征服活动的基本同盟者。他们对清朝的忠诚是久经考验的，特别是1650年他们从明朝支持者手中夺回广州并屠杀守城者更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位就是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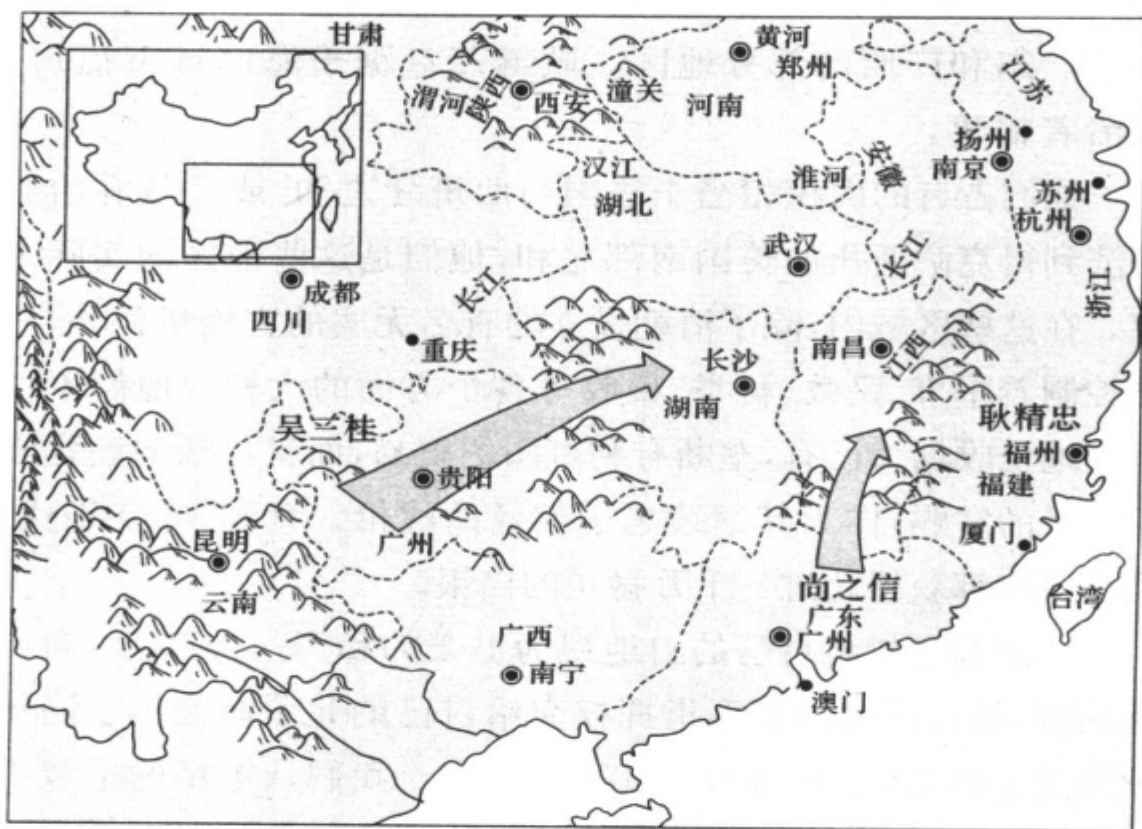
桂。这三位均被封为藩王，并与满族贵族结为姻亲。三位的统治区域犹如独立王国，被称为“三藩”。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和湖南、四川的部分地区。尚可喜以广州为基地统治着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耿继茂盘踞于海滨城市福州，统治着福建。

他们占有的面积相当于法国与西班牙之和，或是从乔治亚海滨到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南部之和，他们是这些地区的实际主宰。在这些区域内，除了清朝设立的有名无实的官僚机构外，三藩控制着军事、民政、科举、税收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他们不仅将当地税收据为己有，垄断有利可图的贸易，而且不断向朝廷索求大量的赏赐，作为其继续忠于朝廷的代价。直到1660年代，他们每年都获得超过一千万盎司的白银。

三藩都显然将自己的封地视为世袭的私产。1671年，尚可喜病倒，他将广州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尚之信。同年耿继茂去世，其子耿精忠接管了福建省。我们从零星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确知，康熙皇帝在其统治之初就已经着手讨论如何处理三藩问题。康熙的满、汉谋臣们束手无策。与他的那些谨小慎微的谋臣不同，如果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康熙是有胆略直面问题的。因此，1673年，年老患病的尚可喜奏请朝廷许其归老辽东时，康熙见机大喜，欣然准奏。当吴三桂和耿精忠也试探性地提出同样的请求时，康熙也一概欣然允准。这些奏请旨在证实康熙是否允许封藩继续存在，当康熙明确态度以后，公开的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康熙的一些心腹试图说服吴三桂和平地离开封地，吴三桂对此置之不理，于1673年12月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宣布建立新王朝“周”，率军深入湖南。耿精忠也于1674年反叛，在巩固了对福建的控制后，又挥师进入浙江。尚之信囚禁了坚持忠于清

朝的父亲,于1676年也加入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在广东的统治,又率军北上江西。



三藩之乱示意图(1673—1681)

三藩之乱是对南方和西南地区汉人忠诚于谁的一次痛苦考验。那些从1640年代和1650年代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与清朝和平相处的人现在又不得不决定真正忠于清朝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吴三桂的周朝。吴三桂利用汉人的民族意识,下令恢复明朝习俗,剪辮蓄发。吴三桂还公开征询,谁应该是周的开国君主,以此暗示如果能找到明王室的幸存者,他就将被拥戴为皇帝。而且,他用“周”的国号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上最受尊重的王朝之一、曾于公元前一千年统治华北、被儒家经典竭力赞美的西周的回忆。吴三桂表示,如果康熙彻底退出中原,在辽东和朝鲜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即可得到赦免。可以想知,康熙严词拒绝,他

愤怒地处死了吴三桂在北京做人质的儿子。

吴三桂及其支持者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厚实的基础，比南明的福王和桂王有更好的获取成功的条件。而且，在南部和西部，忠于清朝的汉人陷于包围之中，人数上也处于弱势，尽管其中很多人都拒绝为三藩效力——有的逃往山区，有的装病，甚至自残——但大多数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屈服。叛乱似乎真要使清朝大厦倾塌了，至少眼看着满人将要丢失整个江南，若是果真如此，那么王朝倚重的基本地区将成为动乱的牺牲品。但是，由于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中国得以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这对以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吴三桂在是否越过湖南边界，北上进入他1674年控制地区的问题上犹疑不决；其二，虽然康熙年少，却才智不凡，能够凝聚朝廷上下，制定出远大的攻防战略；其三，有一批为清朝冲锋陷阵的将领，其中一些青年虽然尚未经历战阵，但都勇猛无畏，坚忍不拔；其四，三藩在任何一条战线上均未协调一致以形成对清朝持续不断的打击；其五，三藩未能唤起那些对明朝忠心耿耿的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三藩昔日积极与满人合作的历史了如指掌。

三藩皆不能胜任重建大明江山的使命。吴三桂日益沉溺于奢华和虚荣，而尚之信的残忍本性较之以前的叛乱者张献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让猎狗将自己的私敌撕成碎片。耿精忠似乎一直显得能力低下，无所作为——正是由于他于1676年单方面向清朝投降，使三藩丧失了协同作战的机会。尚之信也于次年降清，这显然是因为吴三桂坚持向被尚之信视为私人禁地的广东省派遣官员。

吴三桂最后于1678年自立为“周”朝的皇帝，但这一举动已为时太晚，没有意义了。同年他死于痢疾，结束了自己六十六年

跌宕起伏的生命。他的孙子继承其名号，继续与清朝对抗了三年多，后在云南省会昆明被满人将领围困而自杀。吴三桂的追随者们皆被处决。尽管康熙已经接受了耿精忠和尚之信的归降，且恢复了他们的藩王封号，结果还是将其处死。康熙不能容忍把这类人留在左右。

1681年平叛战争结束，那些曾经主张对三藩采取强硬路线的谋臣们成为康熙的近臣：虽然他们的主张战争几乎断送了王朝的命运，但是最终的胜利却意味着中国将因此而更加强大。康熙严惩了支持三藩叛乱的大臣，但对待那些在战争中身不由己的被俘者则较为宽仁。正如康熙所言，他们只是显示了“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民水火之意”。康熙对战争中误入“贼”（他通常如此称呼反叛者）中的妇女和小孩也表现出同样的怜悯：“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①

随着藩王们的死去，三藩的势力也烟消云散。新的总督和巡抚——大多数为汉八旗——被派往叛乱各省，将其整合到中央的统治之下。这些地区的税收又重新流入国库，同时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也再次恢复，士人又开始为朝廷所用。但人们的生活深受创伤，很难迅速恢复。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在康熙一朝始终不能进入王朝的主流生活，朝廷对这些地区的不信任感仍然很深。那些省的人极少有获得高官厚爵者。虽然康熙广为巡游，但从未冒险深入南方。他所指的“南方”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富庶的南京和苏州，真正可以称之为“南方”的华南和西南各省却耐人寻味地被排除于他的巡游范围之外。康熙在其一生中，常常回味这场战争留给他的震撼，为因其作出准允三藩告老退位决定引发三藩之乱而肝脑涂地的生灵深感抱愧。但他从未因做出这一决定本身而后悔。

2. 台湾和海上中国

台湾归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 明朝末年，台湾基本上仍鲜为人知：危险的大海，狂暴的台风，浅滩环抱的海岸，充满瘴气的辽阔的西部平原，背靠连绵起伏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山脉，使这里成为与世隔绝的天地。台湾不太友善的土著居民阻碍了外来的探险者和定居者。但是一些中国商人还是从广东和福建的港口出发，涉险渡海，贩易台湾的鹿皮和鹿角（人们相信它有壮阳的功效）牟利，并在岛的西南方建立一些小的定居点。中国和日本的海盗也在沿海找寻到自己的天堂。

1620年代，台湾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遇难的海员和传教士一度是岛上唯一的欧洲访客。随后，葡萄牙人来岛上探险，并将它命名为“美丽之岛”。但是他们又撤离了该岛，决定把澳门作为其在东亚活动的基地。西班牙和荷兰人却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只做了匆匆的过客，西班牙人在北部的基隆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基地，而荷兰人于1624年在南部的小镇安平（今天的台南）建立了热兰遮城堡。到1640年，荷兰人驱走了西班牙人和日本海盗。跻身台湾岛、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帝国，和中国东部沿海的商人、官员之间开展了利润丰厚的贸易。在岛上贸易利益的吸引下，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来到岛上，集居于先后来此的西班牙和荷兰人周围，另一些人则前往台湾西部平原开垦耕种。虽然来台湾的中国商人最初很少有长期定居的，但是荷兰人还是鼓励他们前来贸易。他们冬天又返回大陆，游离于荷兰人的管理体系之外。荷兰人对岛上的土著居

^{*} 这是史景迁的看法。依中国史籍所载，此起始时间应大大提前。——编者注

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

1640年代和1650年代,荷兰人尽量远离南明势力的抗清战争,但是沿海地区战事的发展以及与南明势力的联系又使其不可能置身事外。实力雄厚的郑氏家族最终接受了垂死的南明政权的官爵,使战争进一步激化。郑氏是来往于福建、台湾和日本南部的海盗商人。郑芝龙于1646年降清,但其刚烈不羁的儿子郑成功却拒不遵从。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和舰船仍旧追随正在逃亡的南明政权,甚至在南明政权被驱入内地以后,他还是继续打着南明的旗号。

这位杰出的以“国姓爷”留名于青史(明朝赐给他皇姓,福建方言读作Kok-seng-ia,西方人据之译为Koxinga)的海上斗士生于1624年,母亲是日本人,他成长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融的环境中,通晓多种语言。他父亲的贸易网络从长崎延及澳门,在其厦门附近壁垒森严的家中既有基督教礼拜堂和佛像,也有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逃脱的黑人组成的卫队。船只可以直达营垒中的生活区。

整个1650年代,国姓爷的舰队一直在中国东部沿海与满人作战,在他的控制下,厦门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港口。国姓爷还组织了十个商队,贩易丝绸、其他奢侈商品和白糖,换取维持其海军战斗能力的军用物资和火药。1659年他下令进攻南京,受到重挫。当清军逼近其主要基地厦门时,他大胆地决定去攻击荷兰人的城堡热兰遮。也许得到了以前来到这里为荷兰人做通事,熟悉热兰遮防御体系的一个汉人的帮助,国姓爷包围了城堡。但是尽管他顺利地征服了周围的乡村,杀死那里的荷兰人,将其妇女掳为奴役,而守卫城堡的荷兰人令人惊奇地坚持了九个月。直到1662年他们才投降,根据协议,他们获准退回荷兰占领的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把价值超过一百万盎司白银的

商品和现金留给国姓爷。

国姓爷并未能长久地安享胜利。由于他不向清朝屈服，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北京被处死（他日本籍的母亲很久以前就被清军所杀），这一消息使他本已烦躁不宁的精神状态更加恶化。他开始虐待部属，对孩子们大发脾气，最后于 1662 年去世。

尽管 1661 年清朝辅政大臣鳌拜实行野蛮的迁海政策，却仍然未能使台湾屈服。清政府曾与荷兰人短暂结盟，逼走了坚守于福建沿海的郑氏家族势力，但是 1664 年和 1665 年两次远征台湾都遭到失败。满人不习海战，1673 年以后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平定三藩之乱。这使得台湾的郑氏集团得以继续拓展其繁荣的商贸王国：由于移民人口的增长和大陆人口的不断迁徙，先后即位的国姓爷的儿子和孙子统治着超过十万的汉人，生产大量的稻谷和甘蔗，从事巨大的食盐、白糖贸易和船舶制造。



十七世纪的海上中国示意图

甚至在于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结束以后，康熙发现仍然很难集结足够的军队从郑氏家族手中夺取台湾岛。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招就是任命国姓爷父亲以前的将领、早在1650年代就已降清的施琅为远征军的统帅。这是非常高明的选择，不仅因为施琅是一位出色的将领，而且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在他降清时都被国姓爷所杀，因而复仇心切，清廷可以寄望他决战到底。

施琅有条不紊地策划着战役，他拥有三百艘战舰的舰队规模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有多么强大的潜在海上力量，尽管其海上的资源通常并未得到开发。1683年7月初施琅将军率领舰队从福建出发，在澎湖列岛粉碎了郑氏集团的军队。

三个月后，台湾投降，或许康熙不愿再见到以前的国内战争的血腥屠杀，他宽仁地对待郑氏家族及其官员，并给其中一些人赐予爵位，允许其在北京居住。国姓爷的军队的大部分被从台湾调往中国北方，加强对俄国的防御。关于如何处置台湾岛，清朝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建议彻底抛弃台湾岛，而施琅力主将其建成防御基地，用以保护中国免受号称强大无敌的荷兰舰队的侵略。康熙决定将台湾并入他的帝国。它被划为福建省的一个府，以台南为治所，下辖三个县，以当地官员治理。同时，康熙命令八千名清军长期驻防在岛上，尊重当地土著居民的部落领地和狩猎场所，并审慎地限制汉人继续向岛上移民。

康熙这种自相冲突的做法反映了清朝政府（一如以前的明朝）对待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矛盾心态。中国的统治者对于贸易有一种根本上的不信任感，认为它是不安和动乱的温床。他们担心贸易活动会将中国的国防机密泄露给外国势力，导致珍贵白银的外流，以及促生海盗势力及其他犯罪活动。因此，尽管迁海政策在郑氏集团失败后被废除，清政府仍继续通过发放

许可证及限制船舶大小控制着与台湾的联系，厦门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地方政府均严格执行这一政策。

但是在商业活动十分繁盛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政策是不切实际的。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结果就是使巨大的贸易利益流进了这些地区能够控制海上和沿海地区贸易的官员的腰包。据一个汉人包衣自述，在1680年代早期他用一万多盎司的白银行贿，换得两广总督的职位，使他得以掌管广州城的大部分贸易。他在重新安置大量返回沿海地区百姓时，得到特派官员们的帮助，受权将近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三万百姓。而这位亦商亦官的总督积累的财富超过四十万盎司白银。

国家通过合法的对外贸易显然也可以征得巨额的税收，以前各朝统治者也曾有效地开掘过这一利源。但是除了建立四个海关（分别置于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进口税外，清政府并未建立必要的贸易制度，而宁愿实行行商代理制和贸易垄断。到了十八世纪，随着更为强大的西方贸易商人的到来，这样的贸易体制必将失败。

同样地，清政府限制向台湾移民，而又不能有效保障这一政令，结果只能使台湾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独立王国，一个野蛮无序的边疆社会，使其必然地处于清政府行政结构的边缘。康熙朝的记载使后人得以管见当年人们开发台湾岛的活动。来自福建的移民们从土著人手里廉价地租来土地，用汉人的灌溉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土质。施琅将军的一位定居于台湾北部的亲戚，利用人口稠密的南方的闲散劳力，斥资开发那里的不毛之地。一位来自广东的汉人青年娶了当地土著酋长的女儿，并做了其岳父的翻译。他将部落的土地租赁给其他汉人移民以获取利益。这些均不再代表汉人传统的行为方式，但是他们却为中国传统帝国增添了重要的新因素。

3. 绥服士人

南明诸王持久的反抗、郑氏家族受到的支持、三藩之乱的迅速蔓延并几乎得逞，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清政府缺乏汉人的支持。康熙皇帝即位伊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一方面确保满人贵族作为其军事上的有力后盾和政治上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使汉人相信他尊重汉人的传统文化。

争取满人的支持比较容易。康熙身体强健，小时候生过天花但安然无恙，这也成为他被选做顺治继承人的一个因素。他很早就热衷于狩猎和箭术，他的骑术也足以经受跋涉，远赴祖宗旧地满洲。在旅途中随驾的侍卫和满人贵族都对皇帝忠心耿耿，他们虽然在政见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康熙早年经历的所有危机中都给予他有力支持。康熙的祖母，皇太极的遗孀，很宠爱康熙，她借助其家族的关系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康熙的皇后和妃子们（他十一岁时娶了一个反对鳌拜的辅政大臣的孙女）的家族也成为他有力的同盟。他还谨慎虔诚地在北京的萨满寺庙中举行仪式，把满、汉均授予高位，设立一个由满人掌管的皇室事务管理机构，并在很多宫廷杂役中更多地使用汉人仆役以限制宦官的权力。

获得汉人的支持就复杂得多。满人 1644 年进入中原时宣称是为明朝崇祯帝复仇，但是很多汉人并不相信。即使满人这样做了，但是出于对本民族统治者的强烈忠诚，听到崇祯帝死讯后很多汉人还是纷纷自杀，很多人拿起了武器，虽然他们清楚反抗最终将失败，还有很多人则韬光养晦，以各种方式拒绝效力于清朝政府。

拒绝效力于新王朝的行为是恪守儒家原则，而康熙也就以

其人之道应对这些对抗。虽然十七世纪中叶对儒家教义究竟包含哪些内涵有过很大的争议,但儒家的教义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本质上说,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在中国就已经成为道德观念、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准则的代言人。他推崇正义和忠诚,并以意在确定一个特定对象与宇宙及同时代人们之间关系的仪式来强化这种重要性。他曾说,有道之士不应侍奉无道之君,如果需要,必须准备为道而献身。他进一步论述道,人类应该关注世界的问题,同时应该尊重自己的祖先,而不应沉湎于与上天感应及精神世界的探求。

一本记载孔子与政治家及学生对话的集子(即著名的《论语》),将孔子描述成一个精明而又精力旺盛的人,不断地省察他自己及他周围人的人格缺陷,而其行为从不失德。他十分信奉道德榜样的力量和教化的核心地位。孔子认为人们的识见会随着年龄而增长,他绘制了一个认知发展的时间表(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去世的若干世纪后,据说是他编写的五部著作被合称为儒家经典的“五经”。其中的一部论述礼仪,两部论述历史,一部论述诗歌,还有一部《易经》是关于宇宙和预言的著作。到了十二世纪,《论语》和《孟子》以及另两部关于人性和道德规范的书(即《大学》和《中庸》)被合称为“四书”。人们相信这九部著作包含了指导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并提供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政通人和的理想时代、一千五百年前的周代的可靠记载。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由“四书五经”搭起的儒家思想的构架在无数考释、疏义的充斥下不断膨大,而且受到佛教思想(五世纪以后在中国逐步活跃起来)及中国哲学中的其他思想潜移默化改造。同时,这些融为儒家思想的内容逐步成为教条,“四书五经”也成为通向仕途的科举考试的基准。儒家思想又被

根据等级制度的需要进行解释,用来为父子、夫妇、君臣之礼辩护。而科举考试只限于男子参加,女子无论其学识多好也不得人仕的规定更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清朝日益普及的儒家教育也强调“理”的力量,并将它与“气”相提并论,从而对人性及超物质世界作出二元论的解释。

从囚禁鳌拜开始,康熙就表现出对这份十分复杂的文化遗产的极度尊崇。1670年,康熙颁布了十六条诏令,昭示全国,其内容都有关儒家的道德准则。这些著名的“圣谕”强调了社会关系中的君臣父子之仪、宽仁、遵从、节俭和勤劳。康熙还任命了一批满、汉大学士,以备顾问,与之一同细心研读“四书五经”。从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康熙逐章研读的收获以及他与大学士们对疑难问题的讨论。康熙悉心研读儒家经典,练习书法的消息被特意向朝臣们“透露”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即被冠以“圣主”的光环。与此同时,满、汉学者们将“圣谕”以通俗的语言改写出来,使康熙关于伦理道德的观点在百姓中广为传播。

中国政府巨大的权力之一来自对科举考试的控制。顺治朝即已恢复科举制度,康熙时继续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即使三藩之乱期间也未中断。但是令康熙恼怒的是,很多饱学之士认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明朝的背叛,因而拒绝应试。康熙推出一个解决这一困境的妙策,1679年,他下令在三年一次的国家考试之外,由地方举荐那些有奇才异能者,专门为其举行特科考试。虽然一些固守自己信念的学者仍然拒绝赴京应试,还有的甚至不允许地方推举自己,但是康熙的这一举措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次特科考试共录用五十名,大部分来自江南各省。出于嘉许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康熙令这些学者相助编修明史。

尽管朝廷作出了这些姿态,很多汉人对新王朝的态度仍然

举棋不定。一些学者甚至私自收集资料，摆脱朝廷的监督，自己编修明史。像扬州和江阴这样虽然失败却可歌可泣的抗清行动也被载入史册，并秘密地世代传颂。一些在自己家乡亲身参与了抗清活动的学者们退出政坛，认真撰写明朝后期东林党及其他类似团体的改革派学者们的事迹。

有三位学者因其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和著作而享有盛名。一位是湖南人王夫之，他追随流亡西南的南明桂王政权多年，于1650年回归故里。他竭力反驳明朝中期学者王阳明的信徒们的个人主义哲学，认为王阳明学派在个人良知中孜孜以求地找寻道德源泉实则有损于整个时代的道德。王夫之还撰写了桂王政权的历史，并针砭以前“蛮夷”建立的王朝。如果清政府发现了这些，他一定难逃厄运。

第二位学者黄宗羲是浙江人，他的父亲于1626年被宦官魏忠贤所杀，他是东林党和其他改革派的热情支持者。黄宗羲在东部沿海跟随南明藩王作战多年，在山区设置路障，阻延清军。1649年后他退隐山林，潜心治学。他不仅态度严谨地撰写明朝重要人物的传记，还试图剖析政治结构。他建议，改变当前权力过分集中状况的法门就存在于中国远古理想社会里，应当以充当地方权威的士大夫的道德力量实施管理。大多数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都致力于改变宦官及联结皇帝与百姓的官僚的行为方式，而黄宗羲则认为应该削弱君权。

三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顾炎武，他于1613年出生于江苏，由寡母抚养长大。其母是一位德行高尚的非凡女性，顾炎武受其影响，也恪守儒家礼教。明朝末年，顾炎武通过了乡试，有感于当时政治和道德上的颓败，他潜心钻研中国传统的经世之术及政治军事问题。1644年，他曾一度在福王政权中供职，抗击满人。母亲宁愿饿死也不屈从于新的征服者的行为给了他深刻

的触动。她给顾炎武的遗言中说道：“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尔当读书隐居，无仕二姓。”^②

虽然顾炎武并未仿效母亲的行为，但是他将母亲的遗言铭记在心，其余生（他于1682年去世）致力于游历、省思和治学。他甚至离开了位于富庶的长江平原的江苏故里，来到陕西省西北荒芜之地。顾炎武有大量著述，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一样反对儒家主流学派因强调二元论和主观意识而导致的道德的空洞无物。顾炎武骑马游历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区，考察农业生产、矿业技术以及当地商人的汇兑制度。在一系列来源于亲身观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开创一种新的严谨而务实的学风。

在其篇帙浩繁的著述中，顾炎武主要致力于政治结构、种族、经济、地理及社会关系等几个问题，特别关注“朴学”，认为这是阐发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真谛的基本工具。他特别赞赏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学者们不饰虚文、治学谨严、不矫作自负的学风。顾炎武声名日盛，但他拒绝参加清朝的一切科选，包括1679年的特科考试，也拒绝参加由康熙发起的明史的编修。顾炎武死后，受到很多学者的景仰，被视为治学严谨朴实的典范。他的著作对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惟武人和学者们起来反满，清朝前期很多画家也用他们的作品表达他们的愤慨和对新王朝的不忠。他们以大胆的创新、怪异的画风以及作品中的留白，描述了一个凄暗失衡的世界。施以浓重笔墨的曲折的孤松、荒芜嶙峋的山峦、杂乱的草木，加上孤单的鸟、鱼，这些都是艺术家们青睐的主题。一些杰出的画家，如石涛和“八大山人”，均与前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征服中原以后都遁隐空门。八大山人（其自署之名，意为居于八大名山之中者）用沉默显示对清朝的反抗。他在自己门上书一“哑”字，却从此缄口不言，虽然他在醉饮之时及创作灵

感的激荡之下还会纵情哭笑。但是石涛又逐步回归社会,开始与学者和艺术家们交游,即使他们已事从清朝。他也偶尔受人之托,为一些富裕雅士设计庭院,只是不与朝中之人交往。

清廷网罗知识分子的活动确实可以写成一部历史。那些不愿出仕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仍然难挡友情和金钱的诱惑。编修文献尤其是吸引他们心力的好途径。康熙召集几批学者,请他们编写辞典、百科全书、实录及古典诗文集。另一些大臣发起规模庞大的地理和乡土历史的研究,使无数学者游历全国,收集材料,然后返回舒适的宅第撰写著述。还有一些官员将那些饱学之士召为幕僚,授以闲职,使他们有时间各展才华,或成为小说家、诗人,或成为戏曲家。这使得处于外族强加的血腥统治之下的中国文化在 17 世纪晚期仍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通过孔尚任的艺术表达,那些明朝遗民们反抗和忠君行为最后也为康熙朝所接受。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生于清军入关以后的 1648 年,他的父亲曾是明朝著名学者。孔尚任深为明朝的覆灭及为亡明献身的人们所震撼。在其四十多岁时,他写了一部通俗戏剧《桃花扇》,讲述一个正直的学者和他所爱的女子在南明福王小朝廷里的苦难经历。这位女中豪杰拒绝南明一个邪恶大臣的求爱,以死相反抗,血溅花扇;一位画家巧妙地将血迹绘成桃花。戏剧以此为题,显然喻示了晚明精神生活中暴力与美好的交织。戏剧的结尾,随着明朝反抗的失败,这对爱侣发愿隐入佛门,一些幸存的有气节的大臣也隐居深山,逃避清朝的征召。在最后一幕,这对爱侣与一位友人一起慨叹:

千古南朝作话传,
伤心血泪洒山川,
仰天读罢招魂赋,

扬子江头乱螟烟。^③

1690年代,这首诗已在康熙的朝廷中传唱,孔尚任的戏曲也受到宫廷的喜爱。孔尚任在一篇描述听众情绪的文章中写道:

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丈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摇酒阑,唏嘘而散。^④

这些人或许仍然心怀旧朝,但是已与新的统治者晏然相处了。

4. 确立边界

外来的影响,至少是一些外国的技术,在清朝前期的中国日见频繁。就连那些对外国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的中国人的生活也在快速地发生变化。例如,孔尚任在写《桃花扇》以前多年视力已开始逐渐下降,他在诗中以无法抑制的欣喜描写了他能重新读文写字的情形:

西洋白玻璃,
市自香山澳,
制镜大如钱,
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
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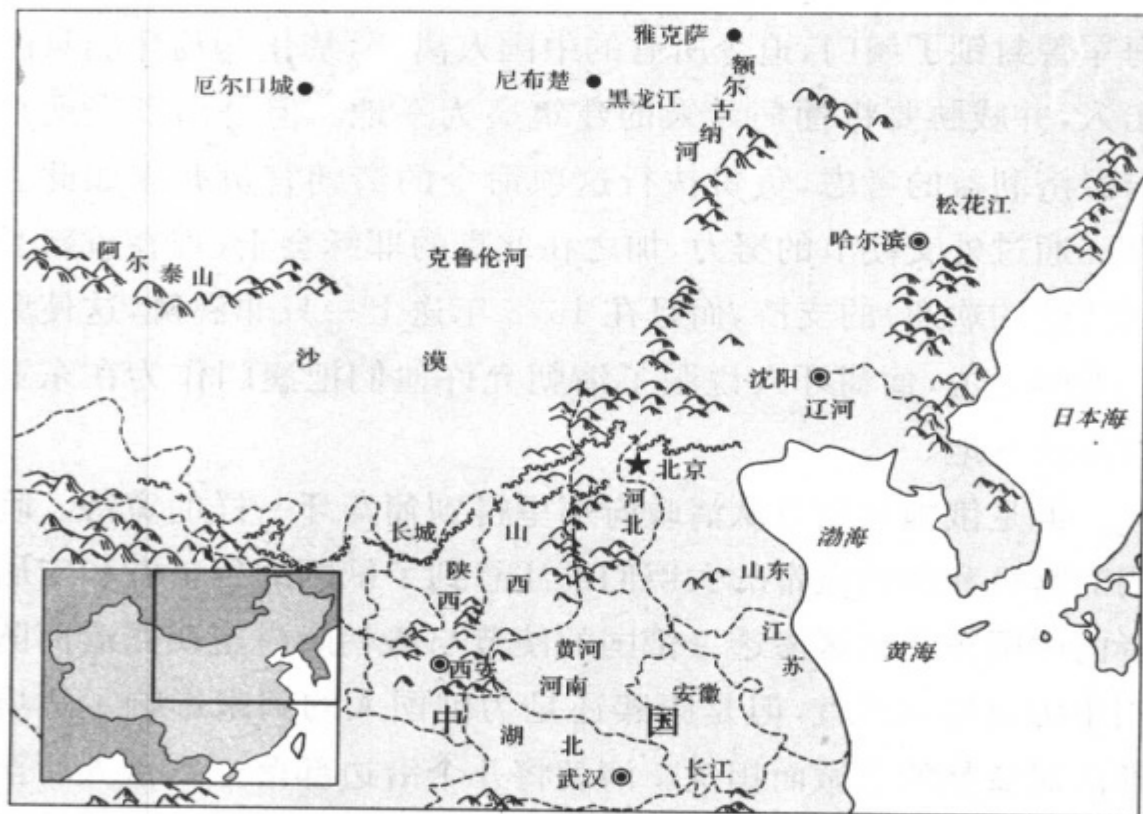
犹如在年少。^⑤

孔尚任得以重见光明，应归功于通过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这还得感谢清朝不摧毁这个葡萄牙人据点的决策。在1660年代，作为打击台湾郑氏势力的迁海政策的一部分，清朝海军曾封锁了澳门，迫令所有的中国人离开，禁止葡萄牙船只的出入，并威胁要将葡萄牙人的建筑夷为平地。但是出于当地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清朝官员并未如此去做。通过外交使节的努力，加之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现在重新受到清朝的欢迎）的支持，而且在1678年送上一只非洲狮，这使康熙龙颜大悦，葡萄牙人说服了清朝允许他们把澳门作为在东亚贸易的基地。

但是俄国却没有从清政府那里得到葡萄牙一样的宽待。晚明的官员和顺治皇帝的大臣们都注意到了俄国的狩猎者和定居者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俄国的使节与清朝商讨定期派遣商队到中国贸易的事宜，但是康熙还是为俄国人的到来影响了边境部落对清朝的忠诚而担忧。清朝将几个沿边部落迁到俄人所至地区以南，并制造一个无人区将俄国人与中国人相隔离的尝试——这也许是对为打击郑氏集团而在沿海实行的迁海政策的精心仿照——也因费用太大，不切实际而停止了。

实际上，康熙已经筹划了几年，准备对黑龙江边雅克萨的俄国人发动袭击。上文中曾论及，清朝于1683年最终收复了台湾，将一批郑氏家族的军队调至北方，参加抗击俄国的战争。郑家军的海战技术对康熙十分有用，他正需要水军在北方的河流中巡航护卫。随着南疆的安定，康熙下令谋划雅克萨战役，并于1685年经过激战，夺取了雅克萨城。之后，康熙又命令放弃这座城市（那时它实际上只是较大的设防的围栏）并撤回军队，但

是清朝的将领却令人费解地抗旨不遵,毁坏了这一地区俄国定居者种植的大量作物。于是俄国人建于希尔喀河西岸的第二个贸易据点尼布楚的守军指挥官派人在冬季来临前积聚粮食,并重新占领了雅克萨城。



《尼布楚条约》示意图(1689年)

盛怒之下的康熙又于1686年对雅克萨发动第二次袭击,遭到了俄国更加激烈的反抗。然而,俄国统治者担心面对清军的坚决抗击,自己是否有能力守住辽阔的区域,遂决定主动提出议和。议和双方用通晓拉丁文和满文两种语文的耶稣会士做翻译,于1689年在尼布楚议和,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影响深远,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它划定的疆界一直维持至今。在最有争议的地区,以格尔比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南北基本分界线。俄国人放弃并捣毁雅克萨城,整个黑龙江流域归属中国。双方互相遣回逃亡到对方的臣民。互

开商贸,但只允许持有清朝颁发的有效文件的商人贸易。

台湾已被用武力收归中国版图,澳门的葡萄牙人被给予没有得到条约认可的半独立地位,而在与俄国的关系中,双方以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签订了条约。虽然这很不符合中国的传统行为方式,但是从清朝建国以来对俄国的事务并未交给处理与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关系的礼部管理,而是由一个特殊的机构理藩院负责。这个机构由皇太极创建,最初负责处理与蒙古的商贸和外交事务。将俄国事务置于这一机构的管辖之下,表明清朝认为对这位北方的邻国应另眼相看,漫长的北方边疆的防卫事务的处理也应有别于东南。

中国西部的准噶尔部挑起的动乱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清朝与俄国签订条约。因为清朝担心俄国与这些危险的游牧勇士们结成联盟。准噶尔部在杰出的首领噶尔丹的领导下,虔诚尊奉西藏的达赖喇嘛(将其奉为精神领袖),恣意驰骋于外蒙和青海的广袤地区。1670年代末,噶尔丹占领了喀什噶尔、哈密、吐鲁番等地,将这些城市里的大量穆斯林居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控制了联系中国与地中海地区的富饶商路。敌视噶尔丹以及被他打败的部落纷纷逃向东方,进入清朝西部的甘肃省。大批武装移民的涌入使本来就担心俄国与准噶尔联盟的康熙皇帝十分忧虑。

但这样的联盟并没有建立起来。《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康熙派军(由其兄弟统领)打击噶尔丹。在噶尔丹与其东方各部落多年争斗不息的情况下,康熙决定御驾亲征,这一大胆举动的促发因素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而非手下的将领们成功地策划了对俄国的战争。以有力的后勤保障为依托,八万清军兵分三路西进。康熙大军越过戈壁沙漠,直捣克鲁伦河北岸的准噶尔部,噶尔丹被逼入了死胡同,1696年在著名的昭莫多战役中被打败。

噶尔丹众叛亲离，于次年死去。

这次平叛战争标志着康熙的帝王生涯进入了顶峰。四十二岁的康熙欣然感受了战争的刺激和危险。战事结束后，他写信给朝中的宠臣们，描述这里灿烂的晴空、新奇的食物、令人惊叹的风景，这一切使他充满了喜悦。“今噶尔丹已死，其下人等俱归顺”，康熙在169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朕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护佑成功，朕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朕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墨难尽其大概而已。”^⑥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个问题的解决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一区域的权力争斗并未随着噶尔丹的死而结束。达赖喇嘛被谋害，新的继承者选任不当，康熙发现自己又卷入了与准噶尔部其他首领的复杂斗争之中。康熙乃在匡扶正义的名号下进入西藏（正如1644年满人人关一样）。他分派两路大军，一路由青海湖，另一路由四川省入藏。1720年秋，两路大军会师于西藏首府拉萨，一位忠于清朝的达赖喇嘛被扶上宝座。就这样开始了清朝对西藏政治的武力干预。

与此同时，在台湾，由于生活的动荡和清朝政治的腐败，一位来到台湾的官员的仆从福建人朱一贵与五十名歃血为盟的弟兄举旗造反。得益于动荡的时局和前明皇室的姓氏——朱姓，朱一贵纠集了数百名追随者，占领当地治所，自称台湾王。他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两个月，就被三十八年前曾经收复台湾岛的施琅将军的儿子率领的远征军俘获。

虽然清政府并未完全消除地方隐患，但他们迅速有效地处理了两个边缘地区的危机。1722年康熙去世，清朝势力向西南和东方的发展也随着西藏和台湾的征服达到了极限。《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保了满人祖宗故地的安全，清朝疆域之广袤，权力之巩固只有中国古代辉煌时期的几位帝王能与之媲美。

5. 复杂的遗存

康熙坚定谋求国家统一，积极处理对外事务为他赢得了很多声誉。以自己决断力为荣的康熙经常把满、汉大臣们抛诸一边，独享成功的殊荣。然而，在有些方面，结果并不令人愉快。他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纷杂不清的局面。这特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围绕皇位继承人胤礽的争论，与天主教教士的关系，农村的治理。

康熙在其执政之初就十分清醒地力图避免 1640 年代和 1660 年代多尔袞和鳌拜专断朝政的现象的重演。因此，1674 年当第一个皇后喜生贵子胤礽后，康熙很快就册封他为太子。因为胤礽的母亲死于难产，所以胤礽的出生就萦绕着一种宿命的气氛，也使他与其他异母的兄弟十分疏远。

胤礽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被培养成为天下表率，遵循儒家道德规范，灌输满人的优秀品质。康熙为太子选择了博学隽德的老师，密切关注他的进步，也很重视其行为举止和学业修养。并给他逐步灌输治国之术，1696—1697 年康熙远征噶尔丹时让他留在北京监国。康熙甚至很早就有意退位，让胤礽即位。

但是，康熙西征归来，开始听到关于太子行为的令人忧虑的传言，涉及胤礽乖张、暴烈、冷酷的种种表现。康熙喜好巡游，在他带着皇子们巡游西部、东北以及多次巡游运河沿线和长江下游富庶城镇的过程中，胤礽所表现的任性行为再一次令人感到不安。

康熙面临的问题是难以悉知详情。毫不奇怪，朝廷中也围绕着继续拥立胤礽还是立年龄和聪慧都足堪角逐皇位的另七个皇子分成了不同帮派。在此情形下，满、汉大臣中几乎无人肯直

言己见。于是康熙开始另寻新的信息渠道，以拂去笼罩在这些传言上的层层迷雾。

皇帝通常都以“奏折”的形式从在京及地方官员那里得到信息。这些书写工整的文书由政府的邮差送至朝廷，先由内阁誊录、审阅，并在票拟了意见以后送呈皇帝，但这只是相对公开的制度。康熙在 1690 年代还开始建立一套秘密的密折制度，密折由上奏者的家仆送至宫中，由亲信太监不开封直接上呈皇帝，皇帝亲自阅览、批复和密封。然后这份奏折又原路返回，上奏者的家仆带着有皇帝秘密朱批的奏折，回去交给上奏者。

最初，这项制度并非是正式的，康熙只是让一些在地方任职的亲信臣僚将最近的粮食价格上呈给他，以使他能够查验大臣们报告的准确性，并寻查和判断将会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原因。十八世纪早期康熙开始广泛实行这一制度，1707 年就有一部分亲信大臣以密折的方式向皇帝报告胤礽行为的一些密情。他们向皇帝描述胤礽尚未登位就如何以皇帝自居，对待下属和奴仆是如何残暴，如何派人到南方买童男童女，带回宫中狎戏。虽然康熙在很长时间里都隐忍不动，但到 1708 年，汇集的太多不利于太子的证据使他不能再迟疑。怒不可遏的康熙永久剥夺了胤礽的太子地位，拘禁于宫中，由四皇子胤禛监管。胤礽的几个密友和一些大臣也受其牵连，被下狱处死。

事后康熙却萦绕于犹疑、愧疚和自责的痛苦之中。康熙相信胤礽并非真有指控的罪行，而是受到蛊惑，乃于 1709 年释放了胤礽。但是，包括盛传胤礽曾图谋刺杀显然不愿意退位的皇上这样的新证据使康熙于 1712 年再次下令拘禁胤礽。此后，在其统治的十年中，康熙拒绝任命别的继承人，并无情地惩处敦请他立储的大臣。朝中流言四起，围绕众多皇子而营伙结派的现象日益严重，大清的前途一时阴云笼罩。

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也触及了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自推翻了鳌拜的辅政统治后,康熙曾在朝中任用耶稣会士。他再次委命他们管理司天监,任用他们作为自己绘图和工程等事务的顾问,允许他们在京城和各省传教。特别是1693年以后的十年,皇帝下令允许基督教传播,耶稣会士们开始希求能获得巨大的转机。然而,康熙坚持,耶稣会士们要同意接受他的规约——即中国人祭祖和尊孔是民间习俗而非宗教仪式,因此,中国的基督教信众可以继续奉行这些习俗。因为康熙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沿自晚明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所以大多数在华的耶稣会士对此都无可置疑。

然而,很多东亚和罗马的不同教派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与耶稣会士一样,都对此有很深的歧见。他们相信,康熙从本质上以自己的绝对权威干预宗教教义,耶稣会士们也致命地削弱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深受信任的年轻使者麦拉德·铎罗前来调查情况。1705年和1706年这位使节在北京与皇帝的一系列会见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铎罗以逐出教会相胁迫,禁止天主教传教士们遵循康熙的旨意,而康熙则还以颜色,下令驱逐所有拒绝签署承认康熙地位的印票的传教士。虽然大多数在华的耶稣会士都签署了印票,还是有十多位圣方济修会和道明修会及其他传教士拒绝这样做。这些人均被立即驱逐出境。彼此的强硬立场毁坏了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基础,也有力地阻碍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假如任何一方采取更灵活的态度,那么在十八世纪,天主教接受了伽利略的发现而传教士们将西方最新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也许会给中国的思想和自然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

在税收和乡村管理这两个重要领域,康熙最后都未能实现

建设性的改变。他似乎已接受了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业已存在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重新进行全面的土地清丈,他还是继续实行晚明制度,即将原先以实物和劳役形式交纳的赋税以银折纳。税收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地方用于地方官员的薪俸,实施当地救济,支付建筑测量费用。地方官员力图通过广征大量的额外费用来添补用度,其中很多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也有用于给上级送礼,或送礼到北京,以使有关的部门考课的时候能对他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制度的疏漏延长了经济低迷的时间,土地和谷物的价格急剧下降。当时的中国人忍受了钱重物轻和经济停滞的痛苦,人们反观过去,使得顺治统治时期相比之下像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⑦

结果,尽管康熙在政治统一和边疆巩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对于乡村地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而言,生活仍然是一种痛苦的挣扎。因为无力武装民团,使得小股的盗匪在中国很多地区犹人无人之境,肆意横行。地方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欺凌农户,横征暴敛。土地契约的争讼要拖延数十年,孤儿寡母遭受同宗的成年男性的欺凌,往往也求助无门。私人的争端常常导致暴力和仇杀,而埋头于巧取豪夺的官员既无闲暇也无人手去调查。

也许他想起了 1659 年战役中江苏、浙江当地汉人对国姓爷的有力支持,或虑及这一地区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带,康熙在追究富饶的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拖欠赋税上特别宽容。为了保持宁和的局面,他一再敦促处理欠税案件时要宽仁,并经常慷慨地减征很多并未遭受严重灾害地区的赋税。虽然他还是继续实行“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能在家乡任职(为了避免其在职时滥用职权),但对那些指控其亲信大臣的家人,或在朝中为官多年后致仕回乡的大臣公然滥用职权的密折,他常常置若罔闻。

康熙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似乎由衷地相信现在中国的乡村已经完全恢复了繁荣景象，官僚机构也能利用所掌有的资源履行职责。朝廷也财力充裕，因为除了土地税以外，它还从食盐的专卖、人参与玉石的贸易以及所谓富商的“自愿”贡输、商业运输费等处获取为数巨大的额外收入。康熙还认为人口的数量也可以衡量中国繁荣的状况——而真实的人口数却被地方官员所隐瞒，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报告了人口增长的数字，户部就会提高税额——于是他决定采取断然措施。1712年，他根据既有耕地上的丁数固定税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方官员因而能够准确地报告人口增长情况，而不必担心增加以后的赋税负担。

因为康熙——就像他的前任顺治一样——已不再实行全国性的土地清丈，中国的地税制度现在依据两个标准固定下来：各省的土地维持1581年万历统治时期所作的最后一次全面清丈的登记数，而每一单位土地应纳的租税数量此后皆依据1712年的数字。这严重阻碍了康熙的继承者们对中国财政做合理化的整顿。虽然现在更高的人口统计数字开始报到北京，皇帝陶醉于中国的繁荣富庶，但是财政上的根本弊端一个也没有消除。

“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康熙在1717年一道袒露心迹的谕旨里告诉群臣，“故深惧颠倒是非，万机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⑧在说过这番忧郁的话以后，康熙又活了五年，此时，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长寿带给他的却是不断减少的慰藉。当1722年他在北京的皇宫里寿终正寝时，他还未公开册封太子。回顾当时的情形，很难想象出是何等的绝望使他将立储这样的基本责任都置之不顾。

注释：

- ① 史景迁著：《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纽约 1974 年版，第 32 页。
- ② 彼德森(Willard Peterson)：《顾炎武的一生：1613—1682 年》，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28 期，1968 年，第 142 页。
- ③ 孔尚任著，陈世骧、艾顿(Harold Acton)译：《桃花扇》，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78 页。
- ④ 斯特拉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孔尚任的世界：中国清初的一个文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3 版，第 278 页。
- ⑤ 前引斯特拉斯伯格著，第 219 页。
- ⑥ 前引史景迁著，第 165 页。
- ⑦ 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著：《财富之源：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6 版，第 211—215 页。
- ⑧ 前引史景迁著，第 148—149 页。

第四章 雍正的权威

1. 经济结构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在位时间不长,但是此期朝政坎坷跌宕,错综复杂,而且是有清一代重要的时期。雍正宣称自己就是康熙皇帝临死时选定的继承人,雍正朝从一开始就笼罩着议论猜疑的阴云。因为康熙临终时诸皇子均不在场,又因为京城的九门提督是雍正的密友,所以对他的继立没有人公开提出质疑,但是在其统治的整个时期里(1723—1735),对“篡位者”的指控一直困扰着他。

然而,雍正篡夺皇位一说几乎并无证据,相反却有一些证据能够证明与其他大多数皇子相比,康熙更信任雍正。康熙和雍正(在家族中的名字叫胤禛)经常一起讨论政务,一起游乐。正如我们见到的,雍正一度被指定为他兄长亦即废太子的监管人——从当时的政治情形来说,这是一项微妙而危险的任务。

一旦登上皇位,雍正逮捕了那些他认为最不满自己统治的兄弟,不遗余力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首先却给他们加官晋爵以平息其猜疑!)前太子胤礽和另两个兄弟在被捕后不久就死于狱中(是被杀还是被虐待而死不得而知);其他几个或遭软禁,或被严密监管。雍正完全信任的仅康熙的第十三子胤祥,他获得了加封,并担任总理事务大臣。

这些行为无论其是内心深怀不安与疑惧的表现还是消除隐

患的实际手段,都显示了雍正精于统治之术。他性格精细,每天长时间处理政事,常常从凌晨四时直到七时阅读历史典籍,七时吃早饭,接着会见大臣,直到晌午,然后批阅奏折,直到深夜。他既不到北方远行狩猎,也不像他父亲喜欢做的那样到江南的城市悠闲地巡游。他的主要消遣似乎就是研习佛教,在这方面他是虔诚且有深厚造诣的信徒。此外就是到北京西北的宫殿放松心身。尽管他的父亲经常用满文书写,汉字写得缓慢而拘束,雍正似乎更喜好汉字。他的汉字书法清晰流畅,书写正确通顺。

但是,皇帝生活表面的有条不紊并不能使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就是雍正时期的中国还远非一个完全整合、政令亨通的国家。中国辽阔的疆域需要皇帝考虑诸如经济改革的步调,血缘组织的方式,交通运输的效率,宗教活动,商业的波动以及土地使用和占有方式等等领域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应该囊括当时关于所有这些变化的系统扎实的信息,以便能描述其变化的确切方式,及其如何为中央的政治决策服务。

虽然这个目标让人望而却步,但各种研究已逐渐表明它是可行的。特别是根据经济联系而非传统政区划分为单位,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官僚机构没有利用的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社会。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将其分为九个“大区”(他们使用的术语),每个大区覆盖几个省的部分地区。大区皆有一个“中心”,它是大城市中经济的活力旺盛、人口稠密,有相当发达的交通网络便于食物和商品流通的城市。每一个中心周围是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稍逊的“边缘”地区,将一个划定大区的中心与相邻区域的中心分隔开来,这里同时也是一个违法分子和盗匪自由滋长、治安松懈的区域。

这九个大区中一个在东北,是清朝入关以前的心脏地区。两个在华北,即陕西西安地区和北京——山东西部地区。三个分布在长江沿线——一个在南京周围的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在长江中游的汉口周围,另一个深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第七个在福建沿海地区。第八个在边远的东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最后一个在西南的云南和贵州省。我们不必对所有九个区域都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对其中三个区域作一简要的考察,以判定十八世纪时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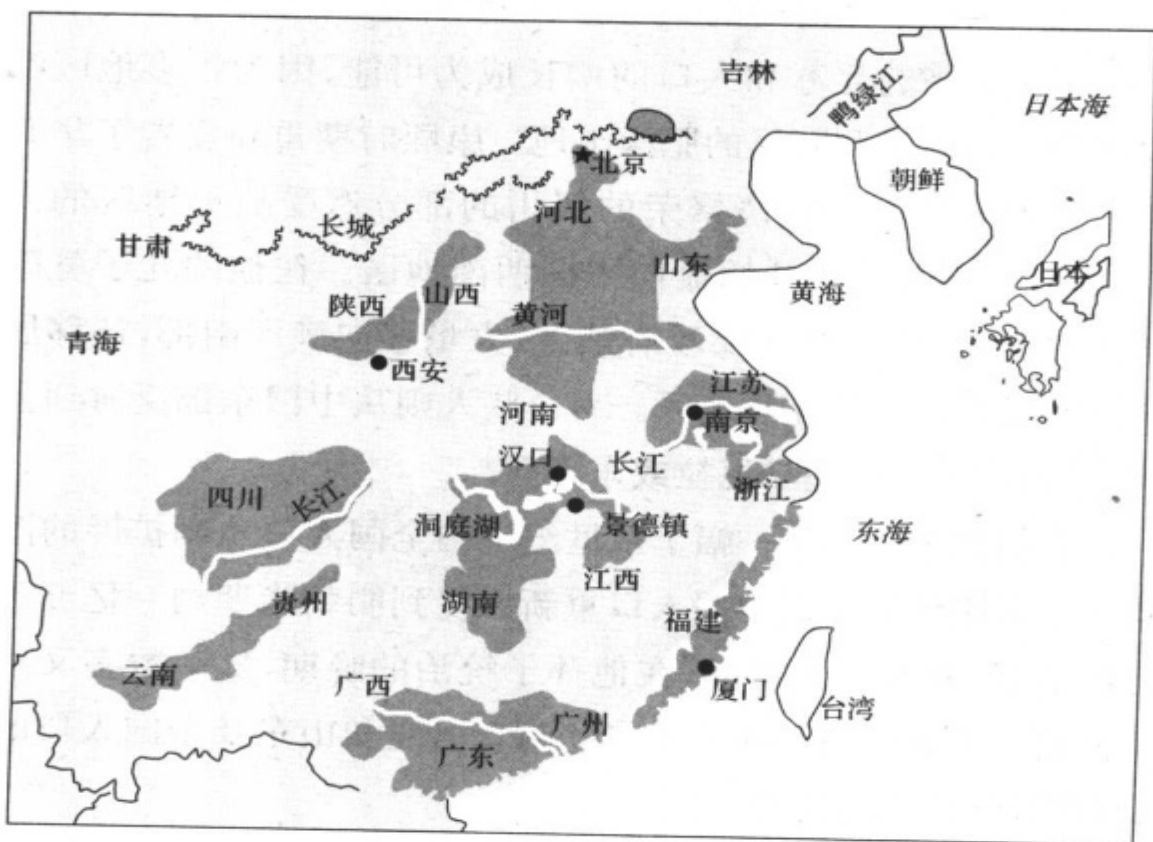
首先,北方大区——以北京和山东西部为中心,扩及河南和江苏北部——尽管其中有都城,城市的发展仍逊于其他大多数区域。经济的基本状况是小土地占有。满带泥沙的黄河经常泛滥,但对于远离京城的地区,这里的救灾赈荒的措施更为有效。随着纺织技术的进步,棉花逐步成为这一区域很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棉纺经常是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地窖作坊中进行,这里的环境能够顺应当地气候,控制湿度以防止脆弱的棉线断裂。烟草种植与玻璃制造、煤矿开采、酿酒也逐步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动、在大运河驳船上大量劳力和船工的存在、土地的过度耕作、细碎的财产占有,所有这些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犯罪和暴力的渊藪。

相反,长江中游大区由于人口密度很低,有很多未垦土地,此时别的地区的移民正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出现了对新的居住地和祖籍都有认同的“客居者”,以及当地离开其以前的耕地的少数心怀怨恨的人。得到迅速开发的沿江城市汉口拥有复杂的金融和行会系统,其商业地位胜过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真正的地区间粮食远距离贸易的集散地。东南的景德镇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城市,为西方的出口市场和中国的上层社会生产瓷器。然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农民们在洞庭湖地区修建新的

堤坝,保护他们小块的耕地免受洪灾,士绅们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计划。结果由于人类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剥夺了河流自然的蓄洪区域,最终河流泛滥,导致了可怕的洪灾。

我们的第三个范例,即以福建省为中心,包括浙江南部和广东东部部分地区的东南近海大区,则是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的影响。处于沿海的地理位置给这个区域的商人提供了与台湾和东南亚贸易的巨大商机,也给这一区域——特别是厦门——带来四海一家的思想和高度发展的信用和金融系统。这一地区丰富的茶叶生产给经济带来长久的繁荣。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这个区域又有着强烈的地方观念。强有力的宗族关系控制着整个村庄,村庄间经常发生势不两立的争斗。很多富裕的家庭都壁垒森严。这里地租很高,在开成梯田的山地,新来的移民与穷困农民紧张的关系一触即发。浓重的当地口音和方言使其与外面的交流甚为困难。考中令人向往的进士的人也越来越少,当地的精英阶层逐步丧失了全国性的影响。清政府将它视为有隐患的地区,派八旗和当地绿营重兵驻防。

因为每一个大区都有自己内在的经济联系,不同地区间的差异通常有着逐步演化为冲突的危险。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无力调停或控制这些冲突,结果可能导致分裂和内战。在1630年代至1680年代就发生过类似事情,农民起义军、明朝遗民、国姓爷的军队以及三藩势力就曾一度在不同的大区域的中心建立了根据地。因此,政府的任务就是用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的手段——如果需要也可以武力为后盾,将不同的区域整合在一起。如果相互分离的区域间的贸易联系也得到了发展,这个任务并不难实现,而且十八世纪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联系。经济的整合加强了政治的一体,清朝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最终将会改变。



清中叶中国大区分布示意图

清朝中期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使得社会经济更为复杂。尽管康熙于 1712 年改革了人口税制,以更准确地掌握国家的人口状况,但是人口数据仍旧扑朔迷离,而且与早期相比更难弄清。然而,客观地说,我们相信明朝前期(1390 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约在六千五百万至八千万之间。1790 年代,雍正的儿子乾隆统治的末期人口超过了三亿。明—清转折期人口统计的意义在于说明它打破了人口稳定适度的增长方式。事实上,从 1620 年万历皇帝去世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1681 年)这一时期,外来入侵、国内战乱、盗匪骤起、自然灾害、灌溉系统破坏,以及瘟疫肆虐使中国全国人口急剧下降。人口下降的程度如何惨烈难以言说。明朝晚期中国也许还有远远超过一亿五千万的人口,到 1670 年代人口可能还超过一亿。这并非是十分精确的数字。

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就是人口统计上所见的这些灾难使十八世纪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因为很多地区都存在着有待佃耕和开垦的肥沃土地。康熙时期重新安置了华北被破坏地区和曾经富饶繁荣的四川的部分遭受战火地区的人口。雍正时期,移民开始流向中国西南地区。在他的儿子乾隆统治时期,人们开始违反政府禁令,大量移向满洲南部,还移居长江和汉水流域的丘陵地区。另一些人则从中国东部泛海到台湾,或远渡重洋前往马尼拉或东南亚。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全国人口急剧扩展的图景。如果康熙朝末期中国人口重新恢复到明朝晚期约一亿五千万的数目,那么毫无疑问,在他孙子统治的晚期,这一数字又翻了一倍。下表给我们展示了华北两省河北和山东及全国人口的简单数据(一律简约成千位数):

河北、山东及全国人口数表^②

年份	河北	山东	全国
1573	4 625 000	5 644 000	150 000 000
1685	3 297 000	2 111 000	100 000 000
1749	13 933 000	24 012 000	177 495 000
1767	16 691 000	25 635 000	209 840 000
1776	20 291 000	26 019 000*	268 238 000
1790	23 497 000	23 359 000	301 487 000

* 这是 1773 年的数据。1776—1790 年山东人口出现不正常的下降,也许是自然灾害和这一时期发生的叛乱的破坏造成的。

这些数据所示的人口增长寓含着一些社会和政治意义。虽然这一时期既有旧土地逐步被新的居民占有也有新的土地不断被开垦,但是初步统计显示,从康熙中期至乾隆晚期人口增长了

三倍,而耕地面积仅增长了两倍,因而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减少了。此外,因为中国人并不是将家庭的大部分土地传给长子,而是遵循“诸子均分”的制度将所有土地平均分给诸子,不会出现占有大量土地的新家庭。我们的数据表明,十八世纪华北—北京大区内家庭的土地占有大约仅为平均两英亩半,占有土地超过二十英亩的家庭是罕见的,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中国还是一个没有重大的技术革新的推动,以小土地占有和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特点的国家。

迁徙到长江和汉水流域的丘陵地区或迁入满洲南部森林的家庭,依据传统的实践经验,将土地辟为农田,毫不顾及他们的行为对生态的影响。虽然新开垦土地的产量较高,然而密集性的农业生产加剧了土地侵蚀和森林砍伐。山体大量流入河中,导致泥沙问题,给农垦区下游带来严重的洪灾险情。而且,因为主要以人类排泄物为肥料,在边远的丘陵地区地力耗尽的土地不容易得到补充(例如像人口密集的城市附近的农村能做到的那样),常常不得不将土地抛荒。

十八世纪,中国大多数人口增长都是生态的巨大变化促进的。新的作物从新大陆传入中国。例如,十八世纪中期甘薯在中国沿海地区广泛传播,同时玉米和马铃薯在华北和西南地区也普及起来。晚明时期花生已在华南和西南地区迅速传播,此时也逐渐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所有这些作物有助于增加中国农村劳力摄入的热量。因为这些作物在贫瘠、多山或沙质的土地上也良好生长,所以人口得以在食物稀少、劳力匮乏的地区快速增长。

从满洲南部沈阳以北的道义屯获得的残存文献使我们能够更直接地考察当地人口统计和年龄大貌,推知十八世纪末一些家庭生活的状况。因为道义屯逐月记载的生育时间大多在二月

和三月中,据此我们可以说大多数是在初夏怀孕,即春播和秋收之间的农闲时期。三分之一的男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中死去,一半在二十岁以前死去。道义屯男性平均寿命在三十二岁左右,有百分之四的人寿命超过六十五岁。女性的年龄情况也应与此类似。

道义屯女性生育年龄表(1792年)*^③

女性生育年龄(岁)	生子数量(人)
15—19	87
20—24	226
25—29	255
30—34	191
35—39	118
40—44	68
45—49	23

* 这些具体数据只是反映儿子的出生情况。因为道义屯须在八旗制度中负担兵役,统计者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征兵对象。但是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更注重统计男性的数量。

道义屯的数据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就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女性生育儿子的年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数据显示女性在二十多岁的后期最可能生育。这说明由于食物供给的不足,来自于父母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使女性在生育能力最旺盛的年岁里推迟了生育。随后的所有生育间隔、记录的男性与女性出生的高比率,均为中国乡村家庭计划的系统模式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获知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社会文化关系。由于孩童时期的疾病,食物的匮乏,以及饥荒时期的杀婴——加之富裕的男性常常娶几个妻妾——所以道义屯适宜结婚的女性数量比男性少得多,这与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对家庭模

式造成如下影响：虽然道义屯几乎每一个超过三十岁的女性都已结婚或守寡，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年男性终身未娶。中国家庭多子多福的理念，对香火传承的关注，子孙应敬拜祖先以使祖先在阴间免受苦难的信条，所有这些虔诚尊奉的信仰对芸芸众生似乎是一种残酷的嘲弄。对于女性来说，任何逃避结婚的想法都是不可能的。很多地区都一直存在导致这些社会不满情绪的根源，道义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中国盛行的社会信仰又使得这些不满情绪难以消释。

2. 税收问题

雍正在其十二年短暂的统治期间（1723—1735年）集中精力解决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到现在也是如此。其中包括整顿中国的官僚结构与农村财政，建构有效的秘密信息系统，强化中央行政机构等。这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现今亦然），成功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便可保障有效地统治中国广袤的领土。

雍正在即位伊始，对于如何治国似乎已经成算在胸。他不是像其父亲和祖父那样冲龄即位，处于摄政王或辅政大臣的监护之下，而已是四十五岁经验丰富的成人并目睹了他父亲的统治日见崩溃。他对康熙创设的奏折制度的非正式的内容加以扩展和调整，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密折制度。除了日常政务仍如以前一样公开上奏给各部和内阁外，大多数地方长官现在都将其行政详情和其他情况密奏雍正。当雍正了解到税收不足的程度及康熙朝并未经意解决财政危机，遂敦促大臣们提出改革财政结构的建议，并设立了一个考核财政的官署，独立于户部之外，且权力在户部之上。他任命康熙的第十三子胤祥管理这个官署。

财政危机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并非一两条诏令所能解决。中国 1723 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是三千五百万两白银,其中大约六百万两来自各种商税,二千九百万两来自地丁银。二千九百万两中各省可以留用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其余上缴中央。但是,几乎所有留用部分也都被用于诸如军费供给和国家驿站费用等一些实际上属于国家承担的计划上。地方官用于当地支出的只有全部财政中不到六分之一的份额。也许有人简单地认为可以用提高地税和丁税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但是雍正对康熙恪守孝道,没有改变他父亲 1712 年的法令。而且满人也同样遵奉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轻徭薄赋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也是君主宽政爱民的表现。改革税制的另一个障碍来自于户部的官员,他们有自己的收税程序和规矩,可在收税过程中接受巨额贿赂,可想而知,他们是不愿意改革的。

现行的税制不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大力维护,而且被肆意滥用。与康熙统治时期一样,上层阶级成员常常又是大土地占有者,其中的很多人利用虚造假名,重复登记,转移和抵押财产等等手段隐瞒赋税负担,几乎不可能了解其确实的财产状况。而且乡村的很多经济权力掌握在横行乡里的小部分地主手中。这些地主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逃避自己的赋税,迫使穷困的农民承受更多的赋税负担。在这种境况下,农民得不到补偿,事实上被挪用的钱款又被计作“欠税”——也就是说,还是由欠税未缴的农民负责。

1725 至 1729 年间,雍正改变了他父亲实行的不够严密的税制,深思熟虑地实行地税改革,打破了把持中间环节的地方集团的权力。他决定将清朝国家的权力更有效地行使到农村。正如他在 1725 年的诏令中所表露的想法:“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

之补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④

雍正通过密折制度逐步收集准确的信息，任命很少受到当地士绅影响的满人和汉八旗担任各省督抚和财政官员这类要职，这正是他开始改革的先声。接着雍正与大臣商定，在地税和丁税配额之上加征火耗，所有的火耗交归各省府库，其他一切额外科征和馈赠均被定为违法。各省府库所收税钱在省内重新公平分配。其中部分用于提高官员的薪俸（称之为“养廉银”），部分作为各县水利工程、修路、办学，以及当地其他需要而又不在户部财政预算范围内的费用，包括为灾害中的受害人提供牲畜、改善狱政、印制公文、修缮城市下水道或慈善公墓、科举考试的考棚，以及为地方寺庙供给香烛等。

观察一下此时中国地方的变化就可知这些改革的成效。在包括陕西、河南和河北在内的北方大区，改革的成效最大，这一区域独立的自耕农普遍存在，土地的登记相当容易，官员也在严密监督之下被迫放弃一直享有的额外油水。事实上，除了可以上下其手的充当中间人的地主和一些残忍贪婪的官吏，所有的人都是从改革中受益。在地税之上增收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耗羨银相对于以前盛行的无数交错重复的费用，对于农民乃至大地主都远非不可承受的负担。新的薪俸给官员提供了比以前更高的固定收入：县官一年六百至一千两白银，而改革以前是四十五两。官府管理更好，办事效率更快，地方政府真正拥有自主处理一些特殊事务的主动权。

然而，在南方和西南大区改革远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因为有很多新近才有人定居，居民稀少的地区，所以这里的基本税额远低于他处。但是，由于官员的人数仍然很多，耗羨银不足以支付与北方同样的高薪。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准许地方官员从矿税、盐业等商业，或者在道路、运河和河流上的检查站征收交通

税获得税收。即使如此,因为距离遥远、代价过高,很多官员不能将所有这些耗羨银送交本省的府库,而是恳请在其将剩余的部分运交府库以前,允许他们扣除新的俸禄和地方公用支出。不难预言,这将使渎职现象再次萌生,官员不能以实际需要为基础全面而公平地分配税收。

在长江流域的几个重要省份——特别是江苏、安徽,还有浙江和江西——改革措施遇到的麻烦最大。这里居住着无数致仕回乡却仍有权势的官员及其亲族,他们的土地从未完全登记在册,而且他们自恃与京城的关系以胁迫地方官员。康熙对待这些地区的富裕士绅特别宽仁,此时他们也将难以接受中央强硬的态度。雍正的改革遭到公然一致的反对,以致他最后不得不派出一个满人钦差率领从朝中选调的七十名经验丰富的稽查官员,对各省财政进行彻底查验,全面准确地登记了土地。

他们发现的不法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弄虚作假和重叠登记的情况如此复杂,以至于稽查官员一度失去了理清事实的信心。在一些案件中,稽查官员们发现,地主们将其土地分记在数百个伪造的名字下,以为不会有官吏花时间追查这些已分成小块的土地应交的小额欠税。地主们以拖延、敌意、阻塞道路、切断桥梁甚至暴力攻击等手段对付稽查官员的现场查验,那些被逮捕讯问的人也常常被劫狱者救走。稽查官员查抄的账册显示,地方官吏为了获取贿赂,世代免除了富家豪族几乎所有的赋税负担。即使有这一证据,稽查官员们还是发现难以阻止犯罪集团,而要收缴他们发现的该地区所欠政府一千万两税银的一小部分则更是难上加难。

十分强韧的对抗正说明意欲推行的改革迈向了正确的方向。改革活动说明只要坚持不懈,官员们正直勤政,加之雍正的鼓励,清朝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效率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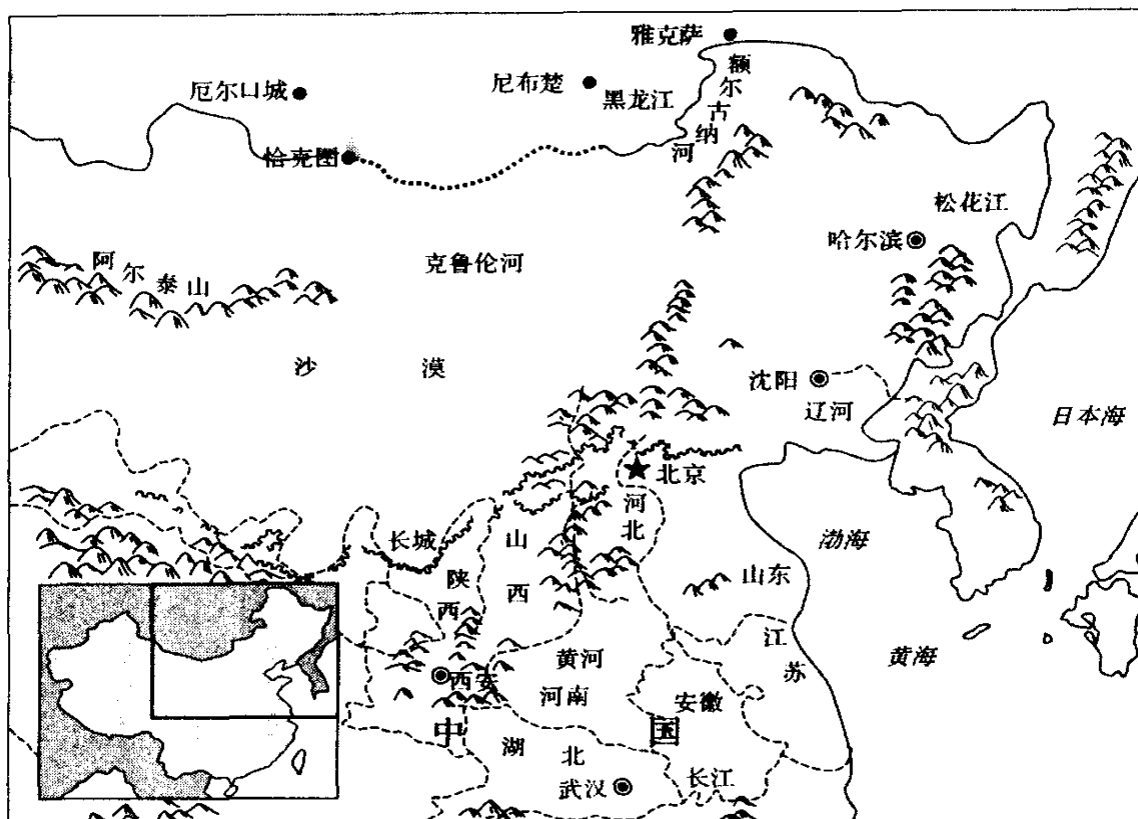
平。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在 1644—1683 年间赢得国家的再次统一,对外政策上随后也取得成功,并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切实持久可行的政府体制。尤其是,如果中央能够控制和开发中国最富饶的省份的丰富资源,则必将从总体上使国家日益富强。

3. 中央与权力渠道

统治者很少能在一段时间里完全专注于某一个具体问题,雍正也从未能全力以赴地处理中国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村税收和管理问题。加强清朝的边境力量再次成为必要。朱一贵在台湾的反叛于 1721 年很快被镇压,但是有效维持台湾的稳定并非易事。经过长时间的商议,雍正决定进一步将台湾各县拆分得更小,以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并允许早期来台湾的移民的妻儿前来团聚,以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环境。他还准许汉人与台湾土著人订立契约,租赁土地,同时为土著人留出一定的保留地。

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与俄国人认真举行新的谈判,以防止与边境部落、商业贸易有关的争执,以及西伯利亚南部发现黄金所引发的冲突等原因导致《尼布楚条约》的破裂。一个全部由满人组成的高级谈判代表团与理藩院一起于 1727 年在恰克图起草并签署了一份补充条约。《恰克图条约》划分了两国从恰克图至额尔古纳河之间的边界,阐明了哪些部落归属于中国版图。恰克图将成为两个新的边境贸易城镇之一,俄国的商队每三年可以到北京贸易,俄国获许在北京建造一座东正教教堂。大部分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在以前的战争中都被逮捕,而现在他们被并入旗人之中(该条约特别规定鼓励他们学习汉语)。雍正还牢固地掌握了仍被满族王公贵族控制的最后几个旗,并密

切关注西藏和西南苗族问题。



《恰克图条约》示意图

尽管 1696 年康熙大军击败了准噶尔，但雍正还是将其视为长期存在的最严重的隐患。他相信只有在西部集结大军，时刻警惕，才能抑制准噶尔的势力。但是补给线太长，调兵遣将的行动很难保密。朝中耳目众多，即使雍正主要的议政集团——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能保守其言行的秘密。北京还有很多蒙古王子和公主、八旗将领、游贩的商人以及忠于西藏佛寺的喇嘛，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将清朝的意图传播出去。所以雍正最初将商议的对象限于少数他最信任的大臣，即他所称的“内中堂”，以保持其军事计划的秘密性（“内中堂”的名称是将其与那些“外”朝官僚区别开来）。

内中堂的三个主要成员是他所信任的弟弟胤祥（同时还管理财政稽查机构）和两个汉族大臣张廷玉、蒋廷锡。张廷玉是康

熙最信任的顾问大臣的儿子，能说流利的满话，曾任户部尚书。蒋廷锡也曾掌管户部，而且还是闻名全国的杰出画家。两人都是进士出身，都因其卓越的学识而供职于荣耀的翰林院，且都来自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张廷玉来自安徽，蒋廷锡来自江苏。因此，人们也许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满人入关八十年后坚定忠于已与汉人并无二致的满人皇帝的汉人官员。到1729年，这三位大臣执掌新设的机要机构“军需房”，由从各部，特别是户部谨慎挑选的可信满、汉官员相助。甚至并非所有的大臣都知道有关他们工作的详情，直到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统治时期，人们才知道了这个以“军机处”之名出现的显要机构。^⑤

如同他在处理财政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雍正撇开六部及其衙署获取信息，作出决策，创设了一套非正式但却有效的网络以提高个人的权力。为什么要秘密地撇开惯常的渠道呢？部分原因也许在于雍正及其顾问大臣们担心错综复杂而花费巨大的西征战争存在容易引起质疑的财政问题，而想向正式设置的各部隐瞒其商议的内容，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出于保密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军需房保留了诸如给某一军队运送供给物资所需四轮车、骆驼及手推车等项的详细记录。

实行这些新举措的另一原因是内中堂要经常票拟密折。有时这些东西必须存档，因为皇上在阅览后不可能将所有的细节都置于脑海，而归档保存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置于严密防范的特殊机构。雍正也用为他设置的“廷寄”方式，在内中堂商议之后将情况迅疾而秘密地送达接受者，与前线的将领交流。皇上亲自批阅密折，常常一天达五十至一百份，这一方法为他节约了时间。用这一为皇上专设的秘密的廷寄方式，皇上也能加上针对个人的言语以向前线的将领显示他是多么信任他们。“鞍马风霜卿好么？”雍正给驻防西部的岳钟琪将军写道，“官弁兵丁人

马安泰否？”他还对岳将军说：“军营出行吉期选择发来。”^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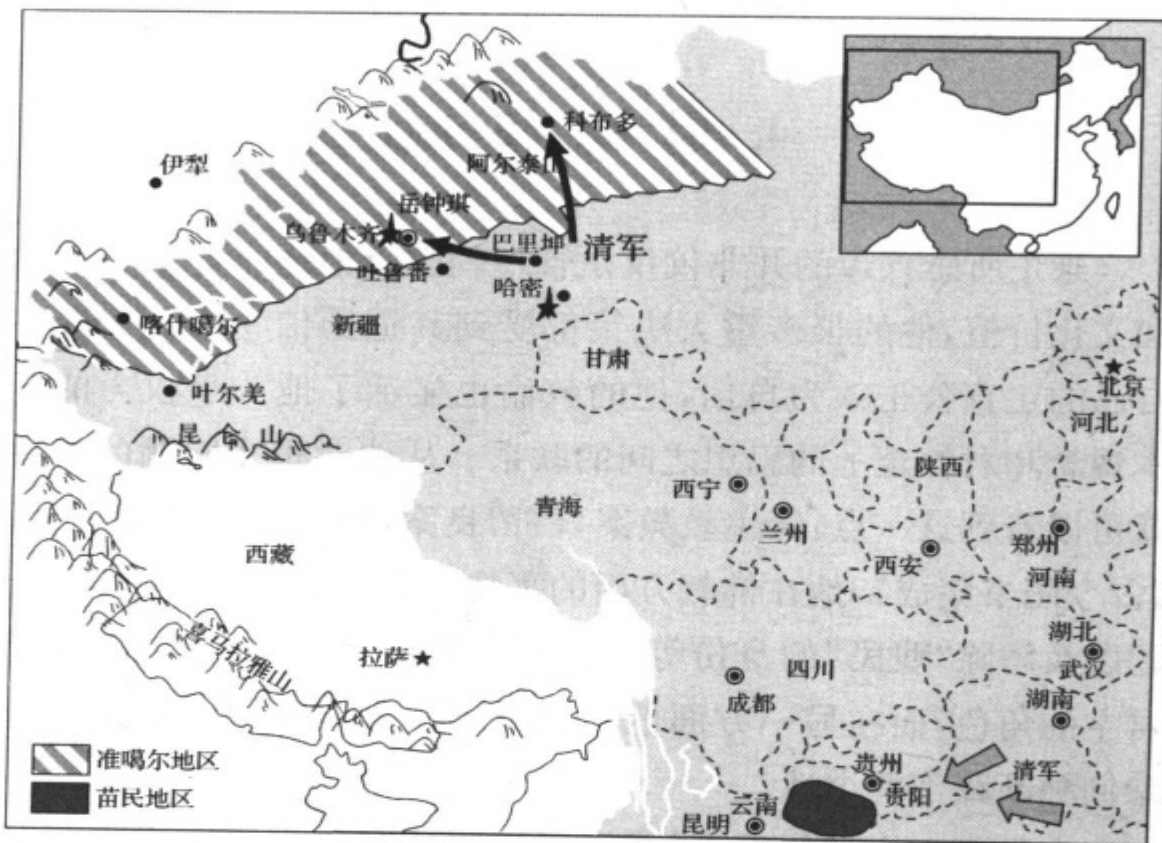
最终这些新措施的推行也是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要，正如它们与皇上防止自己的军队生变，保障自身安全密切相关一样。隐患大量存在，例如，雍正即位时，他最不信任的一个兄弟正出任大将军在西藏作战。雍正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在四川和甘肃统军时因牵连到雍正兄弟们谋反活动而于1727年被勒令自杀。这一地区的新的统军将领岳钟琪，虽然如上所述受到皇上的关爱和尊重，但他是岳飞的后裔。岳飞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十二世纪的爱国者，尽管他勇猛抗击女真对宋朝的入侵，但还是被宋朝统治者在狱中杀害。为了消除来自于自己军队的一切隐患，雍正有理由步步小心。

经过长期策划的对准噶尔战争进展不顺。1732年岳钟琪将军设于巴里坤的前线总部可以直取乌鲁木齐的敌军，但却未能保护其在哈密的军队免受敌军的袭击。岳钟琪所部一位大将率领一万大军贸然进军，在科布多附近陷入埋伏，虽然该将领得以脱身，却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士卒和大部分部将。因为这些过失，加上腐败的指控，两位将领被雍正判处死刑，虽然随后他取消了死刑判决。这些过失使得清朝将要再花上三十年的时间解决这一地区的边境问题。

雍正还用一些新的沟通渠道部署西南与苗族土著的战争。汉族居民在三藩之乱平定后逐步进入云南和贵州省，迫使居住在山谷里的当地居民迁入山中，汉人开采银矿和铜矿，扰乱了当地社会。1726年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鄂尔泰出生于镶蓝旗武将家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精通满、汉语言，经常通过密折的形式与雍正保持着联系。这些密折表明，鄂尔泰在当地瓦解苗族首领的权力，没收部落的土地，将其纳入州县管理体系登记和管理，对敢于反抗者则加以围剿、杀死，对归顺者仍

要没收土地,但通常重新授与官职,使其享受薪俸。

1728年,鄂尔泰被越次提升,加授广西总督,雍正希望他加快镇压那里的部落。雍正常常在密折上批注长篇意见,或激励鄂尔泰,或辩论疑难问题,或讨论当地官员的业绩。1732年,在平定西南取得巨大成功后,鄂尔泰被召回北京,在军需房供职。他取代了亲王胤祥和蒋廷锡的地位(鄂尔泰还在西南时,这二人就已去世)。因此,他和张廷玉成为雍正在京城最信任的顾问。



雍正西征示意图(1726—1735)

考察财政管理,信息沟通渠道,军事事务等领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大清帝国在统一和集权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在满人入关后的一个世纪里,摄政大臣和满人贵族——或他们所掌管的旗——控制国家的权力已经衰落。王室诸子仍能威胁皇权,

但是朝廷有能力控制和镇压他们。正常的官僚机构在很多方面还有助益,但在其他方面则又成为障碍(特别是需要快速和保密时)。然而雍正没有像一个独裁者经常所做的那样直接设立一个重要的新机构,任用自己的亲信,把持重要决策的垄断权,而是采取更迂回的办法,用难以置疑的名目建立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机构,仍在其中供职的人同时掌管别的事务,因此,他们的俸禄和官衔也以别的常规的官僚机构的名义授予。雍正堪称一个具有操作正式和秘密机构——他信奉此道——能力的著名战术家。控制这些机构对他来说就是权力的实质。

4. 道德权威

雍正所感兴趣的并非仅仅是管理朝政。他还十分关心道德和文化价值,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受到其道德信念影响。他对自己的正直公正颇为自信,他的敕谕也显示了他关于权力的基本观念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之间的联系。从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天主教教案,吕留良案,增修康熙圣训,刊印《古今图书集成》,他在佛教方面的兴趣,劳动者和吸食鸦片者问题以及解除“贱民”的身份等等。在某种层面上,他扮演着儒家君主的角色,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不了其东征西讨的满族先辈们独断躁烈的个性。

在处理天主教传教士问题上,雍正当其父亲康熙在晚年处理这一问题时更为严厉。不仅礼仪之争使中国的天主教群体四分五裂,而且至少有两个自信有机会使雍正改变信仰的耶稣会士与雍正最不信任的兄弟胤稷用罗马字母为代码秘密通信联系——当雍正发现了这一情况时,迁怒于认识传教士的其他学者和所有的天主教教堂。除了极少数在宫廷中供职的传教士

外,所有其他活动在各省的传教士都被勒令集中到广州或澳门,有几个地方的教堂改成了学校或旅馆。因为雍正一再打击结党立派的活动,以此公开表明他反对这一现象的态度,所以他愤怒地斥责教会介入党派之争。在1726年最后一次禁令中他还从道德的高度抑制天主教:“远夷慕化而来”,他说道,“惟有示以恩德”。^⑦虽然这一时期只有一个传教士被处决,但传教士作为一个集团,其行为不得不异常谨小慎微。他们的影响力衰减到只能在宫廷中担当司天监官员和宫廷画师。

吕留良案同样反映了雍正复仇与怜悯交织的复杂态度。吕留良是一位强烈反满的学者、行医的郎中和僧侣,死于1683年,他的遗愿是不穿满人服饰入殓。他的一些讥讽满人和蛮夷的著作在中原流传,被一位叫曾静的容易激动的教书先生读到。曾静受到吕留良著作中反满情绪的感染,也相信雍正是篡位者的传言,1728年他试图策动正在四川准备出师进讨准噶尔的岳钟琪将军反叛雍正。岳钟琪一直假意表示同情,直到了解了计划的全部细节后报告给了雍正。

审理这个案件时,雍正愤怒地发现了吕留良的著作,了解了关于自己篡位的传言流播得多么广泛。雍正从三个方面处理这一案件:下令将吕留良开棺分尸,并将吕家所有幸存的成员或发配为奴,或处以流放;写了一份激愤而详细的反驳书,试图证实他是其父亲选定的真正的接班人,要求每一位科举及第者都阅读;以曾静年纪尚轻,易受蒙蔽为由,加以宽恕,不再追究。

在其他方面,包括增修康熙的圣训,雍正也在为自己精心设计一个糅合儒家仁君和严父的形象。康熙曾经简要地总结了十六条“圣谕”,教化臣民忠孝而安宁地生活。雍正将康熙的每一条圣谕作了详细的长篇阐释,准备了讲稿,由地方的学者深入乡村每月宣讲两次。在他的阐释中,雍正特别强调了地方社会的

统一，这有利于他们迅速完税，避免争斗，保护他们免受不法之徒的侵害；重视农业经济中的勤俭风气；避免诉讼争端；鼓励发展教育，进行道德和正统思想的教化，杜绝异端邪说。所有的县级的应试者都必须知道经过增修的圣谕及雍正的阐释。雍正还准备了由几个大臣编写的圣谕的简本，以便那些文化有限的人也能宣讲，并能传播到不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之中。这场全国性的教化活动严肃而彻底地推行，雍正相信这将有益于提升百姓的思想和行为，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这样的道德教化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将成为周而复始的主题，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大规模反叛后，以及随后的中国政权皆然。

雍正皇帝刊印《古今图书集成》的行为明确地显露了其性格中褊狭的一面。但是清朝时期皇帝严肃认真地推行这一计划，却寓含着将政治和文化价值相互关联的意义。《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的百科全书，是学者陈梦雷数十年辛劳的成果。陈梦雷在其他学者、康熙的第三子的帮助以及康熙的资助下，力图收罗过去有关自然现象、地理、历史、文学及政治的善本书籍，编成《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世界历史上卷帙最大的巨著之一，有八十万页，一亿个汉字。康熙去世时，印行这部巨著的铜版已经制成。

雍正决意不能让编修这部巨著的美名归于他嫌恶的那位兄弟的名下，乃借陈梦雷曾经为三藩之一的耿精忠供事之由，指控他为叛国者，将其流放东北；然后掩盖了所有陈梦雷编修此书及自己的哥哥与这一工程的有关事实。雍正又用四年时间修订这部百科全书，以康熙主持的名义刊行，雍正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内中堂署名为修订本的总纂。

在佛教问题上，雍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又是专制君主。最吸引雍正的佛教宗派是早在一千年前就

已在中国盛行的禅宗。禅宗的信奉者严格体行冥思和内省,以达最终领悟出所谓的现实世界不过是一场幻景。他们也相信一切生灵皆存有佛性,所有人都能凭着虔诚的信仰潜心省悟获得佛性的启迪。由于这套禅宗之道的虔诚信奉,雍正定期在宫中召集十四人的禅学研习群体,包括他还信任的五位兄弟、选出的大臣、一位道士和五个和尚。他还批准了设立一个佛教印书坊,刊印佛经。雍正不同意晚明时期两个僧侣对佛经所作的阐释,鉴于这些阐释仍为当世信奉者遵行,他便下令焚毁这两个僧侣的书籍,强迫他们的追随者不再研习他们的思想和著述。

从劳动者关系问题的处理方面还可看到雍正的社会价值观。江南的苏州周围地区是十八世纪中国著名的丝绸和棉布的贸易中心。这一区域主要的劳力是男性,干的是令人惊奇的重体力活,即以重达千磅的碾子碾布。这些被称为“踹匠”的人工作沉重而报酬菲薄,每个工人几乎整天劳作,织出六十八英尺的布匹,而只得到十一文铜钱,或是百分之一两银子。当时市场上—担米的基本价格为大约一两银子,工人的这点报酬当时仅够度日活命。

在康熙统治时期,这些踹匠几次罢工,不仅要求增加报酬,而且还要求兴建医院、孤儿院和聚会厅。罢工者一无所获,为首者被杖打,但是踹匠们还是于1723年和1729年再次起来抗议。由于苏州周围有八千多名这样强硬而执着的劳工,雍正不敢掉以轻心,但是他更关心这些劳工可能与外面的叛乱和暴动者联合,而非他们穷困的经济状况。他对逮捕和审讯过二十二名工人的一位官员大加赞许。

通过现存密折的夹行中雍正的长篇批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细致地进行调查,了解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就是工人中夹杂着造兵器的工匠、占卜者、郎中、妓院老鸨,甚至据称还有一

些已逃到菲律宾的明朝太子的同伙。只有当 1730 年所有的问题都已查清,谋反者受到惩处时,雍正才在大臣呈递的密折上批语,让臣僚们公开上奏。也就是说,只有到现在,朝中的大臣和内阁大学士们才获准分享被雍正及其亲信包揽了七年的有关此事的全部内容。

在处理吸食鸦片的问题上,雍正涉及了一个未曾接触过的新领域。从十七世纪以来,鸦片在医药和麻醉方面的用处已有记载,吸烟之风盛行于中国,也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派往台湾镇压 1721 年朱一贵叛乱的士兵将吸食鸦片的方法带了回来,从此鸦片的吸食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雍正在其统治的初期即已警惕这一问题的蔓延,并决定禁止吸食鸦片,但是由于在中国法律记载中没有关于此类案件的先例,只好借用一些类似的条款。因此,鸦片贩子作为贩卖违禁品者受到审判,戴一个月大木枷,然后充军边镇。引诱无知者吸食鸦片的人与传播异端宗教者一样,将被判处绞监候(即复审后可能给予减刑)。吸食和种植鸦片者根据扰乱国家秩序的罪条打一百刑杖。

但是 1729 年一道长篇奏折劝说雍正高度重视鸦片问题。奏折说到一个陈姓鸦片贩子被判以没收货物,充军发配。但是他申诉自己无罪,只不过售卖鸦片治病而非吸食。雍正重阅证据以后,认识到确有必要对两者加以区分,官员们在处理实际案件时应查清贩卖鸦片的真正动机。这位福建陈姓商人用干橘饼与广东商人交换四十磅鸦片,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或药剂师,并非是一个无赖。雍正敏锐地观察到:“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若不违禁,何故贮存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⑧这个具体的事例说明,这位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仍然能密切观察社会问题,力图加强经济公平性,同时又以至高无上的文化仲裁者自居。

雍正在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举措也许是他解放中国的贱民的决定。这一称呼是指几种被社会排斥，禁止在官府供职或参加科举考试的群体：陕西和山西的“乐户”，他们在婚礼和葬礼上演奏乐舞；浙江的所谓“惰民”；安徽的伴当世仆及江苏的丐民；东南沿海地区生活在危险的海上的船工、采集牡蛎、珍珠的“蜑民”；在浙江和福建边境采集大麻和靛青的“棚户”；以及其他充当家奴的人。雍正试图改变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然而他更关注的或许是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公众道德，这要超过其行为所寓含的真正同情的成分。但是，他在1723年至1731年间下达了一系列解放贱民诏令的事实，显示了他在力图结束这种社会歧视方面坚持不懈的态度。

雍正的诏令未能在短时期内达到他期待的效果。很多贱民别无选择，仍然从事着低贱的行业，还有很多对其低贱的地位已习以为常，虽然法律已经变化，自己仍安之若素。尽管皇帝已有诏令，普通民众并不热心于平等地接受这些贱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解放贱民的诏令还是产生了所希望的效果，这些曾受到歧视的群体中的很多人在清朝社会中能更多地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同在其统治的其他时期一样，雍正处理这些事时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人的本性的执拗，那些公开发布的关于道德的诏谕未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很难说雍正的心里是否真正认识了这一点。他依然完全相信自己的训导能力，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还不断地劝导官员和臣民。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的道德主义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被清朝的满族统治深深地内化的标志。

注释：

- ① 这三个大区的个案研究参考了韩书瑞(Susan Naquin)和饶懿伦(Evelyn Rawski)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 章。介绍和阐述大区这一基本概念的是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 ② 河北和山东人口数据取自黄宗智(Pillip Huang)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2 页。全国数据取自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81 页。
- ③ 参考李中清(James Lee)和伍若贤(Robert Eng)的《十八世纪满洲人口和家族史：1774—1798 年间道义屯的初步研究》，载《清史问题(五)》第一期，1984 年 6 月，第 31 页。又参李中清(James Lee)和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财富：1774—1873 年间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状况》，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章。
- ④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财政的合理化改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0 页。
- ⑤ 本段及本节其余部分参考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的《君与臣：1723—1820 年清朝中期军机处的兴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⑥ 转引自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朱批：清朝中期军机处的奏折制度与中央决策》，耶鲁大学 1980 年版，第 57、61 页。
- ⑦ 罗梭(Antonio Sisto Rosso)：《派往十八世纪中国的使徒》，南帕萨第纳 1948 年版，第 405 页。
- ⑧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 年》(两卷)，第 1 卷，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64 页。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与乾隆政权

1. 如日中天

1736—1799年的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朝。^{*} 如果我们将其与皇帝在位时间差不多长的康熙朝,以及雍正朝一起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三位皇帝统治中国的时间涵盖了1661年至1799年间的整个时段。如果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同一时期的北美(即英国人在纽约建立殖民地到乔治·华盛顿去世),或者与英国查理二世复辟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相比,在外国观察者的眼里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平稳安定和一脉相承的景象。

乾隆皇帝满怀着乐观的精神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乾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子,他二十五岁时平稳地继承了皇位,幸免了他父亲年轻时甚为苦恼的派系斗争。雍正深谋远虑,将其私下选定的继承人的名字写下,放入宫中的一个盒子里,这样就消除了争议。作为皇帝,乾隆谨小慎微,但他对自己的治国能力和他所统治的伟大王朝充满信心。在他的思想中,自己不仅是中国的皇帝,而且是包含多种文化的亚洲帝国的统治者,使清朝的统治更至高无上。他在其政治统治中吸纳新的宗教、语言和种族等因素,使人们重新认识满人正统地位和权力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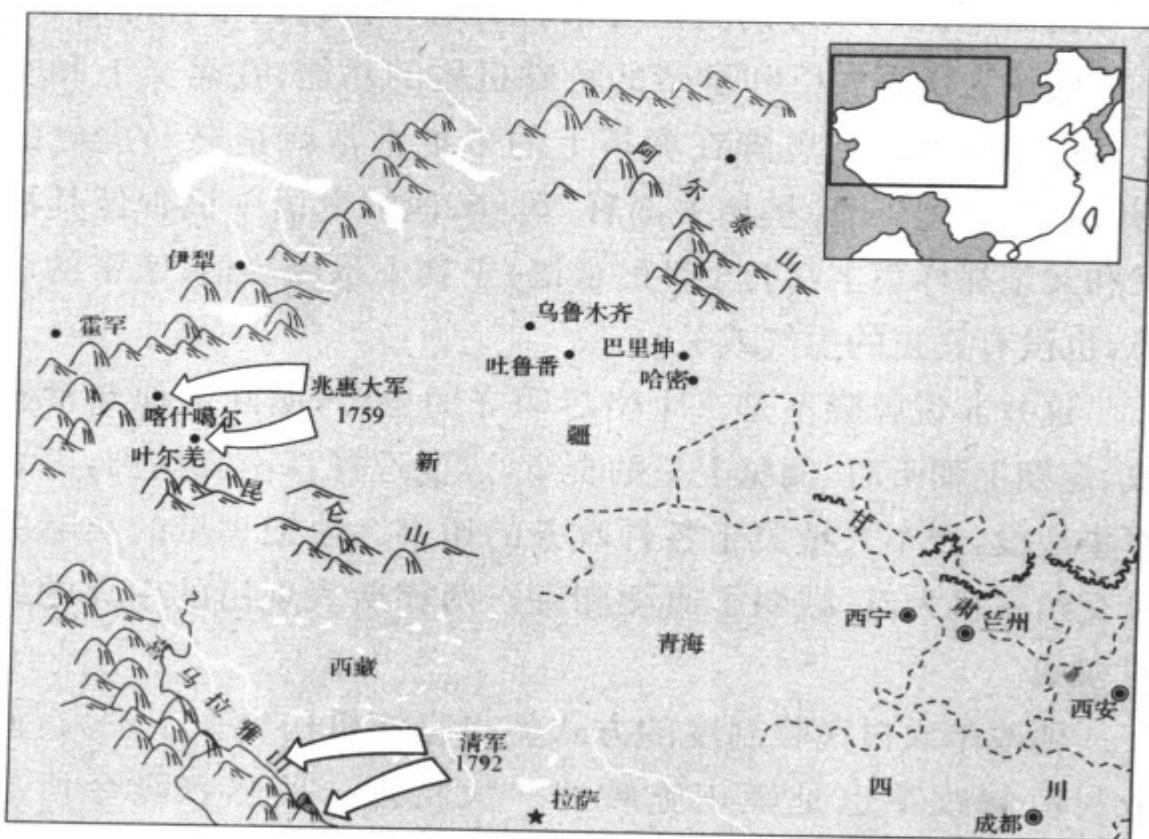
^{*} 从在位时间来看,乾隆与其祖父康熙是相同的。但乾隆在其退位(1796)之后又活了三年,史景迁是按此计算(至1799年)的。——编者注

乾隆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征服辽阔的西部边疆——即后来所称的新疆,在那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并最终解决了准噶尔问题,巩固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这一丰功伟业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与川西和西藏东北部的战争密切相关(这与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情况一样)。

乾隆把西部战争的统帅权信任地交给一个叫兆惠的旗人。兆惠以前并不显赫,他 1730 年代升任大学士,曾充任负责四川清军军需供给的官员,此后又被派往准噶尔前线负责同样的事务。他勇于主动承担责任。1756—1759 年间,兆惠经历了种种险情:重要同盟者的背叛,所派使节被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谋害,粮草断绝导致军队自相残杀以及在险峻的地区强行行军数百里等等险情,最后还是于 1759 年占领了喀什和叶尔羌城。清军残酷屠杀准噶尔最后的残余军队。新的疆域由伊犁将军及驻扎于乌鲁木齐的副将统管,蒙古各部与清朝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兆惠将军返回北京时,乾隆亲自出城迎接,这是几乎无人得享的荣誉。

正如所有与准噶尔和蒙古的外交谈判都由理藩院的满人官员担任,现在这片新的西部疆域的管理也控制在满人和一些经验丰富的汉八旗手中。这一地区不向汉族垦殖和定居者开放,而且仍旧作为战略边防区,由一万五千到两万的满人和汉八旗及十万扈从驻防,每年至少耗费清政府三百万两白银。当地为数巨大的穆斯林居民仍有他们的宗教领袖,严格遵循自己的饮食习惯,满人还宽容他们不剃头留辫。当地民政官员(即伯克)由清政府给予俸禄和封号。虽然满人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玉石、黄金及其他最有价值的矿产,但是可以自由贸易的商品还有铜、宝石、硝石、羊毛披肩、奴隶等。乾隆将新疆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家庭的女子纳为妃子,这也是其权力扩及这一地区的证明。她

获许遵守穆斯林的宗教和饮食习惯,曾经几次陪同皇帝闲游华北和华中。她在 1780 年代去世时被葬于特殊的坟墓,在她的石棺上用阿拉伯文雕刻了一段《可兰经》。^①



乾隆西征示意图

乾隆时期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并未如雍正时期那样由秘密的小小军需房运筹指挥。虽然协调指挥战争的机构的中文名称仍与雍正时期无异,但其规模和人数有了很大的扩展,在整个政府中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地位。正因如此,从乾隆朝开始,英语中将这一机构译为军机处(Grand Council),因为此时它的权力超过了六部,甚至也超过了内阁。乾隆的首任军机处大臣中有他父亲雍正信任的两个顾问:鄂尔泰和张廷玉。他们保持了政务的连续性,随后几位皇帝亲自选拔的大臣又相继参与进来,在乾隆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军机处的员额保持在六至七名。军机

处有二百五十名文职官员，他们昼夜轮流当值，使这一机要部门时刻有人理事。

军机处此时成为全国各地官员所上奏章的处理中心。这些奏章也由军机处以外的大臣誊录、票拟，并常常送给各部商议，军机处作为联系大臣和皇帝的特殊机构的功能，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开始减退。乾隆在奏折上的朱批常常就是马马虎虎的“知道了”、“阅”、“转呈相关部署”等等，他的批语中极少像其祖父和父亲那样写上富有个性的批语，于其中示以热情、亲密的意思，也没有真正的生气或关心。

这并非说乾隆不是一个恪尽职守的皇帝，实际上他非常勤政，定期上朝听政，阅览上呈的奏章，广泛巡视江南和满洲，谋划军事战役，颁布大量关于各种政务的诏书。他把大量的实际决策交给军机大臣，减弱了康熙和雍正两朝所表现出的中央的绝对权威。

他改革农村税收制度的方式使得官僚机构失去了动力，而农村税制改革也是雍正施政的一大特点。虽然乾隆令所有1742年参加进士考试的举子撰写关于保障地方税收的文章，并以同样的问题询问群臣，逐渐地——几乎也是偶然地——税收政策原来的一些关键因素消失了。税收盈余的富裕省份将贴补更穷的省份。结果使得富裕的省份丧失了能藉以增强自己管理的地方自主权，而贫穷的省份也失去了完善其税收制度，改革其经济基础的动力。

知县们将本地的盈余税收据为己有而不上交省里的现象也日益频繁。旧有的额外费用、非法收费等又重新蔓延。户部又逐步制定一项制度，即地方每一笔开销都必须经中央查证后方可支出。这导致案牍成灾，一些细小的事务也要拖延数年，而一些要务根本上没有批复。这一时期从地处京畿的河北省上报给

的户部的公文显示，地方官员不得不将诸如花四十八两银子派兵守卫大桥、一百零五两支付水手工钱、给两个寡妇的十二两养老津贴等逐项列清。

在文化方面，乾隆行事的方法与其父亲相近。他树立了一个恪守孝道的形象，特别表现在他对其母亲即皇太后谨奉礼仪。乾隆顺从和取悦太后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带她游历江南，甚至在太后不再能继续游历时还在北方的宫廷里为她仿造江南的街道。他改变了雍正宽仁的做法，下令将 1728 年宣扬吕留良思想的不幸的曾静在北京凌迟处死，以惩戒这些人对雍正的侮辱，表达自己对父亲的孝道。他为在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中落榜而有奇才异能的人开设特科，让很多地方官学宣讲儒家价值观和康熙圣谕，在特殊的节日里向着老们拜贺，表彰烈女节妇。

在一些领域乾隆也主动创新。他广泛收集字画和书法，将千年来的精品网罗入宫。（他在很多伟大的画作上题写诗句，其书法虽称工整却非卓然不凡，有损于原作的精妙，因而受到后来的鉴赏家们的责难。）他资助一些宫中的耶稣会画师，特别是才能卓著的意大利人郎世宁，他的皇室肖像画及大型的狩猎和行进的全景画糅合了中国画技巧和西洋画的透视法及作色特点。乾隆雇请耶稣会建筑师修建宏伟的欧洲风格的夏宫，即建于北京城外一个湖畔的圆明园。他下令编纂一些诸如谱牒、历史、礼仪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以精心传承满族的传统。为了强调大清崇佛奉教，他在热河的避暑山庄仿照西藏布达拉宫建造了一个喇嘛寺。

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乾隆还下令大规模地编纂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史著作。这部书因包含经、史、子、集四部而被称为《四库全书》，这不是《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的祖父和父亲两代完成的百科全书）一样按题选编，而是一部附有提要的文选，所选的著

作皆完整照录。《四库全书》共包含三千四百五十部完整的著作、另含存目书籍共六千七百五十种，佚书三万六千种，历时十年方告竣工。这是中国书目编纂的伟大成就。

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书，并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的书籍的人。这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次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们纳入禁毁之列的两千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一些参与《四库全书》工程的高级编纂官也通过消除不同门派的著作，或在提要中强调他们自己的学术观点来张扬自己支持的学派。

从乾隆众多的诏谕和行为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股微弱却令人不安的潜流。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迎合世俗，以丰亨豫大为务，日常琐事也望得到肯许和颂扬，却并未真正作出过棘手或不合众意的决策。在一派繁荣的乾隆朝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正如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所了解的，通过中国的五经之一的《易经》即可预见这一现象。《易经》的第五十五卦是丰，意为丰富、充裕，其卦辞说到：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②

但是古人对这段话的阐释为：

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2. 十八世纪的儒学

如果有人提出质疑，乾隆肯定会强调，他的朝廷遵守儒家原则，推行的是儒家制度，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皇帝和群

臣将儒家的经典视为道德智慧的宝库；儒家经典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和国家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儒家的忠孝观念将君臣、父子联系在一起；学者和官员们在乡村宣讲儒家思想，凝聚人心，使百姓忠于国家。然而，儒学内涵在不断增损，儒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十八世纪，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儒家学说也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十七世纪后半叶，学者们都埋头于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其中的很多人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明朝晚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盛行一时的内在道德良知的学说。清朝早期的康熙和雍正时期饱学的官员，乃至皇帝本人，都试图重新宣扬宋代（960—1279）的理学以对抗日显颓废的明朝的学术风尚。他们崇尚宋代，是因为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死于1200年）明确提出理可以阐释上天的行为，指导人们的行动。朱熹及其后继者们相信，明理将有助于人们理性地生活并与天道和谐，也有助于彰显有道之士在公共生活中探寻天理的努力。虽然这些信念的精心建构需要思想家们探究天理，对宇宙论进行多层面的思索，但是宋代理学的思想所着眼的仍是国家生活。而且，即使是盛德君子也不可能穷晓天理，因而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职责就难免有失，这使儒家思想家们深感焦虑和愧疚。

清朝前期身居官职的学者们拒绝明代思想的某些因素，而从十二世纪宋代的理学中寻求安全感，清朝晚期的思想家又否定宋学而另辟蹊径。到乾隆时期，很多学者开始不再致力于特定的经典，而更多地关注治学方法。这一方法称之为“考证”，进行缜密严谨的考据，严格追求证据的准确性。从事考证的学者们试图摒弃思辨活动，而植根于研究切实的事实。他们致力于研究音韵、算术、天文及地理，相信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古代圣人们的言语和寓意，因而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现实

中人们应该怎样生活。^③

深受这一运动的后继者们满怀敬仰的“考证”运动最重要的先驱都生活于康熙时期。考证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是顾炎武，他忠诚于明朝，并曾抗击满人的军队，保卫乡里。如前文所述，顾炎武最终与新建立的清朝相安共处，把自己的余生都用于游历华北，研究当地技术，寻访古碑铭，认真地做成拓片，供学者们作学术研究的参考。顾炎武还十分细致地记录下自己的工作，他的记载不同于那些有投机企图的理学家们有关道德或纯哲学的日志，是对经文的阐释、珍稀的资源、地理发现，以及古代的艺术作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数学和天文历算领域的知识，对考证学家们的研究方法颇有影响，也使他们相信哲学的流派之外还有一个“实在”的世界。）

顾炎武的朋友阎若璩用相似的方法研究历史典籍中的部分儒家经书的年代学和语言结构。他的研究成果，虽然直到1740年代仍只以手稿流传，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阎若璩用认真收集的论据证明《尚书》这部几朝科举考试皆引以为基础的典籍是后来人的伪作，因而并不值得学者们遵奉。

直到1740年代，整个科举考试因其贫乏的考试形式不能选取最优秀的学者为官而逐渐受到攻击，阎若璩的研究更突显了国家所推行的儒学的不足。社会压力进一步破坏了对这一制度的信任。到十八世纪中叶，国家不再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科举考试的配额。读书人面临的随之而来的压力，以及即使应试成功也难以获得职事的现象给很多知识精英带来的是挫败和幻灭。

十八世纪的学者们运用考证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地探讨儒家的历史。很多人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览经典及汉代（公元前

206年—公元220年)以来的注疏,因为这些注疏运用典籍比宋代经典更接近孔子时代,当然也就更近于孔圣人的本意。研究汉代经文的学者又根据更信奉西汉还是东汉经文而分为不同的派别。这并非只是深奥的争论,而是将经典也视为历史,并以敏锐的怀疑主义对待历史的研究活动。考证学者们的研究也对十八世纪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学者们犹如“蚁行”——正如一位学者形容他的研究——一般积累证据,考察水利学、天文学、绘图法以及有关治国安邦的古代经文,使这些学者能以更锐利的眼光审视清朝的现实。

考证之风至乾隆中期已十分盛行,而书商、印刷出版人、藏书家以及从事这一精深研究所需素质的教师的相应发展为其提供了基础。学者与商业世界之间的界线常常变得若有若无了,很多商人赞助考证研究,购置大量藏书供学者们研究之用。有一些考证学家直接出于商人之家,这反映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发展,以及以前鲜明的职业分野的模糊。

在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巨大工程中,考证学家们发挥了主导作用,运用其新的学术观点褒贬宋代理学(虽然这些理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仍被视为正统),提升了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的声誉。乾隆对这些学者为他搜集到的大量珍籍善本甚为满意,他下令将《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书籍另外抄写三部。这三部书保存于考证学主要中心的扬州、镇江和杭州三家藏书楼,以供这三地的学者们参考使用。

这些考证活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领域。考证学家重新形成一个知识精英阶层,十八世纪人数日增的落第文人跻身其中是异常困难的(落第文人阶层的困境,以及很多自负学者的堕落和清高在1740—1750年间创作、1768年首次出版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辛辣而诙谐的描述)。至乾隆晚期,热衷考证传

统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其方法的局限性。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戴震一方面宣称坚守考证营地,同时也开始运用纯哲学的术语著述,回归到考察人生目标、动机、欲望以及道德行为意义的时代。颇有意味的是,虽然戴震认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其思想的核心,但其密友们并不认同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十八世纪,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自身都开始重新关注妇女教育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些开办女学的男人受到严守清规者的严厉批评。还有人更为尖锐地指出,女性的作品偏离了社会价值结构,不去探讨道德、哲学及史学等曾经有过强烈影响的领域里的问题,而是从事描述内心世界的文学创作,特别关注浪漫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走不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批评者看来,女性觉悟的晚明是不值得称许的时期。现在需要的是扩展女性的胸襟,以使她们成为知识分子世界中视野开阔的分析家。这些批评者认为,已刊行的大量女性诗歌选集内容太过狭隘,实在乏善可陈。^④

儒学并非仅仅是哲学问题。绘画和书法一直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基本附属部分,在十八世纪其风格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像1701年的《芥子园》这样的画画教本即可教会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掌握中国绘画的传统技艺。通过这样的书籍,人们可以很快学会画一枝着色的梅花、一间茅舍或者远处的山峦,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作画。而文人画则独辟蹊径,故意不循构思和着色的规则,貌似无法,实则深含匠心。这样的怪异画风是十七世纪的明朝遗民的风格,用以表达一种政治立场。到十八世纪,它又显现出更多的阶级意识的面目。

书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考证学者们发掘并刊印古代的手稿,精心拓下的碑刻也广为流传,使厚古非今蔚然成风。一些画家刻意在画作上题款,笔法形如雕凿,显示自己的画意与博

学。至乾隆朝末期,读写能力在和平昌盛的中国日益普及,一些最富学养的人更发展出别人无法企及的新的文化表现形式。

3. 《红楼梦》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作品《红楼梦》创作于乾隆朝中期。作者曹雪芹生于一个得到康熙宠信,有钱有势的汉人包衣家庭。但是曹家在南京红红火火数年之后以不忠和无能之罪受到雍正的处罚,查没了大部分家产。曹雪芹对贯穿整个清朝的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深刻认识,在他 1763 年去世以前,饱尝锦衣玉食的奢华和家道破落的苦楚。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细致地刻画了贾府的生活。贾府是一座未道出名称的城市中的望族大家,兼有南京和北京生活的某些影子,拥有鳞次栉比的宅第。贾府故事的很多方面显然都取材于康熙时期。贾府知晓满人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为皇上担任财政要务,与宫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贾府的一个女儿是宫中的贵妃。然而这部小说并非真实地描写清朝的生活。小说的两个书名点出了小说殊异而复杂的结构:“红楼梦”微妙神秘地预言了与贾府有着各种关系的主要女性角色的命运;“石头记”讲述一块神奇的宝玉,上天给它授予了不可思议的生命,由一个和尚及一个道士带入尘世。

简单概括,《红楼梦》就是一部爱情故事。小说的男主角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年轻女子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两个女子每人的名字中都含有他名字中的一个字。这三人在贾府的大院里与一群年轻的同伴一起长大,但是当深深爱着林黛玉的贾宝玉被其父母哄骗着与更富有、更健康的薛宝钗结婚时,贾宝玉与林黛玉田园诗般的关系戛然而止。这次欺骗导致了林

黛玉的死亡。在小说的结尾,贾宝玉——尽管他刚刚考中了进士——离开年轻的妻子,抛却日见衰败的若大家业,遁入空门。

曹雪芹写作这部小说在简单的娱乐愿望同时也有其严肃的目的。在小说的情节背后,《红楼梦》追求个性及对人生旨趣的理解。这部小说还探究着与所谓的成败交织在一起的不同层面的真实与虚幻。曹雪芹在本书的第一回中说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神,自色悟空。”^⑤或是第一回中的另一句表述:“假作真时真亦假。”

虽然这意味着曹雪芹否认小说的写实性,但是小说结构丰富——长达一百二十回,除了主要角色外,还包含数以百计的刻画丰富的人物——它也可以被视为清朝中期精英阶层生活的缩影,包括家庭结构、政治、经济、宗教、审美,以及性事等。即使考虑到作者富于创造性的想象以及整篇作品中丰富的讽喻,这六个方面仍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社会的繁荣奢华及隐含于其下的内容。

在家庭结构中,曹雪芹指出了父亲对于孩子们的巨大权利,特别是在他们的道德成长和教育方面。贾父选择师塾先生,对贾宝玉学习的进程严加督问,处罚其疏忽和不合道义的行为。他父亲生气时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只要提及此事就足以令其胆战心惊。比较而言母亲就没有权力。但是,作为一家之长的贾母——即贾宝玉的祖母——治家有方、聪明睿智,因为年寿和辈分而备受尊敬的地位可以调解家庭的行为。辈分在迫使他服从比自己年长的人的同时,也同样使贾宝玉有着比年轻的兄弟姐妹更高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贾府的权势不只是因为其家中的一个成员是皇帝的贵妃,也不仅仅由于他们在官僚机构中据有高位担负重任。他们的实际权力来自于地方,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使

地方官僚系统服从于自己的利益。任何一位地方官员都知道起诉贾府的人或其朋友就可能丢掉官职。这个家庭伴生着腐败，使下一辈的成员相信他们可以触犯法律而不受处罚，甚至其家庭中有人杀了人也照样平安无事。由于达官贵族的友朋网络及科举及第使家族的年轻男子容易获得要职，年轻女子皆嫁与权势之家，这种政治权力无形之中得以长盛不衰。

经济方面，贾府所能支配的资源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想象。他们的家中充斥着金银、丝绸、书画卷轴。他们的庭院建筑广阔宽敞，忠实的管家从城里的产业及贾府作为不在地主拥有的远处土地上收取的租金不断补充着家里的府库。他们从事着具有厚利的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还在担任国家的官职中获取额外的收入，并从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商人那里得到外国商品。贾府还有成群的签订了契约的男女奴仆，处理家中的各种事务，贾府的人外出时他们则作为扈从。

在宗教方面，贾府与清代社会一样兼容并存。贾府谨奉儒家传统和自己的祖先。葬礼和婚礼尽显奢华，仪式隆重。但是假如有必要，也会招来道士与和尚举行法事。他们遵循这些宗教规定的仪式。贾府还在其家的别业里养着一群年轻的尼姑。遇到灾病时则请其举行佛、道法事，口念咒语，除魔驱邪。小说中，贾宝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恶人的巫术缠身，即使通灵宝玉也不能保护他。贾府的一位长者入寺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宗教教化（他后来死于服用太多道教的长生不老仙丹）。

在审美方面，贾府里的生活是欢快愉悦的，使人回想起晚明时期上层精英优雅的生活。青年男女们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生活中是没完没了的诗歌唱答以及引经据典的笑话和谜语。小说中人物的衣着、装饰、庭院无不精致华美。就连上茶、饮酒、进餐都体现着美味和工艺的完美结合。音乐和戏剧也是贾府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贾府有自己的戏班，男女演员随时应候，表演如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之作。

最后，在性事方面，贾府的人行为很少约束。少年们生活在童真的世界里，彼此的逗笑即使影射着性的意义，本质上却是天真无邪的。但是他们的长辈却非脱俗之人，孩子们长大后也纷纷效尤。家中的男女都利用自己辈分上的权力获取性的愉悦。通奸带来妒恨，爱欲导致谋杀。侍女和奴仆成为泄欲的对象，除了逃离和自杀却无力反抗。春宫画撩拨人心，贾宝玉初试云雨便是一例。贾宝玉看了一幅色情之作后便惚惚入睡，做了一个曲折美妙的春梦，醒来后又与其喜爱的侍女重温梦中的经历。初入佛门的尼姑与年轻的男戏子也难逃诱惑。甚至传授儒家道德的私塾里年轻的男性学者之间也出现了同性恋。

曹雪芹 1763 年去世时并未能完成他的小说，手稿在其家人和朋友们中流传了几十年。直到 1792 年，由后人续补的全本得以刊行，并立即获得成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广泛的读者是清朝中叶太平盛世时期的上层阶级的男女、落第文人，还有在繁华都市里谋生的儒商。

虽然《红楼梦》充分回应了晚明杰出的戏剧和小说成就及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我们也不能确知后四十回中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但整部小说浑然天成。从其细腻的描写和谋篇布局都可预见十九世纪西方巨著的风格。曹雪芹本人已无法再评说自己的成就，但他借贾母之口道出了以前大多数的传统中国小说和戏剧老调重弹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

贾母笑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要一个佳人，所以

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⑥

曹雪芹一生或许颇为失落，但他并非是嫉妒权势之人，也未沾染旧式小说的风气。他的成就独具一格。唯一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也许就是，尽管曹雪芹已敏锐地看到当时繁荣景象之下寓含着的问题，但他的这部杰作仍然为乾隆盛世增色不少。

4. 乾隆的晚年

似乎是应验了丰卦的警示，乾隆皇帝的晚年危机频频出现。这些危机并无特定的模式，正是政府一系列的决策失误，加之政府以前无视国内的积怨，导致了紧张的局势。日益恶化的军事边防、地方的叛乱、官僚机构的腐败、皇帝的护短等都是危机的表现，与此同时，传统的学术价值发生动摇，国家无能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和行政问题，稳步增长的人口给土地带来了空前压力。

在公开的诏谕中，乾隆对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睿智深感自豪，1750年代征服新疆——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运气——也确实堪称一项丰功伟绩。但是1760年代对缅甸的战争严重处置失当，这与一个世纪以前吴三桂在这一地区追捕明朝最后一藩王的成效形成鲜明对照。1788年和1789年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短暂战争也清楚地反映了清朝政策的草率。

1788年越南黎朝的统治者携家人逃离被篡位者控制的河内，在中国广西省避难，寻求清朝的保护。乾隆迅速作出回应，

下令清军分三路进攻河内，一路由孙士毅将军率领从广西进发，第二路从云南东南部出发，第三路从广东经海上进攻。孙士毅将军率领的清军于1788年12月进抵河内，大获全胜，并重新扶持了黎朝政权。乾隆立即加封孙士毅为国公。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正当孙士毅及其军队在河内欢庆春节时，遭到了起义军的攻击，孙士毅损兵四千余人，被迫狼狈撤回广西。乾隆武断地认为黎朝注定覆灭，乃承认继立的胜利者为越南合法的统治者。从某一层面说，这显示了中国仍然有给周边国家统治者赐封的特权，然而同时也表示中国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出现了问题（这次失败标志着中国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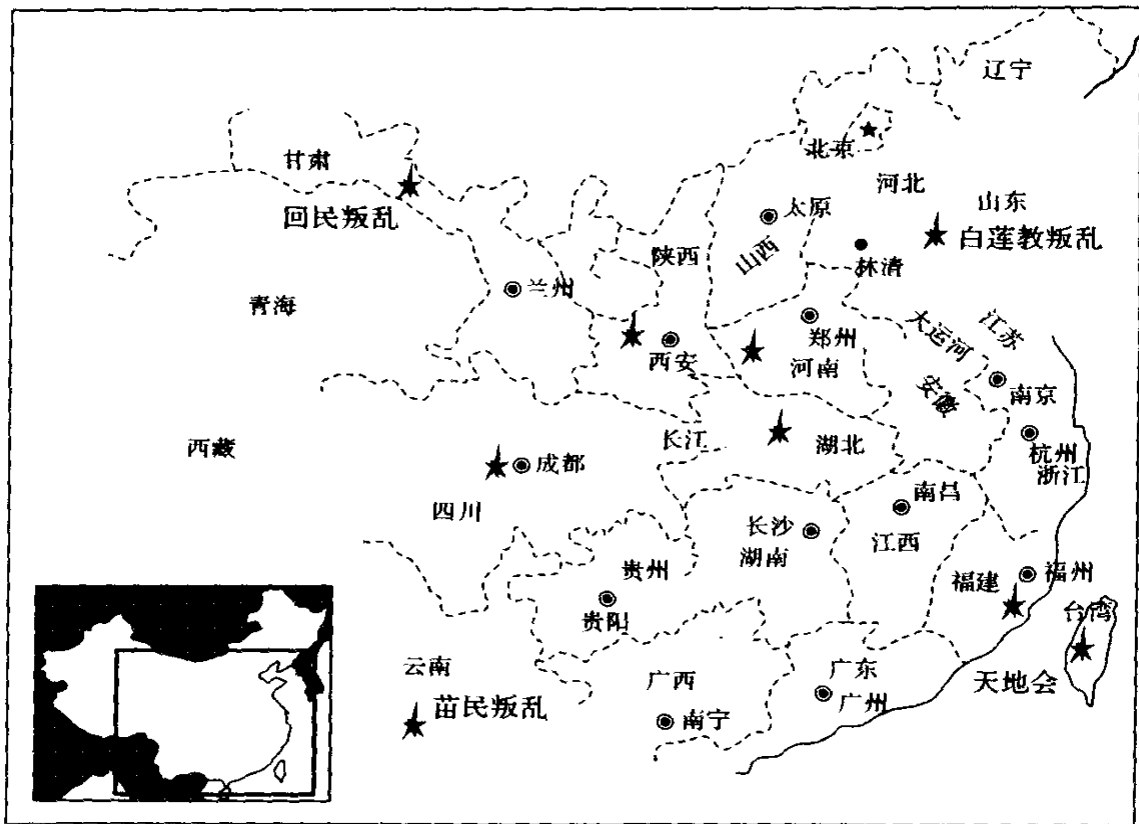
1790年和1791年，清朝成功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尼泊尔廓尔喀人，显示了一些满人将领仍有令人叹服的军事才干。满人将领率领的清军于1792年进藏，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打败了廓尔喀人，迫使其从喜马拉雅山口退回尼泊尔。清军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区的作战和后勤补给都表现了卓越的能力。在随后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尼泊尔同意每五年一次向中国遣使朝贡，这一承诺一直保持到1908年。但是，这次战争使清朝耗费巨大，花费的巨资也是一笔糊涂账。负责管理账目编制的就是在越南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孙士毅。乾隆不管他在越南的败绩，还是把他调到拉萨，这说明皇上对一个人的喜好胜过了对其能力的评判。

对外战争长期不断，十八世纪晚期国内的反叛也在各地此起彼伏。有些暴动事件纯属夸大其词，出于迎合皇帝多疑的本性，而非真正危及皇位。1768年一个由巫术蛊惑的事件就是一例。在这一事件中，起初皇帝相信：有一群谋反者剪下受蒙骗者的辫子，制成声称可以盗走人的灵魂、召唤天兵天将的神奇药剂。只是在逮捕了一些人，严加拷问之后——很多无辜游民被拷打致死——皇帝才明白他曾经被人误导，实际并不存在反对

他的事件。还有一些事件更为严重，而且确有其事。在距北京不远的山东省临清附近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暴动，那里是南北大运河运输线上的枢纽，地近东北大区的外围。这里人口急剧增长，心怀叛意的农民与在运河上谋生的易动不安的船工、苦力交织在一起。1744年，在通晓武术、行医治病的王伦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清朝的叛乱，声称有“无生老母”保佑。从这一点看，这次反叛与地下秘密活动的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也同样崇拜这位女神，宣扬人间的千年劫难，其思想根源则可追溯到五百年以前。王伦从各行各业广纳信众：很多是农民或雇工，也有漂游的艺人、车夫、渔贩子、豆腐贩子、僧人、油贩子和高利贷者等。我们很难说王伦有其政治纲领。虽然确实有些农民支持他，但他从未说要消灭地主，救助穷人，或平分土地。他的追随者们起来反叛也并非响应什么明确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而是由于简单的精神煽动激化他们对社会主导势力的敌意。

王伦的训导使叛乱者相信，他们有能力抵挡清朝的进攻。正如他所说的：“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①在早期的战斗中，王伦的一些预言似乎应验了：他占领了几个小城镇，并一度攻占临清，满、汉军队望风而逃。但是朝廷调集了包括八旗兵和地方绿营在内的大军。王伦用刀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抵挡不了清军有部署的攻击。尽管起义军进行了逐房逐间的英勇巷战，还是被对手击败，连同家人一起遭到屠杀。一位从王伦着火的大营逃出来的起义军给清军讲述了王伦临死前的生动一幕。他说，王伦身穿紫色长袍，手戴两只银镯，腰佩匕首和长剑，纹丝不动地盘坐于房角，从容就死，当时他的衣服和胡须已经着火。

王伦暴动的意义更多的是表达了潜藏于社会的不满情绪，而非其随即产生的影响，这件事应该与爆发于中国其他地方的



乾隆晚期的叛乱示意图

通常没有明确思想和目标的反叛联系起来考虑。1780年代,天地会会众在台湾暴动,攻占了几座城市,宣布建立新的政权。天地会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和通过立誓建立的社会组织。这次暴动既是对清朝政府的反叛,也是不同的福建移民集团之间为控制台湾经济而发生的争斗,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暴动于1788年被镇压,其首领被处决。

同样在1780年代,甘肃省也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回民反叛,由反对清政府任命当地穆斯林长官的“新教”信徒所发动。两次回民反叛经过激烈的战斗,被镇压下去。发生在中国西南的一系列苗民反叛也被平息。但是,平叛战争使清政府耗资甚巨,而且战争的胜利并未能根除宗教、经济和民族间的隔阂。1799年,乾隆去世,曾经组织了王伦之乱和白莲教暴动再次席

卷华中，并频频袭扰四川、湖北、陕西及河南的清军。

我们能把这些反叛和导致百姓与政府疏离的满人特殊的政策联系起来吗？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这一点，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十八世纪晚期清政府的诸多制度逐步废弛：义仓经常空空如也，大运河也常常淤塞，八旗兵残忍而无能，不再阻止带来生态危机的土地开垦，官僚们结党营私，腐败日甚。也可能是清政府不愿在新的定居点或人口稠密地区设立新县，加重了现有官员的负担。而且，获得职位的紧张压力也预示着那些最终得到官职的人将凭借手中的权力横征暴敛、勒索贿赂，以迅速补偿其候官时付出的代价。1790年代的白莲教反叛者们就直接指出“官逼民反”。^⑧在边境的战争中也与镇压内地的反叛一样，官员们的肆意渎职骇人听闻。文武官员相互勾结，常常向乾隆隐匿实情。而乾隆将其父亲雍正个人密奏的密折制度改为常规制度，这使得现在他失去了秘密可靠地获悉官员不法行为的途径。

1775年以后，垂暮之年的乾隆皇帝宠信年轻的满人侍卫和珅，虽然并非每一件坏事都应由和珅负责，但官员的腐败却无疑更加严重了。那时和珅二十五岁，乾隆皇帝六十五岁。在随后的时间里，乾隆的这位宠臣一再受到越次提升：乾隆任命和珅为满人正蓝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及军机大臣。将如此众多的重任委与一个年轻人，各种荣誉积于一身，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无可与比肩者。和珅还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一度又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裁、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总督，授一等男爵。1790年他的儿子还娶了乾隆的第十个女儿。

关于乾隆和他的这位宠臣的关系也流言四起，这不足为奇。流行的说法是乾隆与和珅是同性恋，也有人说和珅犹似雍正一个妃子的转世，乾隆年轻曾迷恋过她。一位来华的朝鲜外交官

也许受了这些流言的影响,这样描绘三十岁的和珅:“相貌优雅,模样英俊,但欠男子气概。”1793年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节来华的马嘎尔尼勋爵描述和珅道:“年约四十到四十五岁,相貌堂堂而体面,有捷才而健谈。”^⑨

事实上并没有关于这类关系的任何明确证据。只是乾隆在其晚年确实宠信和珅。也可能乾隆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和珅充当自己的耳目之臣,正如康熙和雍正实行密折制度的早期利用包衣和臣僚所做的那样。因此,1780年乾隆派遣和珅赴云南秘密调查总督贪污事件,1781年又派他帮助镇压甘肃的回民暴动。但是常常患病的和珅主要作为乾隆的心腹大臣呆在北京。和珅的医生总结他的病症是外邪侵入,邪自内生,游走于体内。医生对此也爱莫能助。和珅转而大胆地求助西医,召来马嘎尔尼勋爵使团的吉兰会诊。吉兰发现,和珅所患的是自儿时一直困扰着他的严重的疝气和风湿病,并为他做了适合的疝气带。^⑩

在对和珅的各种评论中,马嘎尔尼和吉兰都说和珅手握大权,才智不凡。而且形形色色的中国方面的记载也表明和珅机智伶俐,善察人意,通晓经史。但是他以权谋私,为自己和亲近攫取了巨额财富。他飞扬跋扈,恃宠邀赏,广索贿赂。在乾隆晚年的诸多战争中,他都雁过拔毛,谎报开支,敛财逾数百万,特别是在旷日持久、极为惨烈的平定白莲教叛乱战争。和珅的斑斑劣迹,集中反映了时弊,加剧了官僚机构和百姓之中的道德败坏。

1796年以后,和珅权势更大了。这一年乾隆退位,此举是为了显示孝道,表明自己在位时间不超过其祖父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乾隆并未让他的儿子真正掌握朝政,在他垂暮之年使用的虽然已不再是乾隆年号,但仍然通过和珅继续掌控朝政。乾隆于1799年去世时,和珅的根基也随之瓦解。他被乾隆

的儿子嘉庆处以贪污罪，勒令自杀。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繁荣的盛世就这样令人惋叹而又合理地终结了，这一终结也凸显了清王朝令人费解的盛衰嬗变。

注释:

- ① 关于乾隆穆斯林妃子可参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的《乾隆宫中的维吾尔穆斯林:香妃的意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94年第2期,53卷,427—458页。
- ② 威廉(Richard Wilhelm)和白恩斯(Cary Baynes)译:《易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13、670页。
- ③ 对考证运动的研究主要参考了艾尔曼(Benjamin Elman)著《从理学到朴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④ 曼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载:中国十八世纪的女性》,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女性作家作了集中的论述。
- ⑤ 曹雪芹著,霍克斯(David Hawkes)译:《红楼梦》(修订本),第一卷,纽约1973年版,第51、55页。
- ⑥ 前曹雪芹著第三卷,第31页。
- ⑦ 韩书瑞(Suan Naqun)著:《山东的叛乱:1744年的王伦之乱》,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 ⑧ 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清代名人传》,第一卷,华盛顿特区1943年版,第223页。
- ⑨ 康(Harold Kahn):《皇帝眼里的君主政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克莱莫尔-平(J. L. Cranmer-Byng)编:《访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日记,1793—1794》,伦敦1962年版,第120页。
- ⑩ 前引克莱莫尔-平编,第281—283页。

第六章 中国与十八世纪的世界

1. 管理“外夷”

清朝没有设立外交部。与非汉民族的关系由不同的机构和部门管理,这喻示了外夷文化的低劣和地理的边缘性,同时也有防御外人入侵的意味。

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与蒙古、准噶尔及俄罗斯的关系主要由1638年皇太极创设的理藩院管理。理藩院官员全部由满人和蒙古人担任,其职责是维护过去屡遭入侵的西北地区安宁。为此,理藩院精心制定了一套管理中亚商队来华贸易的协议体制。皇室公主也常常下嫁给有影响的蒙古王子,构建了一个以驻扎于各战略要地的清军为后盾的私人联盟组成的安全网络。回民有的来自中亚,有的就是汉人,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但一般仍允许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自雍正时清军进入拉萨,西藏信仰喇嘛教的各部已不再是清朝的严重威胁。由理藩院处理的多种事务使这些官僚获得了大量的处理外交问题的实践经历,也使作为西北边防屏障的长城大部分时间都形同虚设。

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主要由北京独立行事的机构内务府管理。这一机构管理着与皇帝相关的诸多事务,其中包括贮藏金银、供应膳食、维护皇家财产和宫殿、制造珍贵的丝绸和瓷器,以及从食盐专卖和国内外贸易中的关市之征等,获取额外岁入。直接处理传教士事务并负责护卫教皇使团的主要是有权有势的

皇帝包衣奴仆，他们在管理传教士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使人们普遍认为，对外事务是宣扬朝廷威名的途径，而非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耶稣会士们发现自己的角色深受限制，而在写回欧洲的信中却力图强调他们的独立性。一些耶稣会士以及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牧师在信徒的掩护下秘密传教。如果被当局抓获，则会面临严厉惩罚。

与朝鲜、南方边疆地区以及缅甸、泰国、越南和琉球群岛等的非汉民族的交往事务由礼部管理。这些国家分享了中华文化的诸多基本价值：中国的历法，中国典籍的形式，中国的饮食和服饰，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信仰，中国的官僚机构等。礼部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繁缛的礼仪，中国试图不费一兵一卒，藉此控制这些国家。中国以外国国书中卑微的用语和使节在朝堂上给皇帝行三拜九叩之礼，使这些国家使团认识中国文化优势与政治权威。这些国家获许与中国进行一定量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允许这些国家派遣朝贡使团，每年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北京朝贡的形式进行。贡品呈献给皇上后，随使团来北京的外交人员和商人即可进行贸易，所有随贡人员必须住在礼部管理的旅舍，而且必须在朝贡活动结束后带着商品离开中国。

不过在制度范围内还是有很大的弹性。朝鲜朝贡最为频繁，每年都来。朝鲜的使节可以与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自由交往，留下了关于北京的社会文化生活及儒士政治态度的生动记载。然而，明朝后期日本的来华使节完全停止，日本拒绝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加之德川幕府限制外国人在长崎居住和贸易，使得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只能维持最低的限度。1788年，中国行使其权利和义务，扶助越南黎朝统治，显示了朝贡关系中的军事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篡位者取代了黎朝的传统朝贡地位，顺从清朝，中国立即转而支持新的政权。琉球则是一身事二主的特

殊情况。琉球群岛事实上受日本摩萨藩王的控制,同时又向清朝朝贡称臣。十八世纪的记载还显示,当中国的外交使团访问琉球时,日本即谨慎地撤离,一旦中国人离开后又立即返回。

乾隆自诩为整个亚洲的共主,以下三种主要对外管理模式——西北模式、使团模式和南方模式——即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的基本观念。其基础就是视中国为中央王朝,其他国家皆为化外。因而中国也就很少有兴趣获取外国的精确信息并作详细研究。即使在十八世纪考证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学者对地理和语言学的兴趣也主要局限于中国范围之内。中国典籍关于外国的记载依旧混杂着神秘的传说和臆想,常常把外国人比作鸟兽,描述中充满了居高临下和不屑一顾的语言。

离开中国去海外贸易或游历的中国人都被视为叛国者。即使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不断发展,清政府也无意支持中国在这里的权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莫不如此(唯一的例外就是台湾,但台湾在形式上已归并为福建省的一部分)。虽然清朝也通过内务府从海外贸易中收税,但对海外贸易能够给政府带来的潜在利益从根本上毫无兴趣。他们不信任商人,还与1660年代一样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沿海居民,以实现其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目的。他们使自己对外国人来华贸易(包括贸易的地点、次数乃至人员、货物的细枝末节)拥有绝对管控权。清朝的观念和政策体制必然与西方势力发生冲突,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新的殖民扩张国家开始取代昔日伙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导地位,扩展其海外帝国之后,这一冲突将更为强烈。人们可以透过中国“管理外夷”方法的第四种(亦即广州制度)追寻文化冲突的轨迹。清朝前期,荷兰与葡萄牙都试图与中国建立广泛的贸易,但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地位,向礼部登记,仅在规定的时限获准派遣贸易使团。英国的船只从1635年开始,不时出现在中国东部

沿海,也许由于英国不寻求建立正式的关系,英国商人获准在舟山、厦门和广州与中国人贸易。随着清朝于1680年代废除禁海政策,及其朝贡地位思想的逐步减弱,西方势力均得以从对华贸易中获益。广州的中国商人为了通过调整价格来控制对外贸易,增加获利,于1720年设立了垄断贸易的公行。1754年这些行商受清政府之命,为外商的贸易行为及商税缴纳担保。

1600年,英国创立了东印度公司,由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贸易垄断权,它不断吸收可观的新投资,并开始印度次大陆掠夺土地,现在正迅速壮大,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乾隆统治时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与英国政府一样开始对清朝的限制政策感到恼怒。1741年,皇家海军准将乔治·晏臣受命在远东攻击西班牙船只,他的旗舰被暴风严重损坏后停泊广州港,这使英国人认识到在远东占有一个立足点的重要性(葡萄牙已经占有澳门,西班牙占有马尼拉,而荷兰人占有巴达维亚)。晏臣显然相信中国也会遵守西方流行的国际海洋法,以仁慈的中立者的立场款待他。但是广州当局却设置一系列行政障碍,连续数周拒绝接见他,也不承认他所说的情况,提供给他的补给品也是以次充好,漫天要价,也不让他获得所需的修缮。晏臣陈述他遭受虐待的记录出版后广为流传,并被译成欧洲几种语言,促使了英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反华意识的增长。

东印度公司力图扩大对华贸易范围,1759年派出精通汉语的公司商人洪任辉与清朝谈判,向清朝廷抱怨广州对贸易的限制和猖獗的腐败现象。经过锲而不舍的坚持和大量行贿,洪任辉乘坐载重七十吨的小船“成功号”,先航行到宁波,然后又到天津,终于得以在北京申诉他的抱怨。皇上一开始还同意派一使团南下去调查。但是在“成功号”从海上驶回广州(洪任辉独自游历了南方),皇上又改变了主意。洪任辉也因违反清朝航行到

北方港口的禁令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及学习汉语等罪名被捕入狱，监禁三年。

面对十八世纪晚期集聚国门之外的日益增多的外国商人，清政府的反应是一面宣称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一面强化上述的统治措施。1760年以后，所有欧洲的来华贸易都限制在广州一港，外国人除了每年10月至次年3月的贸易季节外不得在华居住。尽管有很多行商在贸易活动中恣意妄为，还有大量行商由于过度扩张而破产，欧洲人还是被限制必须与特许的中国行商交易——正常情况下大约有十家。西方商人可以向这些行商表达他们的抱怨情绪，行商把书面的材料转呈给朝廷任命的贸易官员。官员收到后即禀告给省里的长官或朝廷，也或许他以种种借口完全拒绝转呈这些文件。

这一复杂而令人发指的过程与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国际间外交和商业的平等关系大相径庭。1770年代英国人被迫每年以数百万英镑的金银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出现了贸易逆差，于是开始将印度生产的鸦片贩运到中国南部港口，交换中国的手工业产品，这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英国和美国饮茶之风的盛行，贸易量不断飙升：到1800年，东印度公司购买三千二百万磅中国茶叶，价值三百六十万英镑（1784年以来，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商人，现在可以自由地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贸易，他们也开始派遣船只参与利润丰厚的中国茶叶贸易，但是他们也同样要屈从那些曾约束欧洲人的限制条款）。

乾隆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王乔治三世政府的授意下，着力树立与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尊严相适应的地位。他们选派马嘎尔尼勋爵率使团访华，马嘎尔尼勋爵是北爱尔兰一个有政治渊源的贵族，曾经担任驻俄罗斯圣彼德堡公使，具有外交经验。马嘎尔尼还曾担任加勒比海地区的格林纳达及印度东部的

马德拉斯的总督,使他获得了政治经验。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搭乘一艘有六十六门火炮的战舰,有两艘补给舰随行,每艘船都装载着能代表英国精湛工艺的贵重礼品。马嘎尔尼率领着近百名随行人员,其中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卫士、仆人以及来自那布勒斯神学院的中文教师。

马嘎尔尼船队于1792年9月离开伦敦,1793年6月在广州短暂停泊,因为他们声称前来给乾隆贺八十大寿,获许直接前往天津,从那里登陆。登陆后,使团被视为朝贡者隆重地护送到北京。马嘎尔尼努力坚持不在皇帝面前行五体投地的叩头仪式,而代之以单膝跪地和弯腰致敬。清廷接受了这一方式,1793年9月和珅与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热情接见了马嘎尔尼。在接见中,马嘎尔尼要求英国享有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并要求结束受到种种限制的广州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开放新的港口,协定公平的关税。乾隆及其大臣都对英国人的请求无动于衷,拒绝接受。

乾隆给乔治三世一道敕谕,解释道,中国不会增加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对别国一无所求。正如乾隆所写的:“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①

马嘎尔尼无以抗拒。他只能按照规定的路线从陆路到广州,沿途尽可能地记载所见所闻,在其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个貌似令人敬畏的国家内部却隐含了将导致其覆灭的重重弊端。他以这次耗费时光且不愉快的海上旅行作了一个颇为贴切的比喻。“中华帝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好比一艘陈旧、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幸赖先后有几位能干且警觉的军官掌舵,才得以航行一百五十年而不至沉没,它徒然以庞然巨躯令邻

邦生畏。”马嘎尔尼补充道，但是如果由更逊色的人掌舵，中国将逐渐失去控制，直至在“岸边撞得粉碎”。中国最终抗拒不了英国所欲达到的目标，因为“企图阻挡人类知识的进步有如螳臂当车”，正如清朝所做的那样。“人类的精神有一种飞跃的本质，踏上阶梯，就会不断克服困难，至顶点方休。”^②

整个冒险活动花费了东印度公司一小笔财富，公司从中却一无所获。虽然马嘎尔尼本人的表现很出色，但这次事件对于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外交关系的时代并非一个幸运的开端。马嘎尔尼在执行这次探险任务以前，曾坚持要每年一万五千镑的报酬，结果他从这次出使中获利两万英镑。至少中国并未阻挡他个人前进的道路。

2. 外国人与中国法律

马嘎尔尼勋爵在中国得到的一个更为有趣的收获就是清朝律令的抄本。这本律令带回英国，并由一个跟随马嘎尔尼使团出访的学过汉语的学者译成英文，这澄清了几代英国商人的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与欧洲立法的观念迥然不同，因此求助于法律也许只能加剧而非减缓国际紧张关系。

虽然中国的法律也是以以前广泛的经验和案例为基础的，但法律由国家编定和解释。各省和北京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县级官员担负着地方的司法职能。由省的长官及司法官员审议后可将案件上交北京的刑部。原告也可以上诉，但须依循严格的层级，最后送达朝中大臣组成的“法庭”。死刑判决必须由县官的上级审议，在技术上，皇帝对所有案件的执行有最终的审判权。但是实际上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而审判也常由地方专断。在地方的暴乱案件中，反叛者通常被立即处死，以打击其

部属的士气,并防止他们被其他反叛朝廷的人劫狱。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通常也判决得很快。

县级官员基本上同时承担侦察、审判和陪审的角色。他们搜集证据,对证据作出审议,最后作出判决。县官们必须遵行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各种罪行的处罚条款。虽然县官们在法律方面常常依赖这方面有专长的下属吏员,但并没有独立的司法人员,也没有律师。干涉犯罪案件的人会因此受到严惩。嫌疑犯在监狱中受到粗暴的对待,如果不招供,就严刑拷打。通常在判罪以前讯问招供,如果没有确切的新的无罪证据,就将依据招供定罪。厚重的木制刑杖的拷打逼供,有时会导致嫌疑犯的死亡或终身残废。中国人在遇到财产、继承及其他经济事务的严重纠纷时虽然也会诉诸县衙,但很多人都显然对这套法律机构充满畏惧。

在很多争端中,中国人往往求助那些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或大家望族的首领充当调解人。身涉此类案件的人也可能花钱消祸,衙门里的吏员们则照例收取贿赂,为人息事,中饱私囊。为了逃避处罚,那些被指控盗窃、强奸,或杀人的人也送礼给县吏,或直接送给知县。只要送钱给狱吏,或分送食物给同室犯人,在监狱中严酷且可能致命的遭遇也就可以得到改善。

清朝的刑事制度也具有官方儒家教化所宣扬的等级社会的价值观。反对皇帝的罪犯及其家人是犯逆天大罪,触犯官僚和亲贵者也将受重罚——处斩,或延长刑期。在家庭内部,父亲对儿子犯罪,受到的处罚要远比儿子对父亲犯同样的罪轻,夫妻、老少之间的情况也与此相同。有一个案件是父亲将儿子活埋致死,刑部仔细地审议了事实,认为地方官员因此判这位父亲杖刑是错误的。刑部大臣认为,杀死了儿子的父亲只有在他们处置不合理的情况下才会被杖责。而在这个案件中,儿子对父亲出

言不逊，理应处死：“虽系故杀，惟子系谩骂伊父，罪犯应死之人。”^③这位父亲被宣告无罪。

即使没有刑部的干预，这位父亲也可能免于处罚。审讯和判决以后，所处罚可以以钱抵偿，钱的多少视判处的程度：半两白银可抵二十下杖责，三两可抵六十下，十两可抵一年半流放，七百二十两可抵终身放逐，一千二百两以上可抵绞刑或斩首。虽然这样的免刑因各人官阶大小或财富多少而定，但是这一制度显然有利于有钱人，这些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微不足道，而对于穷困的农民或城市手工业者也许是其几个星期甚至几年的收入。而且那些在州县科考中取得功名的儒生也可以免除肉刑，藉以逃避常常用来对普通人严刑逼供的杖责。

乡村的保甲连坐制度巩固了清朝的司法体制。每保一千户，由十甲组成，每甲一百户。中国的家庭都登记入各保甲，由从他们中间选出的轮流担任的保甲长管理。这些保甲长要核查记载各户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及职业等详细资料，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保甲长还要负责维修堤坝，看护农作物，组织团练等。如果遇到严重的犯罪案件，或有谋反的嫌疑，这些保甲长就求助于县衙。保甲长们还要督促本保甲成员按时纳税。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有时甚至还有危险。在很多地方，这一制度难以推行，因为没有人愿意担任保甲长。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保甲制所代表的整个概念，就是一个特定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共同为社区的良好秩序负责，犯罪者的邻里亲朋要因其违法行为一起受罚。

虽然中国的刑事制度是粗疏的，其法律秩序的准则却也许堪与当时欧洲和美国盛行的原则相提并论。但是在这个制度内确实没有涉及到外国人。在所有日常事务中，外国人由理藩院、刑部，或内务府处理。如果他们违法犯罪，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

是他们应该在中国的公堂上按传统的方式处理。

在外国船员偶然杀死了中国人的几个案件中，清朝地方当局首先是同意赔钱偿命。在康熙朝，1689年英国船员在广州附近杀了一个中国人，清朝当局索赔了五千两白银。当英国还价为两千两被拒绝后，便放弃了贸易计划，扬帆而去。康熙朝末期的1722年，“乔治王号”一位炮兵在外出狩猎时意外杀死了一个中国男孩，中国接受了其船长的两千两赔偿，了结了此事。1745年，一位英国水手在广州被法国人杀死，虽然没有涉及中国人，清朝官员还是干预了这件发生在其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所有与法国人的贸易都被终止，直到法国官员交出了凶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庆祝乾隆即位二十年及清朝平定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而举行大赦，这名凶手又很快获释。

公行垄断制度确立后，在乾隆晚年发生的一些司法案件中，西方人的处境更为不利。1773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审讯一个据称杀了一个中国人的英国嫌犯，结果发现他是无辜的，便予以释放。但是清朝官员坚持有权干预这起被害人为中国人的杀人案件，重新审讯那名英国人，并将其处决了。七年以后，清朝当局再次成功地主张了自己干预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外国人杀死外国人的案件：在一次争斗中一个法国人杀了一葡萄牙人，此人被勒令从法国领事馆的庇护下交出后，公开绞死。

商船“休斯女士号”和“埃米利号”涉及的两个案件对西方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使其重新考虑如何在国际外交层面上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784年，亦即马嘎尔尼勋爵使华的前九年。“休斯女士号”是一艘所谓的港脚船，由私人股东所有，却持英国东印度公司执照，在印度与中国间往来贸易，在广州附近燃放礼炮时，导致两个旁观的中国人死亡。当“休斯女士号”船长对中国人声称他不能说出是谁施放了这致

命的一炮时，中国人依照其连坐的思想，逮捕了该船的商务主管。他们还威胁取消所有与西方人的贸易。为了威吓中国人，在广州贸易的大部分外国船员——包括英国、法国、丹麦、荷兰，以及首次出现在中国水域的来自纽约的“中国皇后号”——都在岸上的货栈周围武装警卫。但是中国人并不松动。面对贸易的全部中断及商务主管可能被处决的情况，“休斯女士号”交出了可能应对此负责的炮手。此人于1785年1月被绞死。

发生于1821年的美国商船“埃米利号”的案件是首起直接涉及美国人利益的案件。“埃米利号”的一个船员（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位船员名叫特拉诺瓦，英语意为新大陆）扔下的陶壶砸在船下的一个中国水果贩子头上，使其落水身亡。中国人要求交出特拉诺瓦，美国人先是毫不让步，坚持在船上审讯。但是在清朝下令停止美国人在广州地区的所有贸易后，“埃米利号”船长动摇了，也许因为他船上满载着非法的鸦片，他担心被查没。特拉诺瓦被交给中国当局。在不允许任何西方人参与的审判中，他被查实有罪，于次日处决。这次审判形式与处决的速度都一反清朝办理意外杀人案件的程序。

所有这些审讯、冲突和判决使西方国家相信，必须迫使中国人放弃涉及外国案件的司法权。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人竭力坚持的。彼此的误解使争执火上加油。走马观花的认识很难充分理解中国法律的复杂性，做到这一点需要仔细地研习，而西方人几乎无人能够做到。而且，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的规定由来已久。例如，明朝的法律就规定：在中国土地上，“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1646年，清朝将此条修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意指所有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都必须完全臣服。在雍正朝，又改为准噶尔、蒙古及俄罗斯由理藩院管理，而其余外国人仍需服从中国的法律，这是因为他们已“归附

天朝，若有违律情事，惩处一如本朝臣民。”^④

最后，为了理顺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刑部在保证法律公平的同时，于1743年在外国人的案件审理中加上“收禁成招等项目，原不必悉依内地的规模”，^⑤中国官员们认为经过这些变动，即可“下顺夷情”，1740年代和1750年代的案件就是依此处理。然而到1820年代，外国人认为，经过修改的法律剥夺了其上诉权利，亦即在传统的法律体制下中国被告有望获得的缓刑和减刑的权利。

不仅仅是外国人抗议中国法律的不完备。中国的贵族和平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视角，但都被清朝官员在处理外国人要求免刑和特殊对待一事上的软弱态度所激怒。1807年英国“海王星号”船水手在争吵中杀了两个中国人，清朝官员和英国大班达成妥协，找了一替罪羊。随后判处其意外杀人罪，并根据大清律例的减刑条款允许他以十二两四钱余银子赎罪。就像已经协调一致一样，广州到处贴满了斥责清朝官员将自己出卖给“番鬼”的行为。这场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主张正逐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股新兴力量的主流：即排外的民族主义。

3. 鸦 片

将水手特拉诺瓦交给中国法办以保全该船鸦片的“埃米利号”船长可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在此前的一个世纪，欧洲和美洲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及装饰品需求的增长远非中国对西方出口的棉花、羊毛、皮革、钟表、其他机械产品、锡、铅等需求的增长所能比拟。这给西方带来严重的贸易失衡。西方人不得不用白银支付中国的商品，导致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这也是乾隆朝繁荣兴盛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给英国政府提出

了警示。例如,在 1760 年的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超过三百万两,1770 年代达七百五十万两,到 1780 年代达到一千六百万两。然而到 18 世纪晚期,英国选择了一种新的产品来交换中国的商品:鸦片。虽然鸦片贸易也有剧烈波动,往中国的鸦片销量已明确地显示了整个贸易的趋势。每箱鸦片视其产地而定,重量在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磅。到 1820 年代,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足以供给一百万左右的吸食者。在这一数字基础上再加上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数量(虽然这个量还很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英国销往中国鸦片数量表^①

年 代	箱 数
1729	200
1750	600
1773	1 000
1790	4 054
1800	4 570
1810	4 968
1816	5 106
1823	7 082
1828	13 131
1832	23 570

鸦片在中国销售的稳定,有几个因素必不可少:这一麻醉品的充足供给,必须有吸食鸦片的方法,使鸦片贸易持续不衰的足够的吸食者,政府禁烟不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中国在其现代史上陷入痛苦的循环。

英国对印度广大地区的占领刺激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东

印度公司的煽动加之杰出的将领克里夫和练达政事的总督哈斯丁的努力,1750年到1800年英国控制了从西部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以及南部的马德拉斯(马嘎尔尼勋爵曾担任这里的总督)等印度的很多地区。热衷于寻找能够用来出口牟利的经济作物的英国人发现,鸦片在印度的一些地区长势特别旺盛。而且印度有丰富的劳力,可以利用来搜集罂粟荚中的汁液,煮制成鸦片膏,以供吸食。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的收购权,然后选择一些称为“港脚商人”的西方商人,发售鸦片贸易的许可证,采取了间接牟利的方式干预鸦片的贩易。港脚商人在中国销售了鸦片以后,将在广州的公司代理所付的白银存于广州,换得信用证,公司用这笔白银购买茶叶、瓷器及其他中国商品,销往英国。这样发展出英国到印度、印度到中国、中国再到英国的三角贸易,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出高额的利润。

鸦片的消费可能还只是整个产销过程中相对简单的方面。历史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在药剂中浸泡或与其他药草混合吸食,到十九世纪晚期浓缩成吗啡片及今天的海洛因注射。中国最流行的是吸食鸦片——将一个经过提炼的小球状鸦片膏在火苗上加热,然后用细长的管子吸食——此风最初的流行是继承了清朝前期已经盛行的抽烟的方式。烟草种植从拉丁美洲传到福建省,并从这里迅速传播到山东省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在康熙时期的所作画轴里可以看到一群中国人抽着烟管在街上漫步,各种流行商品的招幌展示在店铺的前面。鸦片混合烟草吸食的方法在中国可能出现于1720年代,由那些镇压1721年朱一贵叛乱的士兵从台湾带回。到乾隆朝中期,关于如何吸食鸦片的详细介绍使能够识字的人都可以了解到。在一些小旅馆里人们用几文钱就能得到一管鸦片,舒适地躺下来

吸食,这些旅馆把鸦片传播给城市的居民和穷人。

为什么清朝中晚期的中国人开始大量吸食鸦片呢?因为没有同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资料,我们只能猜测。但是我们知道吸食鸦片可以使周围的环境变得舒缓缥缈,时间变得若有若无,复杂而痛苦的现实世界飘然远去。这一时期中国的文献说到,最初受鸦片诱惑的是那些身负烦恼和压力的人。被宫廷繁文缛节所困的太监们,身居闲职或在宫中担任闲差的满人官员也吸食鸦片。那些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禁止出外活动的富贵之家的妇人们也染上了鸦片。县衙里的吏员,谈生意的商人,参加科考的学生也都吸食鸦片。就连前往镇压农民暴动的士兵在行军的路上也在吸食。

十九世纪吸食鸦片之风不断蔓延,特别是那些闲暇而找寻松弛方式的阶层。卖苦力的劳工也开始或吸食鸦片,或舔食小球状鸦片膏,藉以消除日复一日繁重的劳作和痛苦(精明而残酷的雇主发现苦力们吸食了鸦片后能搬运更重的东西,进而便因此提供鸦片药丸给工人们)。到十九世纪末,很多农民也成为瘾君子,特别是那些自身把罌粟作为经济作物种植,以获取微薄收入的人。

清朝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如上所述,第一位对鸦片颁发诏令的雍正认识到,作为药剂,鸦片有合法的需要——鸦片对治愈腹泻或痢疾特别有效——但是非药用的鸦片是有害的。提供鸦片给私下吸食者及经营烟馆将受到严厉处罚,而药用鸦片仍可继续公开销售。

在十八世纪,大多数的鸦片批发贸易都由公行商人把持。但是1800年以后,鸦片进口和中国本地种植鸦片均被禁止,特别是1813年进一步禁止吸食鸦片后,鸦片的贸易更加隐蔽。中国的吸食者要被杖责一百,并戴枷示众一个月甚至更长。公行

商人不再敢贩易鸦片,但是外国商人发现,如果他们停泊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很多中国人会冒险前来购买他们的鸦片。广州以南海湾中的伶仃岛边停泊的一艘武装趸船于是成为鸦片肆意传播的集散点。中国的商人凭借迅捷轻便的船只,可以躲避为数不多的清政府海军的所有拦截行动。他们水陆并行,通过本地的商业网络贩售鸦片。

清政府严惩鸦片贩子,向吸食鸦片者讯问货物来源,试图以此强化禁令,这使得鸦片的贸易更为诡秘,参与贸易的大量中间人皆隐匿形迹。1831年一位被逮捕的宫中太监向内务府官员的供词中简要地描述了鸦片贸易的过程:

最初我们直接向回人朱大购买小量供自己吸食的鸦片。后来我得知,当海船抵达天津时,鸦片价格就会下降,因此我向克克斯布库借了一百贯钱,还卖了我的骡车。我带着我的仆人秦保全到天津,找到秦保全的故旧杨怀远做代理。杨怀远用二百四十贯从一个姓张的人手中购买了一百六十盎司鸦片。我给了杨怀远三贯八百文作为佣金。^⑦

如果清朝当局曾经竭力追查过这件案子,他们可能已找到了两位中间人和当地兜售鸦片的张姓人。但是张姓人可能只是一个小贩子,到他被捕时,批发鸦片的大贩子和供给鸦片的外国船只早已逃之夭夭了。

4.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才逐步受到西方的关注。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天主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们的书籍和信件的刊行

传布,这些教士在中国巨大的人口中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前景。虽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士都能以利玛窦为榜样。利玛窦于 1583—1610 年间在中国生活,对中国人的工艺技术,完善的国家官僚机构,寓含深刻哲理的文化传统以及统治者的权威充满敬佩。

康熙朝晚期,主导着中国传教活动的法国耶稣会士对早期的清朝极尽赞美,目的是向“太阳王”路易十四提出请求,说服他在金钱和人员上支持传教士。这些充满溢美的描述主要是想说明,儒家典籍的伦理内涵证明中国人是一个颇有道德的民族,而且曾经信奉一种一神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并无大异。因此,只要稍加努力,就可以引导中国人回归他们也曾认同的价值观,而不必采取强迫手段使其皈依基督教。

虽然康熙朝末年耶稣会教在中国迅速失去影响,而且十八世纪它在欧洲的声望也江河日下,直至 1773 年解散,但他们所写的关于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书籍仍是欧洲人所能见到的最详细的记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读了这些耶稣会士的书籍,对《周易》的八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反对教权的哲学家伏尔泰也被他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吸引了。伏尔泰坚决地抨击十八世纪法国教会的权力,他机智地利用传教士提供的这些关于中国的资料来驳斥传教士们的极端主张。伏尔泰辩论道,如果中国真的如此有伦理道德,文化昌明,管理有序,而这一切又归功于儒家思想,孔子却又并非基督教徒,那么一个国家显然可以不需教会的力量就能够取得令人敬仰的成就。

在他 1740—1760 年间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中,伏尔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伏尔泰在一部小说中指出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不同社会的道德观念是相互呼应的。在一部戏剧里,他还提出,中国的道德的力量驯化了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征服者。

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以别具一格的叙史方式，评述了世界历史，其中中国部分占有很长的篇幅。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借以透视欧洲人的自负：“对中国礼仪的最严重误解，肇始于吾人以己之风俗度衡彼之风俗；吾人以偏颇天性所生之偏见，来看待世界之种种目的。”^⑧伏尔泰无法在欧洲寻找到一个“哲王”来说明他关于宗教和政权的观点，他相信乾隆皇帝就是这样一位哲王，因而他以诗歌赞颂这位遥远国度的皇帝。

伏尔泰对中国制度的褒扬出现于热情赞颂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一短暂的时期中，中国热席卷欧洲，法语通常用“chinoiserie”* 这个词描述这股热潮。相对于哲学和制度而言，这一热潮关注的更多是中国的装饰和设计。从中国宅院和花园的画册、中国刺绣丝绸、地毯、华美的瓷器中，欧洲人发现了有别于他们的精密几何计算的古典主义建筑和繁复的巴洛克设计的新的艺术风格。法国“洛可可”风格就是其中之一，它热衷于柔和的色彩，不对称性，一种刻意的无序，以及梦幻般的感觉。洛可可风格盛行一时，从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新的中国风格墙纸和家具摆设，到公园里的宝塔、街上来往的轿子，乃至花园四周的窗格，在欧洲随处可见。

但是当人们看到晏臣愤怒和讥讽的评论，无论是知识还是审美方面的中国热潮都迅速消失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发现伏尔泰对中国的描绘不可相信，于是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成为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卢梭和孟德斯鸠怀疑中国人似乎并没有自由，他们的法律的基础是威慑而非理性，中国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也许会导致中国道德的崩溃，而非有益于道德

* 意为“中国艺术风格”或“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译者注

的提升。还有一些作家也认为,中国似乎并未进步,实际上就连进步的观念也没有。这与认为中国日益退步的观点不过一步之差。法国史学家布兰杰写于1763年(写作次年被激进派的威尔克斯译成英文)的一部书中令人伤感地写道:

中国现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完全消失一般;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⑨

一些杰出的欧洲思想家对这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争论进行了反思,竭力探求这个国家的前景。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论及中国,该书出版于1776年。斯密在分析不同国家的生产能力时,发现中国可以作为参照,特别是用来比较与欧洲国家和发展中的北美各国。他以人口增长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标,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国家人口每五百年翻一番,增长速度稳定,在北美,人口二十至二十五年翻一番,不断提供新的劳动力,因而新大陆“比较繁荣,而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迈进”。^⑩

然而中国这个“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亦即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此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已处于这样的境况,即不断增长的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反作用:“在这样的国家,工人的工资在过去足以维持生计,养家活口,但因为工人相互竞争与雇主的利益,工资很快就会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结果是“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匮乏国民的贫穷程度”,溺婴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斯密不满地指出,“结婚在中

国是受到鼓励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生儿育女会带来福分,而是因为他们有杀害子女的自由”。按照斯密所述,中国拒绝思变,问题正日益恶化,他们正远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我封闭:“忽视和轻蔑对外贸易,只有二三个港口容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国家,断难达到与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国家所能拥有的商业数量。”^⑩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代早期所作的一系列著名演讲中,综合布兰格、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密等人的各种不同分析,指出,“东方文明”——中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历史上人类的早期而现在却已被扬弃的文明。黑格尔的“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对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和十九世纪晚期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他所说的“观念”的发展及世界自由的实践过程。自由是“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展示,这一精神在欧洲和北美基督教国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黑格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到乐观,他提出一种漠视中国过去的历史哲学。他将中国描写成被皇帝或专制君主统治的典型的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在西方,希腊和罗马时代一部分人拥有自由,而若干世纪以后即黑格尔的时代,所有人都拥有了自由。由于缺乏对“精神”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的了解,中国皇帝的自由也是随心所欲的,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这种驯服只不过是自然的以外”。^⑪

黑格尔写道,中国命运部分取决于地理因素:“亚细亚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在一段论述中,黑格尔语气强烈地论述道,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

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⑬虽然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会使在海上驰骋的富有的福建商人感到惊讶,但是基本上正确地概括了清朝政府对开拓海洋毫无兴趣的情况。

在这一系列悲观的结论中,黑格尔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精神的发展之外。虽然中国有大量的史学家,他们以自己所持的偏见研究本国历史,没有认识到中国自身“犹在世界历史之外,却预先假定若干因素的结合必然造就活泼且生动的进步。”中国皇帝对百姓说话也会“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中国百姓却“自视卑微,确信人天生就只配给皇帝拉车”。黑格尔为中国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喘息,然而这却像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饭食,却不以此为憾。”这段话远比马嘎尔尼勋爵对清朝命运的看法更为透彻。

也许中国还没有永远陷入形而上和地理上的孤立。在一段极为暧昧的旁白中,黑格尔补充道,“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特质,始可得知。”^⑭黑格尔并没有谈到是由谁或怎样找出的问题,但是西方势力带着他们的舰船、使团和鸦片很快就开始给出这个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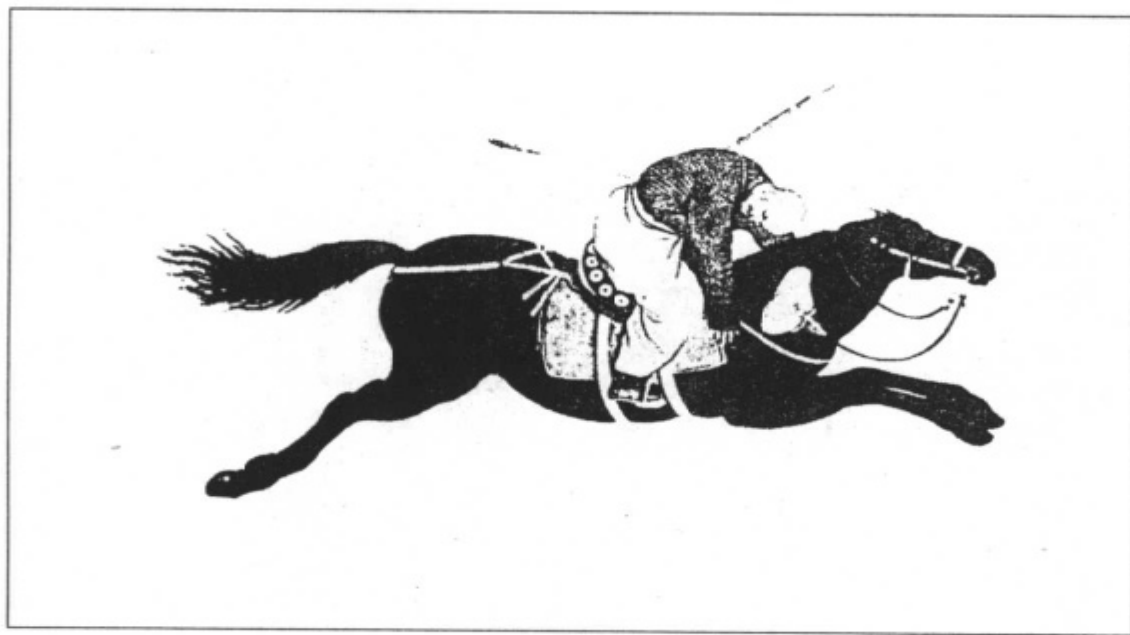
注释：

- ① 克莱莫尔-平(J. L. Cranmer-Byng)编:《访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日记, 1793—1794》,伦敦 1962 年版,第 340 页。关于叩头礼的妥协参见艾西里克(Joseph Esherick)《来自远方的珍贵资源》,载《现代中国》1998 年 4 月第 2 期,24 卷,151—152 页。
- ② 前引克莱莫尔-平(Cranmer-Byng)书,第 191、212—213 页。
- ③ 布迪(Derk Bodde)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编:《中华帝国的法律》,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390 页。
- ④ 爱德华(Randle Edwards):《清朝对外国人的司法权》,载孔杰荣(Jerome Cohen)、爱德华(Randle Edwards)及张富美(Fu-mei Chang Chen)编《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22—269 页。
- ⑤ 前爱德华著第 229 页。
- ⑥ 数据转引自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三卷),上海和伦敦 1910 年、1918 年版,第一卷,第 173、209 页,以及张馨保(Chang Hsin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23 页。
- ⑦ 史景迁:《清代中国的鸦片吸食》,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修订本),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43—173 页。
- ⑧ 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诸民族风俗论》第一卷,日内瓦 1771 年版,第 36 页。
- ⑨ 布兰杰(Nicolas Antoine Boulanger)著,威尔克斯译(John Wilkes):《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巴黎 1763 年原版,阿姆斯特丹 1764 年译本,第 260 页。
- ⑩ 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康南(Edwin Cannan)编:《国富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70 页。
- ⑪ 前亚当·斯密著第 71—72、95 页。
- ⑫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霍尔丹(E. S. Haldane)和

西蒙(Frances Simon)译:《历史哲学》,纽约 1956 版,第 18—19 页。

⑬ 前引黑格尔著第 87、90—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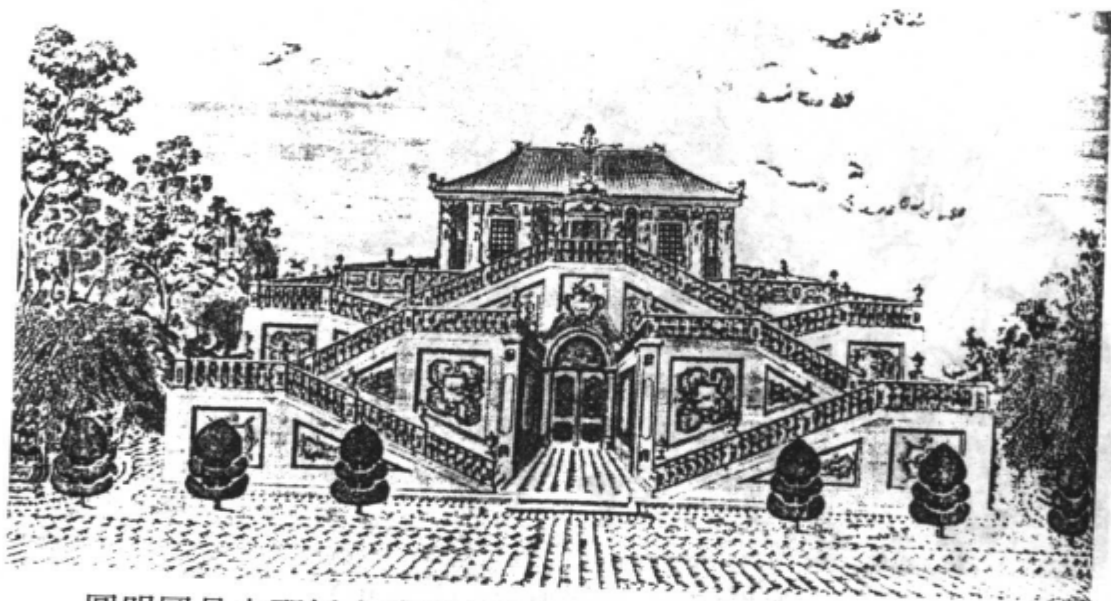
⑭ 引语依次见前引黑格尔著第 116、138、101 页。



《玛瑞斫阵图》 传教士 Castigkione(1688—1766)作,描绘清朝将领征服回疆的战功。



乾隆皇帝的伟大功勋之一即是征服今日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图中描绘 1759 年攻克喀什、叶尔羌之前，清军扎营的情形。



圆明园是由耶稣会建筑师为乾隆皇帝所设计的，坐落于北京城外。图为版画圆明园“海晏堂”。



乾隆元年八月吉日

郎世宁作：乾隆画像(17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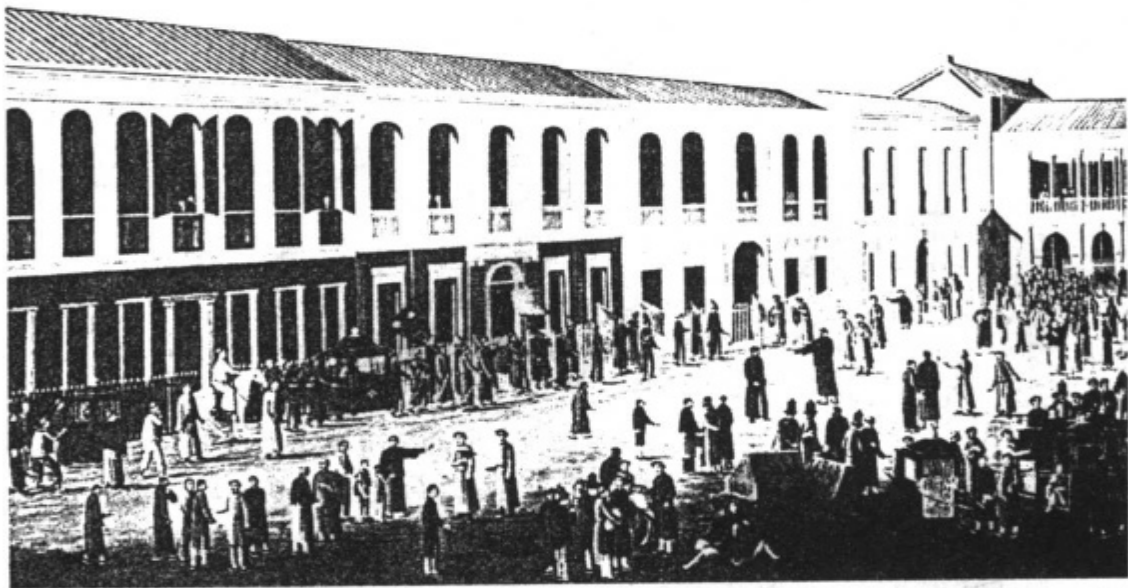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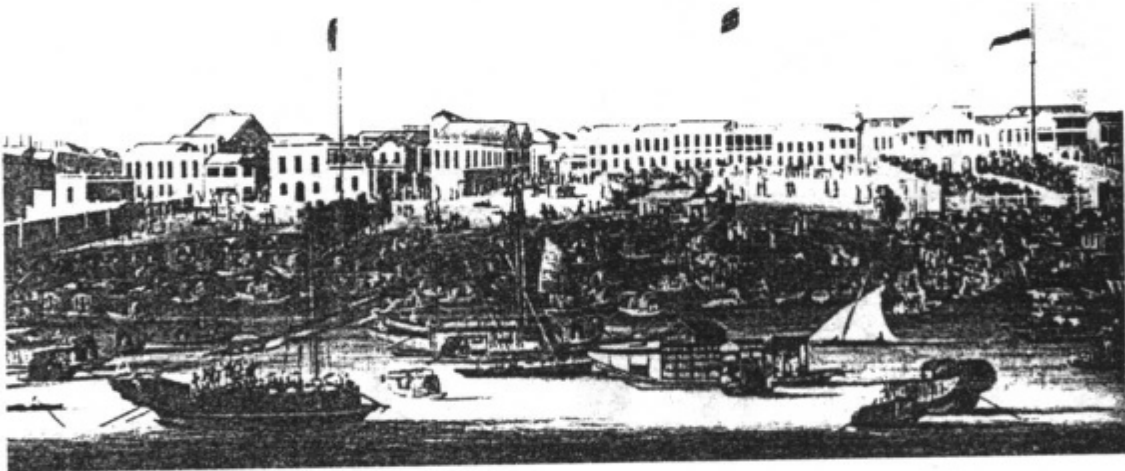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接见马嘎尔尼勋爵漫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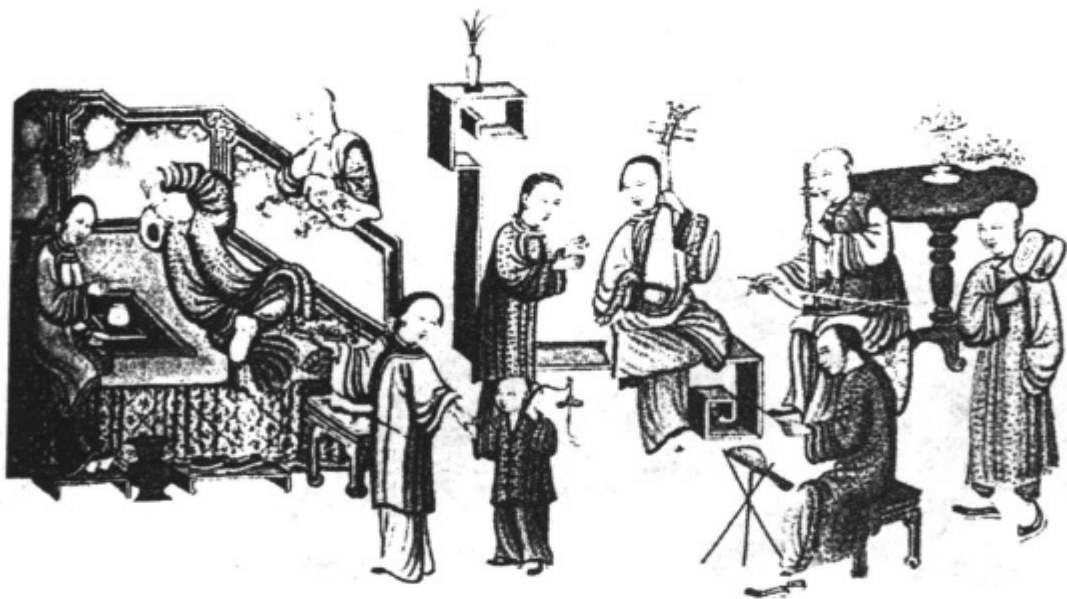
根据 1806 年版的马嘎尔尼日记所作的这次会见的场景。



十八世纪中国风格的绘画。画的正中是形象悠闲的康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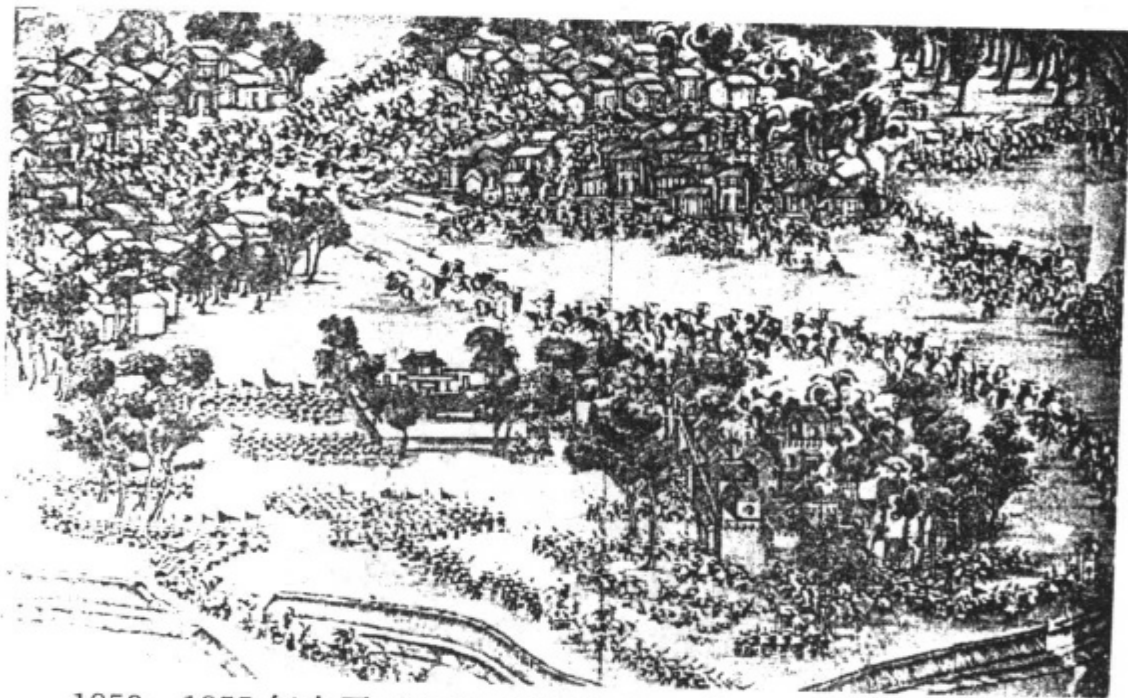
广州的夷馆：西方商人在中国允许其居住的指定地区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画中描述的整个夷馆区于 1841 年的战争中遭到抢掠，次年被烧为灰烬。



“鸦片烟癮者的沉沦”，1860年。选自十二张一组的中国水彩画。

上图：女人、丝竹歌声是沉溺于鸦片烟的第一步。

下图：母亲用藤杖责罚抽鸦片烟的儿子，父亲十分不悦。其妻劈坏鸦片烟杆，孩子十分惊恐。



1853—1855年太平天国北伐战争：1853年秋，太平军进抵天津近郊，距清朝首都北京不到七十里。正如一位当地画家在作品中所描绘的，他们在这里被清军遏止并击退。



清军打败太平军：1854年，清军最终抑制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势头。这幅画充满对曾国藩及其军队的敬意，描述了1854年七月清军的湖南洞庭湖大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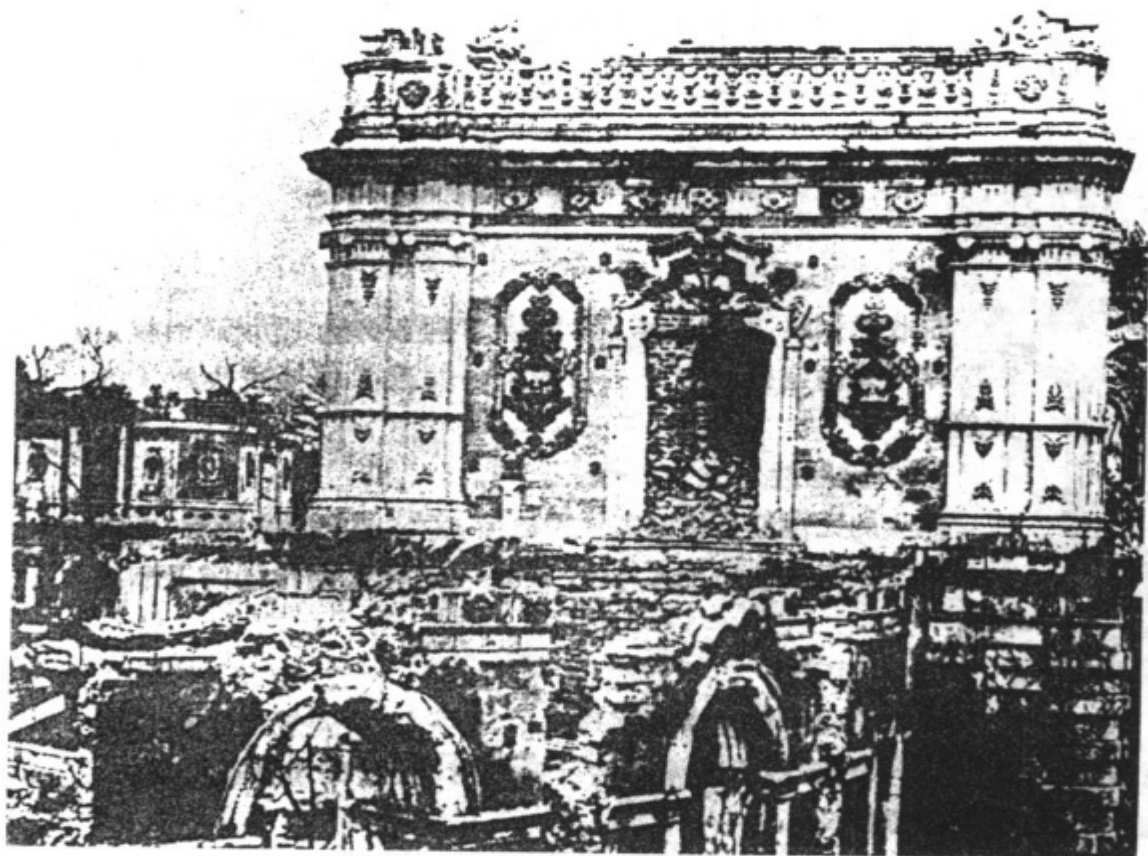
曾国藩：湘军的创立者和平定太平天国的领军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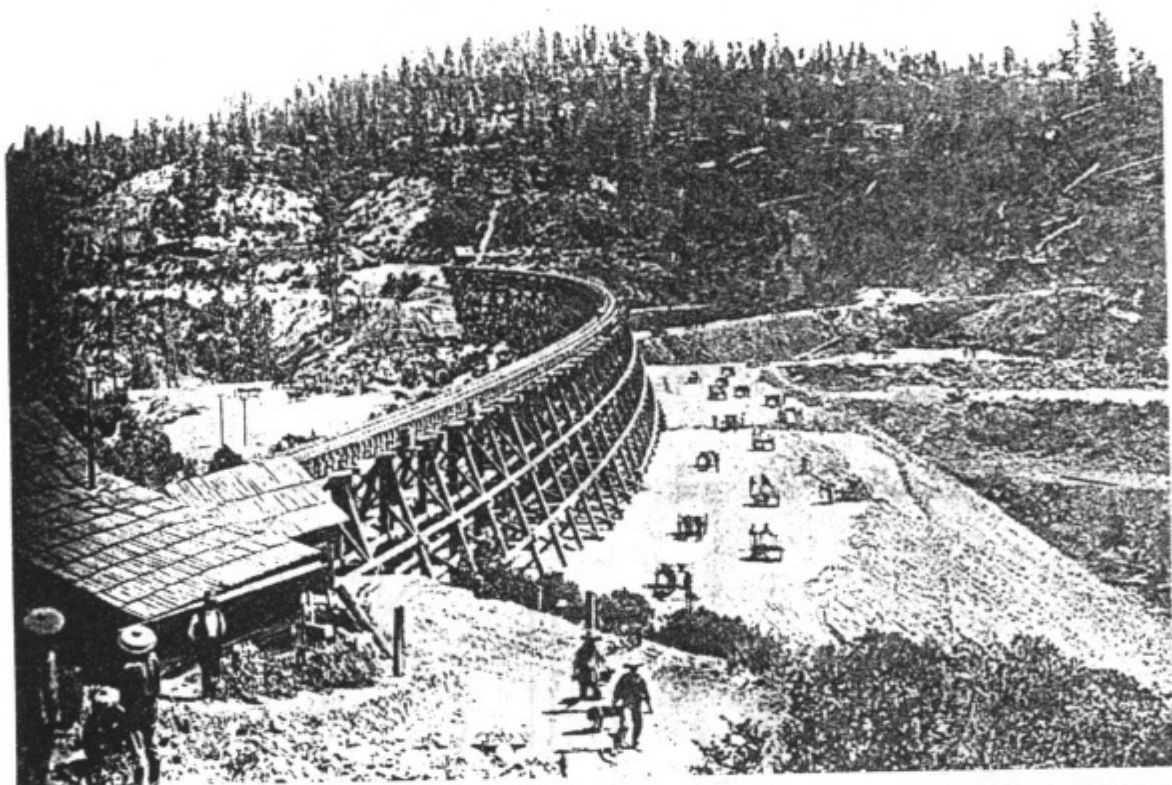
中国“戈登”查尔斯将军，英国炮兵军官，率领常胜军抗击太平天国。



1860年8月的大沽口炮台内景(Fleix Beato 摄):清军在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以后仍在抗击英国的入侵,于1859年在大沽口要塞击退了英国军队,但是次年却向英法联军投降。这是摄于中国的最早的新闻照片。



圆明园废墟(Thomas Childe 1875 摄):1860年10月18日,英军司令额尔金命令他的部队毁坏了由耶稣会建筑师为乾隆设计的夏宫。同一天,清廷宣布投降,并满足了英军要求。



第一波华人向美国移民的巨大浪潮伴随着 1848—1849 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来。数千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到犹他州大铁路最后一段的工地上劳作。

莽乾坤股肱何
 物辨英例身及繫
 覺世事紛紜存此別
 談何容易試說家華金張
 許史列如合能幾還可惜鏡換青梅之淫挽白頭一撮套馳無計
 愛誤人可憐書史一字何也輕記公子憑虛先生希有按證為知且放詩狂辭
 當途慢悅顏氣
 全世一意但慨然一醉
 蘇世
 淮之夫
 方調十二時
 任熊
 賢哲
 矣也



任熊(1820—1857)自画像。

分裂与改革

第二部分



十

九世纪前期，中国的儒士已感觉到了社会所承受的道德和经济压力。他们利用自己所秉承的知识传统，建议实行政治和教育改革，对迅猛增长的人口提出警示，敦促实行财富更公平地分配。有的还指出了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呼吁更多地关注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鸦片吸食的泛滥引起了异常复杂的社会困惑。儒士、官员和皇帝都为使这种药物合法化还是断然禁绝的问题而苦恼。而与此同时，英国大量投资鸦片的产销，鸦片收入在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占据重要份额，使得鸦片贸易成为该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清朝却仍把鸦片视为内政问题，决定禁

烟。英国人则以武力相回应。他们打败了清朝，于1842年强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与外国势力的关系，也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对其土地上的外国人实行有效控制的历史。

外人入侵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导致了国内新的骚乱浪潮。十八世纪晚期反清的暴动就频繁爆发。十九世纪，不断蔓延的社会混乱导致了更大的动荡，到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四起大规模叛乱，至少其中的两起——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能力推翻清王朝。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教义和人人平等的原则，摒弃了儒家思想和中华帝国的价值观。捻军展开新式的游击战，对政府基本的军事体制造成了威胁。还有两起都是回民的叛乱，发生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政府对边远地区非汉民族的控制受到了挑战。一群忠诚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执意维护主流的社会、教育和家庭制度的儒士们指挥了一系列战役，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赢得了巨大胜利的儒士官员却热衷于仿效和接受外国的一些军事技术和国际法，而这将最终破坏他们孜孜维护的神圣的价值观。但是一开始很难预见这些后果，他们以谋求清朝的自强为名，不仅建立了制造武器和轮船的新式工厂，还开设学校，教授外语，聘请外国人在平等基础上征收关税，试图雇佣一支小型西方舰队，设立中国首个职能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

然而，中国人与洋人的关系仍旧紧张。中国连续发生教案，与此相应，美国也发生了排华的暴行，中国移民的浪潮最终被美国单方面实行的一系列禁令挡回。在双方发生的这些事件中，尽管其中出现的个人的努力证明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和平相处、彼此同情和适应，但是对其他民族的文化 and 价值目

标的误解仍然十分严重。

到十九世纪晚期，尽管充满内忧外患，清朝看上去似乎仍可望实现新的整合。但是中国在军事和工业上运用外国技术所取得的成就由于与法国和日本的两场短暂而惨烈的战争的失败而灰飞烟灭，中国颇为自得的“现代”海军也永远葬身海底了。

1898年轰轰烈烈的改革的热潮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胎死腹中，1900年义和团暴动登上舞台，排斥洋人的强烈情绪导致广泛攻击外国传教士及其信徒的行为。拳民们遭到外国军队的镇压，但是唤起了汉人的觉醒，从报纸和宣传册、经济抵制，以及意欲从内部消灭清朝势力的暴动浪潮中传出了汉人反清的民族主义的第一批信号。

清朝集结王朝力量的最后努力就是有可能奏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改革：试行西方模式的立宪政府、按照西方建制从新武装和组织军队、通过发展中央控制的铁路网更有力地掌握中国的经济。然而，这些改革的结果没有带来稳定，而是导致了矛盾和误解。各省设立的谘议局成为抨击清朝和维护地方利益的中心。满人控制的训练有素的强大现代化军队无助于汉人，反而威胁到了汉人推翻清朝，谋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梦想。政府试图利用外国贷款将铁路收归中央，激怒了地方的投资者和爱国者。当这些不满的火苗受到激进的领导者巧妙的煽动，清朝发现自己统治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面对1911年年底爆发的军事叛乱，满人已经束手无策，到1912年他们已别无选择，只能交出权力，宣布清朝寿终正寝。中国的权力中枢出现真空，没有才能卓著的领袖来填补，持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集团一时纷纷登台。清朝覆灭后并没有出现确实而崭新的共和制，而是一段时期的内战和

思想的彷徨无序,对饱经患难的中国人来说,其痛苦并不亚于二百六十八年前明朝灭亡后的那段时期。然而在这动乱的局势中,强国的梦想从未完全泯灭,一些有经国之才的思想家、自强运动者、立宪改革者和革命者们始终为此不懈奋斗。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所留下的积极成果就是不容许中国的伟大走向消亡的思想。

第一章 与西方的首次冲突

1. 中国儒士的回应

甚至在 1799 年乾隆皇帝去世前，儒士们就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王朝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忧外患。注重实证研究传统的考证学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要求弟子们更多地关注现实的需求和政府管理问题，还有一些人开始大胆地思考中国的未来，琢磨能否从儒家传统自身寻求到鼓励变革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考证学派正日益变得枯燥乏味和流于形式，他们在其著作中努力开拓新的政治论题。

对儒士们来说，即使是对清朝统治隐晦的批评也仍然是危险的。一个叫洪亮吉的学者就尝到了这一点。洪亮吉是很多考证学学者的朋友，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四次考进士不中，仍坚持不懈，最后于 1790 年（年届四十四岁时）如愿以偿。他在贵州做了三年学政，这使他得以对遥远的西南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有助于他不断地分析京城的政治派系斗争。在 1790 年代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他讨论了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毫无控制的人口增长，以及它超过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时所带来的困难。洪亮吉还指出了城市里日益增长的奢靡之风，逐渐蔓延的地方政府的腐败，以及镇压白莲教和其他叛乱时出现的问题。这些文章并未受到审查，但 1799 年，当洪亮吉冒险批评刚刚去世的乾隆皇帝和他的宠臣和珅时，很快被判处死刑，

“斩立决”。只是在新皇帝嘉庆(1799—1820年在位)的干预下,才改判流放远在中国西北的不毛之地伊犁。

嘉庆皇帝似乎是认识到了洪亮吉对中国面临的困难所做的切实的观察,一直在调查以和坤及其党羽为核心的腐败网络,并于1800年赦免了洪亮吉。洪亮吉得以在安徽重新过上读书写作的学者生活。洪亮吉于1809年去世,但是他所因以闻名的务实深刻的著述风格被很多学者所继承,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贺长龄。他编修了一部卷帙浩大的清朝政府文书集《皇朝经世文编》。这不只是一部理论著作,而且还收录了清朝早期和当时官员们的优秀文集,内容包括人事考核、俸禄、盗贼、赋税、保甲制度、八旗兵饷、赈荒、盐政、通货、民间宗教,以及洪灾控制等等。贺长龄编修的这部管理国家的纲要借鉴了明朝晚期东林党人陈子龙所修的《皇明经世文编》的模式。这部巨著于1827年彻底完成,很多当时的人读到它时都不由产生朝廷日益颓败的紧迫感。

贺长龄自己并不只是一个经世思想的代表,还是颇有经验和识见的行政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贺长龄精心策划着一项计划,准备放弃日益废败的大运河,从海上将漕粮从中国南方运到北方之时,黑格尔却正在讨论中国拒绝海洋的问题。1826年,根据他的建议,用一千五百艘船只从海路成功运送了九百万斗大米。但是贺长龄的计划不久就被取消,主要是考虑到那些在大运河上运输漕粮者的既有利益。如果海运继续实行,这项计划也许可以带来中国海上商业航行的巨大发展。

其他的学者则为变革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其中之一就是龚自珍,他于1792年出生于浙江美丽的杭州城的一个富裕儒士官僚家庭。龚自珍最初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符合那个时代主流的学者,他接受的是考据研究所需的教育,并对早期“汉学”倡导者

们研究的注疏和经文饶有兴趣。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批评意识使他特别关注《春秋》公羊学。大多数中国史籍都暗含着历史循环论,因而在中国线性“进步”的观念受到排斥,欧洲的批评家们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公羊学却与此不同。公羊学提出一种历史发展三阶段的理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

龚自珍是一个性格复杂,放任不羁的人,这可以与清初文人古怪的行为模式相互呼应:他毫不在意自己的服饰和行为,书法风格狂野,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游,肆意赌博,凌辱长者。他对社会的评论比洪亮吉更为广泛,不仅攻击官员腐败,还涉及诸如叩头等朝廷礼仪,科举考试的陈腐僵化,并抨击司法制度、财富分配不公、妇女缠足、吸食鸦片及与洋人贸易等,藉以强调中国正处于最低的据乱世。

谈到财富的重新分配,龚自珍言辞慷慨。他写道,在远古时期,统治者与臣民犹如盛宴上的宾客,人人都付出,人人都同样分享。但是在商、周时期:“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龚自珍用这个比喻指出中国社会中手持大、小勺子的人们相互攻击,而统治者却试图独享整个汤锅的状况。毫不奇怪,锅中已“涸而踣”,现在将锅中的东西重新公平分配的时候到来了。

有如贫富相轧,富相耀。贫者陆,富者安。贫者日瘠倾,富者日瘠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怒。或以骄汰,或以吝嗇。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①

像龚自珍这样的学者能够将其兴趣从考据研究和新经文的研究再转到对社会的批评,其他学者所走的道路则更为曲折。

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之一的《镜花缘》就写于 1810—1820 年间这一重要时期。它的作者李汝珍是北京一个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学者，他最初的兴趣是音韵学。但是时代的危机使他不仅重新审视哲学世界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且关注两性关系等特别敏感的问题。在其小说中，他描述了一个所有传统的两性角色被彻底改变的世界。在题为“粉面郎缠足受困，长须女玩股垂情”一回中，男人必须过屈辱、痛苦、被压制的生活，他的耳朵用针穿孔，忍受缠足的苦楚，还必须花上几个小时梳妆打扮，取悦女主人。虽然别的中国作家以前也娱乐性地触及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人像李汝珍这样专注地探索，而且清朝男子读到商人林之洋的痛苦经历，确实很少会不对同时代女性所受的磨难不心生一丝同情的：

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头上乌云，用各种头油，业已搽的光鉴；身上每日用香汤熏洗，也都打磨干净；那两道浓眉，也修的弯弯如新月一般；再加朱唇点上广脂，映着一张粉面，满头珠翠，却也窈窕。^②

李汝珍对社会混乱状况的认识在嘉庆朝的学者之中有十分普遍的代表性，他们发现考中科举或谋到差事都不容易。尽管在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读书人日益增多，政府却仍然拒绝增加科举名额，或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如果这些学者没有收入来源，毫不关心改革，没有讽劝的权利，没有艺术才能，那么他们的生活一定郁郁寡欢。沈复就是这样的男人，在 1807 年前后（他四十多岁时）写的一部篇幅不大却十分尖锐的书里，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当时没有前途的读书人的情景。沈复于乾隆朝中期出生于苏州，他体验过多种生活，诸如学者、商人、幕僚等。他的

书恰如其分地取名为《浮生六记》，反映了他漂流于全国寻找襄助，屈从于专横的父亲或各种短期雇主的经历。

沈复的生活并非完全是灰暗的。他甚至远到广州去做生意，在旅途中他目睹了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他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与他相伴了二十三年，直到她去世。他同她分享了审美、闺中和厨房里的欢悦。她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富有想象，性情文雅。她尽其所能聊补家中微薄而不稳定的收入。沈复对他们生活的描写说明，丈夫优越于妻子的观念——法律思想也支持这种优越性——已经成为儒家传统的一个部分，但人们仍然能够拥有亲密互爱的婚姻。然而这对夫妻还是被贫穷和失败击垮了，虽然直到最后沈复仍不明白命运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得快乐些。“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他问道，“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③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却不再酬答这种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

2. 中国政治的回应

除了英国人为了使澳门不落入法国人之手而采取的一些行动外，嘉庆时期中国的外来压力得以暂时缓解。但这全然不像很多汉人和满人所想的那样，并非因为英国的乔治三世收到乾隆 1793 年自以为是的“敕谕”而对中国心怀敬畏。原因是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使英国和法国筋疲力尽，一时无力向东亚扩张，而此时中国也没遇到其他强大的对手。一个世纪以后，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也与此相似，日本乘西方人自顾不暇之机在中国开始实现它拓展疆域的野心，而在十九世纪早期，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也无意问津中国。

然而，在拿破仑滑铁卢失败以后的一年（1815 年），英国东

印度公司就派遣了另一个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来华。阿美士德使团与马嘎尔尼勋爵使团一样想寻求贸易特权,增开港口,在华派驻外交人员等,受到了清朝非常无理的对待。阿美士德被长途跋涉和清朝坚持要他行叩头礼弄得心力交瘁,他在北京一天也没有得到休息,就被强行带去参拜皇上。当他要求多给些时间准备时,先是受到威胁,然后被屈辱地驱逐出中国。

这一情节被英国用来说明清朝不愿与外国人展开合理的交往,事实上,清朝官员也正逐步面临着与西方人交往的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对于广州和两广地区的官员们更是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鸦片贸易的发展,东南的流通货币和积储的丝绸和茶叶数量剧增,这既加剧了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商税和合法的对外贸易的关税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继续得到皇上给予的特权,公行的商人被迫向朝廷和地方官员上供巨额的“捐输”。而他们却一直都缺乏安全保障,很多行商因为向外国公司借贷而债台高筑,或彻底破产,然后被新指定的——常常是很不情愿的——行商取代。公行制度得以长期持续可能是得益于“公所基金”这一互助制度的建立,行商都将贸易利润的百分之十纳入基金,以备危机时期使用。最初这只是行商私下实行,1780年基金得到清朝政府公开支持,并增加了百分之三的进口税。到1810年,从公所基金中上交给清朝政府的每年达一百万两。

随着广州成为重要财政中心之一,学者们也云集至此,学院开始不断开设。1817—1826年在两广任总督的阮元创建了“学海堂”书院。该书院成为著名的学术中心,刊印了很多书籍,包括广州地方历史。阮元较早对清朝的数学家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三十七位生活在中国并继续从事研究的欧洲传教士,这一著作的传播激发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成就的兴趣。阮元坚决反对

鸦片贸易。1821年他逮捕了几名澳门的鸦片贩子,并试图在广州禁止吸食鸦片。

对吸食鸦片问题持强硬或温和的立场成为了中国外交和国内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这场论战开始影响到京城和地方官员派系集团的形成。嘉庆的继任者,1821—1850年在位的道光皇帝似乎心地善良却效率低下。乾隆朝和珅专权,朝政懈怠,嘉庆朝也未能中兴,道光意欲急切地重振朝纲。1800年和1813年嘉庆皇帝严禁鸦片贸易未能奏效,道光试图寻求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到1825年,道光从御史的奏折中得知中国大量白银用来购买西方的鸦片,导致国家经济的衰退。虽然这一现象还主要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但遥远的内地也已能感受到它的影响。白银的短缺意味着它与铜钱比价的升高。因为农民在日常的交换活动中使用铜钱,而向国家缴纳赋税时则用白银。白银的增值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随之而来的将是社会的不安。1834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情况更加恶化。这一举动使所有来华者都可以与中国展开贸易,可以预知,鸦片贸易将进一步增长,欧洲其他地区和美国的商人也将蜂拥而至。世界范围的白银短缺使外国人购买中国的商品时改用其他的不太常用的货币,更加剧了中国的危机。^④1820年代,每年大约有两百万两白银流出中国,到1830年代,每年增至九百万两。乾隆时期,一贯铜钱大约等于一两白银;嘉庆时期山东省一贯五百文铜钱等于一两白银,而道光时为二贯七百文等于一两白银。

1834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后,英国政府的第一位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来到广州,又引起一些新的矛盾。律劳卑拒绝这种将公行商人介乎其间的关系,希望能直接与两

广总督交涉。清政府的回答是：“天朝疆吏不得与外夷通送书信。”^⑤律劳卑命令其舰队从虎门开向广州，只是因为他死于热病才避免了严重冲突的爆发。与此同时，鸦片进口继续增长，1835年超过了三万箱，1838年达四万箱。

1836年道光皇帝就鸦片问题垂询大臣，大臣们众说纷纭。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大臣指出，这可以消除官员的贪污腐败、强取豪夺，还可从关税中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且主张允许国内种植鸦片——相信其质量不会亚于印度鸦片而价格比市价更便宜——逐渐排挤外国鸦片。然而，很多大臣认为这种主张是有害的。他们指出，洋人冷酷贪婪，中国人并不需要鸦片，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他们认为废弛已久的嘉庆皇帝的禁烟政策应该更严厉地施行。

1838年，道光皇帝在考虑了群臣言论后作出决定：鸦片贸易必须停止。为了保障其诏令的推行，他选任了五十四岁的福建籍官员林则徐，令他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从理论上说，这一任命是不错的。林则徐是1811年的进士，曾任职于翰林院——朝廷中很有声望的儒学研究机构——而且在云南、江苏、陕西以及山东等省任职。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曾采取过有力的禁烟行动。他的密友之一就是直言不讳的学者龚自珍，他在给林则徐的一封信中写道，所有的吸食者都应该扼死，而贩易和生产者也应斩首。林则徐于1839年初抵达广州，他没有落脚于已被阮元的后继者们弄成了讨论鸦片贸易合法化好处的中心的学海书院，而是下榻在与学海书院对立，其成员都主张严厉压制鸦片贸易的另一书院。

为了禁止鸦片，林钦差（正如西方人对他的称呼）试图动员所有儒家的传统力量和价值观。在公告中，他强调指出了吸食鸦片对健康的危害，下令所有的吸食者在两个月内将鸦片和烟

枪上交衙门。学官们受命彻底检查生员是否吸食鸦片，所有的吸食者都将受到处罚，其余的人编成五人互保的小组——像保甲制度一样——保证小组中无人吸食鸦片。林则徐还巧妙地利用科举考试制度，集中六百多位当地学生，组成一特殊的群体。除了考问传统的儒家经典的有关问题外，还问及传播鸦片者的姓名及停止贸易的办法。陆军和水师的士兵也成立了类似的群体。林则徐还动员当地的士绅，更广泛地组织保甲制度，询查本社区的吸食者。到 1839 年 5 月中旬，已逮捕了一千六百名中国人，收缴了三万五千磅鸦片和四万三千具烟枪，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林则徐的军队又收缴了超过一万五千磅鸦片和两万七千五百具烟枪。

对于洋人，林则徐晓之以理，既进行道德规劝，也采取高压手段，从他自己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政策导致武装冲突。他首先从行商入手，3 月份他私下接见了行商们。林则徐斥责他们，人人都知道英商查顿和因义士就是鸦片贩子，却错误地为其出具保结，担保他们不是鸦片贩子。他命令行商向洋人传达他的旨意，交出他们贮藏在伶仃岛上的数千箱鸦片，并签订保证书，以后不再贩易鸦片。广州的外国居民还被告知列出他们拥有的武器的清单。林则徐并不想轻率地凭借微弱的水师赶走外国船只，但他意识到，他可以给当地的外国居民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服从管理。

林则徐还试图劝说洋人，敦促他们从事合法的茶叶、丝绸和大黄（他相信这对洋人的健康十分重要）贸易，不要从事有害于中国人的活动。林则徐与两广总督密切合作，两广总督乐观地告诉西方人，吸食者都已戒除，贩易者已经驱散，已不再有对鸦片的需求，鸦片贸易也已无利可图。林则徐在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措辞严谨的信中，试图唤起她的道德责任感：“闻贵国禁

食鸦片甚严,是明知鸦片之害也……设使别国有人贩售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痛绝之也。”^⑥事实上鸦片在英国并未受到禁止,通常被一些社会名流做成鸦片酊。很多英国人认为鸦片比酒的危害还要小,林则徐的道德劝告也只能是对牛弹琴了。

虽然惊慌失措的行商请求外商服从朝廷命令,但外商先是借口他们是受人委托存贮鸦片,无权将其上交,接着象征性地交出一千箱。林则徐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为首的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外国商馆拒绝将颠地交出接受审判。1839年3月24日,林则徐下令公行彻底停止与外国的贸易,命令所有中国职员和佣人辞去洋人的雇佣,三百五十名在广州的外国人(包括英国政府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都被困在商馆里。虽然仍给洋人提供食物和水,其他一些商品也被走私进来,但围困仍令人精神崩溃,中国军队彻夜不停的锣鼓和号角声更难以忍受。六周以后,洋人同意交出两万箱鸦片,林钦差接收后解除了封锁,十六名外国人获准离开。

林则徐对洋人向中国移交鸦片的管理十分谨慎,他甚至4月和5月一直生活在船上,就近监督移交行动,防止欺诈和盗窃。现在他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销毁近三百万磅生鸦片。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挖三条七英尺深、一百五十英尺长的壕沟。然后在六十名官员监管下,用五百名丁壮剖开鸦片球,用水、盐和石灰搅拌,直到鸦片溶解。然后在中外围观者众目睽睽之下使这些黑乎乎的混合物流进港湾,汇入大海。

在特意为南海神写的祭文中,林则徐祈望,“谁知毒姿鸩泉,渐致蛮烟之成市”,“本涤瑕而荡秽,资激浊以扬清”。他就向大海倾倒毒物一事向海神致歉,他在日记中写道,“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关于经历了商馆的禁闭又目睹了销烟过程的外

国人，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奏折中写道：“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⑦

3. 英国人的武力反击

钦差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是尽职勤奋，且已将儒家等级观念和统治手段内化于心的人。他们似乎相信广州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天性淳朴，对其坚持进行道德训诫就能奏效。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还没有将鸦片冲进大海以前，一位中国官员就指出，林则徐并未真正解决鸦片问题，这只不过是一次示威行动。一位英国鸦片贩子回忆自己被封锁的经历，只是平淡地给朋友写道，封锁商馆“幸可作为我们提出赔偿的理由”。^⑧

中英之间战争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长。一些较大的原因已经作了论述：清朝社会的失序，吸食鸦片的蔓延，对外国人的日益不满，外国人拒绝接受中国法律，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崇拜的消失。另一些原因则与林则徐的谈判密切相关，还有一些他所不理解的其他因素。其中之一与 1836—1838 年间清朝朝廷上的争论有关，就是外国商人相信吸食鸦片在中国将会合法化。结果，他们存贮了大量的鸦片，并增加向印度种植者的订货。当 1838 年严厉的禁烟开始时，市场萎缩，商人们发现自己面临了囤积难售的危险。

第二个因素就是新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是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而不再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如果中国人反对改换总监督，他们也就是侵犯了英国，而非一个贸易公司，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区别。而商务总监督也缺乏约束英国商人的权力，更不能控制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商人。然而，在危急时候他可以

直接寻求英国军队和皇家海军的帮助。

就英国方面来说,前述两个因素的综合产生了第三个因素:英国的鸦片贩子将大量囤积难售的鸦片交给继律劳卑任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义律又将鸦片交给林则徐。因而商人们丝毫不为鸦片倾倒入海而感到羞耻,反而希望藉此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财政补偿。

中国发生的事态受到英国的密切关注。1839年初夏,义律就写信到伦敦求援,外交大臣巴麦尊爵士最初并不同情不遵守中国法律的英国商人,现在也倾向于他们的利益了。巴麦尊在“致中国钦命宰相书”中写道,他十分惊讶地听说中国官员以“暴力伤害广州的英国臣民,而这些英国臣民却是平和地住在广州城内,信赖中国政府的善意。虽然女皇陛下不会宽赦贩卖鸦片的行为,但她绝不容许海外的英国臣民遭到暴力相向,受到侮辱与不公平的待遇”。^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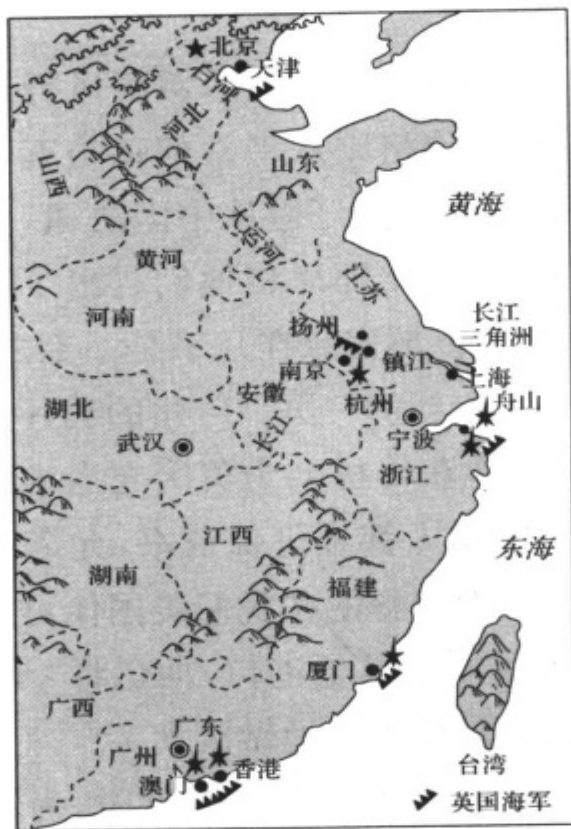
当封锁商馆和收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中国有巨大的贸易和商业利益的商人大力游说,敦促国会采取报复行动。腰缠万贯的鸦片贩子查顿甚至从中国赶回英国,加入呼吁的行列,以使新教传教团从道德上对鸦片贸易的抨击不会赢得广泛的影响。在华的商人们筹集了两万元供查顿回国游说之用,并允诺如果需要还可以给予更多的支持。“因为目的是如此重要,花再多的钱也是必要和值得的”。还有人告诉他,“如有必要,不妨付出高价,借助几家大报加以鼓吹”。然而英国国会并未向中国宣战,只是授权派遣一支舰队,并动员远在印度的军队,以期“获得满意答复并得到赔偿”,如果必要,就“扣押中国的船只和货物”。^⑩整支军队由义律的堂兄懿律率领,包括十六艘共装载了五百四十门大炮的军舰,四艘新式的武装蒸汽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四千名士兵,还有蒸汽轮船用的三千吨煤和饮用的一万

六千加仑酒。

此时林则徐仍在广州肃清鸦片，雷厉风行地逮捕和调查吸食者和鸦片贩，鸦片的价格则从平常的每箱五百元涨到了每箱三千元。当英国商人拒绝签订遵从中国法律，不再贩卖鸦片的保证书时，林则徐像在广州那样将他们赶出了澳门。迫于林则徐的驱逐令，义律将其下属安顿在几乎是不毛之地的香港岛，这一举动翻开了东亚历史新的一页。广州的鸦片贸易并未风平浪静，美国人非常高兴地获得机会为英国充当中间人，谋取利益。美国领事德拉诺让美国人都签订保证书，允诺不触犯中国的法律。正如一个美国商人解释的：“我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补偿损失。”即使中国人关闭了其他港口，他仍将“步步后撤，但是我只要寻求到贸易对象就要不停地做买卖。”^①

林则徐开始在进入广州的水路上设防，为炮台购置新的大炮，用巨大的铁链封锁航道，着手编练军队，但是贸易却仍在继续。撤退到香港的英国人遭到当地中国人的袭扰，他们在井里下毒，拒绝给外国人出售食物。1839年9月和10月，在香港和广州外边的虎门，英国人和中国人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中国数艘船只被沉没，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也丧失了。由于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英国水手在九龙杀了一个中国村民，义律拒绝交出凶犯由中国法庭审判，林则徐甚至动员本地乡勇反击英国人，这对于通常十分警惕民众示威的中国官员来说确实是令人惊诧的行动。一份布告中写道：“群策群力，购买器械，聚合壮丁，以便自卫。”^②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队全部抵达广州港外。令林则徐懊恼的是，英国人并未攻击他新设的防御工事，而是只留下四艘舰只封锁广州港的入口，其余的则继续北行。7月，英国人用两艘船封锁了宁波港，并占领了浙江沿海的舟山岛的主要



鸦片战争示意图(1839—1842)

城镇,从这里阻断了扬子江地区的交通。英国人在舟山留下一支戍守的部队和一名传教士翻译取代已经自杀的当地知县,舰队一路无阻地航行到守卫天津城的大沽炮台附近的白河河口。1840年8月和9月英国人在这里开始与直隶总督、深受道光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满人耆善谈判。上任刚刚一年的林则徐因为处置失当,被解职流放伊犁。

1841年1月,耆善与英国人达成协议,他放弃香港,同意赔款六百万元,*允许英国人直接与清朝政府交往,并在十天内重新向其开放广州港。道光皇帝听到奏报,怒不可遏,下令将耆善免职,处以死刑,后来改判流放。

* 墨西哥银币已经在中国作为通货广泛流通。中国人自己仍用银锭,而非银元。

巴麦尊爵士因未从中国得到更优厚的条件，也同样对义律大为恼火。在1841年4月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私人信件里，他解除了义律的职务，拒绝批准协议，指责前任商务总监督：“阁下违背、怠忽所收到之训令。阁下已被解除一切的权力与兵权；阁下已无须再接受任何低于训令所要求的条件。”巴麦尊对义律放弃舟山，不坚持赔偿销毁的鸦片，仅仅得到了几乎连一间房子也没有的不毛之地香港岛特别恼怒。新的全权大使璞鼎查受命处理中国事务。巴麦尊在最后给璞鼎查的指示中坚持新的条约必须与皇帝本人签署：“女皇陛下的政府不容许在英、中的和解过程中，中国人以不合理的举措取代了人类的合理做法。”^⑬

1841年8月璞鼎查带着这些新的指示来到中国，却发现局势已一触即发。广州城外的乡村重新爆发了战斗，很多是由当地士绅领导的民众武装发起的，英国军队遭受了伤亡。英国则摧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船只，将一些滨水地区夷为平地，占领了广州的部分地区。虽然在广州官员支付了六百万元后，英国人撤出了广州，但并未商定这笔钱是使广州免受洗劫的赎金，还是义律与耆善商定的赔款，抑或是两年前被销毁的鸦片的补偿。

1841年8月底，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占领了厦门和宁波，并再次占领了舟山。当1842年春，从印度派来的增援部队赶到时，璞鼎查发动了战争，切断了中国主要河流和水道的交通线，迫使清政府投降。英国人于6月占领上海，7月占领镇江。面对这些“夷人”，八旗兵也开始绝望了。战败之时很多清朝官员举家自尽。大运河和长江下游的交通被切断了。璞鼎查不顾清政府会谈的请求，推进到明朝的故都南京，于8月5日在城外占领了攻击地形。清政府立即请求和谈。8月29日，由一些满族大臣和两江总督出面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道光皇

帝接受了这一条约,10月底维多利亚女王也批准了条约。

在评说这一条约及其附约以前,有必要强调 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是重要的历史性的标志。它不仅是清朝遭受的最决定性的逆转,也是西方军事技术和战术的革新。正如英国舰艇“复仇女神号”在战争中所显示的那样,威力强大的蒸汽动力舰艇在海战中的出现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复仇女神号”是不用铜包裹的明轮铁壳船,利用风力及烧木材和煤块的六座锅炉为动力,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海域时速也能达到七至八节。该船吃水仅五英尺,在任何风力和潮汐状况下都可以在沿海浅水区域航行。在广州虎门之战中,“复仇女神号”游弋在浅水区发射葡萄弹和重磅炮弹,运送军队,在风平浪静时拖拽船只。在上海战斗中,这艘船炮轰城市、将英军士兵直接运送到码头。这场战争结束前,一批同样设计的新蒸汽船就被送到中国海域,英国人只要有足够的燃料储备,就能保证其令人敬畏的威力。

然而清朝并非只是西方技术和火力的被动目标。林钦差在广州时就委托一些学者为他收集西方国家的信息,在广州和新加坡精选外国出版物。他还请美国传教士为他翻译国际法的一些主要章节。随着战争进行到 1842 年,英国人发现很多证据表明,清朝政府官员正试图对西方的新技术作出反应。例如在厦门,他们发现了一艘仿照英国双层甲板、装备了三十门大炮的战舰,几乎准备航行了,而其他几艘相似的舰只也在建造中。在吴淞,他们发现了五艘装备有黄铜大炮的中国新造的明轮船。在上海,他们缴获了十六门制造精美的崭新的十八磅重火枪,枪身上有准星和燧石装置。所有这些火枪被装配在有铁轮的木车上。^④中国还是有一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夷的进攻既是奇耻大辱,也未尝不是一种刺激。

4. 新的条约体制

《南京条约》于1842年8月29日在泊于长江的英国舰艇“皋华丽号”上签订,十个月后,经维多利亚女王和道光皇帝批准,在香港换文生效。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条约。条约包括十二条主要条款,给中国的商业和社会观念带来了显著变化:

第一条,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第二条,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第三,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第四,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道光十九年英人在广州交出的鸦片)原价。

第五,凡英国商民,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第六,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元,大皇帝

准为补偿。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第七，以上酌定银数，共两千一百百万元……（此时至一八四五年四年内交清），但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一百元应加息五元。

第八，凡系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释放。

第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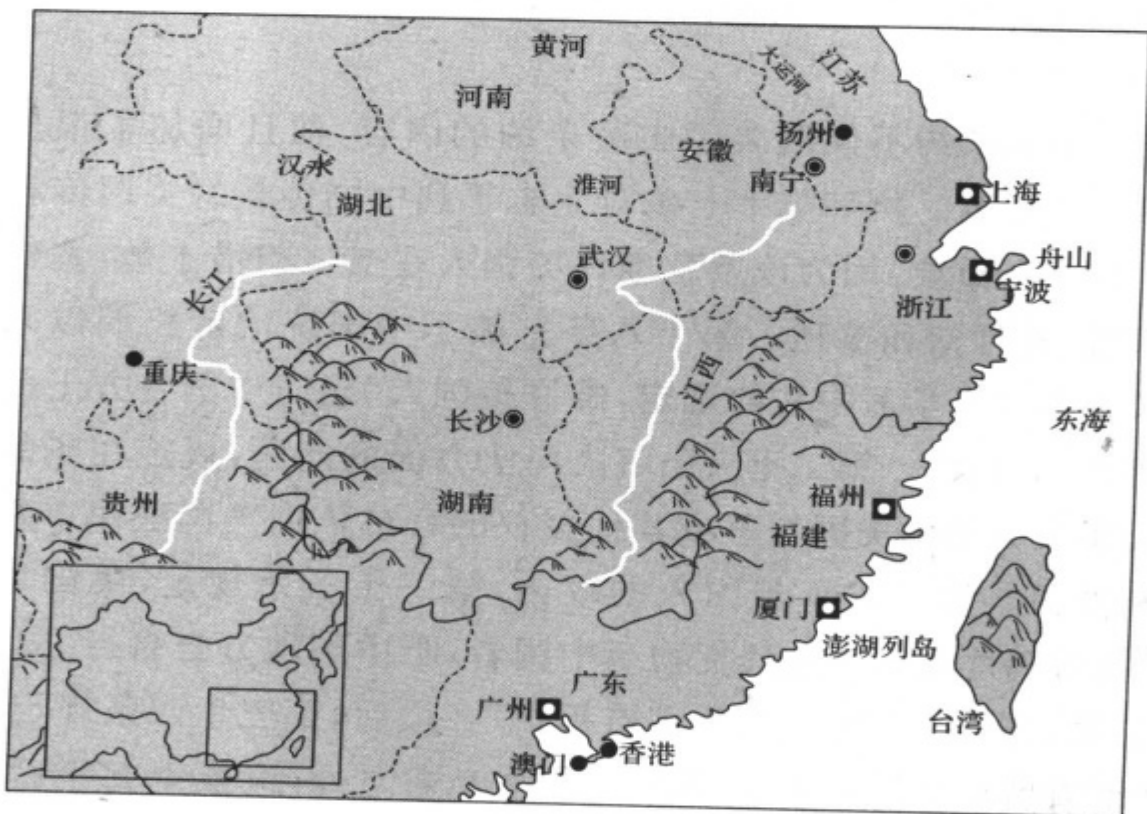
第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餉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第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

第十二，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元交清，英国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

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⑮

除了规定为 1839 年销毁的鸦片赔偿六百万外,条约对鸦片问题只字未提。



1842 年通商口岸示意图

1843 年签订的附约规定了茶叶、丝绸、棉花、羊毛、象牙、金属制品及洋酒等货物的关税,也未提及鸦片问题。在随后签订的关于五口管理和保护外人贸易的复杂程序中再一次对鸦片问题避而不谈。在与满人大臣、谈判代表耆英的私人谈话中,璞鼎查提到,英国希望中国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以结束白银外流的状况。耆英回答自己不敢决定这一问题,璞鼎查说他也受命不强逼这件事。

其他国家纷纷对《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条款进行认真研究。1843 年美国总统一约翰·泰勒出于美国的利益和对华贸易

的巨大利润,派遣顾盛为全权代表到中国。顾盛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很多有对华贸易利益的富商都居住在该州。顾盛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谈判。尽管因为一位试图袭击美国人的中国人之死一度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顾盛和耆英还是很快在澳门附近的小村庄望厦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条约不仅沿袭了中英条约的内容,而且增加了很多重要的条款。例如第十七条对立志于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将十分重要,因为该条款准许美国人在五口租借土地,修建医院、礼拜堂和墓地。第十八条打破了中国统治者长期以来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规定,准许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教习语言”。第二十一条解决司法方面的问题,规定在华的美国人只能由美国领事或其他授权的官员依据美国法律审判和处罚。为了防止英国人的攻击,第三十三条规定,美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最后,第三十四条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⑩

1844年10月,法国人以中、美条约为范本,也与中国签订了条约。在中美条约基础上增加的内容主要有,如果法国人遇到问题之时,该地又没有法国领事,法国公民可以请求其他友好国家的领事处理;重申了治外法权——在中国领土上犯罪者依据本国法律判处——比顾盛签订的条款更有过之。屈从于法国人的压力,耆英奏请皇帝颁布了完全容忍天主教的传教,改变了雍正禁止传教的诏令,在1845年签订的一个附约中,耆英又给新教以同样的权力。

至此,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之后的六年之内,清朝就由将

所有外来者拒之门外演变到丧失了中国商业、社会及外交政策等控制权。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之后，一大群列强纷纷效尤。英国无须担心其他国家交涉的结果，因为中国人给予他国任何新的权利英国也一体同享。在 1843 年签订的附约中，体现了英国人用心良苦的第八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清朝政府接受这一条款是相信其可以缓解外来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条款使中国无法结成联盟，利用一国对抗另一国，严重地妨碍了自己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商业效果却使英国人和大多数外国商人大失所望。虽然五个通商口岸是精心选择的，但福州和宁波的贸易增长十分缓慢，以至于有人谈到将其换成前景更为看好的城市。到 1850 年，只有十九个外国人住在宁波，而福州只有十个，且其中五个是传教士。厦门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这里的贸易历来就是与台湾和菲律宾展开，很难适应欧洲和美国的需要。只有当英国船只开始运送苦力到古巴从事甘蔗种植，才从贩运人口中获得了一些财富。

公行的垄断一旦废除，贸易的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广州展现出巨大的商机，但是当地人十分反感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西方人发现在这个城市建立居住区，进行贸易，或开设领事馆都是不可能的。1840 年代和 1850 年代初，充满着暴力事件，乡村民团和城市暴徒袭击英国人，而英国人也以牙还牙，陷入恶性循环。清政府再也无法承受广州人与朝廷心理上进一步的疏离，因而对反英的暴力事件采取姑息的态度。

在五个通商口岸中只有上海将沼泽地区和无人居住的乡村划给英国、法国和其他外国人居住，从而成为一个繁荣的城镇。到 1850 年，随着这些土地排干，河堤修造，已有一百多名外国人

在此居住，有领事馆官员、五名医生和十七名传教士，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家眷。1844年有四十四艘外国船只进入该港，1849年增至一百三十三艘，1855年达到四百三十七艘。到1850年代中期，丝绸贸易已迅猛增长到二千多万元。鸦片贸易虽然仍旧是违法的，但还是以每年两万箱的速度发展。

清政府对新的条约口岸的态度暧昧不清。在耆英看来，这也是朝中很多人的观点，洋人首要的目的就是满足商业上的贪欲，如果他们的贸易得以进行，或许就不会再提别的要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对于治外法权这样的让步也在所不惜。耆英和道光皇帝也许在名义上都是因循先例，即清朝于1830年代对中亚外交政策上的处理办法。例如，1835年清朝准许有侵略野心的浩罕汗在喀什派驻一个政治代表，其商业居民可以在叶尔羌和其他重要的商贸城市居住。这名政治代表既有领事之职，又对阿尔提沙地区的其他外国人拥有司法权，以及其他外国人带到这一地区的货物征收关税的权力。而且清政府同意回民只须缴纳非回民税率的一半（即只缴纳百分之五税率中的一半），从阿尔提沙地区出口到浩罕的货物则免除关税。清政府作出这些让步绝非放弃主权，而事实上是以这样简单省力的方式防止浩罕汗获得更多贸易特权的无厌而骄横的需求。参与这次谈判的几位清朝大臣——或曾与浩罕作战的著名将领——于1830年代和1840年代初被派往东南沿海任职，说明实际上清朝在东南边疆和西部边疆的政策正力图保持连续性。^⑭

正如他对中亚那些难以驾驭的大汗所做的那样，《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耆英也不断对璞鼎查示好：他表示要收璞鼎查的儿子为义子，交换各种纪念品（包括他们妻子的照片），并亲手将糖果喂进这位满脸惊愕的商务总监督口中，还

用中文自创一个新词“因地米特”(intimate),以表示他坚持璞鼎查是他“亲密”的朋友。但是耆英给道光皇帝说,这是他自己绥服英夷的办法。他不会与他们争夺虚名,而将弃小节来取大谋。^⑧这一分析的问题在于,对英国和其他列强而言这些辛苦赢来的条约远非虚名而已,它们是国际关系和商业贸易的产物和凭据。耆英和道光皇帝事后知道了这些,均难以接受,这并不奇怪。对于清朝而言,眼前最重要的大谋就是谋求国运的存续。对于中国的当政者,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使外交政策问题显得边缘化了。

注释：

- ① 鲍吾刚(Wolfgang Bauer)著,肖(Michael Shaw)译:《中国与幸福的寻求》,纽约1976年版,第257页。
- ② 李汝珍著,林太乙译:《镜花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13页。
- ③ 沈复著,普雷特(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译者注:Chiang Su-hui音译)译:《浮生六记》,纽约1983年版,第73页。另,林语堂译文载《天下月刊》1935年1月,第316页。
- ④ 最近的两篇论文对以前公认的关于白银和行商的观点重新审视:林满红(Lin Man-houng):《货币与社会:中国十九世纪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哈佛1989年版、陈国栋(Chen Kuo-tung):《中国行商的破产,1760—1843》,耶鲁1989年版。
- ⑤ 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一卷,上海1910年版,第126页。
- ⑥ 张馨保(Chang Hsin-pao):《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135页。
- ⑦ 韦利(Arthur Waley):《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伦敦1958年版,第44、46、49页。
- ⑧ 前引韦利著第47页。引文参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160页。
- ⑨ 马士(Morse)著,第622页。
- ⑩ 前引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191页,马士(Morse)著,第253页。
- ⑪ 前引张馨保(Chang Hsin-pao)著,第206—207页。
- ⑫ 马士(Morse)著,第241页。
- ⑬ 前引马士(Morse)著,第661—662页。
- ⑭ “复仇女神号”和中国仿制西方船只的历史详见格雷厄姆(Gerald Graham)的《中国军港:战争与外交,1830—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183、215—218页。
- ⑮ 《南京条约》全文转引自赫斯雷特(Godfrey Hertslet):《英国与中国、中

国与外国列强条约集》(两卷),第一卷,伦敦 1908 年版,第 7—12 页。

- ⑩ 前引马士(Morse)著,第 330 页关于望厦条约的论述。
- ⑪ 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清朝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统治的全盛时期》,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卷,剑桥 1978 年版,第 377—383 页。
- ⑫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13 页。

第二章 内部危机

1. 南北社会的动荡

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失败成为导致中国国内动荡的原因之一。动荡局面的形成还包括前述很多方面的原因：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白银的外流，知识精英谋取一官半职的艰难，鸦片吸食的泛滥，八旗作战能力的衰减，和珅及其党羽引起的官僚机构的道德败坏，白莲教的屡败屡兴带来的广泛社会灾难。

十八世纪末业已显现的其他弊端在十九世纪初进一步恶化。管理黄河大堤和运河的庞大官僚机构腐败无能，虚职冗员日益增长，国家下拨的治理经费被中饱私囊。结果大运河淤塞阻梗，大运河无法利用黄河和淮河调节水位，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政府南粮北调的机制。运河机制的败坏给运河沿线靠拉纤为生的民工带来了困境，很多人结成秘密组织，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生计，同时也在当地横行霸道。

国家庞大的盐政系统也日渐瘫痪。从制度上说，食盐的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清政府管理海盐、井盐和池盐等食盐的生产，然后批发给特许商人。由这些商人将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体制中的效率低下和腐败已使私盐泛滥，侵蚀着复杂的盐政系统。这些经济和组织问题加剧了后和珅时代官僚机构的派系纷争，他们争权夺利，拉帮结派。很多朝

中的大臣开始在官僚机构中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肆意掠夺公共资源，占为己有。

十九世纪初由地方士绅和地主领导的准军事组织和团练武装迅速增加，试图以此保护社区免受白莲教乱军、无业绝望之徒、江河湖海的海盗等的侵害。还有的地区，地方领袖们通过传播深奥的宗教组织秘密社会，以便在国家无能为力之时起而自卫。

可以说，在中国，私人利益正日益蚕食着政府领域，帝国的体制再也无力主张以前的权势。1799—1820年在位的嘉庆皇帝只是依赖花言巧语而非特有的政策廓清帝国。他关于裁减官僚机构的言辞是如此深切，而用度几乎没有减损。虽然和珅任人唯亲的现象得到了清理，但其他的大臣又结成林立的派系。嘉庆和他的儿子道光（1821—1850年在位）都任用了固守儒家基本观念的大臣，而这些大臣对于危害朝廷的众多的内忧外患却缄口无言。道光朝末期，一系列大规模的暴乱开始了，暴乱持续了二十三年，几乎倾覆了清朝统治。

但是正如对这些暴乱应该在中国外交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它们同时也必须被视为从白莲教开始及随后中国南北爆发的程度稍逊而仍有显著影响的一系列危机积累而成的顶峰阶段。十九世纪初中国北方的一次暴乱是1813年由林清领导的。林清生于1770年，他早年的生活可算是清朝社会中无所依恃、徘徊在城市贫困线上者的代表。林清的父亲是北京的一个小吏，他受过教育，在中药铺当过学徒，但只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解雇了，然后当了一名守夜人。父亲死后，林清设法接替了父亲的差事，却挪用了放在他的官署中的运河经费，拿来开了一个茶叶铺。林清在赌博中输光了茶铺的产业，北上来到东北，在那儿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工。生性不安的他又南下苏州，先是

在官仓做事,后又在县衙做低级职员。接着他又转而北上,在运河上拉纤做苦力赚了些钱。回到北京附近的家乡,做起了售卖鸣禽的生意。

对世界略有些了解的林清加入了千禧佛教,学会了一些神秘的咒语。“每日东方发白,朝礼太阳,诵念真经”,他告诉他早期的追随者之一、一个旅馆的小二:“如此得以消除火、水、兵等灾噩。倘遇凶年、天灾,更可趁势开创家业。”^①林清以此鼓动了数以百计的当地村民、大量穷困潦倒的旗人、奴仆,以及宫中的宦官。他的侄子后来告诉清朝官员,他“口能舌辩,人都说他不过要人银钱,说是种福,将来一倍还十倍,就信了他,给他的钱,我也从没有见他还过”。^②有一些承诺十分离奇:交给林清一百文铜钱,将来神教胜利了可以得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大约相当于十六英亩,对于贫困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不菲的回报)。

林清与其他几支首领结盟,使自己力量更为壮大,他开始将自己说成是未来佛,即弥勒,受无生老母派遣,拯救信徒逃脱即将到来的“劫”,即人类历史新的大循环。林清的信徒诵念的口诀显示反清的色彩日益浓重:“单等北水归汉帝,天地乾坤只一传。”^③到1813年,林清计划进军北京,杀死嘉庆皇帝。

正在此时,他的计划开始败露:山东一个心起疑虑的生员及担心儿子卷入非法教派的两位父亲向官府举报。夏季里官府逮捕了一些信徒,严加拷问,也发生了一些零星而激烈的冲突。1813年末,一群林清的信徒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皇宫的袭击,结果全军覆没。或许是命中注定,在“暴动”期间林清仍呆在乡村的家里,当地捕吏在家中将其抓获。嘉庆皇帝对这位想杀死他的无名之辈十分好奇,将其提来亲自审问。林清缄口不言,结果被凌迟处死。他的首级在河南示众,以警告仍在那里作乱的信徒。

因为林清的叛乱发生在京城附近,而且目标是皇帝,所以其生平和反叛事迹记载甚详。但是林清积聚信徒和钱财,传播的不满情绪,鲜明的宗教宣传成为华北以后数十年间很多反叛集团的样板。这些集团虽有可能演变成叛乱,假若没有杰出领袖的感召,或不寻常的天灾,它通常还处于是和平的、半合法化的状态。

中国南方也有不满情绪在慢慢孕育着,但是其方式有所不同。这里的主要势力是三合会,也称天地会,通过歃血盟誓、宗教仪式和结拜金兰等方式组织会众。三合会于十八世纪后期——虽然据称其势力的发端要更早——在台湾和福建发展起来,然后两广也形成强大势力。早期的三合会成员很多似乎是在海上谋生的水手,或是在南方纵横交错的水道上讨生活的船工,还有一些是城市的贫民。他们常常做些不法的事——勒索、抢劫和绑架——这些行为又受到县府衙门里的会众的庇护。到1830年代,三合会又吸纳了大量农民,或许因为中国南方通常是强大的宗族势力控制着整个村庄,而三合会为那些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提供了另一种保护和组织的方式。妇女也常被吸纳入三合会,正如她们加入白莲教一样,可以得到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权利和地位。根据一些记载,比丈夫先加入三合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可能优越于丈夫。有些妇女则是瞒着丈夫加入的。

三合会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他们反清的态度也许源于对清政府在广州对付洋人上的无能,以及广州城多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不满。这些压力又使清政府很难对国内民众中的潜在反叛采取激烈的行动。因为更多的反叛集团集中在诸如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地形复杂、不易控制的边境地区,地方官员难以采取协同镇压行动。

三合会的堂口及其在地方官僚机构里的会员和关系人通过渗入当地团练组织来加强自己的势力。林则徐曾经鼓励组织民团乡勇，保卫广州，抗击英国人，犹如明朝末年士绅们以此保卫自己的产业免受满人或农民军的侵犯。广州的团练势力成分十分复杂，有士绅领袖、本地的暴徒、农民自愿者、其他军事组织的成员，以及商人等。1841年5月这支混合而成的队伍在广州郊外的村庄三元里遭遇英国的巡逻队。他们手持长矛、锄头——有一些人有枪——击退了英国人，打死英国士兵一名，打伤十五名。中国人将这次遭遇战视为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压力的标志。

对于清政府而言，与明政府一样，这种组织是一把双刃剑。一些士绅发起的制度规范、组织良好的团练能够有效地维护乡村秩序或在城市巡逻防卫。有一些团练散失的人员，也许带着武器和所受的基本训练回到原来的匪帮，或将这些新的技术带给了三合会的会友。1842年以后，《南京条约》开始生效，上海的贸易不断增长，不向洋人妥协的广州地区的资源也不断外流。失业的船工和苦力、穷困的工匠和农民——这些试图在艰难时期寻求寄身之所的人使一些心怀叛意的集团势力不断壮大。

广州地区发生了抗击英国人的事件，这种仇视洋人的行动于1848年达到顶点，道光皇帝认真思考了这一现象：“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而在彼亦可稍折其嚣然之气也。”^①问题在于对于清政府而言，利用这些民间暴力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2. 太平天国

从1850到1864年的席卷中国很多地区的太平天国这样的

剧变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与上文提到的事件相似的因素:像林清那样不安的本性和用宗教神化自己,东南地区社会潜在的离乱,穷人之中日益发展壮大的秘密社会,英国人和鸦片贸易导致的混乱等等。正在这时,一个人的个人历史和心路历程塑造了这场运动,他就是洪秀全。他与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努力奋进,试图跻身于中国士绅阶层的最底层。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广东一个勤劳的农家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他的父母是客家人,他们千辛万苦地使洪秀全得到良好的教育,以使其在上流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虽然他通过了初级的考试,取得了考生员的资格,但在1830年代初他两次落选,没有获得这个可以使他穿着学袍、免除体罚,并能得到政府津贴的资格。

对于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失败都是羞耻的,而对洪秀全而言则未必如此。他只是庆幸能有机会游历广州,增广见识。1836年洪秀全将再次走进考场,去追求成败未卜的功名,这时他得到了一本一位新教传教士印刷的译自《圣经》的册子《劝世良言》。他在这样的时刻得到这样的册子——正因为如此——使得洪秀全后来的暴动与以往所有的暴动都不相同。西方新教传教士——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从1800年代初就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大量印刷,在沿海和内地游历时就广为散发。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还试图将其精炼成《劝世良言》这样的册子,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洪秀全既没有研究这些册子,也没有把它们扔掉。他似乎很快地浏览过它们,然后就放在家里了。最初他并没有把这些册子与他1837年第三次落选后的那场奇异的梦和精神迷乱的状态联系起来。在梦境中,洪秀全与一位浓须、金发的人交谈,他给了洪秀全一把剑,还有一个年轻些的人指导他铲除妖魔,洪秀全称他为长兄。这场梦以后的六年间,洪秀全一直做乡村私

塾教师,并试图再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当他第四次考生员失败后,他打开那些基督教册子,完整地读了一遍。他顿时惊奇地发现,他在梦中所见的两人一定就是册子中的上帝和耶稣,因而,他洪秀全也一定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

正像三十年前中国北方的林清那样,洪秀全通过神赐异能的方式和强烈的宗教信仰使人们相信他的精神力量。但与林清不同的是,洪秀全不通过地方宗教网络秘密传教,而是公开传教,给信徒做洗礼,捣毁孔庙和宗祠。虽然这些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公愤,洪秀全离开家乡逃往广西,但人们并未报官,洪秀全又得以继续传教。1847年他返回广州,跟随美国南方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研习《圣经》。这年末,洪秀全离开广州,投奔他的密友——他第一批信徒之一、在广西东部的紫荆山区创立了拜上帝会的冯云山。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区——远离县城——洪秀全的运动迅速发展,他从客家人和山地部族中吸纳信徒。到1849年他已经吸纳了一万名信众。也许是受参加拜上帝会的三合会成员的影响,洪秀全的意识形态融合了建设新的基督教社会和推翻清朝的思想,他以动人而有力的词句大声宣扬铲除妖邪。当回想到吕留良胆敢用比洪秀全温和得多的言辞攻击清朝,死后被焚尸扬灰,洪秀全的勇气和鲁莽确实值得赞赏。但是在洪秀全看来,统治王朝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挑战:对他而言,执政者反抗皇天上帝,皇天上帝的形象和圣洁在中国存在已久,直到儒家信仰使中国人偏离了正义的道路。

洪秀全充满激情的花言巧语吸引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在洪秀全最亲密的幕僚中有一个紫荆山区目不识丁,孤身一人却是天生的杰出军事家的炭工,一个出生于当地富裕地主家族的十九岁会员,他说服了多数家人给洪秀全捐献了大约十万两银

子。信众里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一群矿工，他们善于爆破和挖掘隧道，这些在广西山中练就的本领被用来在日后攻城时破坏城墙。与矿工们同来的还有很多身怀各种技艺的人：典当商（可以经营财货）、衙门胥吏（可帮助建立官僚结构）、曾在清军服役的士兵和团练，还有至少两名著名的女匪首和几个船匪。

到1850年，洪秀全信众已超过了两万人。传教运动卓有成效，并开始着手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建立军事组织；严厉训令禁止腐败、淫乱、吸食鸦片，举行基督崇拜的仪式，所有钱财都集中于圣库，男子皆蓄起长发，妇女——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分离到由女性官员管理的女营。通过这些行为，拜上帝会在中国各地匪帮中异军突起，最终引起了世人的注目。

1850年12月，清朝政府派来军队，试图将洪秀全从紫荆山地区驱逐出去，却遭到惨重失败，领军的满人官员被杀。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合会众，自称太平天国的天王。在被更强大的清军赶出了根据地以后，太平军一直在两广交界地区作战，直到1851年秋，他们北上攻占了永安，缴获了大量现金、粮食，补充了新的兵员，人数发展到六万人，或更多。

他们新创了基督教每周七天的太阳历作为指导（虽然由于计算的错误使太平天国的星期天事实上是基督教的星期六），太平军于1852年春继续进军。他们进攻了广西首府桂林，虽然在该战中，由客家女子组建的新的军队作战英勇，堪为表率，但还是未能攻陷桂林（这些习惯于在山地从事艰苦耕作的客家女子不像其他中国妇女那样裹脚）。这年夏天他们进入湖南，进攻长沙两个月，未获成功。太平军在这里发布了措辞更为激烈的公告，以吸引更多的应征者：“中国尚得未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气惨于五湖，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⑤



太平天国之乱示意图(1850—1864年)

1852年太平军打破僵局，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洞庭湖东边的岳州。岳州是财富丰足、人口众多的城市，不像太平军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贫穷地区，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五千艘船和可观的武器弹药（部分武器是两个世纪前三藩之乱失败后吴三桂遗留在那里的，但它们仍然可以使用）。此后，一系列难以置信的胜利接踵而来：1852年12月攻陷汉口，1853年1月攻陷武昌，洪秀全得到了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并从地方官库中得到一百六十万两白银。1853年2月，安庆也几乎是不战而得，太平军缴获三十万两白银、一百门大炮和大量粮食。3月，仅有少量军队防守的南京城城墙被炸塌，城中遭到炮轰，太平军士兵还扮成和尚和道士进入街道里应外合，城市被起义军攻陷。

南京城中有四万名满人，其中大约五千人是士兵，他们退到

内城,但还是在太平军一轮接一轮的攻击下陷落了。所有没有战死的满人无一例外地被烧死、刺死或溺死。洪秀全以此显示了在全国扫荡妖邪的方式。3月底,洪秀全头戴王冠,身穿华美的龙袍,坐着十六人抬的金黄大轿,进入南京,进驻明朝的皇宫。

太平军以洪秀全为天王的南京的“天朝”的统治维持了十一年(1853—1864)。太平天国的政策不论其条文内容,还是其贯彻实施,都惊人的激进。其中之一就是实行禁欲主义,要求男女分营,严禁鸦片、卖淫、跳舞和饮酒。钱财由公共的圣库管理,理论上由所有人均享。因为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和南京城内共获得白银超过一千八百万两,保障了财力。太平天国还重开科举,以翻译成中文的《圣经》和洪秀全阐述的宗教教义和文学作品为基础。妇女被编入女营,在官僚机构中也有自己的管理部门,并可参加女科考试。

最引人注目的是太平天国与地方士兵征募相联系的土地法令,可谓前此中国历史上所曾见过的制度中最理想化、最复杂也最独裁的制度。所有的土地由太平天国内和太平天国的拥护者的家庭按家庭大小平均分配,男女均等。产品除了本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皆上交圣库。每二十五户由一个“两司马”管理,负责登记产量、处理诉讼、监督年轻人接受《圣经》和太平天国教义的教育,以及在安息日主持基督教仪式。两司马还负责从其管理的家庭中为当地军队拣选丁壮。被选的丁壮受到严格的训练,教以使用讯号、武器,设置陷阱,以及在战斗中救助伤病员的技能。大量部队从南京的大本营出发,向东、向北扩大太平军的辖地,补充物资和兵员。其结果确如太平军的告示中所说,“无处不均平,无人不饱暖”。^⑥

虽然有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建立完美王国的乌托邦梦想,太平军还是未能推翻清朝,反而最终被残酷地屠灭。为什

么在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之下频获捷报，还是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出于初期的兄弟之情，洪秀全封几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关键人物为“王”，一并受他的领导。但是其中两个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于1852年战死，一些幸存的杰出领导人——特别是在紫荆山时期就是其最早的信徒的杨秀清和石达开——最后都失去了他的信任。杨秀清假借天父，权力凌驾于洪秀全之上，1856年在洪秀全的命令下被杀。石达开坚守自己最初的承诺，成为太平天国最伟大的将领，在妻子和母亲被不和的将领杀害后也于同年离开南京。他试图在四川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但1863年被清军设伏杀害。

剪除了这些最杰出的助手，重掌大权的洪秀全却畏缩不决。他表现出致命的无能，缺乏明确的目标。犹如在武昌他错过了一次北上直捣北京的机会，占领南京以后他又未能积极推进太平天国的事业。他沉溺于宫中的享乐和宗教的神秘主义，身边妻妾环绕，醉心于从《圣经》的《创世纪》到《路加福音》里为自己和太平天国寻求天启。洪秀全未能提出有广泛号召力的反清圣战问题，未充分利用自己作为神圣的宗教领袖的声望。

就在太平天国控制南京之时，洪秀全也没能唤起人们的反清情绪，这正是太平天国陷入孤立的症结。如果太平天国能维持南京的繁荣，洪秀全能在民众拥护的基础上保持神圣的地位，太平天国也许就会不可战胜。但是在南京的汉人居民眼里，太平军的占领者们——其中很多是装束和口音怪异、妇女不缠足的客家人——与洋人和满人一样奇异。居民们抱怨太平天国对经济生活的改变，建立圣库制度，管制市场，将人们按照性别和职业分离，以及强化严格管束人们行为的法令。人们通过逃离、为朝廷做奸细，或叛投清朝等方式消极地反抗太平天国。^⑦相

反，清朝初期多尔衮的富有弹性的政策更成功地赢得了民众的接受。

在南京城外，太平天国在乡村的发展也遭受了失败，他们试图实行的人人共享财富，平分土地的梦想无法普遍实现。虽然他们长期控制着江苏、安徽和浙江的广大地区，并间或向北、向西扩展，但他们的人员却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将另一套税收机构置于沮丧的农民之上。为了维持庞大军队源源不断的粮食和物资需要，太平天国征集粮草的小队在数百里范围内的乡村搜寻。在与清军作战时后勤的需求还会倍增——清军也需要粮食和营地——使曾经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变成了贫瘠的荒原。

太平天国也未能与同时期另两支暴动军队——北方的捻军和南方的红巾军协作。假如采取了一些协商的行动——正如1630年代反明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曾与其他义军领袖联合那样——同时经受着西方列强的一系列重创的清朝就不可能得以幸存。但是太平天国的禁欲主义及其宗教主张上的极端本性使其很难与其他起义军形成联盟。

太平天国也没有设法取得西方人对其事业的同情。一开始，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们还因这支承诺进行社会改革的基督教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垂死的清朝的失败而大受鼓舞。传教士们最终明白了洪秀全对正统基督教的偏离，而商人们则担心太平天国对鸦片的极端憎恶。最后，西方列强决定支持清政府，防止太平天国占领上海，威胁西方在条约中赢得的新成果。随着1853—1855年初三合会中的华人会众控制上海，太平天国似乎可能占领上海。在太平天国行将覆灭的时候，一支由外国人指挥的雇佣军在吃水较浅的蒸气炮舰的支持下，站在清政府一边打击太平天国。这就是所谓的“常胜军”，第一位统帅是来自美

国马萨诸塞州的华尔，在他死后，这支军队又由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英国炮兵军官“中国的戈登”指挥。

虽然正规的八旗军不能打败太平天国，清朝的朝运还是得到忠诚、坚韧而勇敢的抗击太平天国的汉人官员们的支持。这些儒士们被太平天国对其故乡的威胁及其运用基督教对中国价值结构的狂热打击所警醒。这些人中最伟大的就是湖南人曾国藩。1852年他离京在家居丧，他首先募集乡勇保护自己的家业。接着曾国藩和他的兄弟起而武装了一支由吃苦耐劳的湖南农民组成，由地方士绅指挥的高效而忠诚的军队。清朝八旗军已显示了其软弱无能，地方官僚机构又无力维持团练，曾国藩的军队成为国家重要的防御力量。以贯穿湖南的湘江见称的“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在最后南京的收复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湘军的成立代表了地方团练在抵抗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令人惊服的韧性和战斗力。太平天国没有争取到大量士绅加入自己的事业，因而在华中和华东遭到数以百计的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士绅武装的反抗。虽然地方团练的出现更突显了清朝政府的无能，但清政府还是承认了其存在的必要，团练武装使地方士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清政府允许这些团练领袖征收厘金——一种商税的附加税——来供给军需，使团练武装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不断取得胜利。当整个社区都团结一致地反抗时，太平天国发现保障供给和兵源变得越来越困难。

太平天国大胆的改革和采用西方化体制的失败说明了洪秀全政权致命的顽固性。这次改革的发动者是洪仁玕，他是洪秀全的堂弟，也曾在广州跟随传教士学习，是拜上帝教的最早的信徒之一。在太平天国的早期，洪仁玕生活在香港，与那里的英国殖民当局关系密切。最后于1859年化装成医生，取

道陆路来到南京，受到天王的热情欢迎，被任命为丞相。洪仁玕精心起草了《资政新篇》，1859年上呈天王。他的计划是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建立法制，创办银行，修造道路、铁路和蒸气动力的运输船，引入邮政系统，发行报纸，废除占卜和溺婴陋习。除了发行报纸，传播信息一条洪秀全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⑧在其他所有的奏议中都批了“此策是也”。但是最终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付诸实施。洪仁玕收复长江上游的新的宏大战略计划归于失败，对苏州和杭州的大规模攻击也被击退，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护也彻底丧失了。

正如曾国藩沾沾自喜地向皇上报告的：“今则民闻贼至，痛恨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贼行无人之境，犹鱼处无水之地。”然而当1864年7月，洪秀全死后——自杀还是病死，至今仍是谜团——大结局来临，清军涌入南京时，曾国藩心有余悸地上奏皇上：“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⑨

3. 外国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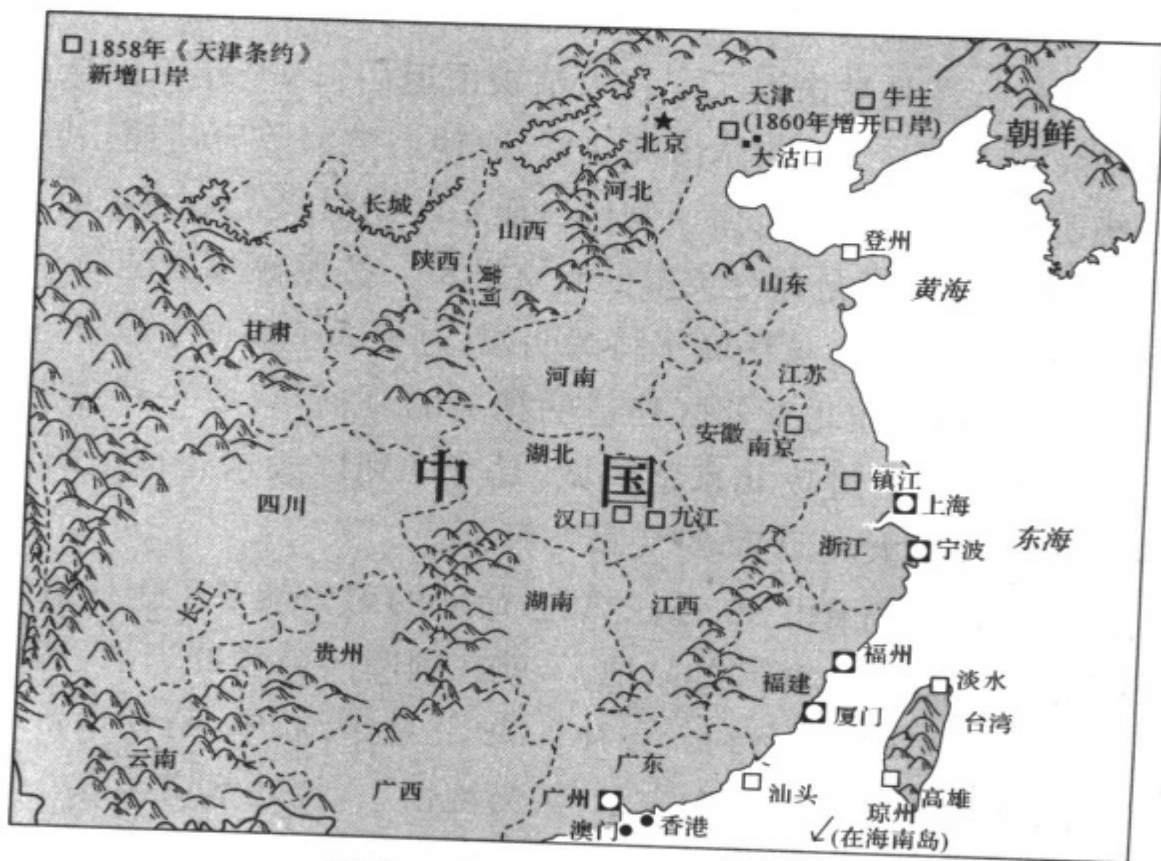
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是1860年代初西方各国给予的帮助，不论是以洋人管理的上海税务司征收关税，还是洋人指挥的常胜军。西方人提供这些帮助，主要还是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英国再次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不满足于《南京条约》的结果，而清朝又长期不予合作，当清朝受到日益燎原的太平天国的威胁时，英国人几乎是无动于衷。相反，英国还执意决定依据条约，按照美国1844年与中国的条约给予最惠国待遇，即依中美条约规定每十二年重议条约。

英国外相看到了这次磋商的困难，写信给香港的总督：“中国当局可能藉口反对，此刻局势不宜着手进行此项工作。”^⑩但是他还是建议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骇人的要求：允许英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如若不成，则要求进入浙江所有沿海地区和长江下游直至南京一带；鸦片贸易合法化；取消外国进口商品的内地商税；镇压海盗；制定华工移民的管理制度；英国大使进驻北京；修改后的条约若有争议，应以英文本而非中文本为准。

由于英国人卷入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作战，从而有所顾虑，但还是与美国和法国联手迫使清政府修改条约，一起向拒绝修约的清政府施压。最后英国人利用清政府非法搜查已在香港注册的船只“亚罗号”，而于1856年在广州重新挑起战端。英国的军事行动因印度爆发激烈的叛乱，且英国人民并不赞同在东亚发动战争而拖延了时日，到1857年12月，英国人占领了广州，并将一贯敌视洋人的两广总督流放到加尔各答。他们接着重演1840年的一幕，挥师北上，1858年5月夺取了战略要塞大沽，威胁天津，通往北京的大门已向英国人洞开，6月清政府作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根据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获得的所有好处，大多数其他的西方列强也得以分享。

1858年的《天津条约》对中国特别苛刻。此后英国大使将携家眷和职员建立馆舍，进驻北京。基督教的公开传教活动受到保护。外国人持有有效护照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旅行，不需护照也可在开放口岸附近三十里范围内随意活动。一旦眼前的叛乱镇压下去，将允许其前往长江上游新开的四个口岸（汉口、九江、南京和镇江）贸易。另外增加的六个口岸也将很快开放：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东，两个在台湾，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南方的海南岛。

《天津条约》还规定所有外国进口商品的内地商税降为百分



通商口岸示意图(1854—1860)

之二点五。在所有的港口和海关使用标准的量、衡。官方的往来交流将使用英文。在中国的官文中不再使用“夷”来描述英国人。追击海盗的英国舰船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中国港口。在各种商业协议的附约中明确说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如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尽管中国法律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这一规定还是强行推行。而英国作出的唯一的让步就是撤出天津，并将大沽炮台交还清政府控制。

英国人显然希望中国统治者放弃对抗态度，但清政府并不愿意，也无意按照条约允许外国大使进驻北京。1859年英国为了强制实施新条约，再一次攻打清军此时已经加强防守的大沽炮台。战斗十分激烈，虽然美国海军司令塔特诺无视本国的中

立立场,声称“血浓于水”,^①援助受伤的英国海军将领何伯,但英国人最终还是被击退了。在大沽被击退后,1860年英国从其他路线派遣了一支谈判队伍到北京,但他们被清政府逮捕,其中一些还被处决。英国首席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决定给清政府一个沉痛的教训,于是命令英军向北京进军。按照额尔金的命令,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将圆明园(过去为了取悦于乾隆,由耶稣会士设计,在北京郊区建造的精美的夏宫)烧成一片焦土。然而英国人没有进攻北京紫禁城,是考虑到摧毁这些神圣的建筑将使清政府大失颜面,难免最终覆灭。

皇帝已经离开北京,逃往热河,命他的弟弟恭亲王担任谈判代表。但是已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就在圆明园被焚的当天,恭亲王重申了1858年的条约。在补订的《北京条约》中,清朝皇帝对伤害英国女王代表的行为表示“甚为惋惜”。他还承诺赔款八百万两,允许中国人搭乘英船移民海外,开放天津为商埠,将九龙半岛部分土地割让给英人控制的香港。至此,条约体制终见成效了。

4. 捻军之乱

一般认为捻军之乱的时间是1851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宣告成立的同一年。但捻军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790年代活动于淮北(特别是山东西南、江苏西北、河南中东部和安徽北部交界地区)的“流寇”。“捻”的名称也许只是指乱军不稳定的联合状态,虽然在中文里这个词的含义含糊不清,或指他们有时候做的军事伪装,或指他们夜晚抢劫时用的卷纸火把。

与太平天国不同,捻军没有鲜明的宗教纽带、意识形态、战略目标或统一的领导。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他们的人数

和力量都在稳定增长。部分捻军与白莲教集团、八卦教信众，或三合会联合，也有的与私盐武装联合。捻军大多数都是在过度耕作的土地，严酷的冬天，不时洪水泛滥的河流等等恶劣的环境中挣扎谋生的贫苦农民。这一地区盛行的溺杀女婴的现象导致了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高达五分之一的男子不能找到配偶，以开始家庭生活，这使他们成为没有根基，易动难安的群体，随时都可能啸聚成党，四出劫掠。当地社区试图建立自卫武装，在村庄筑墙环卫，成立巡护庄稼的组织来确保安全，但是捻军袭击抢掠邻近村庄的庄稼，抢夺官府盐商的运输车船，绑架富裕地主，勒索赎金，甚至袭击关押有捻军同党的当地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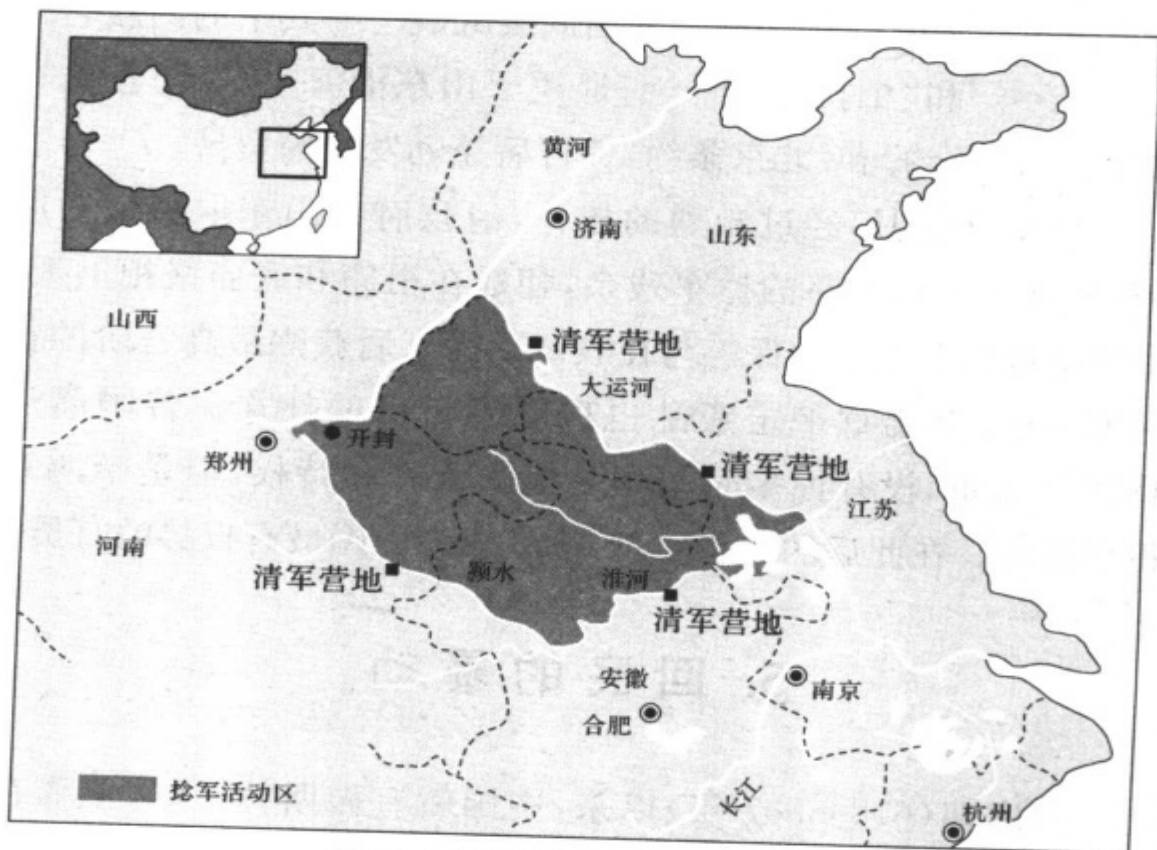
1851年以后，苏北严重的洪灾使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捻军的队伍急剧壮大，清朝官方将其视为叛乱。1855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两年，黄河在开封东面决口，冲出一条流入山东半岛北边海湾的新河道，导致连续的洪灾，随之而来的穷困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捻军中。同时，捻军的组织也得到加强：1852年十八支捻军头领公推张乐行为首，张乐行是安徽北部的地主，曾庇护一群偷羊贼，并曾贩运私盐。1856年张乐行被选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捻军将自己分为五大“旗”，根据不同的颜色命名，每一旗都由邻近社区同姓的乱党集聚而成。

捻军中能征善战的士兵只有三至五万，但是其影响却超出了他们的规模。捻军中的很多人是骑兵，不少拥有火器，他们可以随意切断北京与围攻南京的清军之间的交通线。捻军建立了很多深沟高垒的据点，严加设防，装配大炮，在淮北地区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安全基地，当他们劫掠了乡村后就撤回这里休整。别的村庄和市镇也起而设防，将捻军拒之门外，致使淮北地区各种自卫武装纵横交杂。有时设防的村庄和附近的捻军也达成和议，互不攻击。也有的地方向捻军缴纳现银或鸦片作为保护费。

这个地区乡村的灾情如何无法确知，但一定十分严重。张乐行在一份告示中谈到人们逃避捻军而使生活更为恶化：“但我兵所过，尔等自相惊恐，携资逃避。无赖之徒乘间截夺。家无守户，又被其烧，及至回归，两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实也。”^⑩虽然捻军的首领发布了很多告示，禁止掳掠奸淫，但收效甚微。对于士兵而言，在荒芜的农田里找寻蔬菜，猎取野兽，绑架富家成员，抢掠当地商队等都是寻常之事。有时捻军回到他们的据点，也会廉价地出售在别处劫夺的食物，以抬高自己在当地的名声。

虽然张乐行在战斗中被杀，但很快又涌现出其他有才能的首领，填补了他的地位。他们发展出一种十分有效的游击战术，就是在与清军的交锋中稳步后撤，直到清军人疲马乏，而且迫于地形，队伍分化得越来越小。重新集结的捻军则以压倒多数的步兵和骑兵，手持长矛和刀剑，攻击分散的小股清军。捻军还常常采取严酷的坚壁清野政策，庄稼被全部拔除，房屋和船只被烧毁，水井用石头填塞，并将清军诱人这些地区。

清朝廷只好任命攻陷南京后声誉大振的曾国藩为镇压捻军的军事统帅。尽管曾国藩有深思熟虑的计划，在江苏、安徽、河南和山东等省，且在主要河流和运河上都建立军事据点，保障军需运输，但还是不能剿灭捻军。这项计划还包括疏浚运河和沟渠，阻挡捻军骑兵的运动，通过安抚政策和选任新的首领争取当地的村庄重归清政府一边。这一战略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四省的官员不能充分合作，另一方面则因为曾国藩在攻陷南京后遣散了很多精锐的湘军。他只能依靠其门徒、两江（含江苏、江西和安徽省）总督李鸿章的军队。李鸿章可以保障曾国藩的军需。这支军队主要征募于安徽，以流过皖北的淮河而命名为“淮军”，淮军并不完全忠诚于曾国藩。因而朝廷将两人的职位交换，让



捻军之乱示意图(1851—1868)

李鸿章担任军队统帅，而曾国藩任两江总督。

这次职位的调换说明了中国正日益显现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复杂性，权力下移到了地方军事统帅手中。李鸿章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归功于曾国藩的提携，当李鸿章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国藩就将其选为自己的幕僚。李鸿章和曾国藩不仅有着错综复杂而又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且各自经营出自己的军事系统。李鸿章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曾国藩同样的艰难。捻军似乎总是避开他，突破防线，甚至流窜到西北的陕西省，进占西安和延安。正如李鸿章指出的，“贼踪飘忽，我军与为蹶逐”。^③但是到1868年，缓慢而平稳的消耗战终于导致了已经分裂的捻军的覆灭。按照中国的标准，淮军的供给十分优厚，淮军普遍忠于其顶头上司和李鸿章。他们使用购自洋人的来复枪和大炮，并开始

在北方的水道上使用炮舰。外国武装战舰——其中的两艘名为“孔夫子号”和“柏拉图号”——巡逻于山东沿海水域，防止捻军威胁《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蓬勃发展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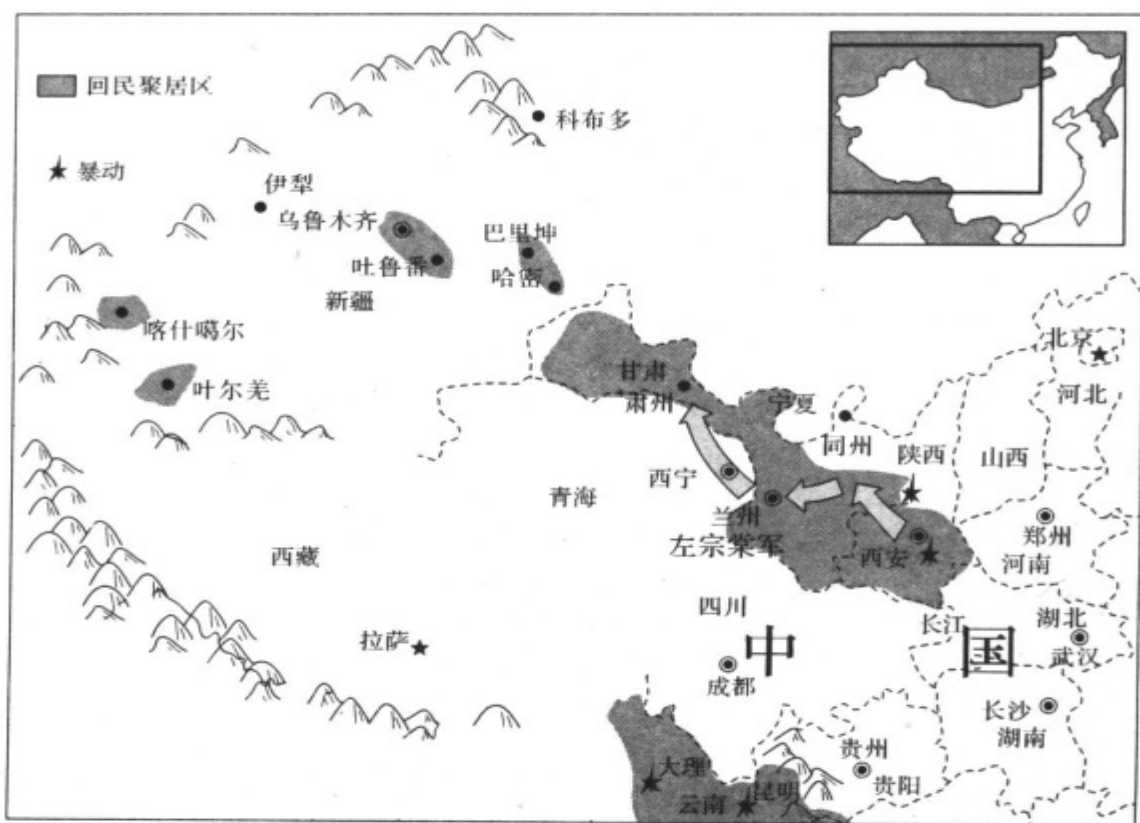
1868年8月，经过激烈的战斗，清政府在山东取得最后胜利，处死了走投无路的捻军残余，朝廷在祖庙和武庙祭祀上天。李鸿章被封为太子太保。与在收复了南京后获赐最高官阶的曾国藩一样，李鸿章平定叛乱也巩固了自己的仕途。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没有很多时间享受他的荣誉和特权，但是李鸿章得享长寿。在此后的三十年里，逐渐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

5. 回民的暴动

自唐朝(618—907年)以来，中国就有穆斯林定居，主要在中亚贸易路线的终端中国甘肃和陕西，以及阿拉伯商人经常往来的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的城市。到明朝晚期，很多穆斯林与汉人家庭通婚，出现很多中国穆斯林(称之为“回”)定居的社区，给地方的管理提出了新的复杂性。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记录了十七世纪早期生活在中国的回民的数量。在乾隆朝时，回民就发动过几次暴动。十九世纪早期，浩罕汗发动的“圣战”使清朝控制的边疆地区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经常动荡不宁。在华北遭到捻军蹂躏的农耕地区有可观的回民社区分布，人数可能达一百万或更多。在河南和安徽耸立着很多热闹的清真寺，回民还控制着自己的私盐贩运渠道。汉人与回民发生冲突，法律则保护汉人，宗教的暴动和民族间的争斗更是司空见惯。

除了甘肃和陕西之外，中国回民最集中的是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回民定居于云南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中原之时，回民与汉人的摩擦成为该地区的一大顽症。1855年当太平

天国逐步加强对南京的控制，捻军开始组成大联盟之时，云南的回民发生暴动，成为反抗清朝的第三大反叛势力。暴动的起因是清政府加在云南回民身上的沉重的土地税和其他苛捐杂税，而这个贫乏的地方主要的财富来源金矿和银矿矿权的纠纷使回民的处境更为恶化。开采完了自己矿藏的汉人试图将回民从他们的矿山赶走。双方的暴力冲突导致汉人大规模袭击回民，回民起而还击，占领了该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大理，并进而包围了省会昆明。1863年昆明一度被暴动的回民占领，不久即被清军收复。然而在大理，回民暴动首领杜文秀建立“平南国”，这个国号就是由太平天国演变而来的。



回民暴动示意图(1855—1873)

云南的地方官员昏庸无能，复杂的地形，特别是与苗民和宗教派别间的消耗，使得平叛战斗十分困难，回民暴动遂扩大到云

南、四川和贵州几省交界的地区。但是清政府通过分化瓦解回民起义军,奖赏变节的起义军,建立地方自卫武装,依靠一些有才干的本地汉人将领等手段努力扭转了局势。1872年大理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攻陷,杜文秀拒降自杀。

由于山重水隔,距离遥远,云南回民很难与北方陕西和甘肃的另一支回民武装协同作战。爆发于1862年的西北回民暴动受到太平天国将领的支持,试图以此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1860年代中期,捻军也进军到这一地区,想看看是否可以结成反清联盟。甘肃和陕西南部几个地区回民人口都很可观,很多人都是起源于中亚的神秘的苏菲教中的“新教义”信徒。在1871年和1873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回民暴动后,清政府竭力禁止“新教义”,但只不过加深了当地的不幸和怨恨。

然而,1862年西北的回民暴动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当地回、汉矛盾,而不是特殊的宗教原因或反清目的。太平天国袭击该地,进一步加深了动荡不宁的局势。面对暴动的威胁,当地人也按照华东和华北建立已久的方式组成自卫的团练。这样做的结果,很自然就形成了回民团练与汉人团练林立的局面。因为大多数八旗兵都调去与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而当地的绿营兵很多就是回民,地方政府又软弱无能,终于酿成大乱。暴动由一件偶然的小事即一群回民和汉族商人关于竹子价格的争执引发。争吵发展为殴斗,由士绅领头,汉人群聚攻击回民,并烧毁了渭河边的多个回民村庄,屠杀无辜的回民家庭。回民也武装起来,报复汉人(同时也把矛头指向拒绝拿起武器的穆斯林),6月末,包围了陕西南部最富庶的两个城市——潼州和西安。

当地的清军最初因指挥不力而连连失败,但即使委任了更有才干的将领,军队仍然士气低落,疾病流行,饷银也时常拖欠。士兵逃亡的现象屡屡发生。虽然清军守住了西安和潼州,却失

去了对周围很多乡村地区的控制。1862年末清军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回民起义军向西退往甘肃，一路大肆宣扬清政府要对中国的回民斩尽杀绝，并在甘肃结成新的武装。

驻扎在宁夏和兰州的为数不多的八旗无力平定暴动，清朝的唯一希望就是从回民内部进行离间瓦解。一个满人官员给朝廷的奏章中的话似乎证明了回民对清政府铲除回民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回民凶悍者固多，安分者亦不少，若一概主剿，则是绝其向善之路，将使良善者亦皆变而为贼，诛不胜诛。”他还说道，问题的方方面面十分复杂，由于在甘肃“各处城关均有回民，各营弁兵更多”。1863年和1864年里发生的是一系列的谈判、交战、欺骗、诈降和报复，清朝廷能够给予其官员的建议就是“暂示牢笼，随时防其中变”。^④到1866年，清军弹药耗尽，米价涌贵，无钱购买，当地小麦的价格甚至腾跃至平常的数十倍。燃料短缺，马匹缺乏饲料而饿死。士兵只能依靠稀粥活命，大量百姓饿死或自杀。

在此绝望之际，清朝廷转而任用儒士左宗棠，他是镇压太平天国中涌现出的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与曾国藩一样，左宗棠生长于湖南。1830年，他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他师从实权在握的官员，有经世之才的学者贺长龄一段时间。虽然左宗棠是一位勤奋的学者，还是在1830年代三次考进士不中，遂决意不再涉足科举。他当起了师塾，并研究中国西部的史地，还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农夫，尤擅种茶织丝。太平天国暴动期间，他表现出了杰出军事统帅的才能，仿效曾国藩，组织、训练和武装了五千人的自愿者组成的民团，先是在湖南作战，后来又先后转战安徽、浙江和福建。除了是一位良将，左宗棠在恢复重新夺回的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鼓励农耕、储备粮食、发展教育、种植棉花，以及建造船只等方面也是行家里手。1866年9月，左

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受命镇压那里的回民暴动。1867年夏，他来到陕西，又接到参与平定捻军的命令，在镇压捻军中他也表现出色。1868年11月他终于得以坐在陕西省会西安筹划平定回民暴动的大计。

左宗棠以务实而耐心的态度处理平定西北回民暴动这个使其前任们受挫的问题。他利用自己对中国西部地区长期的研究，同时也得益于与鸦片战争后从流放地伊犁返回的林则徐的交谈。但是使左宗棠得益最大的，除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和有实践经验的农夫的经历外，就是与曾经做过林则徐幕僚、在陕西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一位学者长期的相互切磋，相互通信。此人告诉左宗棠：“明公上奏，先与朝廷约，勿求速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至它日进兵，视彼中尤骁黠者诛翦之，余不能尽诛，俟其畏服。”^①

从左宗棠随后的行动看，我们可以说，他盯住了最顽劣的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化龙，决定首先将其击破。马化龙在宁夏南部的金积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纵横交错的壕沟和五百多座堡垒拱卫四周。马化龙被尊崇“新教义”派领袖中的代表。回民们满怀执着而虔诚的崇敬去战斗。左宗棠集结了供给充足的军队，围攻金积堡长达十六个月，并损失了一位杰出的大将。只是在回民守卫者粮草耗尽，只能吃野草、皮革，最后不得不吃死去同伴的尸体，马化龙才于1871年3月投降。他和他的家人被凌迟处死，还有八十多位“匪首”被杀，数千回民商人、妇女和孩子被送到别的城市，或流放东北。所有回民不得再定居在金积堡。

此后战争渐趋尾声。左宗棠说服朝廷将其他省的钱粮充作他的军饷，并大量向外国商人借款，征收关税，实行屯田，供给士兵饷银和战马饲料。他沿着商道挥师西进，进入兰州。他在这

里建造兵工厂,种植庄稼,供给军队。他不顾朝廷急速进军的命令,细致冷静地准备攻打甘肃西北的肃州城,于1873年攻取了该城,杀死了城中大部分抵抗者,大肆放火焚烧。虽然部分回民起义军逃往西边的哈密,还得再花时日去镇压,但是中国各省现在终于都平定了。如果不考虑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自1850年以来,中国又再一次在清朝的统治下归于统一。

注释：

- ① 韩书瑞(Susan Naquin):《中国的千禧年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暴乱》,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77页。
- ② 前引韩书瑞著第83页。
- ③ 前引韩书瑞著第93页。
- ④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门前的陌生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 ⑤ 简又文(Chien Yu-wen):《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3—94页。
- ⑥ 梅谷(Franz Michael)和张仲礼(Chang Chung-li):《太平天国之乱:历史与文献》(三卷),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1971年版,第二卷,第314页。
- ⑦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南京的事件和社会态度参见威瑟斯(John Withers)的《天国之都: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1853—1864》,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
- ⑧ 梅谷(Franz Michael)和张仲礼(Chang Chung-li)著,第3卷,第767页。
- ⑨ 前引梅谷等著第1卷,第168、174页。
- ⑩ 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一卷,上海1910年版,第671—672页。
- ⑪ 前引马士著第579页。
- ⑫ 佩里(Elizabeth Perry):《中国北方的叛乱与革命,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 ⑬ 邓嗣禹(Teng Ssu-yu):《捻军及其游击战,1851—1868》,巴黎1961年版,第169页。
- ⑭ 朱文长(Chu Wen-djang):《中国西北的回民之乱,1862—1878:一项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海牙1966年版,第57、69页。
- ⑮ 前引朱文长著第91—92页引王柏心语。

第三章 改革以求中兴

1. 儒士的改革

着实令人惊奇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挑战之后,清王朝并未很快崩溃,在整个十九世纪仍然能够苟延残喘,直到 1912 年。清朝政治家们将这一延续描述为“中兴”,这是一个经常用在别的王朝经受了危机以后重新恢复王朝道德和政治秩序的赞许之词。中兴的观念既含有对过去的怀念,也表现了喜忧参半的心情:历史上的那些中兴纵然意义非凡,也都不能永盛不衰,每一个曾经中兴的王朝最终还是消失了。与历史上的中兴不同的是,清朝的中兴却是出现于帝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的情况之下。同治朝就是清朝的中兴时期。同治皇帝 1861 年即位时年仅五岁,还没有获得亲政的机会就于 1875 年去世了。同治朝由同治的母亲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他的叔叔恭亲王(即 1860 年当朝廷皆逃离北京时被迫与西方人谈判的那位)以及一两位有影响的大学士主持政事。此外还有一群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中崛起的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也许就是其中声名最著者,以及很多其他才干相当的地方官员。这些地方大员有时相互合作,有时各自为政,他们振兴经济,发展意义深远的新体制,重新赋予了清朝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已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成就。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清朝官员动员各种军事力量,摧毁叛乱

势力：他们使用八旗和绿营，地方士绅领导的团练、像湘军和淮军这样半私人性质的区域武装；他们开展军事屯田，修筑防御壕沟和堡垒，有选择地利用外国官员和雇佣军。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治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试图重建儒家政治的基本价值观这一伟大的核心目标的序言。

立志于实现这一中兴目标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湖南人曾国藩。曾国藩 1811 年出生于一个家道并不富足的士绅家庭，他刻苦学习中国经典，于 1838 年考中进士。他进入北京的翰林院，不久以通晓礼制而闻名。曾国藩薪俸微薄，生活简朴，经常向在京的富裕同乡借钱，供给家用和保证几个弟弟上学。直到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经济上才有了改观。很多渴望考中功名的家庭送礼给他，他才偿清了欠债。

曾国藩主张的是严谨而中庸的儒家思想，试图调和三种通往儒家真理的途径。一是坚持道德至上，以及通过教育获得个人伦理价值观；二是赞成乾隆时期考证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严格审慎的考据方法；三是信奉贺长龄这样经世致用学派的思想家，寻求重建健全而诚实的行政结构的有力基础。

经过了鸦片战争失败后那段黯淡时期里多年的探讨和反思之后，曾国藩终于实行了这几个方面的融合。这些年曾国藩沉浸于漫长的思考，在其日记里记载了阅读的笔记和对自己行为态度的反省。这一段文字就说明了曾国藩儒家式的自省的率直：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舛，其

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此客来，申正方散。写联二付。灯后，仍读《易》，心较静。作《忆弟》诗一首。^①

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了曾国藩一生追求的道德和知识模式，现在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价值观念。曾国藩相信，清朝中期危机的背后隐含着精神的崩溃。他寻求中兴的途径就是重建学校和严格的儒家课程。他鼓励有才能的学生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而不要向朝廷捐资获取功名和官职。为了筹集军需，朝廷曾经大量地卖官鬻爵。他编修刊印了在不平定叛乱中捐躯者的名录，使他们的典范流芳后世。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官员一样，他也着力恢复农业生产。他的计划是归还被逐地主的财产，重新课征地税，同时也尽力防止对佃农的剥削。他还重新安置了数百万遭受战火而生计全无的难民。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破坏程度巨大，这些曾经是中国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地区在此后的数十年里重新吸引了大量中国西部和北方的移民。

这些措施总体上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是因为财政短缺，涉及的问题众多，朝廷只能放手由曾国藩和他的各省同僚处理。因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曾国藩举荐的，他们的计划当然也都是是一致的。曾国藩最初聘请他们帮助管理湘军，经理地方财政，或重建司法体制和赈济机构。曾国藩建立了一套遴选和量才录用幕僚的细致的制度。在聘用之前，按照他的原则测试他们的诚实、才能和学识。他总是拒绝任用那些瘾君子、狂妄自大、见风使舵

之徒,以及说话办事卤莽轻率之人。到 1870 年代,数以十计的曾国藩昔日幕僚被朝廷任命为一方大员。曾国藩对清朝忠诚不二,并无心利用这一形势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或以自己的名义攫取权力。

尽管曾国藩强调传统的学术和道德价值观,但他并不固执保守。例如,他不仅鼓励使用洋人指挥的常胜军,还敏锐地看到了有选择地利用外国技术的意义。给曾国藩提出这些令人信服的建议的一个人是学者冯桂芬。这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冯桂芬也是进士出生(1840 年榜),曾供职于翰林院。在 1850 年代中期,冯桂芬统帅一支志愿军在其家乡苏州抗击太平天国,使他获得了军事方面的经验。1860 年,他来到上海,西洋火器强大的威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 1860 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冯桂芬提议,中国必须通过学习外语、数学和科学,以求自强,这些功课成绩优异的中国学生应该被授给举人,次年他将这些文章都呈给了曾国藩。冯桂芬写道,中国的面积是法国的一百倍、英国的两百倍,“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私,不如夷。”为求强国之路,冯桂芬建议“然则有待于者独船坚炮利一事”。^②为达此目标,就须选择港口,建造船厂和兵工厂,聘请外国顾问训练中国技工,在中国制造这些器物。因为冯桂芬感到“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其结果不言自明:中国首先学习洋人,赶上洋人,最终必将超越洋人。

一年后的 1862 年 6 月,曾国藩在一篇日记里记下了他对幕僚们说的话:“今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③该年后,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里指导手下试造小型蒸气轮船。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曾

曾国藩并不气馁。他的识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他派遣三十五岁的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建造一个小型兵工厂所需的设备。选择容闳是一个明智之举，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的一个贫穷的家庭，在家乡和香港的教会学校里读书，1847年第一次旅行至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的预备学校学习了三年后，容闳进入耶鲁，并于1854年获得文学士，成为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

曾国藩第一次与容闳见面时，以其常用的考察人才的方法，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凝神看了他几分钟。但是曾国藩一旦决定信任容闳，则全力倚重，将从广州和上海官库里调用的六万八千两现银交给他，购买在中国建造机械厂所需的基本设备。容闳先到欧洲考察，途中他看到苏伊士运河正在修建，并认识到运河一旦建成，则可以使欧洲到中国的旅程更为快捷。1864年春天，他抵达美国。

由于美国内战正酣，很难找到能够完成中国定货的美国工厂，但最后马萨诸塞州佛契堡的朴德南公司同意接下这个活。容闳留下他在中国遇见的一个美国工程师监管技术细节，自己则去参加他的第十班老同学的聚会，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自愿加入北方联盟，参加美国内战。给他的赞助也因而被削减。他安排将机器设备从纽约直接运往上海，自己取道旧金山、夏威夷和横滨回国。容闳这次因公务环球一周，标志着清朝用人行事的新局面的出现。

先后平定过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曾国藩亲自来视察这些新买来的机器，它们已经与他以前的幕僚购买的安装在上海附近的一个新式兵工厂里的设备装配在一起了。据容闳所说，曾国藩“似觉得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道其历观由美国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④这些机器首先用来制造枪炮，至1868年，在西方技师帮助和关税的资助

下,中国自制的船体和蒸汽锅炉与经过加工的外国蒸汽引擎装配在一起,制成的“恬吉号”下水了。第二个兵工厂和造船厂由左宗棠在受命前往西北平定回民叛乱前不久,于福建的福州建造。在上海和福州兵工厂里,外国顾问指导下的学习机械和航行技术的学校也建立起来,翻译技术书籍的工程也风风火火地开始了。

一位参观过兵工厂的英国人,尽管带些嘲讽,但也掩饰不住他对这些卤莽冒进行为的成功,及其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对中国的作用的惊讶:“若干运输船已配置枪炮,多艘炮舰已成功下水,而留置在船坞内的炮舰业已接近完工。前者被用来运送官粮,虽然这些运输船属于本地人所有,由本地人指挥,但这些运输船从未发生意外,倒是值得注意。”^⑤假如谋求自强的这一系列计划确实与儒家自身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似乎就真会使清朝的政治经济重获新生。

2. 确立外交政策

185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存在,他们逐渐建立一些有助于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机构。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这是为了应付太平天国对上海的威胁,而于1854年创建的。该司订立平等的关税税则,征收外国货物进口税,为清政府开辟新的利源。1860年联军进占北京,朝廷避难热河,需要另一个机构与洋人交涉。经过一番冗长的争论,1861年清朝决定设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即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这是自雍正1729年设立军需房以来清朝中央官僚机构中最具意义的革新。

总理衙门由五位总理大臣(皆为满人)执掌,皇帝的叔叔恭

亲王位居首席。他们有二十四名幕僚辅助，其中的十六位从朝中各部选出，八位出自军机处。在讨论设立这个新机构时，清朝大臣们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内忧外患一旦解除即告废除。恭亲王也向皇上保证他将使新成立的总理衙门保持谦恭姿态，犹如朝贡国使节的一个住所而已。因而，虽然外国人将在总理衙门里办理事务，但这一机构如恭亲王所说，“一切规模，因陋就简，较之各衙门旧制，格外裁减，暗寓不得比于旧有衙门，以存轩轻中外之意”。^⑥依照这一意向，总理衙门最终选定的是一所矮小破旧的房子，坐落于皇城东面以前的铁钱局公所。但是掩人耳目似地装上了一扇新的大门，以使洋人相信这个衙门实际上扮演着重要职能。1861年11月11日，总理衙门开门办公。

这位同治中兴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派满人恭亲王年仅二十八岁。他年轻时极端排外，以后逐渐转向审慎立场，最终完全崇洋。列强的联军洗掠了圆明园，强迫他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撤离了北京，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感到，“是该夷并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⑦作为同治皇帝的叔叔以及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信赖的顾问大臣，他给予总理衙门很多特权。然而大量的劳心之事也许是他干练的副手文祥处理的。文祥生于1818年，是正红旗一个低级官吏的儿子，1845年考中进士，在1853年太平天国威逼北京和1860年英国洗劫北京这两次守卫中，表现积极。尽管出身卑微，但他担任兵部尚书，声望显隆。

恭亲王和文祥在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显示了清朝新的对外策略的另一个侧面。从“休斯女士号”和“埃米利号”事件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清朝招募“李·阿袖珍舰队”之举是一场灾难，而处理普鲁士事件的判决则堪称是一次显著的胜利。

“李·阿袖珍舰队”诞生于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在浙江沿

海取得一系列胜利,清朝担心沿海的控制权可能落入起义军之手。因而,总理衙门受命从英国购买一支舰队,聘请外国指挥官和船员。总理衙门选择海关税务司李泰国为中间人,交给他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白银。李泰国用这笔钱购买了七艘蒸汽船和一艘储藏船,由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指挥。英国外交部表示同意该国海员在挂有特定外国国旗的舰队上服务。因为清朝与历代中国王朝一样,从来没有国旗,恭亲王照会英国,清朝将制作一面旗帜——中间有一条龙的三角黄旗。

1863年9月阿思本舰长率领舰队抵达上海,但立即面临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恭亲王令阿思本为舰队副指挥官,受一位中国将军领导。虽然阿思本本人统领舰队上的所有外国人,但在战略行动上他将服从清朝地区指挥官——此时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命令。问题在于,根据在英国与李泰国签订的协议,舰队遵从清朝的旨意,阿思本“完全统领所有欧洲建造的船舰”。他通过李泰国,直接受命于清朝皇帝,而“不受其他方面传达之谕旨的约束”。^③

任何一方都不让步,结果陷入了僵局。阿思本是一个固守原则的人,他相信自己确实有权指挥舰队。李泰国则是一个极度自负和傲慢的人(他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即是:“一位绅士在一个亚洲蛮人指挥下做事是荒谬绝伦的”)。^④总理衙门不肯向外国人示弱。经过几周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清朝承认问题无法解决,支付了阿思本舰长和船员们薪金后打发他们回家了。美国和清朝双方都担心这支舰队落入敌方手中——美国的南方联盟,或太平天国。因而由英国将舰队卖给了本国商业公司。李泰国在获得一大笔赠予后被解除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

总理衙门处理国家主权问题中的第二件事则要成功得多。出版于1836年的惠顿《国际公法原理》已经成为西方外交领域

中的标准读本。1862年总理衙门研究了其中关于外国使节派遣章节的中译本。一年后他们得到了整部著作，由长期在宁波和上海传教的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传教士丁韪良译成中文。虽然恭亲王令手下人将其文体改得更雅致一些，但在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译本。

恭亲王在与朝廷讨论翻译事宜时说，他已告诉洋人，“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恭亲王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⑩但是面临一件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冲突——1864年的普鲁士与丹麦战争——波及到了中国领海，普鲁士战舰在大沽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恭亲王和他的同僚就用惠顿的著作妥善地作了处理。总理衙门运用所接受的领海的概念，解释中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条约，不仅迫使普鲁士释放了三艘丹麦商船，而且还向中国赔偿了一千五百元。虽然“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间亦有可采之处”，^⑪恭亲王还是花五百两白银刊印了惠顿的著作，将三百份分发给各省官员。或许是担心保守派的非议，他拒绝为这本书的序言署名。

1862年文祥和恭亲王得到朝廷准允，在北京开设了一所翻译学校。学生人数很少，从年龄在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中选出，发给津贴，学习英语和法语（在北京的另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里已学习了多年俄语）。从八旗中招收学生反映了朝廷努力使倾向保守的满人相信，那些明朝的征服者们仍将掌握外交大权。但事实上学校体系迅速分蘖，生员已不再限于满人。上海、广州和福州都设立了官办的语言学校。1867年恭亲王和文祥着手将北京的翻译学校改成一所综合性的学校。他们建议增加数学、化学、地质学、机械学及国际法等课程，聘请外国教师执教。尽管保守大臣们强烈地抗议说中国人不需要“师事夷人”，学些“一艺之末”，两百年前圣明的康熙皇帝也是“虽用其法，实

恶其人”，但是改革派还是占据了上风。开设新课程的学校于1867年成立，由中国地理学先驱之一、历史学家徐继畲执掌。

选择徐继畲是明智之举，再次说明一种新思想在中国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徐继畲1840年代在福建省向美国传教士学习西方的知识，是最早受到总理衙门任用的人之一。徐继畲在其著作中盛赞西方，特别是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畲还赞扬乔治·华盛顿是“异人”，其勇敢和韬略甚至超过中国的文化英雄：“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⑩毫不奇怪，在华的美国人对他的这一任命感到高兴，这似乎是未来外交关系的一个良好征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送给徐继畲一尊史都华创作的著名的华盛顿塑像的复制品，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赞颂被刻在一块取自福建省的花岗岩上，并被安放在三百英尺高的华盛顿纪念碑上。徐继畲1869年因健康原因退休时，1863年翻译过惠顿国际法著作的传教士学者丁韪良接替他，集聚了一批有才干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帮助翻译其他西方著作。

因为大清帝国的海关可以为这些计划提供所需资金，从而使海关成为了这些计划的后盾。海关由才能卓著的赫德掌管，赫德出生于北爱尔兰，曾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供职，然后转而受雇于清政府。清朝海关发端于1854年建立的规模不大的税务司，在赫德掌管下，1860年代成为了有多名外国人员供职的机构，遍设于所有通商港口。赫德能够为清朝创造大量收入，部分用于支持学堂和其他现代化计划。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职员收集了中国各地贸易方式和地方情况的准确资料。

经过了诸多的战争和误解后，1860年代末中国和列强似乎可以合作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于1868年修改条约，总理衙门(得到了朝廷的合作)在与英国人的讨论中审慎而有策

略,英国的代表是思路清晰、机智明锐的公使阿国礼。阿国礼和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报告,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改革行政管理、教育和预算计划。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和平地人住在北京的宽敞住所,拜见和叩头问题因为同治皇帝尚属年幼而被搁置起来(直到1873年清政府允许外国人按照自己的礼俗向皇帝表示敬意,这一问题才波澜不惊地解决了)。一群清朝大臣带着赫德到欧洲考察政治制度,清朝廷委任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作为中国代表与美国和欧洲进行条约谈判。

然而,传教和贸易权利、建造铁路和电报、限制鸦片贸易、外国法庭在中国土地上的确切地位、内陆水道的航行等很多艰难的问题仍然存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中国与欧洲的距离一下子变得更近了,似乎已经沉睡了的旧时的贪婪和对抗又再次出现。令阿国礼和经验丰富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气恼和失望的是,他们殚精竭虑达成的和约修改协议于1870年在英国议会下院被多数否决,数年的心血化为乌有。赫德和阿国礼都深感沮丧消沉。阿国礼去拜访文祥,向他抱怨,英国商人指责他与中国交涉时过于软弱。总理衙门自己的计划也成为泡影,文祥回答道,毋庸置疑,我看到了贵国报纸的言论。我本人也被人指责为叛国者,只不过穿着汉服而已。^⑬

3. 传教士问题的出现

1860年代,总理衙门的官员们都在努力地理解和适应他们面临的新的世界,同时中国人排斥西方传教士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在四川、贵州、广东,以及运河上富裕的商业城市扬州、贫瘠的陕西山区,传教士及其信徒都遭到骚扰、殴打,甚至不时遇害,财产受到威胁和毁坏。最后,1870年夏天,就在1858年

签订《天津条约》的天津城，在久拖不决的外国使节入住北京问题谈判期间，很多外国外交官将其家眷安置在这里，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发生了。

连续数月，城里谣言四起，传言基督教残害拷打小孩，实施各种变态性行为。天主教传教士不顾公众的抗议，在以前的皇家公园和寺庙旧址上建造起高大的天津教堂，遭到了无以复加的辱骂。法国领事丰大业以天主教徒的主要保护人自居，数次向天津地方官员抗议，但是他们也没有采取措施平息激愤的民情。大群的中国人仍不断威胁外国人。气急败坏的丰大业腰插两把手枪，带着一名配剑的随从，冲入县衙。出于对中国官员敷衍搪塞的极度愤怒，丰大业拔出一把手枪，开火射击，没有打中官吏，却杀死了一个看热闹的人。一群满怀敌意的中国人已集聚在衙门外，顿时群情暴怒。丰大业及其随从，还有几个法国商人和他们的妻子被杀。教堂被付之一炬。一群暴徒冲进天主教慈悲修女会，十名修女遭到袭击，被剥光衣服，然后杀害。这一天共有十六名法国人被杀，被杀的还有三个被误认为是法国人的俄国人。

法国要求立即惩办凶手，清政府被迫作出反应。参与调查的是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官员，还有带病的曾国藩，他是直隶总督，名义上应负责天津司法，还有接替曾国藩的李鸿章。经过一番拷问，查出十六位中国人参与了袭击和杀害法国人的犯罪。罪犯数目与死去的法国人的数目正好相等，说明处理结果更注重满足“以牙还牙”的心态，而非调查犯罪证据。中国还同意补偿二十五万两白银，用于重建教堂和抚恤死者家庭。天津的州县官员被终身流放黑龙江，清政府还同意派遣一个使团到法国致歉。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人的注意力从亚洲完全转移回去，正因为如此，已经可以逐渐感知的法国将会提出更为

苛刻要求的局面才没有出现。

外国人后来所称的天津“屠杀”只不过是这个世纪随后的时间中一系列冲突中最血腥的一个事例。这些暴力事件的爆发揭示了基督教传播与中国士绅自身价值和权威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常常正是受过很深的教育的中国人书写谩骂、煽动性的告示和册子,攻击传教士,召集人群制造事端。在中国人夸大传教士们过当行为的背后是一套使他们的训诫更为有效的复杂的真理体系:基督教传教士传布的是不同于儒家思想的教义,他们试图将其教义更深地渗透到中国内地,他们袒护与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产生诉讼的信徒,他们发展自己的教育体系,他们常常将土地买卖说成将私产献给教堂。而且,传教士们怀着拯救灵魂的热切心情,常常接纳,甚至找寻被父母遗弃的垂死的婴儿,在其死去以前为其做洗礼。当这些小孩的尸体被充满敌意的中国人从墓地里挖出,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群情激愤的声讨。

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非只是剥削、误解和敌意。在华的传教士们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和宗教背景。除了耶稣会士、天主教牧师、托钵修道会,还有难以枚举的各种新教教派——到 1865 年全国已超过三十个。这些教派既有 1795 年成立的伦敦布道会、1810 年成立的美国海外传道部,还有浸信会、南方浸信会、长老教会、美以美教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等。他们的根基分别在英国、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瑞士及荷兰等国。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日浸月染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影响,特别是在与教育相关的方面及他们在提高妇女地位上的努力。

在教育方面,传教活动通过传播基督教经典,出版历史和科学著作,建立学校,引入新的医疗技术等等途径产生其影响。基督教经典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迅速传播,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平天

国领袖洪秀全从广州城及其周围地区散发的小册子中获得了灵感。《圣经》粗略的中文译本早在 1820 年代就已完成。到 1850 年由一群传教士精心修改的译本开始在中国广泛流传,同时流传的还有满文的《新约圣经》全译本。还有特别为在宁波、厦门和福州方言区及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中使用准备了用罗马拼音编写的特殊的《圣经》版本。西方式的印刷出版业(仍使用中国的活字)的发展大大有助于天主教和新教传播教义的活动。

1830 年代后期有关西方政治和历史的著作也常常通过传教士在广州和上海印刷的期刊广泛传播。这些著作将中国置于世界的格局之中,使中国的学者得以以新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历史。1840 年代中期,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将此类的著作介绍给后来的北京同文馆总理大臣的徐继畲,使其首次接受了西方历史的观念。

第一次自强运动中随着兵工厂的开设而发展起来的训练学校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和介绍。1865 年曾国藩亲自为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写了赞誉的前言。曾国藩写道,这部著作的翻译完成了二百五十年前耶稣会士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前六部著作的未竟事业,这些翻译的完成对于丰富中国已有的数学著作十分重要。虽然不能抛弃中国传统的数学知识,但不能否认的是学生一生运用数学,懂得方法却仍然只是盲目地运用,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有些人甚至认为数学是不可能研究的。正如李善兰、伟烈亚力和利玛窦所说的,欧几里得探求的不是方法,而是点、线、面和立方体等标题下的原理。曾国藩说,清晰地理解这些知识,就能使学生解决数字的各种形式的问题。^① 1860 年代,伟烈亚力及其合作者们还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有关机械学、代数、微积分学、天文学和对数表的论文。英国传教士福莱尔和

中国学者、数学家徐寿长期的合作也同样卓有成效。他们耐心地工作了数十年,能够用中文编辑刊印系统合理的全部化学词汇,编印了学习指南和杂志,使工业应用化学中的很多领域能够迅速发展。到 1870 年代末,其他的西方学者已完成了电学、蒸汽发动机、摄影、车床、三角测量学以及航海学等方面著作的中文翻译。

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的教会学校随着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而从沿海扩及内地,数量逐步增加。这些学校通常是由传教士个人,或少数教师开办,不仅训练中国的年轻人,使其能够在通商口岸谋一份说英语的差事,而且有意培养引导中国的孩子理解基督教教义,如果可能,则改变年轻人的信仰,并使其具有日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工作的能力。虽然传统的中国教师心怀狐疑地看待教会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伟大的意义在于为贫穷的中国人,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提供了某些形式的基础教育,否则他们是无缘接受任何教育的。结果是互惠互利的。通过与中国学者紧密合作,苏格兰传教士、学者詹姆斯·里格第一次将“四书”“五经”全部翻译成流利而准确的英语,这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助益无穷。

因为当地人的疏远和排斥,教会学校常常不得不以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甚至是衣服和津贴等条件吸引学生。在早期的通商口岸宁波,教会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1844 年时接受了三十名男孩,1850 年第一个班八人毕业。八位毕业生中,一个留校教书,一个继续学医,四个受雇到长老会的印刷厂工作。山东省的齐鲁学堂 1864 年成立时只有八个学生,1877 年首批三人毕业。他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中国典籍和基督教伦理的基础知识,同时还学习英语、数学、音乐和地理,三个毕业生或继续教书,或做了传教士的助手。后来帮助曾国藩购买外国机器的容

容闳从七岁到十二岁一直在澳门的混合小学，接受一位传教士的妻子的辅导。十三岁时进入澳门的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学习英语、中文、地理和算术。到1847年，容闳由于成绩优异，由当地的西方商人赞助，免费搭乘一艘运茶船，前往美国。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中国年轻人一样，他最初是被见到的西方医学所吸引，希望成为一名医生。西方传教士很快注意到医学知识对中国人的影响，正是这批“医生传教士”在赢得信徒方面最为成功。并非因为中国缺乏自己经验丰富的医生——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通过把脉诊断，用植物、动物和矿石中提炼的药物、针灸等治疗——但到十九世纪早期，西方人的解剖学知识更胜一筹，外科技术也更加丰富。虽然也经常发生一些会引起当地人敌视或诉讼的不幸事件，但西医在去除肿瘤、治愈白内障之类的疾病方面尤其成功。到1860年代，传教士和非教会成员的医生通过西方慈善家资助，或从中国地方募集资金，开始建造医院。最初，这些医院与收容盲人、麻风病人和精神病人的中心一样，都集中在通商口岸。其他一些传教士则向中国农民介绍新的种子，以及各种新的水果和作物，也有一些投入到植树造林工程，努力使中国现已贫瘠的山地避免发生不断引起不虞之灾的严重水土流失。

传教士们通过其经书、出版物、学校和医院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虽然无法估量这种影响的程度，但传教士们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片新的选择空间和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在拓展家庭结构、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也同样产生了影响。早期传教士中有几个是女性，数以十计的传教士的妻子也在这个群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容闳回忆1835年遇到他的第一位老师、一个白人女性，她“躯干修长，体态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颐方，眉浓发厚，望而知为果毅明决之女丈

夫。时方盛夏，衣裳全白，飘飘若仙，两袖圆博如球，为当年时制。夫人御此服饰，乃益形其修伟。予睹状，殊惊愕，依吾父肘下”。^⑤

然而恐惧是可以超越的。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学会了向洋人学习、与洋人共事、接受洋人的治疗，甚至与他们成为朋友。西方女性们展现了中国女性不能企求的从事公共工作和事业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教士家庭深入到内地，她们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人的家庭生活和价值观念。她们与中国女性一起分享这些生活方式和观念，向她们介绍新的卫生观念、烹饪技术和育儿知识。她们反对缠足，同情鸦片吸食者。她们宣传宗教，提供教育，并将其视为慰藉和改变生活的源泉。其中一些更有勇气的人甚至提出重新审视社会等级和性别不平等。

后来受人尊敬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50年代年轻时期在宁波和广州任职时，就曾有过一个中国情妇，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住在中国的未婚英国人养了一名中国女人是习以为常的事”，他后来在一份秘密的法律证词中写道，“我不过为人所曾为”。^⑥当他要与一位英国女士组成家庭时，他付给那位中国女子三千元，将他们的孩子送往英国，这样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使他难堪。西方人和中国人个人关系并非总是盛行这种双重标准。容闳娶了一个来自哈德福的美国女子，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都进入了耶鲁大学。在其回忆录中，容闳生动地回忆了他的令人敬畏的第一位西方老师是怎样一直帮助三位失明的中国女孩用盲人点字法阅读，尽其所能地将她们从将会面临的黑暗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但十九世纪末，中国妇女已经有了容闳和赫德所能预见的更多的选择。1892年，两位英文名字叫 Ida Kahn 和 Mary Stone 的年轻中国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来到美国，并获得密西根大学医学学位。但 1896 年，她们回到中国，开始

行医。这些女性的成功,以及激发成功的信念就是献给传教士梦想的令人惊奇的酬报。

4. 海外华人

在国内的几波叛乱中数千万中国人被杀或流离失所,伴随而来的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饥荒和社会混乱。紧张的土地压力依然有增无减。到 1850 年,中国人口可能达到了四亿三千万,虽然 1860 年代一度急剧下降,但 1870 年代开始又再次攀升。

耕地不足导致移民向内地的迁徙,但是中国却不像同时期美国西向的移民可以直接通往大平原和太平洋海岸。中国前往西部和西北的居民来到的或是西藏贫瘠的高原,或是新疆广袤的沙漠,这里于 1884 年最终成为了清朝的一个省,却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向西南迁徙的人们则会遇到心怀敌意的山地部落,或是已经在越南和缅甸建立了王国的边境部落。数百万人选择迁往东北,首先定居在辽东适宜耕种的地区——这里是很久以前满人征服活动中的一站——接着是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再向北进入今天吉林和黑龙江省的严寒的莽莽山林。另一些人则冒险渡过海峡,加入到台湾的移民之中。台湾到 1850 年代已彻底允许中原移民定居和垦殖,1885 年成为了一个省。还有一些人离开乡村到人口不断膨胀的汉口、上海或天津等城市里去碰运气,这里新兴的工业和对搬运工的需求提供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尽管工钱低得可怜。

人口危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完全迁出中国,到异国他乡去碰运气。那些往海外寻觅机会的人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东南地区,通常从广州和澳门放洋出海。有的是贫穷的农民,有的是叛乱集团的逃亡者,还有一些是在清朝社会中野心勃勃却看

不到发展机会的大家族子弟。大部分则是在出国前刚刚结婚，梦想有朝一日富贵还乡，能够买田置土地，振兴衰败的家业。最初，他们把希望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北部各国、美国西海岸这三个地区。

移民东南亚花销最少且最容易，很多中国人很快在稻作和打鱼的社区里定居下来，经营零售杂货和商业贸易。虽然上层的经济活动被英国人、法国人或荷兰人控制（根据所选择的地区），中国移民还是能够找到施展其经营才能的空间。他们成功地渗入到小矿产、橡胶种植和航运业。在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中国人与荷兰殖民当局签订合同，担任税务官，还为荷兰人管理鸦片垄断事务。

因为很多新的移民都来自福建和珠江三角洲，同乡关系和方言集团仍然受到重视，来自相临地区的中国人往往集聚在一起，互帮互助。三合会和其他秘密团体也滋生活跃，他们收取保护费、贩卖鸦片、赊放便宜的川资、经营妓院等。直到1890年，在东南亚地区仍很少有已婚的中国女性。尽管清政府对移民的扩大深感不安，还是于1873年在新加坡建立了领事馆，以便就近监管那里五十万或更多的中国居民。他们还试图通过买官鬻爵使富裕的移民保持对清朝的忠诚。

拉丁美洲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移民，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当地几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反对使用奴隶劳动的呼声日益高涨，蒸气运输船使交通更为便宜，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中国人前往。例如，到1875年已有将近十万人来到秘鲁，这些人通常是受到蛊惑者和被许诺发财的传单所引诱。这些中国人并未能发大财，大多数人都去铺设铁路，在棉花种植园做苦工，或去环境特别恶劣的鸟粪场劳作。在鸟粪场，华工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工作，一天清理四五吨鸟

粪,这样的工作常常导致传染病、肺病和过早死亡。有的则做仆人、雪茄工和面粉工。很多华工在未完全理解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就签订了工作合同,从签约工作的地方逃跑,若被抓获,就带上镣铐,强迫工作。很多人绝望自杀。在古巴,到1860年代有数以万计的华工在甘蔗种植园工作,条件也一样恶劣。华工并没有被视作自由工人,常常受到奴隶般的待遇。夏威夷的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的环境要略好一点,那里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定居。

1873年总理衙门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令三个调查团报告秘鲁和古巴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容闳刚刚为天津兵工厂购买了价值十万元的枪械,又被任命为秘鲁调查团的代表。)两个调查团报告了虐待华工的惊人证据,这种虐待不只是工作状况下存在,而且从一开始招募劳工时就有了。成千上万的人明显是被骗签订了本就是欺诈的合同。很多人是被为种植园主募工的人绑架,出海以前被囚禁在澳门或广州的废船上。航程中的环境十分恶劣——每个苦力的地方通常不到六平方英尺——很多人死于航行,华工的暴动时有发生。自1876年起,主要是出于对这些报告的回应,残酷虐待合同工的行为被禁止,运输过程也获得更好的管理。

中国人向美国的第一次移民浪潮是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来的。实际上,圣弗朗西斯科最初的中文名称就是“金山”。但是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赶上了有利可图的淘金,大多数都是在已经被那些顽强的先驱者们放弃的矿上干了一段以后,就逐渐转向其他行业。很多人在洛杉矶至西雅图一线做市场的园丁、洗衣工,或开店。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修建1860年代加利福尼亚到犹他州大铁路的最后一段。

中国人逐渐横穿美国,向东部迁徙,在时间上紧随美国西进

运动的最后一阶段之后。俄勒冈铁道上的旅行者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第一次看到用筷子吃饭的中国人。到1880年，波特兰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人，同时怀俄明区域的山区和爱达荷州境内的蛇河沿岸的定居者数量也在增长。国内战争后，南方的种植园主招诱了很多中国人到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试图让他们耕种释放了的黑奴抛弃的土地。到1880年代后期，马萨诸塞州的制鞋厂、宾夕法尼亚的餐具厂和新泽西州的蒸汽洗衣店里已经有中国人工作，在波士顿也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中国商人。

中国人在美国的定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一开始，对中国定居者的敌意就是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在于很多来美国的中国人也与那些前往东南亚和秘鲁的中国人一样，按照他们所说，最初只是希望去干上几年就回家。这就使得中国人只是被当作旅居者，而非真正的移民。中国人以其勤劳苦干的习惯获得成功，而招致其他失败者的嫉妒，这也是部分原因。白种人普遍相信，中国人总是愿意接受比别的种族的人更低的工钱，因而全面压低了报酬。虽然那一说法几乎并非事实，但雇主们却利用中国人来破坏罢工。由于懂得很少，甚至不懂英语，中国人常常对他们自己被牵涉其中的社会和经济争端茫然无知。

由于对其习俗的陌生，西方人讨厌并提防中国人——或如很多西方人开始将其所称的“蒙古人”。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男子还留着怪异的清朝长辫。美国人还注意到华人社区里男女比例极端的不协调——1880年时有超过十万中国男性生活在美国西部，却只有三千名女性——他们不是试图去弄清其中的原因，却指责中国人不正常。中国人说话单调的语音，一些人吸食鸦片的嗜好，喜爱饮酒赌博，爱吃看起来古怪而倒人胃口的食物——所有这些使得谣言四起，说中国人邪恶、堕落。

两个方面的不幸事实使传言和指责更加疯狂。首先,正如其他地区的中国移民一样,在美国的中国人依据方言和乡土结成群体。他们主要来自广州周围一百里范围内的地区,他们来到圣弗朗西斯科后,大部分人就立即组成了由“六合堂”控制的地下组织。六合堂与中国秘密社会有密切联系,与秘密社会一样,既是保护者也是经济剥削者。敌对的华人集团经常发生帮派争斗,这使所有中国人都背上了目无法纪的名声。其次,中国人都涌入美国各地的“唐人街”——不论在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波特兰或是后来在纽约——缺少住房,成千上万单身男子的孤寂,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社会环境的压力、性挫败和疾病流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涉及住房、教育、工作机会,以及饮食问题等的反华法案都进一步驱使中国人进入“唐人街”,并且呆在那里。华人不容易获得救济。很多国家的中国人都不允许与白人对簿公堂,禁止担任公职。大多数人还不得不为获得基本的教育机会而斗争。

1849年首批华人定居后的几年内,在一些白人工人及其政治支持者的种族主义议论故意煽动下,潜在的压力爆发为公开的暴力冲突。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怀俄明州。1871年10月,两名试图干涉帮派争斗的警察被杀后,一群人洗劫了唐人街,抢掠商店,焚烧房屋,殴打能够找到的任何中国人。在市政当局制止他们以前,这群人最后杀死了九个中国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和孩子,打伤了数百人(这次圣弗朗西斯科的华人死亡人数与1870年在“天津大屠杀”中死亡的法国人和俄国人完全相等,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十四年后在怀俄明区域的石泉,一群穷困的白人矿工首先用铲子将一名华人矿工殴打致死,接着焚烧了华工的工棚,杀死至少二十八人。同时还发生了一些较小的冲突。这些事件在西部开发中留下了不幸的一笔。

虽然总理衙门知道存在这种问题,但是不习惯于承认海外华人权利的清政府对此反应迟缓。1867年清政府任命全美国公使蒲安臣为无任所大使。次年,蒲安臣热情地解释了中国人出海到美国和欧洲的原因,这似乎回应了一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们最乐观的言论。“当前中国的开明政府正沿着进步的道路稳步前进”,蒲安臣告诉听众们,“现在她说:将你们的小麦、木材、煤、白银,以及任何地方的商品送给我们——我们将尽力接受。我们会送给你们我们曾经大量输出给外部世界的茶叶、丝绸和自由劳工”。他以自己如簧之舌使美国于1868年签署了保障中国人继续移民美国权利的协定。但是蒲安臣也以许诺清政府已准备皈依基督教来搪塞问题。他声称只要很短的时间,中国就将邀请西方传教士,“在每一座山上,每一个谷地树立光辉的十字架,因为她现在友善而且公正讲理”。^①继蒲安臣之后,清政府1871年向法国和英国派遣了外交代表,1878年又向美国派遣了全权大使。

但是反华的政治压力从加利福尼亚波及到华盛顿特区。在一系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战的辩论中,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流民潮成灾以前限制中国移民的论调日益抬头。1879年海斯总统恪守1868年协定,否决了每船限载十五名中国移民的法案。然而1880年清政府被说服授权美国管理中国劳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合理,还可以限制或延缓中国劳工的输入。1882年亚瑟总统同意将技术性及非技术性中国劳工移民暂停十年,强迫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领取特殊的登记证,禁止他们取得美国公民身份。1884年,他同意了进一步扩大劳工限制条款的法案,将劳工范围扩及小商贩和渔民,限止所有华人,不论其是否为清朝属民。

这就打破了世界上所有贫困和受压迫者——不论种族、宗

教或背景——将美国视为天堂的梦想。随后继任的几位总统的行为使这一梦想更是一去难回了。1888年克利夫兰宣称，中国人“对我们宪法与法律的无知，不可能与我们的人民同化，危害我们的和平与福祉”，并签署法案，禁止暂时回中国的华工重新进入美国。^⑧同年接受共和党提名的哈里森说道，他“愿意肩负捍卫我们文明的责任，摒除终究不可能、也不愿与我国人民同化的外来种族”。哈里森当选以后，任用了一个持这类观点的人为国务卿，认为中国人非但没有帮助发展美国经济，而且带来了“身心疾病的种子，贫困的种子，以及死亡的种子”。^⑨此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的断言与清朝政治家在其光辉灿烂的时代对世界其他人的看法同样尖刻，也同样能够令人理解。

注释:

- ① 转引自谢正光(译者注:Cheng-kuang Hsieh 音译):《曾国藩,十九世纪的儒将》,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3页。
- ② 邓嗣禹(Teng Ssu-yu)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概览,1839—1923》,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3—54页。
- ③ 前引邓嗣禹著第62页。
-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纽约1909年版,第168页。
- ⑤ 芮玛丽(Mary Wright):《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防线:同治中兴,1862—18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 ⑥ 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28页。
- ⑦ 邓嗣禹(Teng Ssu-yu)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著,第47—48页。
- ⑧ 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二卷,上海1910年版,第37页。
- ⑨ 前引马士著第38页。
- ⑩ 徐中约(Immanuel Hsu):《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外交》,《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页。
- ⑪ 前引徐中约著第133—134页。
- ⑫ 龙夫威(Fred Drake):《中国描绘世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59、164—165、187、245页关于华盛顿纪念碑的记载。
- ⑬ 芮玛丽(Mary Wright)著,第252页。
- ⑭ 缪尔(G. E. Moule):《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对欧洲贡献》,载《亚洲文会华北支部杂志》1871年第7期,第150—151页。
- ⑮ 容闳著,第3—4页。
- ⑯ 布鲁纳(Katherine F. Brune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史密斯(Richard Smith)编:《在中国供职:赫德日记,1854—1863》,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32页。
- ⑰ 魏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蒲安臣与中国派往列强的第一使团》,纽约1912年版,第136—139页。

- ⑱ 韩德(Michael Hunt):《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 ⑲ 前引韩德著第93页,引文出自布莱恩(James G. Blaine)语。

第四章 清朝晚期新的震荡

1. 自强运动和甲午战争

儒家政治家们以他们的才能、忠诚和毅力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十九世纪中期的叛乱,看起来中国似乎已经能够应付新的挑战。他们举起重建大清帝国秩序的大旗,建立新的制度结构,以处理外交关系,征收关税,制造现代化的船只和武器,并教授国际法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知识。事实证明“自强”并非只是空头口号,它显然是一条兴邦治国的可行途径。具有进步思想的汉人和满人同心协力,选择性地接受中国所需的知识和技术,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方面得以保持。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如乡村不断地军事化、地方财税的自治、地主的横行、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好战的外国势力在军事、外交和传教等方面的人侵。但是只要有强有力的帝国领导集团和坚定果决的军机处,清王朝也许可以重达往日的强盛。

不幸的是率领王朝自强图存的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并未出现。以同治皇帝之名所称的同治中兴时期,中央和地方积极有为,但是1875年,年仅十八岁,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突然去世。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天花,但是广泛的传言却是他放浪不拘的生活及在北京的声色场所任情放纵而死。当他去世时年轻的皇后正身怀六甲,但同治母亲慈禧太后召开的决定皇位继承的会议却将她拒之门外。

慈禧太后保持自己权力的惟一办法就是继续摄政。因此她立了三岁的侄子光绪即位，从而确保自己又操纵了多年政权。同治正有身孕的遗孀那年春天去世，婴儿也胎死腹中，这更保障了慈禧太后计划的成功。然而，选立光绪违犯了大清皇位继承的基本法则：光绪是同治的同辈兄弟，而不是后辈，因而不能在同治灵前执孝子之礼。慈禧太后为平息对这一点所有的公然反对，答应光绪生子后将过继给同治，这样就能执行必要的仪式了。一位深怀儒家孝义的正直大臣在同治墓前自杀，以抗议慈禧的决定，但是再无别的文人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朝中大臣全都缄口不言，显然都对一位强权女性继续垂帘听政听之任之。

慈禧是一位复杂而有才干的女性，虽然在她认为必要时也会表现得心狠手辣。她是清朝惟一执掌最高政治权力的女性，后来那些认为她根本就不应该染指权力的男人指责她该为王朝的诸多不幸负责。慈禧生于1835年，她的父亲出自显赫的满人家族，但只是做了一个小官。1851年她被册封为咸丰皇帝的妃子，1856年当其为咸丰生了一儿子时，就成为他最宠爱的人。咸丰和她讨论政事，允许她阅览奏折。1860年联军入侵北京时她陪伴咸丰逃避到热河，1861年咸丰去世，她发动宫廷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此后，慈禧在其儿子同治皇帝1861—1873年在位及其侄子光绪1875—1898年在位期间，一直垂帘听政。1898—1908年，根据她的命令，光绪皇帝被软禁在宫中，她就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通晓文墨的慈禧坐在帘后听那些男性大臣们的奏报，对国家事务巨细备知。她政治上保守，财政上挥霍无度，然而也支持很多自强运动者的很多图谋中兴的改创。与此同时，她又谨小慎微地保护着清朝皇室的统治特权。

外交政策问题将会成为所有决策中的首务，而正在这一形

势下,1869年恭亲王处决了一个慈禧宠爱的滥用职权的太监,使慈禧和恭亲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确实是不幸的。太监权力泛滥,贪污腐败日甚,历来是王朝江河日下的标志,清朝早期的统治者们立誓永不重蹈晚明允许宦官干政的覆辙。恭亲王也许就是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但慈禧太后却认为此举是冲着她个人的,此后就对恭亲王竭力钳制。

得力的地方大员曾国藩于1872年病歿,能干的文祥也于1876年谢世,左宗棠仍然在遥远的西北平定回民叛乱。北京的大臣们虽然仕途中个个业绩显赫,但他们因循守旧,缺乏引导中国开创新的局面的能力和雄心。自强的计划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虽然仍未中辍,但是仅凭李鸿章一己之力已独木难支了。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及完成了天津大屠杀善后谈判之后,李鸿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他被调往北方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两项要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的岁月里,他给中国留下了比任何人都更深的烙印。

李鸿章的政治业绩主要在三个领域:实业、教育和外交。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在自强运动初期就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基础。他努力发展各种将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企业,也包括清政府和民间商人的合作,称为“官督商办”。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它打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沿海航运的统治地位。这个由李鸿章为主要股东的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承运华中至北京的漕粮。根据李鸿章的命令,1877年后天津附近的开平煤矿大幅扩大开采,使中国更多地控制自己的矿藏资源,为中国不断扩大的海军舰船提供燃料。1878年,李鸿章还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大型的棉纺厂,遏止了纺织品进口不断增长的势头。

18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继续建造兵工厂,为从海外购买

的枪支生产弹药。不久还用采购来的美国设备,开始自己制造枪支。李鸿章还将终端在上海的国际缆线先后连接到天津和北京,接着将分线连通内地的很多大城市。他又在东北南部的旅顺建造新的码头,修建了一条七里长的铁路支线将煤从开平运到附近的水道,确保随时运往天津,供给新成立的舰队。中国的车子原本都是用骡子拉,但是1881年李鸿章的一位下属用西方的零件造了第一辆中国的蒸汽发动机,而且成功地用于运输。

李鸿章还努力推动早期的教育改革。他支持派遣一个教育代表团到美国的建议。这一想法最早由容闳提出,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朝廷批准了这一计划。1872年,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的第一批中国儿童——其中很多人都是福州、天津和上海的新式兵工厂和造船厂雇员的子弟——被送到美国的哈德福和康涅狄格。在那里,他们同当地的美国家庭住在一起,投入到忙碌的英语、一般课程和中文的学习中。到1875年,总共派遣了一百二十名留学生。但是在美国城市的学校和社会环境中,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要保持清政府所坚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很难的。孩子们开始脱下长袍,穿上西式服装,有几个不堪忍受当地人的嘲弄,还剪掉了长辫子。很多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容闳自己娶了一个哈德福的教师,就是西方社会对这些学生强烈的吸引力的最意味深长的典型事例。

但是使李鸿章的使团遭受打击的是,他们发现美国政府不愿意如李鸿章所希望的那样,挑选一批学生在完成了高中教育后,进入安纳波里斯海军军官学校和西点军校。因而1881年他勉强同意了保守大臣的决定,撤回了使团和学生。1881年8月,他们从圣弗朗西斯科乘船回国。他们在美国领土上最后的胜利是打败了奥克兰棒球队,奥克兰棒球队原本希望轻易取胜,却被中国投球手刁钻的发球打败了。这批学生回到中国后,很

多人成为军队、工程和商业领域中的佼佼者。李鸿章又转而派遣学生到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拒绝让中国学生接受先进的军事训练。他还在天津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和陆军学堂。

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对清朝更不友好了。在外交领域，李鸿章——有时候他依靠他自己，有时与赫德和总理衙门联合——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在1870年代，与日本交涉琉球群岛和朝鲜地位问题就是其中的两个。在这些事件中，中国无一能够主张自己的特殊权利，因为很多世纪以前形成的、彰显中国文明优越于邻国家的朝贡体制，现在已经不堪一击了。事实上，清朝对日本在此时的大肆扩张完全措手不及。这一局面始于1854年美国海军司令培利迫使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承认国际关系和贸易的事实。开始于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推动经济和体制改革上成效显著，日本有能力以优势的军事欺凌中国。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若非李鸿章说服朝鲜国王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从1871年起德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签订条约，1880年代朝鲜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1876年英国领事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李鸿章又不得不开始与英国人进行复杂的谈判。马嘉理受派遣与一支英国调查队一起探索修建从缅甸到云南的公路或铁路的可行性。在签订的条约中，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意赔偿七十万两，派遣使团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增开四个通商口岸，这等于从根本上承认了清王朝的软弱。对中国较为有利的是1870年代末总理衙门和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主持的与俄国人的谈判。根据《圣彼得堡条约》，俄国人同意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将自回民暴动以来被俄国人占领的伊犁部分地区归还给清朝。虽然俄国还占领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北的大片中国

领土,但是《圣彼得堡条约》保障中国对 1884 年清朝宣布建立新疆省时的西部地区控制权。

与俄国人交涉的成功助长了清朝朝中大臣错误的信心。当法国拓展殖民者 1880 年占领河内和海防——不顾中国宣称在这一地区的特殊权利——开始迫使中国在越南作出新的让步时,李鸿章呼吁清朝保持审慎态度。但是他的呼吁被激动好斗的满、汉官员置之一旁,他们坚持清政府在原则问题上应采取强硬立场。就在 1884 年李鸿章与法国人斡旋,以避免发生冲突,那些主张采取强硬措施的人却在越南和邻近的东京湾继续与法国人作战。这一地区的法国舰队司令将军队开到福州,停泊在靠近中国舰队的地方,作为对这些敌对行为的反应。

无论条约将会怎样屈辱,李鸿章还是促成了清朝与法国的谈判,因为他知道新兴的中国海军是多么脆弱。当 1884 年谈判破裂,法国舰队在福州开火,事实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证明了李鸿章是正确的。中国与发达的工业力量之间的差别再次昭然于世界。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在七分钟内,大多数中国舰只被击中。一小时内,所有的中国舰只都被击沉或起火燃烧,兵工厂和码头被毁。法国战死五人,中国则有五百二十一人阵亡、五十一人失踪。虽然清军在西南陆战中打了几个微不足道的胜仗,法国人还是牢固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一年后,英国效仿法国的侵略行为,宣布成为缅甸的保护国。

李鸿章原本可以命令清朝北洋舰队去增援福州的南洋舰队,但他却选择保存并进一步加强北洋舰队的实力,同时也是用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除了支撑李鸿章的权力和地位外,北洋舰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与朝鲜间航线的畅通。清政府新设了一个驻朝鲜大臣,留驻汉城,担负着保持与朝鲜密切关系的艰巨使命,确保朝鲜的独立不会导致中国在这个国家的保护国

地位的衰减。清朝希望能确保日本不会永久插足朝鲜。1890年代,随着日本入侵朝鲜半岛意图的日益暴露,局势更趋紧张。1894年,国内叛乱的爆发威胁到朝鲜国王的统治,中国和日本都抓住这一机会派兵保护朝鲜皇室。出兵比中国更快的日本于7月21日占领了朝鲜王宫,扶持了忠于日本利益的摄政王。

就在同一天,清政府租用一艘英国运输船将一千二百名中国援军送到朝鲜。运输船被日本巡洋舰中途拦截,拒绝投降而被日舰开火击沉,生还者不足两百人。到7月底,日本登陆部队在汉城和平壤周围的一系列战斗中打败中国军队。10月,日本人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11月另一支日本军队占领了重兵防守的旅顺口,在该城大肆屠杀中国人。日军当时准备直入山海关,进军中国内地,犹如两个半世纪前多尔衮所做的那样。

尽管李鸿章竭力保存,现在北洋舰队还是面临了与南洋舰队同样的命运,甚至会对中国的自强目标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由两艘主力舰、十艘巡洋舰、两艘鱼雷艇组成的北洋舰队,在9月鸭绿江口战斗中已严重受损,撤退到了严密设防的山东半岛北端的威海卫港。中国的水师提督将其舰队隐退到密集的水雷保护屏障之后,不再参加战斗。但是1895年1月,在一次精明的机动作战中,一支两万名陆军和一万名工兵组成的日军穿过山东半岛的海岬,从陆上占领了威海卫防御工事。他们将炮口转向中国舰队,与此同时用鱼雷艇穿过了水雷区,击毁了一艘主力舰和四艘巡洋舰。两名中国海军将领和要塞长官自杀。

在绝望之余,朝廷转而请已失势的恭亲王帮助谈判,局势犹如三十五年前在灾难性的《天津条约》谈判期间圆明园被焚时一样。恭亲王伤感地告诉西方外交官,他被授予的差事就像弥合被大臣们摔碎在地上的杯子。^①清朝廷选择最著名的大臣李鸿章辅助恭亲王,并派他只身一人赴日本与胜利者谈判。

1895年4月最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的内容使中国遭受了惨重损失。若非因为一名日本刺客开枪刺杀李鸿章,打伤其左眼下方,在全世界面前使日本政府遭受了耻辱,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中国不得不承认了朝鲜完全彻底的独立自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更有利于日本将朝鲜变为自己的保护国。清政府还允诺给日本两亿两战争赔偿,增开四个通商口岸——包括长江上游四川省的重庆——并将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南部的辽东地区永久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人在任何通商口岸区设立工厂企业。其后,俄国、德国和法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放弃对辽东的领土要求,作为交换,清政府增加了三千万两赔款,但是条约的所有其他规定得到三国承认。很多聚集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不畏清政府的恼怒,激烈抨击《马关条约》,要求实行新的大胆的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改变丧权辱国的境地。但是清朝廷似乎无动于衷。这给自强运动时代最充满光明的希望画上了一个黑暗的句号。

2. 1898年的维新运动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新、旧因素并存。在很多层面上,变革的脚步势不可挡。蒸汽轮船在长江上穿梭,上海的外滩新式大银行一线排开,军事学堂用源源印刷的西方战术和科学教材训练年轻的军官,奏折通过电报闪电般地从各省传到军机处。西方列强在一系列的胜利后,巩固了在中国的地位,开始在这个国家大力投资,特别是在矿产、现代化通信和重工业领域。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不仅深刻,而且加剧了自强运动中业已出现的紧张局势。

很多显著的变化都是出现在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区。即使

是最富于进取精神的外国商人对中国乡村的渗透也很缓慢，在几乎所有活动中，西方人都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即所谓买办——通过传统的贸易和流通渠道为他们的产品打开市场。对于大多数富足之家的年轻子弟而言，教育模式仍沿袭不变。他们诵读儒家经典，努力获取当地的生员资格，然后进一步考省里的举人和最后参加国家的进士考试。在城镇和乡村，女孩子们仍然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规的教育，她们仍然缠足，仍然听命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土地耕作上，播种和收割仍然是手工操作，用人力将产品运至市场出售。外国人——假如有幸被看到——仍被视为异类或是威胁。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对此任命不以为荣，而且回国后还常常受到歧视，被迫早早地致仕。

传统与变迁确实在相互渗透，只不过它通常是长期而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中国农民顺应国内对烟草或棉花这类经济作物新的需求，可以比以前获得更多的收入，但也更容易受当地市场波动的影响。茶叶和丝绸生产者更须适应世界市场，世界价格的波动会突然导致市场行情莫名其妙的枯荣变化。日本和美国机器纺织的精密技术要求更为平滑的生丝，这就意味着那些世代直接用茧手工纺丝的农民家庭面临着自己产品需求的萎缩。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和新的城市读者群的增加推动了报刊杂志业的发展。它们把政治评论介绍给读者，刊登健康美容产品的广告，为每一个人灌输着新的选择意识。中国只不过置身于众多国家之中的观念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因而也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没有男女公民也就没有国家。中国第一批定期发行的报纸开始宣扬这些观点，这也是学者们回应深受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所到来的羞辱和打击的方式。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岁月里，广泛传播的一句简洁而深刻的话，使那些担心自强运动的价值观的学者们吃了定心丸：“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简称为体用思想，这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痛苦波动的彷徨之后，从文化上确保了自己的取向。它以中国道德和哲学观念内在的基本结构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并更赋意义。如果坚持这一信念，中国将能够快速而大量地接受各种西方实用技术，并聘请西方的顾问。

体用思想最受儒家大臣张之洞钟爱，他曾经是中国保守派中强烈主战的人物。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差不多十八年，政绩显赫。他可能是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成效的地方改革者。张之洞大力推动修建汉口到北京的铁路并获成功——向国外贷款——还在湖北东部建成了中国第一个融采煤、冶铁和炼钢于一体的汉冶萍矿区。然而，他不断强调循序渐进地改革的必要性，反复宣称要坚持儒家传统道德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以迎合慈禧太后及其辅政大臣。

很多最优秀、最有成就的中国年轻一代儒士获悉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后群情激奋地联合起来，向皇上上了一道万言书，敦促朝廷继续抗日，并要求实行更广泛的经济、工业和行政管理改革，这与张之洞的体用主张是相呼应的。这些人于1895年春天集聚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在其中协调组织的是两位胆识过人的学者——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是来自广州的三十七岁的杰出经学家，他声名远闻，但是也因为他对儒家学说不拘一格的阐释而招致了非议。在早期的著作中，康有为凭借其丰富的经学知识，试图证明孔子并不反对社会变革，儒家思想并不否定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受到了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公羊学派”学者的影响。第二个学者梁启超是年二十二岁，是康有为的学生。他以前就积极参与地方的学术活动，新近又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社团，提倡迅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他的激进主义主张，他与康有为一样，也希望考中进士，追

求这条通向上流社会的无上荣耀的道路。

康有为也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有浓烈的救世情结,他把自己视为能够拯救中国百姓的圣人。他游历香港和上海,考察了那里的西方技术和城市发展状况,同时阅读了物理学、电学、光学等书籍,使他更坚信了体用结合的理论。梁启超也受到了其信心和激情的熏染。万言书在心怀顾虑的大臣们相互踢了一圈皮球之后,终于上呈给光绪皇帝御览了,康、梁等人欣喜若狂。现年二十四岁的光绪皇帝刚刚从在已修复的圆明园里过着半引退的生活的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他对改革有着强烈的兴趣,被康有为、梁启超及举子们的万言书所打动。

1895年的“公车上书”提出了很多中国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们正深感困惑的问题。他们写道,中国需要一支装备西方火器和大炮的现代化军队。为了发展国家的工业基础,朝廷应该号召有技能的东南亚华人回国。应该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建造商业船队,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中国应该通过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品质,设立培训中心,鼓励创新,激发出使美国的发明家们每年提出一万三千余项专利那样的创造才能。应该发展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定居计划,以将每年成千上万的、有生产能力却不断流向海外的中国移民吸引回来。以前只有像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这样的叛逆者才公开赞成这样彻底的变革,但是现在中国最优秀的儒家青年们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执着的改革者们要求用人们可以接受的传统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收效甚微。虽然年轻的光绪皇帝似乎有意于改革,但却没有实权。其他保守大臣把这些建议奏折安全地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但是到1890年代,变革的呼声不再局限于这些比较正统温和的渠道。像年轻的孙逸仙这样的改革者们选择了一条

不同的道路。孙逸仙出生于广州地区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没有康有为的家庭所拥有的教育和地位。像东南地区成千上万的贫穷的中国人一样，孙氏家族中一些人在十九世纪也移民海外。其中两位死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潮，其他的定居在夏威夷。1880年代孙逸仙投奔在夏威夷的哥哥，在转到香港的医学学校以前，他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学校给灌输民主共和政治的思想和基督教教义。文化上的中西结合，加上雄心大志，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深切忧患，使孙逸仙于1894年向总督李鸿章上书，为中国的国防和发展献策。李鸿章正被朝鲜和其他地区危机搅得心烦意乱，没有理会他的上书。

孙逸仙深感失望和挫败。而英国政府认为他所受的医学训练还不足以在英国的领地内执业行医，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看重他的医术。结果孙逸仙于1894年末在夏威夷组织了一个秘密协会，叫兴中会，立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从他的哥哥和其他朋友那里募集了一些资金，1895年他来到香港，试图联合广州附近的秘密会社，发动武装起义，向全国发展，并推翻清王朝。由于组织不力，保密不严，加之缺乏武器和经费，计划被清朝当局发觉，当地的一些首领被处决。

孙逸仙从香港逃到日本，最后来到圣弗朗西斯科和伦敦。在伦敦，他住了下来，并开始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1896年清朝驻伦敦领事馆的职员笨拙（却几乎成功）地策划了一次绑架，想将他押送回国审判并处决，他的研究也因而中断了。这个戏剧性的故事被西方媒体广泛宣传，孙逸仙也成为了一个著名人物。孙逸仙再次回到东方，并在东南亚和日本建立了一系列基地，继续通过秘密社会和自己的同志筹划反清政变。

孙逸仙在那些生活动荡，敢于冒险，不太效忠清朝，经历了海外生活酸甜苦辣的中国人中寻求支持。其中的一个支持者是

宋查理,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在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宋查理生长于中国南方的海南岛上的一个打鱼经商的家庭。宋查理离开海南岛,到爪哇与亲戚一起生活,1878年又乘船来到波士顿,在一个中国商人家庭当学徒。宋查理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又跑去航海,在美国税务机关缉私船当了船员,最后由船长介绍给几位慷慨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他们将他送入大学,准备做一名传教士。1886年他回到中国,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传教士,但他发现这并不光彩,而且收入菲薄。1892年将精力集中到为西方传教士印刷和分发传播《圣经》上,发了大财。不久,他的业务扩展到用西方先进机器生产的面粉厂,搬进了上海郊区一所舒适的洋房。就在这时,他通过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开始给孙逸仙的非法组织提供经费。

到189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国了解的日渐增多,中国人可以广泛地认识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等的政治模式。

中文报刊和以古讽今的书籍广为流行,赞颂西方历史上的思想家,将波兰、土耳其和印度的事例作为中国的借鉴,他们各自都曾被人瓜分,经济荒毁,政治上受压迫。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纷纷提出在华特殊的经济和居留权利——通常称为“势力范围”——将清朝推向更为危险的境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光绪皇帝在治理国家上无疑会比他以前的皇帝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他一直学习英语,坚持自视为独立的君主,以国家利益为行动准绳。1898年7月至9月间他颁布一系列不寻常的诏书,这段时期被称为“百日维新”。虽然大多数诏书都是根据自强改革者和1895年公车上书提出的建议拟定的,但是以前从未有过皇帝主动参与、积极支持,上下一致推行改革的现象。

光绪皇帝要求在清朝国家生活的四个主要领域进行改革。

在改革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方面，他下令废除“八股文”这一束缚科举制几个世纪的、高度教条化的形式。他还提出书法和诗赋不再作为区分考生等第的标准，而代之以与安邦治国关系更为密切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他还下令扩大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部，将旧式学堂（连同不必要的乡村私塾）转变为传授中西学术知识的现代学校，开设职业技能课程，学习采矿、工业和铁路。在经济发展更广泛的领域中，光绪皇帝要求地方官员在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实行改革，增加茶叶和丝绸产量以供出口。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管理茶叶和丝绸的产销，以及矿产和铁路，户部负责拟定全国全年的财政预算。

光绪皇帝还要求增强军事力量。海军的军费很多曾被用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还包括一艘供她赏湖的大理石“船”。现在，通过海外采购和自己建造，又组建了一支有三十四艘现代化战舰的舰队。军队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标准化的训练，地方团练的训练和纪律也有了提高。光绪皇帝甚至许诺，要带着慈禧太后到天津检阅新式军队。最后，他试图通过整顿吏治、简化程序，提高官僚机构的效能。他裁汰冗员，将一些官员调至新成立的经济计划官署供职。

在这一改革计划的推行中，作了几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逐渐失势的李鸿章现在被调到总理衙门。光绪自己的老师因为改革上趋向保守而被解职。几名改革派思想家（包括康有为）被任命为军机处或总理衙门要员，以便参与机要，能直接上奏折给皇上。康有为获准进见皇上，呈上两部关于历史分析的著作：一部是关于波兰命运的，另一部是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胜利。但是很多大臣对光绪的改革计划抱有偏见，认为它有害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并将毁坏中国内在的价值观念。光绪错误地以为他的伯母慈禧太后会支持他的新中国的蓝图，

帮助他压制反对派。事实上，她却为一些会威胁和削弱清皇室地位的改革措施而担心，害怕支持光绪的改革派会危险地屈从于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和影响。

虽然获得的证据前后不一，一些改革者似乎还是担心可能发生反对皇上的政变，他们因而与一些统军的将军接触，希望争取他们的支持。当这一计谋被慈禧太后获悉时，1898年9月19日她突然回到紫禁城，局势顿时逆转。两天后，她下懿旨，声称皇帝请她继续摄政。她将光绪软禁宫中，逮捕了六名激进的改革辅臣。在对其进行模棱两可的阴谋罪行指控以前，慈禧就下令将他们处决了，使改革党和在中国的洋人们大为惊惧。康有为在政变前被安排离开北京，但是他的弟弟却在牺牲者之列。朝廷悬赏他的首级，康有为被一艘英国船只安全地送到香港，接着他取道日本，然后去了加拿大。梁启超也逃离了中国，开始流亡生涯。他和康有为的改革梦想，虽然打着建立新中国的旗帜，又有皇帝亲自统筹实施，但还是灾难性地结束了。

3. 民族主义的三个面向

1898—1899年间，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浪潮的一个部分，外国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德国借口他们的传教士受到攻击，出兵占领山东的港口城市青岛，宣称拥有青岛周围农村的采矿和筑路权。英国则接管了山东半岛北端的威海卫港（三年前清朝舰队在这里没有起锚就被日军击沉），强迫清政府将香港北边九龙半岛大片肥沃的农田租借给英国九十九年，英国将其称为“新界”。俄国也出现在东北，占领了旅顺，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法国宣称在与越南交界的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及海南岛拥有特殊权利。已经独霸了台湾的日本又继续对

朝鲜施加压力,并加强对华中地区的经济渗透。美国则向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所有国家都不能拒绝其他的国家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通过道德的影响减缓中国被瓜分豆剖进程,但各国并没有达成一致支持这一政策。一些中国人开始担心——也确实足堪担心——他们的国家将会被瓜分。

在仇视和忧虑的气氛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在中国滋生。其表现形式众多,综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民族主义。对于汉人而言,其中寓含着急迫地重新认识与外国势力和满人关系的情绪。它也包含着中国人民团结一体,谋求生存的相应思想。我们可以从三个事例看到这一现象的日增月长:1900年的义和拳暴动、1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出版、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1898年,义和拳作为一股势力开始在山东西北部地区出现。他们的名称和威武的仪式来源于前些年在山东南部流传的各种秘密社会和自卫团体,主要是在西方传教士及其信众的刺激下出现的。一些拳民相信自己刀枪不入。他们杂糅了民间信仰、通俗小说和街头戏剧中的因素,制造了众多的生灵和保护者。虽然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但是义和拳吸引了被洪灾和随之而来的旱灾逼得走投无路的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参加。他们开始要求取消中国基督教徒享有的特权,并开始袭击信徒和传教士。到1899年初,他们捣毁或偷窃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大量财物,在山东和河北交界地区杀死了几个信徒,惊慌失措的外国人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拳及其支持者。义和拳则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不久将其编为琅琅上口的打油诗,其中的一些被作为墙头标语张贴在义和拳的坛口或街角: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父母产。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②

1900年春天——这是他们的首领预言的新的宗教时代诞生的一年——义和拳急剧扩大。也许百分之七十的拳民是贫困农民、男子和青年。其余则来自行商小贩工匠艺人等，这与以前很多反清起义情况一样。在义和拳的队伍中，有小贩、人力车夫、轿夫、运河船夫、皮匠、磨刀匠、理发匠等，还有一些是遣散的士兵和私盐贩。义和拳中还有妇女组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红灯照”，这些女性的年龄通常在十二到十八岁，她们是用来对付中国女性基督教徒的。义和拳相信，女性基督教徒会腐蚀男性拳民的力量。在女拳民中，最著名的是“黄莲圣母”，她是一个贫困的船夫的女儿，曾经做过妓女，人们相信她有神奇的力量。其他的女子被编队，组成“沙锅罩”，她们用罐子给义和拳队伍提供伙食，据说这样每顿饭后会精力倍增。

在尚没有统一协调的领导核心的情况下，6月初，义和拳各股势力开始向北京和天津进发。他们头戴红、黑或黄几色头巾，绑着红色裹腿，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装五颜六色，在大街上游荡。他们摧残——有时甚至杀害——中国教徒，甚至是那些拥有灯、钟或火柴之类洋货的人。义和拳还杀了四个法国人和比利时工程师，以及两位英国传教士，拆掉铁路，烧毁车站，切断电缆。强有力的地方官员们也 and 朝廷一样态度动摇不定，有时

派军队迎击义和拳，保护洋人，有时候似乎又宽恕甚至支持义和拳排外的“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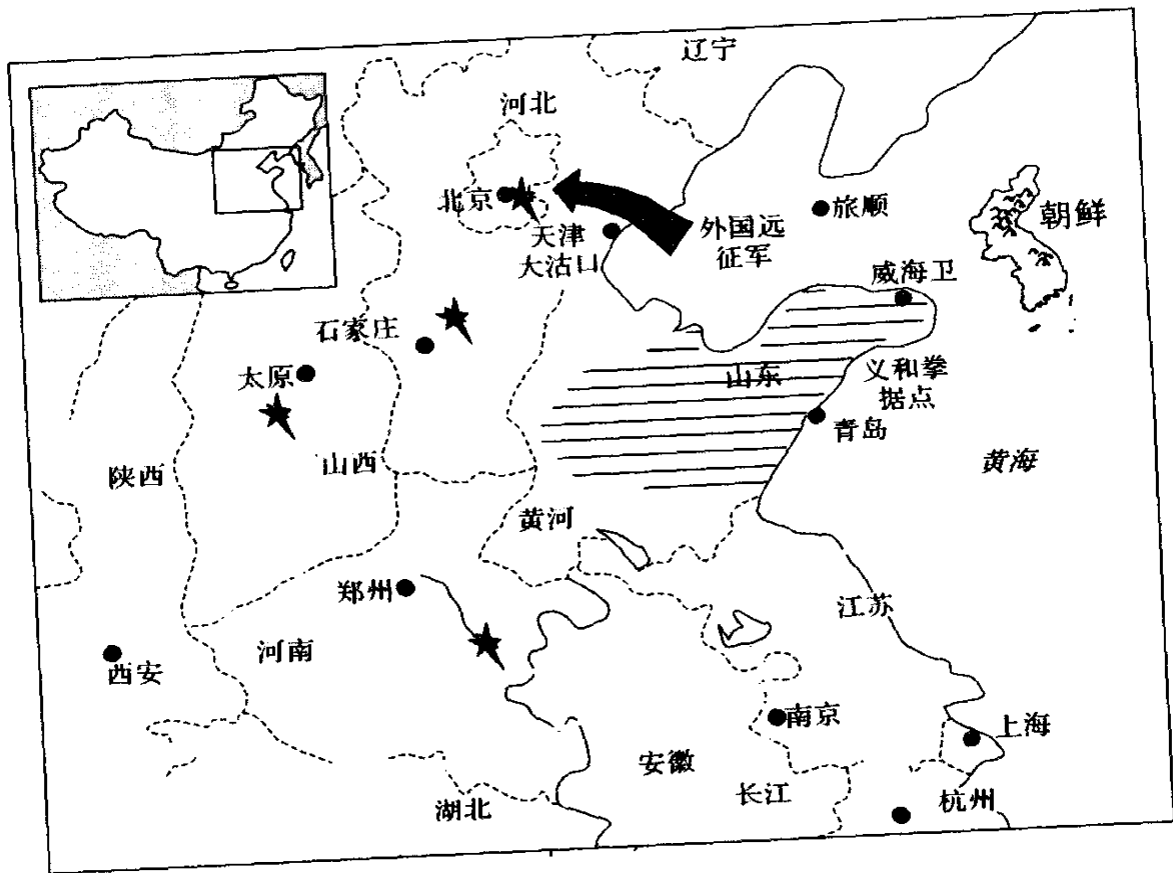
6月17日，列强军队从清军手中占领了大沽口要塞，以便一旦战争全面爆发，就掩护部队登陆。两天后大沽口战斗的消息传到北京，德国公使在去总理衙门会见时被枪杀于大街上，义和拳包围了外国使馆区。慈禧太后现在认可义和拳是一支忠诚的民间武装，1900年6月21日，她签署“宣战诏”，抗击列强，诏书写道：

彼乃益肆梟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③

义和拳现在有慈禧太后和满人大臣明确的撑腰，不断地袭击教会和洋人。山西、河北和河南的袭击行为特别激烈，其中最猛烈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山西。山西总督满人毓贤将传教士及其家属都召集到山西首府太原，答应保护他们不受义和拳袭击。但是一旦他们到达太原，他却下令将所有四十四名男女（包括儿童）全部杀害。

在北京，外国外交使团及其家属撤退到设防的地区，主要有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的人员，他们用家具、沙袋、木料和床垫等设置起临时的路障，仓促防御。如果义和拳被更好地组织起来，并有大量清朝的正规军参加袭击，西方人确实可能无一能幸免。但是袭击行动并没有组成协调一致的力量，现代化的清军也置身事外，华中有实力的总督如张之洞，踟蹰观望，拒绝将其新式军队投入冲突。

1900年8月4日，主要由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人组



义和拳暴动示意图(1898—1901)

成的大约两万人的远征军，在复杂的联合指挥结构的指挥下，离开了天津。义和拳的抵抗很快被粉碎，清朝的几位主要将领自杀，西方军队进入北京，于8月4日解除了义和拳的包围。当 they 从东方进入这座城市时，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向西逃离了北京，在渭河河谷城市西安建立临时都城。新到的德国远征军首先参战，经过一番苦战和与流亡朝廷及李鸿章（再一次充当不可或缺的关键者）的复杂谈判，于1901年9月签订了正式的和约，即著名的《拳乱协定》。^{*}

在该条约中，清政府同意为死去的两百多名西方国家的士兵树立纪念碑，取消发生过暴力排洋事件的城市各级科举考试

* 即《辛丑条约》。——译者注

五年,禁止中国进口各种武器两年,允许外国派遣常驻军并修筑永久炮位保护使馆区,将总理衙门改为名实相符的外务部,处决领头支持义和拳的人,包括山西总督毓贤。他们还同意赔偿外国的生命财产损失四千五百万两(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六千七百万英镑,或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在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亿五千万两的情况,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中国将用黄金偿付赔款,在1940年11月31日分期偿清所有债款以前,将支付4%的利率。加上所有的利率,中国三十九年间赔款总数几乎将达到十亿两(准确的数字是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1902年1月,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乘火车从西安回到北京,正逢七十八岁的李鸿章病故。慈禧重新住进被外国远征军充当总司令部达一年多的紫禁城。这个月底,显然是出于真诚的和解姿态,她在宫中接见了外国外交使团的高级成员,2月1日,做出前所未有的举动,为外交官的夫人们举行了招待会。但是仍然不许光绪皇帝扮演公开的政治角色。

两位流亡的改革者——孙逸仙和康有为——1900年都曾试图利用义和拳暴动之机,各自发动对清朝的袭击。康有为于8月在湖北和安徽,孙逸仙于10月在广州东部的惠州起事。康有为的目标是恢复光绪皇帝在立宪君主下的权力,而孙逸仙则想建立中国的共和制。两人的计划都没有足够的经费和很好的协调,都被清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

现在抗议的形式又回到了著书立说。最为铿锵有力的是一位叫邹容的十八岁的学生,他的著作提供了研究民族主义新形式的第二种范例。邹容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益增多的赴日本留学的青年之一,由于对日本实力的敬畏,这些学生试图考察其根源。邹容对清政府在这个危机的时代表现出的明显的无能日感

失望。像以前的秘密社会和太平天国领袖一样，他强烈谴责清政府，但与以前的那些反叛者不同的是，他不只是用口号，而是认真起草了控诉清政府的长篇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从日本回国后，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区，根据与治外法权相关的复杂的法律协议，租界居民要服从西方司法管理的联合法庭。这些居民可以写作并传播其著作，而由清朝官吏和警察管理的普通城镇的居民不可能得到的自由。

邹容在其不长的著作《革命军》(1903年)中集中表达了反清思想。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号召汉人同胞反抗满人的束缚，掌握自己的命运。邹容说，汉人成为了奴种，曾国藩这样的人镇压太平天国，远非英雄，而是满人的奴仆和自己同胞的屠夫。汉人应该学习西方的榜样，如果人民能够觉醒，团结战斗，就能推翻国内的暴政，使国家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正如邹容所写：

吾不惜再三重申详言曰“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到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凌辱，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皇帝神明之汉种，今倡革命独立之原因。”^④

他强烈呼吁汉人同胞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

尔有政治，尔自司之；尔有法律，尔自守之；尔有实业，尔自理之；尔有军备，尔自整之；尔有土地，尔自保之；尔有无穷无尽之富源，而须自挥用之。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⑤

这些挑战性的呼吁，加上邹容敦请选举议会，给予女性平等权利，保障出版和集会自由等要求，读来令人回肠荡气。这份小册子广泛传播，孙逸仙敏锐地将其作为攻击态度更为保守的康有为的手段，印发了数千份给他的圣弗朗西斯科和新加坡的支

持者。清朝官员向上海的西方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其交出邹容以及与他合作印刷和传播其著作的作家和记者。西方人拒绝了清朝的要求,1904年在上海联合公廨以传播煽动性著作的罪名受审。他被判刑两年,而清朝法庭则会立即判处其死刑。犹如命运残酷的作弄,邹容幸免了在清政府手中受辱并痛苦死去,却于1905年病死于狱中。虽然他年仅十九岁,还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

在邹容受审讯期间,另一波抗议外国虐待华人的浪潮正在酝酿。自从美国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和强制签署了条约,美国人采取了很多针对中国移民的敌对行动。美国财政部移民官员闯进美国城市的华人家中,声称检查登记证,残害和驱逐更为普遍。抵达美国港口的华人——包括应邀前来参加圣路易斯市博览会的代表这样的高级来访者——都会受到粗暴对待,甚至虐待。当美国的排斥政策扩及到夏威夷和菲律宾的中国居民,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到1905年,一种新的回应正在中国发展着,亦即民族主义情感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新近成立的清朝外务部,在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敦促下,对美国虐待华人的行径深感愤怒,拒绝与美国重新签订移民条约。为了声援中国的立场,1905年6月,广州、上海、厦门、天津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宣布联合抵制美货。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抵制活动,特别是1880年代汉口商人的抵制行动,但是都没有这样广泛并赋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虽然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一些清朝地方官员也介入了,特别是中国北方的一些通商口岸,但是抵制活动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广州和上海很有成效地发展起来。清朝廷最终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发布公告,反对这一行动,但是因为很多城市,公告都被倒着贴,中国的抵制者们正确地猜测到朝廷对禁令的矛盾态度。在加利福

尼亚和俄勒冈华人的资助及中国学生——很多是最近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爱国热情的支持下中国商人拒绝经营美国的香烟、棉花、煤油和面粉等商品。直到9月底，联合行动逐步分散，贸易渐渐恢复正常。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不像义和拳暴动或邹容充满激情的言词那么激烈，但是试图通过联合的经济行动来回应民族屈辱的行为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民众运动的出现。

4. 新兴的力量

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或许除了那些在远离城市的农村按照传统的方式辛苦劳作的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开始受到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压力的冲击。然而，即使这些贫困的农民也知晓，如果新的改革付诸实施，税收将要增加，他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聚集抗议，都被清军或新成立的警察部队野蛮镇压。海外留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工人等那些一度被忽视的人在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

在1880年代清政府从美国的哈德福和康涅狄格招回官派学生团后，新一批中国学生又前往欧洲，目的地通常是英国和法国。严复是这次留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860年代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派往英国，进入朴次茅斯和格林尼治海军学校，在那里学习海军技术。尽管受到德国的强劲挑战，但英国的海军技术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还花大量时间考察西方司法实践，广泛阅读西方政治理论。在这一领域，他逐步对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产生了兴趣——就是那些试图将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用于说明社会组成要素的命运的人。

这些理论宣扬“适者生存”，物种若要避免灭绝，就要作出创造性的适应，对中国人而言，虽令人伤感，但它似乎与中国的处境若合符契。严复翻译的这类著作广为流传。严复 1879 年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1890 年升任总办。在履行诸多职事之余，他着手翻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弥尔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虽然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业生涯中他常常郁郁不得志——极度的沮丧使他染上了鸦片烟瘾——然而严复还是竭力给中国学生以思想的启迪。

1905 年清朝廷下令废除传统的儒家科举考试制度，对年轻人而言，在知识和学术上成功的道路更为宽阔了，也出现了更多新的选择机会。一个叫周树人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笔名叫做鲁迅，就是被这些新的潮流所吸引。鲁迅最初在浙江当地的儒家学校里读书，在十多岁时阅读了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后来加入到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潮之中。日本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年轻人。赴日本留学比美国和欧洲更便捷，更便宜，两国文字相类，服饰或饮食文化差异不大。1894 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后成了引人注目的典范，1904 年它又将旅顺的俄军击溃，于是更加令人向往。日本人引入君主立宪政体的方式使立志改革的中国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的书刊上中国人开始发现一些日本人新近创造，用来表达从西方引进的重要概念的新词汇，如“人权”、“宪法”、“民主”、“代表”、“议会”等。因为日本在自己的文字系统中使用汉字，这些新造的文字可以转换成浅显易懂的汉字，虽然事实上用在这些新词里的汉字在中国理解常常与其新的含义相冲突。在面对西方无法抗拒的力量，中国传统的“体”日见脆弱之时，日本的法律和医学学校、军事院校、政治学 and 经济学系科——所有这些似

乎都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新的希望。

1905年鲁迅正在日本学医时，从幻灯片中看到，得胜的日本人在一大群无动于衷的中国围观者中处决一个所谓的中国奸细，使他深受震动。他决心弃医从文，他相信这有助于唤起中国人民对自己处境的认识。鲁迅想，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如此混沌，也就几乎顾及不上中国人身体的健康了。他着手将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现实主义著作翻译成中文，以便使中国的学生了解过去半个世纪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重大问题。

虽然很多中国留日学生受政府资助，从技术上说如果行为不当就可能被遣返回家，但是清朝当局对成千上万的留日学生的管理是十分松散的。在这些情绪激动、精力充沛的人中，孙逸仙要为他的反清组织招兵买马并不困难。1905年他将自己的革命组织与一些其他的激进团体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当学生会会员完成学业，同盟会就将其派遣回国，在中国筹备最终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融合了孙逸仙的共和思想——他在欧洲研习和后来的阅读中形成的——与平均地税、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孙逸仙大胆的革命激进主义比康有为保守的君主立宪和保护光绪皇帝的主张逐渐更受关注。

留日的学生中有很多女性，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虽然一些中国的革命者仍然带着缠足的小妾到日本，还是有很多独立的年轻女性在父母和兄弟的鼓励下不缠足，并争取获得充分甚至先进的教育。答应提供住所和经济援助的未嫁的姐妹、发誓要娶有一双不时髦的大脚的年轻女子的男性群体，以及积极鼓励她们追求知识的学校给予了她们道德和社会的支持。这些女性在著名的西方人物中找到新的榜样，如圣女贞德、罗兰夫人、南丁格尔、碧雪等。她们的传记在杂志中翻译并反复刊行。还有一些像俄国的佩若夫丝卡亚那样的新典

型，她成功地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她被捕遇害，但因其面对专制暴政不屈不挠的勇气而成为典范。

虽然规模仍然很小——到1909年整个中国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女孩上学，几百名到海外留学——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来说，这是逐步培养文学才干，谨慎地回应中国积弱状况和家庭生活限制的时期。与作家鲁迅来自浙江同一地区的秋瑾树立了一个革命女性的生动楷模。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年轻时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商人之子，在突然离家出走以前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1904年她独自东渡日本。在日本她卖掉首饰养活自己，并得到朋友的帮助，她开始广泛学习西方科目，公开宣扬改革的重要性。

秋瑾被吸收到了孙逸仙的同盟会，她偶尔喜欢身穿男装，并且试制炸药。1906年，她回到中国，在浙江的一所小学里做了一名思想激进的教师，并保持着与同盟会会员的联系，还会见当地秘密社会成员。她经常进行军事训练，跨马驰骋，这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小镇居民的非议，但是她仍然我行我素。1907年7月，就在她任教的学校，她为了响应安徽的革命党同志，试图发动反清起义。当地军队稍费周折就将她逮捕，草草审讯后就处决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短暂、不幸而无所成就的生涯，然而她树立的榜样却赋予人们面对国家挫败时的勇气和动力，激励别的中国女性继续为政治自由而斗争。

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的商业领域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已经说到清朝的自强运动政治家们试图通过发展官督商办来拓展中国的经济基础，在造船和采矿等领域，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叠床架屋的管理和资金匮乏拖了后腿。到1890年代又发展出更有利可图的所谓“官商合办企业”。很多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上海官员，或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创办的，包括几

一个新式的纺织厂,拥有五十万或更多的资本。资金由富有的官员联合当地的士绅和商人筹集,虽然有时候商人基本上是在地方官员的逼迫下“捐献”的。从这一行为的基础上再推进一小步,地方官员就成为独立的企业家,或者就是一些富裕的地方人士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发展工业。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是一个大臣,他投资了新式的上海棉纺厂。聂缉规的两个儿子能说英语,不再担任一官半职,成为著名的资本家,1904年为这个家族赢利十万余两。

由于清朝廷、北京的官僚、各省官员和商人各有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成功地建立一种协调的经济政策。然而,朝中的一些大臣们还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努力。例如光绪的兄弟醇亲王在其履行为义和拳暴动的屠杀事件向西方各国政府致歉的使命时,会见了大量海外的中国商人。他回国后积极支持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推动,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与原有的六部和外务部同级。商部有四个主要的部门:一个管理贸易(包括专利权和专卖),一个管理农业和林业,一个管理工业,另一个管理审计(包括银行、商业事务、度量衡、商业诉讼)。

同时,政府鼓励成立商会,以期促进中央对商人的控制。清朝似乎没有认识到商会也可以加强商业领域中国人的地方独立自主意识。1903年,上海商会从传统的城市商业行会、本地钱庄以及新兴的富裕企业中吸收成员,正式成立,虽然它仍旧由来自浙江宁波的金融家把持。广州的商会由于当地人不愿意受朝廷控制而成立得较慢,但是到1905年它已经成为一股经济势力了。这两个地方的商会在1905年领导联合抵制美货的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像越来越富裕的东南亚华商一样(美国和加拿大的华商则稍逊一筹),他们也开始投资中国的企业或利

用别人投资。

这些新式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也如外国资本主义那样，成为了城市工人生活动荡的渊藪。一些零散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工人的反应。在清朝早期，曾经发生过像景德镇的瓷窑工人和大运河上漕船的纤夫那样的罢市和罢工。但是一个二十五岁的美国推销员 1897 年在上海为温契斯特公司写的一封信显示，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城市的紧张关系正不断强化，外国人也迅速地卷入其中。

作者描述了 1897 年 3 月底上海工部局决定将手推车苦力的税收从每月四百文提高到六百文（按照当时的汇率是从二十五美分增至二十七美分五厘）。苦力们起来抗议，开始组织发动，于 4 月 1 日将所有手推车拉上大街。当几天后一个苦力独自一人拉着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试图穿过法租界到英租界时，一群工人将其痛打一顿，并捣毁了他的手推车。一位前来帮助被打苦力的警察也遭到殴打。在俱乐部里的西方人看到警察遇到了麻烦，于是前来帮助，骑警们想骑马去援助，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受到人群的惊吓而被迫下马。苦力们从附近的墙上拆下柱子和砖块与手持佩剑的警察搏斗。不到二十分钟，一艘载着西方志愿者的英国炮舰赶到现场，并拉响四声汽笛，苦力们被驱散，留下三名被打死的同伙，另有两名警察被打伤。三十分钟内，“蓝夹克”从几艘外国船只上赶到，控制了关键的桥梁和公共场合。街上重归平静。工部局决定将增税时间推迟到 7 月。^⑥

到 1890 年代，汉口的现代工厂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得到迅猛发展，工人超过了一万人。外国居民的增加和新的外国租界的开设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劳动环境恶劣，工资低廉，居住环境糟糕，而农村工人为了寻求长期或临时的工作，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1905 年铜矿罢工，1907 年铸币厂雇员也罢工，

1908年成千上万的街头店主、小贩、摊主与零售店雇员也举行了罢工。在中国其他的大城市，新式的棉纺厂、水泥厂、烟厂、铁厂、造纸厂和其他工厂也方兴未艾——且常常有外国资本参股——剥削和动荡也必将与这一切相伴而来。

大多数人尚未觉察到这些工业领域的抗争有着更具普遍意义的模式，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消息在东亚地区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与孙逸仙关系密切的日本激进分子将中国与俄国作了新的类比，促使孙逸仙与俄国革命人士接触。正如一位日本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中国和俄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独裁政府，他们的暴力统治使自由无立足之地。解决的办法显而易见：“为了文明的进步，必须推翻这些独裁政府。”^⑦

注释：

- ① 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三卷,上海 1910 年版,第 35 页。
- ②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义和团暴动的起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9—300 页。
- ③ 珀塞尔(Victor Purcell):《义和团暴动:一项背景研究》(修订本),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25 页。
- ④ 邹容著,鲁斯特(John Lust)译:《革命军:1903 年中国的一本民族主义小册子》,海牙 1968 年版,第 122 页。
- ⑤ 前引邹容著第 126 页。
- ⑥ 布鲁尔(W. H. Brewer)文件,耶鲁大学档案室 1/6/185/18 卷。
- ⑦ 贾士杰(Don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根源,1896—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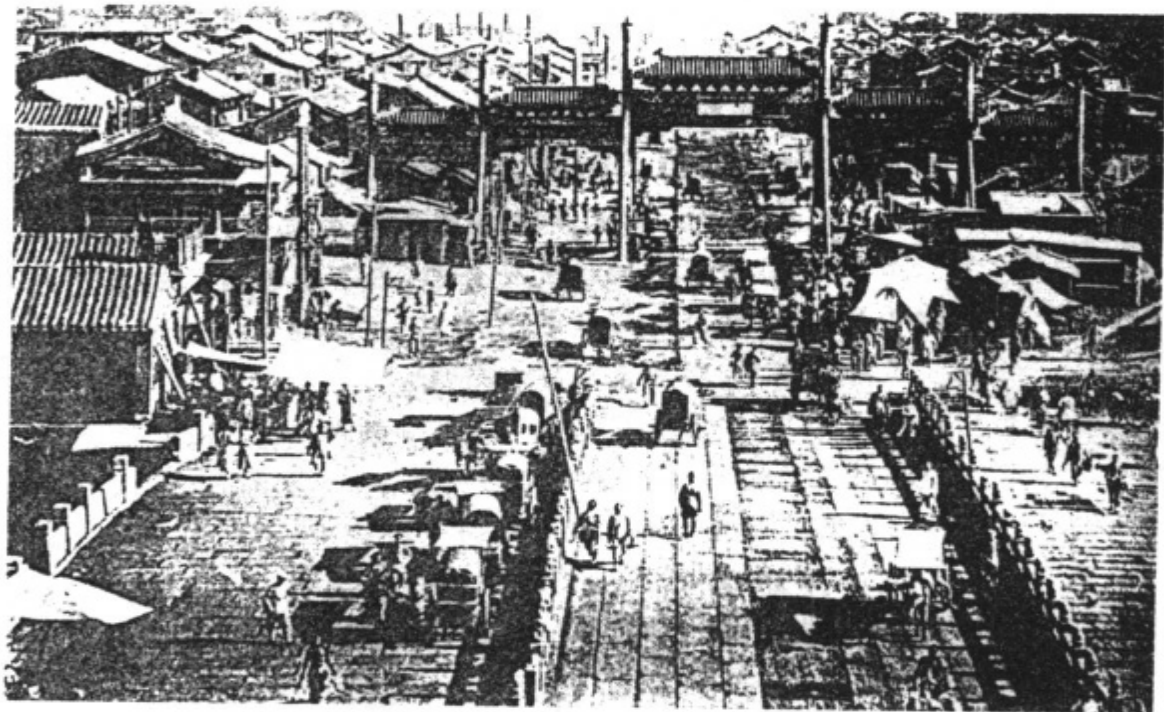
酸寒尉像

光緒戊子八月某日任伯年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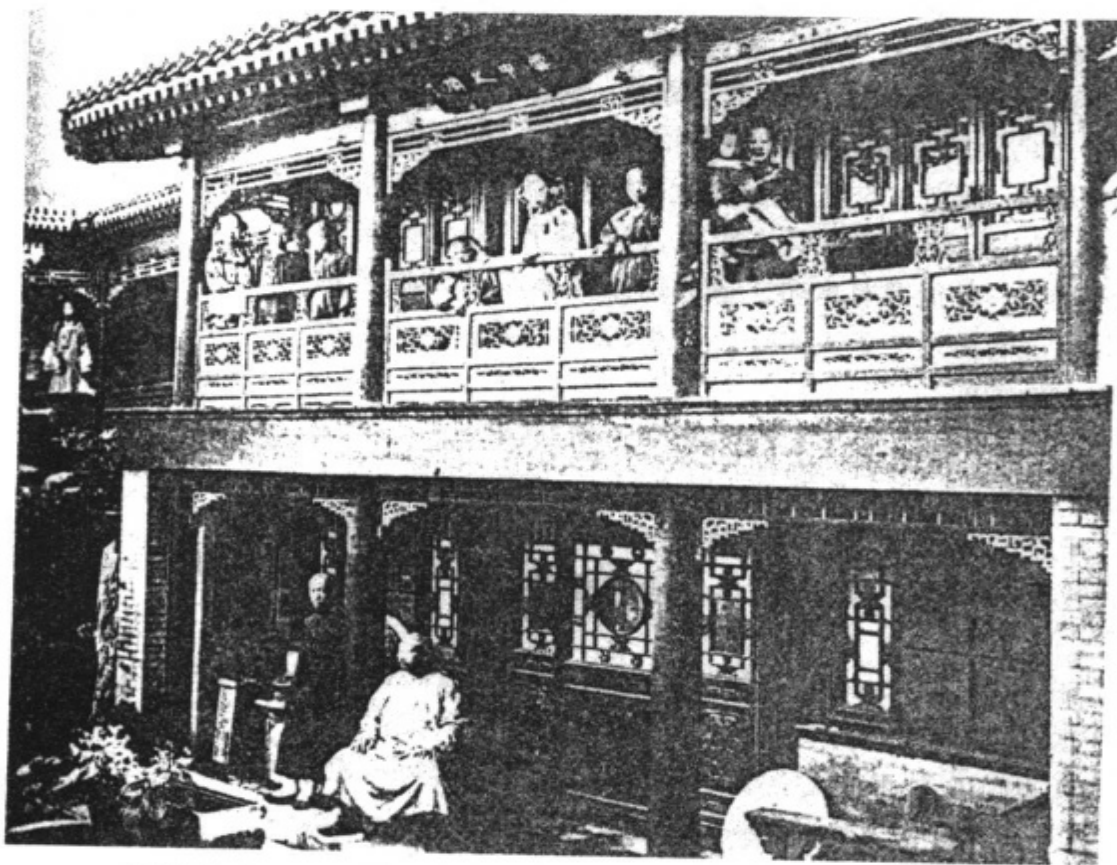


何人畫此酸寒尉像正集于忠不難若法所止意以帶似欲繪昔帳二十
廟年畫之既前天賦賦今年十則然其後唐漢晉宋元明各朝之畫
畫之如畫之自百年估所難多持仗信則夫夫古之君子也志氣高遠
身重而足江平身重則信之信之思時自時也夫姑一不謂其功不伐其
功也蓋其心平不為嘉其德一及所年一十號精神第一志也起年如友
徒其上有何定何尉是也如畫其德也如畫其德也如畫其德也如畫其
世間有介至士野舍息士方相十時苦難進上之二十字字何唯也

任伯年(1840—1895)酸寒尉像:任伯年曾在洪秀全的太平军中供职,描绘了一个收入微薄、职位卑贱的朋友的窘况。



1907年北京的一条主要街道。



一位官僚家的内庭院, 1871—1872年(John Thomson 摄)。



缠足女子：将脚缠成三寸金莲的传统给女性带来痛苦，且使其行走不便，但有助于找到丈夫。当她们在清朝改革期间放脚时也经历了与第一次缠足同样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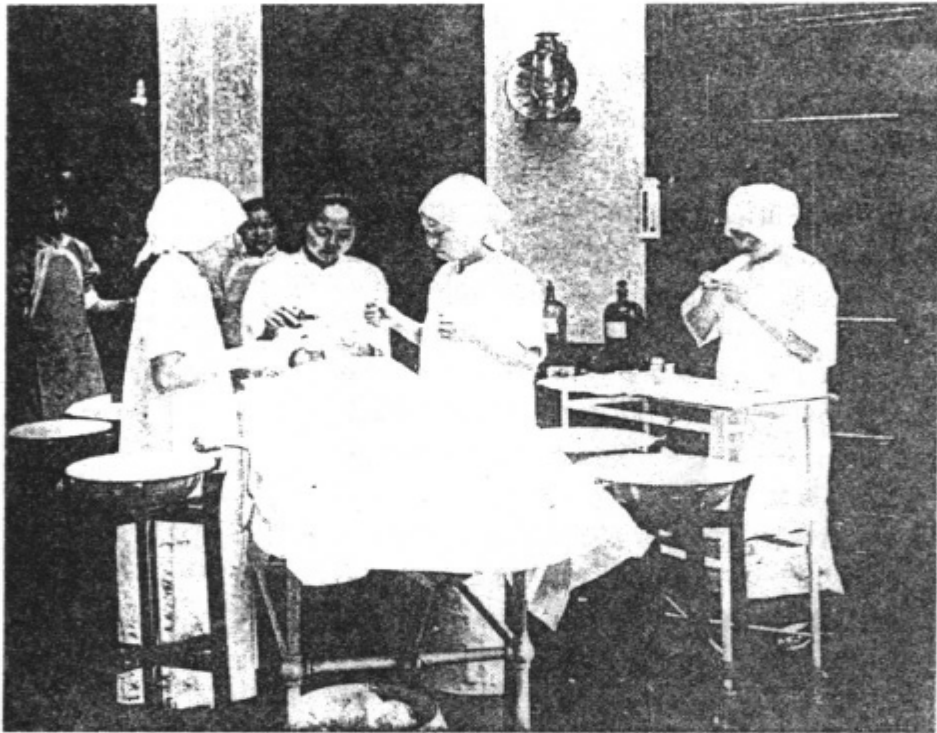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和她的侍女们。



李鸿章



恭亲王



中国的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仅是剥削、误解和敌意。教会学校和出版物为中国人开启了新的机遇。玛丽·斯通(Mary Stone),一个获得了密芝根大学医学学位的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生,在镇江的一所教会医院从事外科(上图)。斯通和一群卫理公会派教徒(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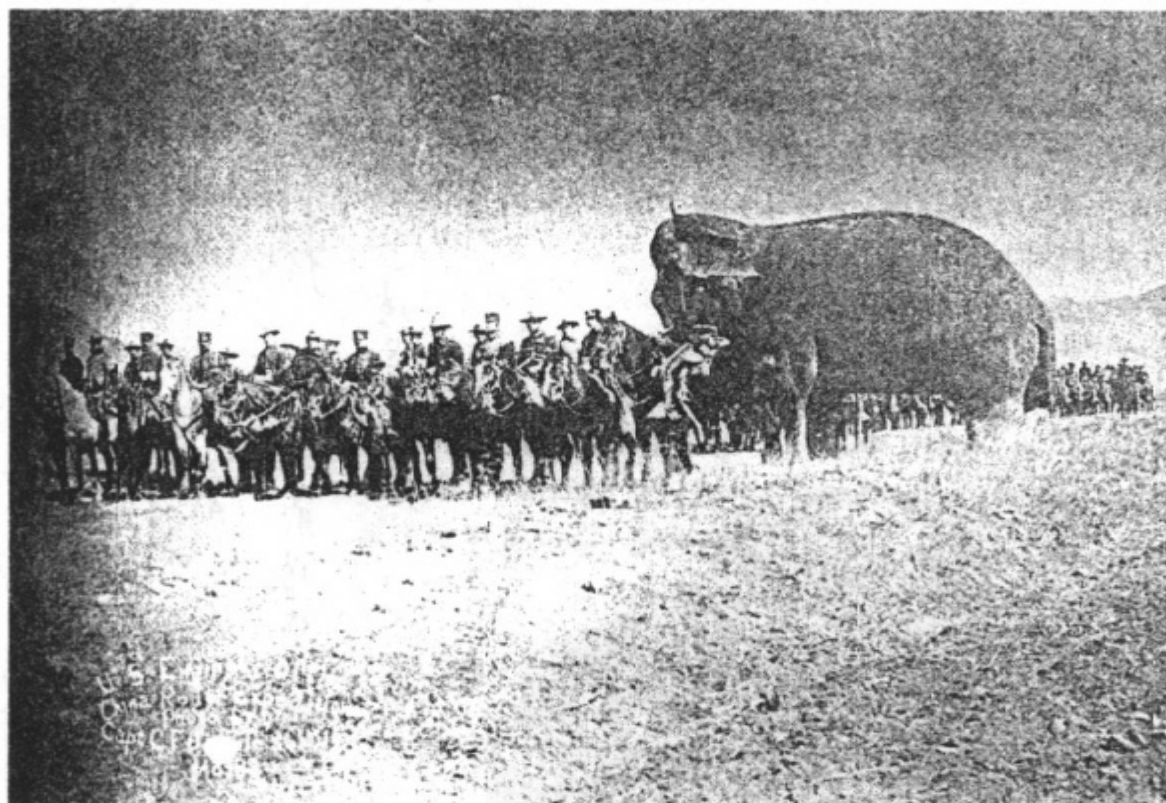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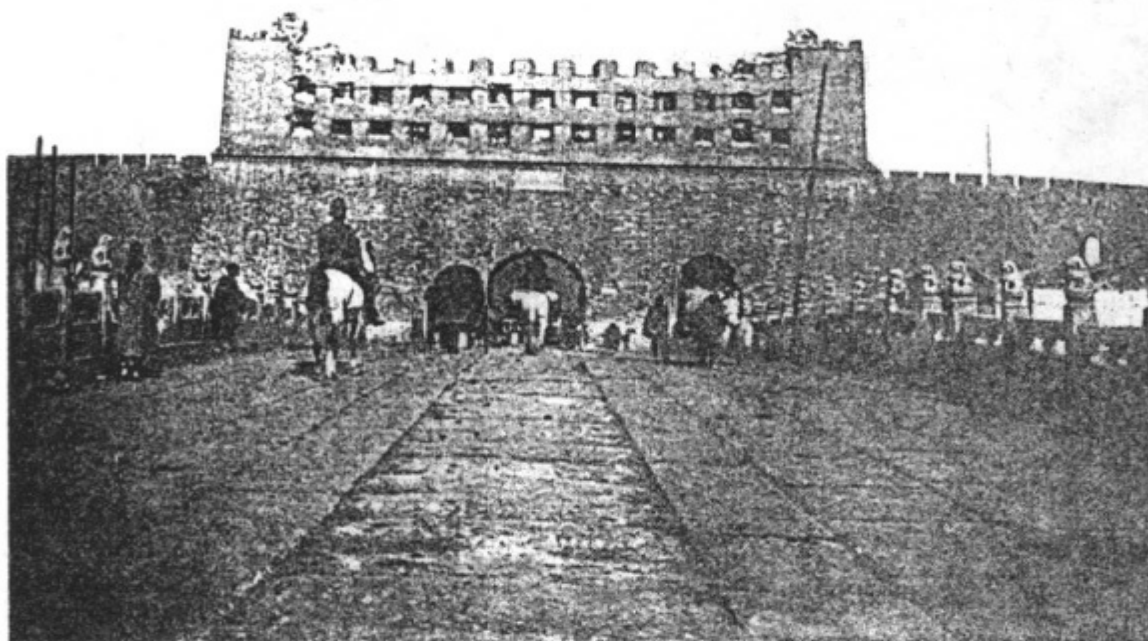
《革命军》作者邹容(1903)



思想激进的秋瑾, 孙逸仙同盟会的早期支持者。



孙逸仙(左起第二)与激进的学生友人在香港, 1887年。



义和拳暴动,北京城门:1900年8月,一支20 000人的外国远征军镇压了义和拳暴动,并解了北京外国人之围。进入北京的一个主要城门在战斗中部分被毁(上图)。明皇陵附近的美国军队(下图)。



康有为(左)与梁启超(右):康、梁是著名学者,他们于 1895 年领导了公车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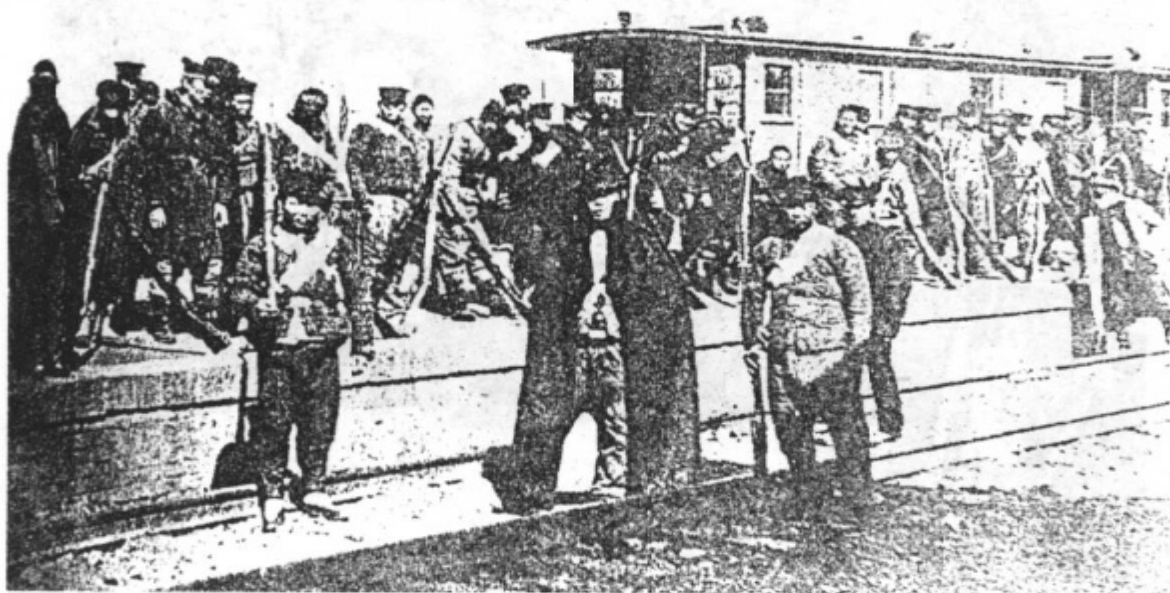


年堂無計迴神少月亦
如盤周故園寄意寒
星昏不察我以我白屋
軒轅
二十歲時作五十一歲時
寫也時年未月六日也魯也

24 岁的鲁迅在日本(1904)剪了辫子之后的留影。



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北洋军接受西方武器和战术训练(1903)



1911年汉口的革命军



宋查理,孙逸仙最早的支持者。
宋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孙逸仙、
蒋介石及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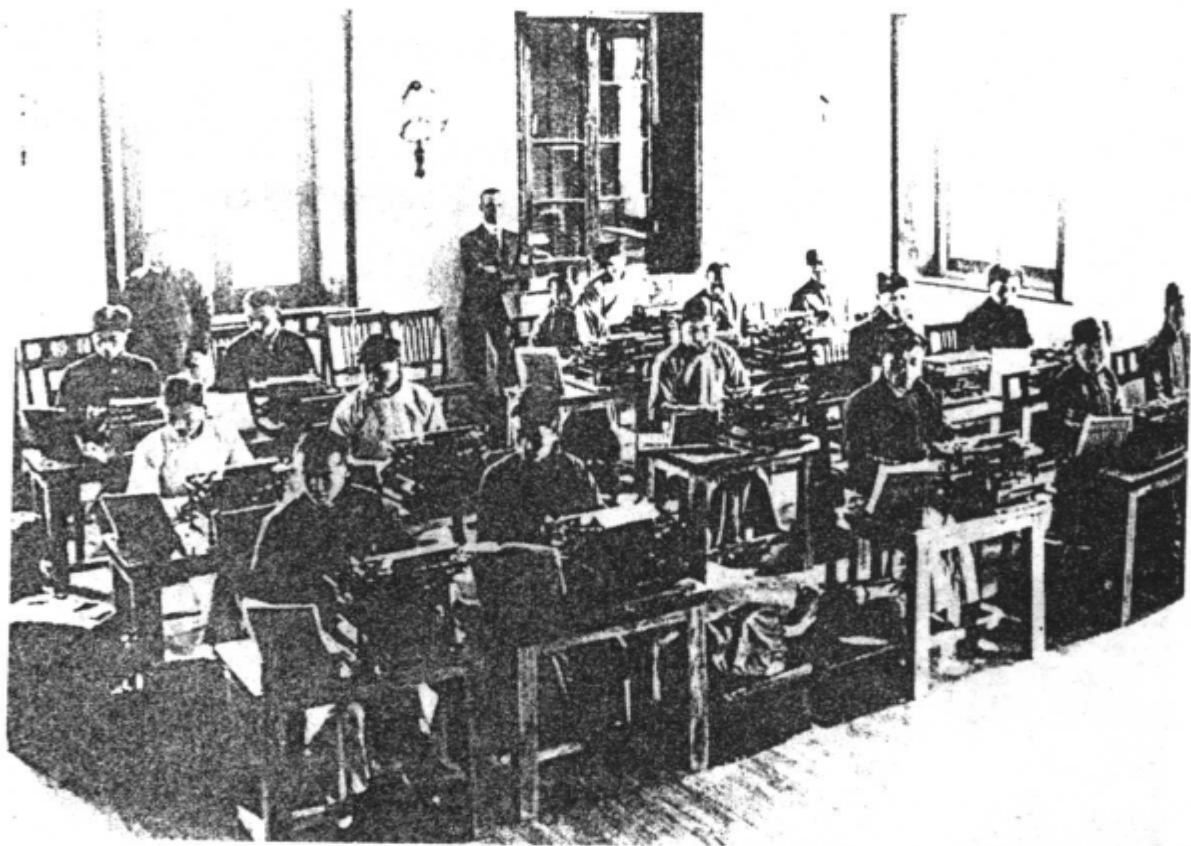
1912年3月,孙逸仙放
弃了大总统之位后,袁世凯
窃居中华民国总统。



1912年的孙逸仙(中)。



在南京,革命军士兵剪下象征着清朝旧秩序的辫子。



在南京国立师范学堂学习西方秘书和语言技能的中国年轻人。

第五章 清朝的覆灭

1. 清朝立宪

1860至1905年间,清朝廷和各省官员都试图广泛吸收中国所需的西方技术和思想:大炮、轮船、电报、新式学校、工厂、商会和国际法等。虽然其关注的重点不断变化,但其目标一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义和拳暴动失败后,清政府开始吸纳似乎是西方列强精髓的宪政体制的要素。

1850年代,徐继畲等官员就特别推崇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度的适应力与公开性,所以清政府最初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就选择了美国。另一些学者被法国革命的政治理念所吸引,并对法国在十九世纪的急剧扩张深为感佩。但是因为共和的思想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不可能合清朝廷的胃口,他们也开始认真地考察既能强国,又能维护王朝命运的君主立宪制的各种模式。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英国是理所当然的榜样了。另一个榜样是迅速崛起于世界的德国。第三个也是最活生生的榜样就是日本,它在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后不到二十五年就全面改变了其经济、工业、军事以及整个土地制度的面貌。日本在1894年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就是这些变革增强了日本国力的最惊人的证据。

立宪改革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由亲王和大臣组成一个小型考察团——包括三位满人和两

位汉人——准备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考察他们的政体。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认识到，该考察团的使命将有利于巩固清朝的地位，今后要推翻清朝就不可能了。这令汉人民族主义者很沮丧。其中的一些人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清朝这次变革的新举动。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学生想在载着宪政考察团的火车9月份离开北京站时炸毁它。炸弹没有准时爆炸，神情自若的刺客被处决。但他确实炸伤了两个考察团成员，考察行动推迟了四个月，直到任命了取代受伤者的新成员。

重新组成的考察团取道日本赴美，1906年1月抵达华盛顿特区，然后前往欧洲，在那儿一直呆到春天。他们返回中国后，向慈禧太后建议，实行某种形式的宪政改革，并说日本是最有效的榜样，因为在日本，皇室家族仍然执掌权力。1906年11月，慈禧太后下诏允诺预备立宪，改革中国的行政结构，改造现有的六部，增设新的机构，约束总督的权力，召开国会。这离光绪皇帝及其拥护者推行温和的改革受阻仅仅八年，但是现在危机已经昭然若揭，慈禧太后的决定被满、汉大臣普遍接受。

在中央政府制定这些政策之前，一些汉人官员已着手重新审视清朝地方政府的本质及其与百姓的关系。早在1902年，山西总督赵尔巽就建议改革保甲互连制度，将其变成由慎重选出的地方保、甲长管理下的城镇和村落群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网络。这将建成知县控制下的比现行的县还要小的行政单位，并将容许更普遍的参与地方行政管理和财政计划制定。改革建议还有设立女学，发展城市警察制度，特别是使资金从地方社区组织——例如寺庙或宗族——转而投到改革地方政府和学校的需求上。赵尔巽感到，建立新的地方体制是根本，因为知县们都淹没在案牍之中，山西的大部分官员都惯于因循，不思改创。而贫

困边远地区更是安然自得，固步自封。^①新成立的政务处公告了这些改革措施，1905年朝廷正式推动县以下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这些改革措施所显现的问题说明了初创时期的民主制度的脆弱，以及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困难。中国的儒士精英们不论是宦游仕途，还是经营土地，抑或涉足商海（有些情况是一个家庭同时涉及所有三个领域），在乡村和城市都享有自然的主导地位。包括官僚结构、知县衙门、科举考试、保甲制度，以及农村税制等等在内的中国国家的各种制度使他们的权力获得长期巩固。但是宪政改革并不一定削减这个阶层的权力，如果这个阶层能够聪明地适应变革，并获得新的政府机构的控制权，实际上改革或许有助于巩固和增加他们的权力。

回避制度就是一例，它规定清朝官员禁止在本省做官，以使其不能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私利。正如山西总督所说的，如果本地人被任命到本地做官，他们就能在自己的家乡巩固并滥用自己的权力。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说明改革措施实际上仍然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废科举为所有阶级、所有职业的才俊提供更大的机会，但事实上一般仍是传统的精英阶层的子弟有金钱和志向上新式学堂，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是这样。因此需要以公正进步的教育作为投票或任职标准的宪政改革，或许也只是增强了地方某些富裕家族的地位。

在清朝晚期，天津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世界性城市和中国现代军事及海军中心。改革派巡抚袁世凯提出了地方改革的另一条途径。与山西的改革者们不同，他的计划是废除保甲制度，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训练和供养警察部队，以强化地方的控制。袁世凯及其部下在解释清朝廷关于地方的诏令时也受到日本模

式的影响,他们迅速建立“自治局”,探索在地方政治中推行有限代议制的可能性。设置自治局的目的之一是增强日益增长的城市选民力量,而非助长地位已很牢固的地方士绅势力。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说:“西方学者曾谓文明的潮流是由东向西。现在,它是自西徂东。我们可以预见,自此几年之后,独裁专制国家将不复存在。”^②这位幕僚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县级以下的议会选举。虽然这对袁世凯来说太过迅猛,但到1906年,他已经建立了地方的自治学校,培训中国北方城市的居民,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1907年他批准在天津实行议会选举。

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在或快或慢地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整个国家都朝着立宪改革发展。1908年末,朝廷宣布此后九年间将全面建立宪政,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清朝皇帝将保留议会、预算、军队、外交政策、司法等方面的权力,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需要在中央、省和地方建立各级民选政府的观念。1908年11月慈禧太后溘然辞世,仅比自十年前改革失败后被软禁宫中的不幸的光绪皇帝去世晚了一天。这些并未改变改革的方向。溥仪像他的两位前任一样也是幼年即位,满人摄政大臣们组成了一个完全是满人的辅政内阁,愚蠢地忽视了此举将增加汉人的疑虑,整个宪政改革将朝着保护统治王朝利益的方向发展,这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

1909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的谘议局是令人惊异的新机构,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这些谘议局仍是精英团体,仅对男性开放,并有严格的年龄、财富和教育程度等标准,但是它将不仅关心自己家庭和地方利益,也关心国家命运的男人们集聚起来,共商事务。很多人参与了这一全新机构的选举。中国政府一直不赞成公开集会,特别是具有政治倾向的集会,明

朝晚期东林党的遭遇，以及雍正使政治思想的关注点都放在宣扬道德和等级思想的圣谕上都显示了这一点。现在这样的集会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而且会议中很快就充斥了报刊杂志宣扬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又得到了曾在军事学堂或海外大学学习，或在新式工厂工作的新企业家等人的强化。到1910年早期，这些省议员向清朝廷施加压力，使其同意加快改革计划的推行，并于10月在北京召开临时国会。

各省谘议局中的专业领域显然都由其领导人掌握。在十八、十九世纪对外关系和贸易广受关注的广东，在首府广州召开的议会由一位致仕官员主持，他是进士出身，曾积极鼓动民族主义，反抗澳门葡萄牙人，而且是广东自治研究会领导成员之一。在排外运动长期不宁的湖南首府长沙，则是一位1904年考中进士，而后供职于翰林院的优秀经学家主持。但是作为清政府部门的湖南学政，他却是一个排斥外国，反对帝制，积极维护湖南人经济利益的人。在浙江，由于与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已经发展成为富饶多产的农业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又是另一种模式。浙江省议会的领导人也是进士出身，他与杭州一个激进的学堂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学堂讲演时结识了一些激烈的反清分子和很多后来都东渡日本的激进学生。在福建，几个为首的议员是新教徒，常常与东南亚华人有着家族或贸易上的联系。他们在教堂里公开演说，宣扬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新主张。^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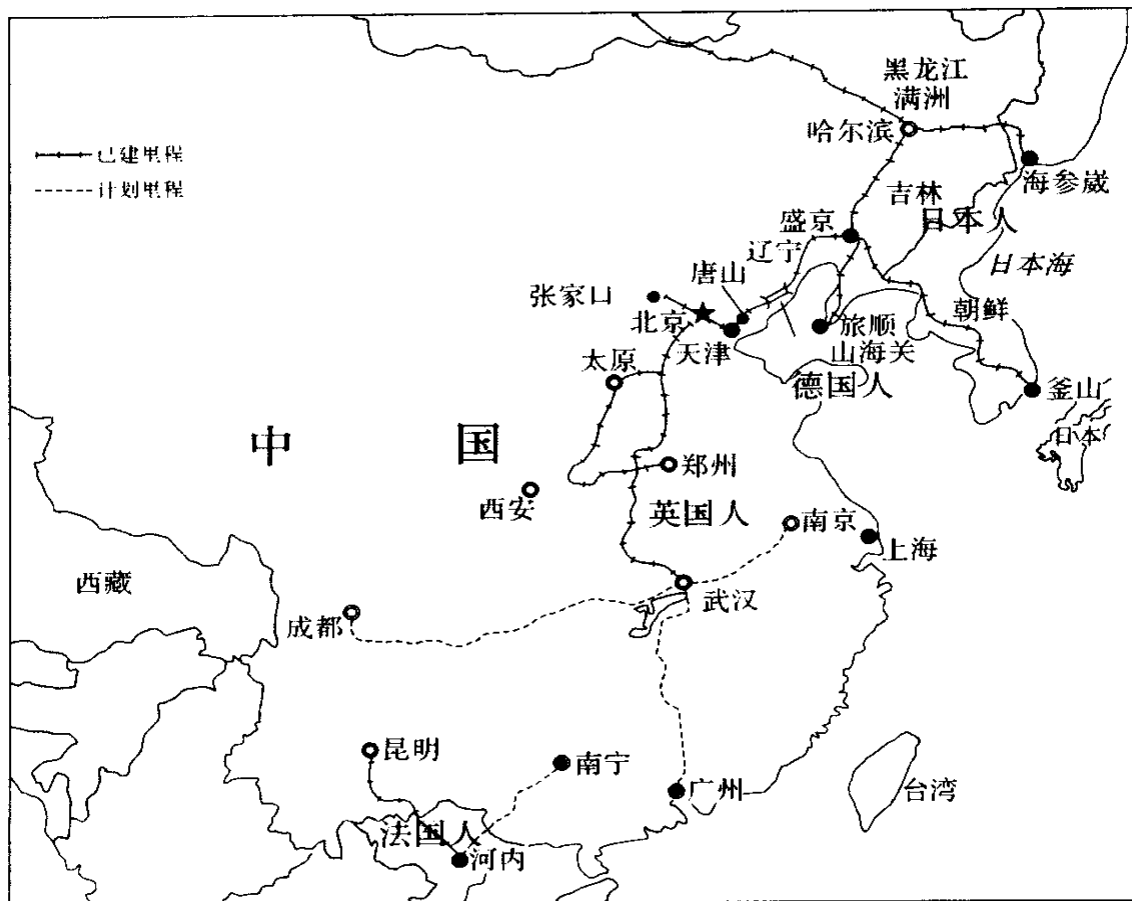
要准确地说出这些人和他们主持的议会将会做些什么，在目前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是清楚的，那就是清朝廷现在要有效地保证，它将来采取的任何巩固自己地位的行动都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详细审查，而他们过去曾经是王朝最信赖的拥护者。

2. 新铁路、新军队

事实证明,在清朝面临的新技术中,铁路是最棘手的。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

1880年李鸿章铺设一条从唐山开平煤矿到附近水道的不长的铁道时不得不找出一些托词。1888年这条铁路线延伸到天津及其附近城镇,1894年又穿过200年前满人大军进军中原经过的山海关,延展到南满。尽管很多外国列强都表示愿意贷款给清政府,以便其能够修建铁路网,经过几年不断努力,到1896年中国还是只有三百七十里铁路线。相比而言,美国已有十八万两千里,英国有两万一千里,法国有两万五千里,日本有两千三百里。

从1894年中国败于日本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日益增强,在义和拳暴动后达到了新的高峰。除了其他债务,中国还要赔偿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清政府开始对铁路贷款感兴趣,即使是外国人提供的贷款。中国最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是京汉铁路,尽管有新成立的大清银行参与,仍未能从中国股东手中吸纳足够的资金。非常清楚的是,外国列强也将不顾清政府的抗议,在其势力范围内修建铁路。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铁路,英国计划在长江流域修筑,法国计划从河内向北修建至昆明的铁路,俄国已经在条约中获许修建穿过黑龙江省直抵其主要港口海参崴



中国的铁路示意图(1880—1905年)

的铁路,又增修到旅顺的线路,日本则在1904—1905年与俄国的战争中作为军事进攻计划的组成部分,将铁路从朝鲜向北修筑到奉天。战争胜利后,日本人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主要铁路线,并成立了南满铁路公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完成的中国铁路里程清楚地说明了外国列强修路活动的结果:1896年至1899年是二百八十里,1900至1905年是三千二百二十二里。

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氛围中,中国似乎成了铁路投资者的理想目标,通过中英公司(主要的合伙人是原来鸦片贸易公司怡和洋行)这样的新的银行团,大量的资金投向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路建设逐步引起了关注。1905年建成的南北主干线连接了北京和武汉,第二步则计划从武汉修到广州。另一条线则计

划从武汉向东修到南京和上海,还有一条计划向西修到四川成都。法国主持修造的通往昆明的铁路与另一条从印度支那到广西南宁的支线相连。

然而,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生长,我们已经在邹容的《革命军》,排洋的联合抵制运动以及反对传教士的行为中见到了它的身影。作为这次新浪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发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其目的是发行地方债券,募集资金,以使中国人能够买回由外国投资者拥有的铁路路权,由中国人完全控制自己的交通系统。争取路权运动中充斥的信心也得益于其他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一个是中国企业家经营的新式重工业的发展,另一个是东南亚华人中有大量可以利用的资金,第三个就是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工程师有能力处理铁路建设中恶劣地区最困难的问题。1904至1907年间共成立了十九个地方收回路权团体,几乎覆盖了中国各省。

到1910年,清政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需要一个有效的集中管理的铁路网络。因而朝廷转而决定从中国投资者手中购买铁路路权,在清朝控制下实现整个铁路系统的国家化。他们作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清朝新设的邮传部(建于1906年)控制的那些铁路一年可以获得大约八百至九百万两的可观收入。清政府现在预算支出二百九十六万两,收入九百万两,这笔新的利源确实令人振奋。溥仪的那些缺乏经验的满人摄政大臣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多么重要的问题,他的顾问们还说,中国的投资者所需要的仅仅是获得部分投资的报偿。1911年5月颁布了关于铁路国有化的最后一道诏令,言辞强硬地阐述这一决定的理由:

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

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①

清政府在向英美银行团刚刚借款一千万英镑(约合五千万美元)后的十天,又同该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六百万英镑的合同,以续建武汉至广州和武汉至成都的铁路。很多认为各省有权控制自己铁路修建事务,不允许外国势力成为修路的主导角色的中国人被这一举动激怒了。在1911年5月诏书颁布后的几周内,针对清政府的集会抗议活动越演越烈,其激愤的程度与以前反对外国列强无异。整个夏季,人们愤怒的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四川,省谘议局的领导人和著名的股东誓言不再给政府交税,并要为保有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在1910年和1911年的铁路风潮中,刚刚成立的中国新式军队的官兵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军中的很多人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清政府正在将国家的资源出卖给外国人。在一次铁路集会中,一位军官砍掉自己的手指,抗议清政府的行为。在另一次集会上,一名士兵给清政府的铁路公司写血书,呼吁其恢复地方的铁路控制权。在四川,一位将军命令军队中反对政府的保路同志会成员出列,以便确认身份,加以驱逐,结果全体士兵团结一致,一同出列,该将军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命令。

这些军队中的官兵代表了中国出现的新现象,早在1850年代儒将曾国藩就组建了一支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思想忠诚的军队。曾国藩给士兵优厚的饷银,向他们灌输行为规范,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正直的道德观,以期消除清军作战所到之处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普遍观念。在李鸿章建立的北洋军和

其他军队中,有军官培训学堂、士官学堂、外国教官、现代武器,是中国现代军队的起源,取代了满人八旗,在军队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

从1901年开始,清朝廷议定重新组织军队,建立“新军”。正如他们在铁路系统所做的那样,清朝廷试图根据自己的方式对新军进行标准化,并控制新军。随后各省的新军被整编成36镇,归属北京的练兵处统辖。每镇编制为一万二千五百人,这将使清政府拥有由中央直接指挥的四十五万新军。1906年清政府还重建了陆军部,置尚书一人,侍郎两人,皆由满人担任。1907年又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军谘处——仍由满人负责。同年,两个最有实力的总督,汉人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进京,担任军机大臣,明升暗降的实质是将其调离他们的军队。朝廷显然是希望由北京的满人而非各省的汉人掌握大权。

在很多层面上,清政府重新整编军队是卓有成效的。新军驻扎在全国各战略要地,也包括曾是传统的八旗驻扎要塞的那些正逐步被淘汰的城市。1910年和1911年,清军取得了几次巨大的胜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藏的一系列战斗。在那里,面对本省独立的呼声和印度北部英国人的扩张,清朝的影响正日益衰减。派往该地区的清军克服了恶劣地形带来的后勤补给和交通困难,征服了西藏东部地区,并设立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份,叫西康省。清军还占领了拉萨,废黜了几个坚持顽抗的王公,在几个城镇派兵戍守,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清军甚至推进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边界,警告英国减轻对边境的压力。对于一些满人将领而言,这似乎又重温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胜利的伟大荣耀。

但是清朝的军事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军队的指挥结构仍然很脆弱,特别是在华北,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拥有一批忠实的

追随者。清朝廷对袁世凯势力的解决办法就是于1910年以其生病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使他十分恼怒，忠诚于他的高级将领也心生叛意。在新军将领中，很多人是1905年废除传统科举制以后从事军事生涯的，因为军队似乎可以提供一条新的迅捷而可靠的上升途径。这些人怀着雄心壮志和躁动的心情，积极投身省谘议局煽动的风潮，新军中渗透进了忠于流亡在外的孙逸仙的反清革命组织成员。

当新军官兵开始效仿欧洲和日本军队，接受同样的训练，穿上那样的卡其布制服，拿起那样的现代武器，他们越发意识到某些认为理所当然的习俗都是荒谬的。例如，中国绅士见面问候要打躬作揖，而在军队中开始代之以简洁的军礼。更赋有象征意义的长辫子在现代战斗中也显得荒谬可笑，那却是1645年摄政王多尔袞强迫汉人接受作为忠诚和服从的标志。士兵们先是把辫子缩拢在帽子里，不久又开始将它们剪掉。而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叛乱是将剪辫子视为反抗清朝的举动。现在，1910年，清朝廷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也认识到不能采取合适的惩戒，只能勉强默认，别无选择。

3.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1905—1911年的几年里，清政府在推行宪政改革，试图加强对新军和铁路的控制的同时，中国的分歧也在继续扩大。已经初尝了新机会的愉悦的议员、留学生、妇女、商人、城市工人和新军官兵都促使地方当局和朝廷更有力地顺应他们的要求，实行改革。清政府无力回应各种的要求，激起了更尖锐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新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也开始出现。

满人的处境异常艰难。随着驻防八旗逐渐裁减或改任文职,计划成立的新军或未完全由朝廷控制,或羽翼未丰,清朝廷并未能明显掌握全国军事的主导权。每一次改创——学堂、公共工程、设立海外外交机构——都使费用急剧上升。当1910年末陆军部起草第一份详细的预算时,估计次年不断增长的军队的开支将需要一万零九百万两(这笔巨大的数目尚不包括海军费用),其中五千四百万两将用于新军。1911年,军费开支一项就几乎占据了全国三万三千八百万两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个预算总数比1910年已经出现赤字的预算还高出四千万两。资政院在北京开会,准备削减三千万两军费预算。即使这样,预算赤字仍然很大,清政府不得不增加农业税,对茶、酒、盐和烟等广泛增设新税目,提高通行税和关税,对不动产和土地交易征收特别税。

这些税收几乎激怒了所有的人,甚至即使清政府做的是善事——比如决定禁断鸦片——也会遇到麻烦。反对不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中国种植鸦片的农民,他们在罌粟地里的耕作将成为徒劳,他们自然要怨恨,现在英国的鸦片市场彻底被中国国内生产的廉价鸦片抢去,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国内的鸦片生产主要局限于云南和贵州,如今在四川、陕西和沿海的浙江和福建省都已蔚然成风。清朝的禁烟招致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反对,包括销售人、运输者、烟馆老板和雇员,以及上百万的吸食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属于最富有的阶层。似乎这些麻烦还不够,特殊的气候也来落井下石。1910年和1911年,长江和淮河流域暴雨成灾,毁坏了数百万亩庄稼,使粮价飙升,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难民涌入大城市寻求救济。

然而,除了通商口岸和租界区外,清朝国家的力量仍然强大,联合的政治反对势力还很难发展。因而1905年后的几年里

与以前一样,很多最有效的政治批评都来自或自愿旅居,或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在这些对清朝提出有意义的批评,并有自己的政治计划的人中有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受梁启超影响的民族主义者、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

在所有这些批评者中,康有为在海内外中国人中声誉最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杰出的经学家,进士出身(1905年中进士),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他是光绪皇帝的私人顾问。直到1911年,他继续呼吁清朝改革政体,使国家现代化,仿效日本,增强中国国力,以抵御外国的进一步侵略。他成立各种组织来宣扬他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皇会”和“宪政会”。但是随着反清情绪的日趋强烈,甚至在他的拥护者看来,康有为的立场也似乎变得不合潮流,其众多的经济资助者们也开始怀疑他们的钱的流向。康有为个人生活奢侈,理财无能。他漫游各国,而且准有年轻女郎相伴。他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并乘气球观览这座城市),还买下了瑞典海边的一座岛屿作为避暑之地。他的投资漫无目的,他将很多资金投到墨西哥风险行业,由于墨西哥革命而颗粒无收。他用典雅的文言文写的政论文章在二十世纪也似乎开始不合时宜了。在其最富幻想的著作中,他推测有可能建立大同世界,以泯灭所有民族主义者的矛盾,他还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福利国家的蓝图,那里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和养育。“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如康有为说,“如气之无不相周矣”。^⑤他建议在政治集会上所有参与者都穿无性别特征的衣服,以消除性别的差异,而且还建议用每年签订的婚约取代现行的婚姻形式,夫妇均可选择不再续约,这种婚约也可在两男或两女之间缔结。但是这些空想之作大多仍是手稿,在当时很少有人了解康有为思想的

全部内容。

康有为最忠诚的弟子是广州人梁启超，他曾与康有为一起参加 1895 年的进士考试。他在情感上没有康有为那样亲近于光绪皇帝和清朝皇室，因而有更广泛的政治选择。他甚至一度接受激进的思想，主张以自由的药方来治愈中国腐败堕落的弊症。然而他还是没有选择法国暴力革命的道路，认为“法兰西自 1793 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 1870 年始获殍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⑥

梁启超也担心中国百姓尚不足以承担民主的责任。他在美国唐人街见到的生活更加剧了他的悲观思想：华人如一盘散沙，胆小怯懦，社会环境令人大为不满。于是梁启超在公共集会上，在各种报纸（其中有些是他主持的）上，以其巨大的说服力和强有力的文笔，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以天赋的坚强领袖们引领全体国民，包括女性，培养见多识广的市民。他写道，为了实现培养积极而团结的市民群体的理想，中国需要一位铁腕人物来遏止贫弱之势，就像斯巴达领袖李克各斯，或英国人克伦威尔，而应该暂时忘记世界上卢梭或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但梁启超却不能宽恕克伦威尔处死英国国王的行为，他不断颂扬君主立宪制的优点，似乎它可以使社会和经济携手共进。他把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再统一运动视作中国可行的模式：在意大利，军队将士、立宪倡导者、精明的外交官都合力驱逐外国占领者，重建一个统一的新国家。梁启超在其小说、戏剧和散文中阐述其政治思想，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华人，在中国国内也广为流行，他传播着一种意识，就是清朝有能力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再次复兴。

很多中国人接受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的思想虽然影响较小，表述得常常也不够华美，却要激进得

多。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和激进的应用方兴未艾,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其影响仍继续发展。1889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组织,其中很多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组成了第二国际,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虽然这个组织支持议会民主制,但它也意在寻求战争带来的社会巨变的机遇,利用一切机会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第二国际的成员们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主要论断。

中国的出版物上第一次讨论马克思是在1899年。马克思的思想被总结为,穷人将不断罢工,以向富人施压,相信富人的力量将跨越国家,播及五大洲。^①马克思也被错误地描写为一个英国人。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那些将清朝皇帝和沙皇看作同样的独裁者的中国人精神振奋,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新的兴趣,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使中国能跻身于现代世界的机会。几个中国人开始研读一本1899年从日文版译成中文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书中说道,马克思“以深远之学理,穷究经济之基础”,“故于多数之劳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而其事易底于成”。^②

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成中文,与英文本和德文本相比,语言更赋诗意,少了些激烈的语气。《宣言》著名的结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中文中被译为:“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③

虽然中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到1911年才产生,但是到1907年,能够阅读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古典文学家江亢虎已开始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江亢虎曾任袁世凯的教育顾问,是一位热心的男女平等主义者。1909年,他参加了在布鲁

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大会。还有一些中国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批评了当代所有的国家思想的结构,强调个人的角色、文化变迁的力量,以及在所有的革命行动中群众参与的重要性。1906年一群旅居巴黎的中国人创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出版了刊物《新世纪》。这些中国人中的大部分都与孙逸仙的同盟会有联系,很幸运的是,他们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因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拥有一家豆腐厂和一家酒吧。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空泛而又充满幻想色彩。他们主张废除政治权威和军队,废除一切法律,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他们倡导各种推进革命的途径,包括写传单、办群众团体、罢工、抵制洋货、发动民众暴动,甚至不顾道德良知搞暗杀。与此同时,另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在东京发展起来,这个团体更多地关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境况。他们反对现代主义,信奉农业文明。他们的偶像是托尔斯泰,他们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探讨农村的共有制生活和在乡村经济中工农结合的可能性等话题。

最后还有孙逸仙,1905年,他将形形色色的“革命”和反清组织组合为同盟会。他的一些追随者热衷于恐怖主义,鼓吹暗杀的作用,而大部分还是完全投身于共和革命的理想。他们坚决地反对清朝,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寻求将中国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一些人还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想使中国摆脱他们视为封建制的过去,进入一个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全新而先进的发展阶段。孙逸仙的同盟会中有很多女性会员,她们提出各种提高新中国女性地位的议题。孙逸仙与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也有密切的联系。他本人于1904年加入了三合会的夏威夷分会,一直倚重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外华人中三合会成员的支持。

孙逸仙也一贯寻求以武力推翻清朝。1906—1908年间,他至少发动了七次反清暴动:三次发生在孙逸仙联系最密切的广东省,其他几次发生在湖南、云南、安徽和广西。虽然每一次暴动都被清朝镇压下去了,但是孙逸仙在海外华人中仍然是一个有着超凡魅力的人物,吸引了很多康有为的前支持者,捐款也源源不断地涌来。很多资金是孙逸仙在美国(在那里他用假护照,声称自己出生于夏威夷)、加拿大和新加坡认识的人慷慨馈赠的。在新加坡,他得到了几位华人富商的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也向支持他的人销售债券,许诺一旦他们帮助他获得政权,他们的投资将获得十倍的回报(虽然孙逸仙并没有认识到一个世纪前林清叛乱的时候也采取过类似的策略)。

尽管孙逸仙缺乏清晰的计划,而且屡遭失败,但他凭借自己的精力和说服力,以及对清朝刻骨的仇恨奋斗不息。到1911年夏,积极的同盟会成员已由1905年的四百人增加到了将近一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孙逸仙或其会员在日本发展的学生会员,然后回到本省秘密组织反清暴动。有些已经升任了新成立的省谘议局的议员,也有的在新军中做了士兵或军官,他们或以革命言论感化,或以物资诱导,积极争取更多的支持。愤怒、挫败、梦想和金钱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是极具爆炸性的。

4. 清朝的覆灭

导致这个统治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清王朝覆灭的一系列特殊事件是1911年10月9日由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的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激发的。然而,这次爆炸若非因为立宪主义、铁路、军队、满人权力,以及外国入侵等导致的普遍的动荡不安,它或许只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孤立事件。

至少从 1904 年以来,中国青年的激进团体——很多是旅居日本的留学生,有一些已加入了同盟会——已经成为汉口及其邻近城市武昌的革命火种。汉口、武昌和汉阳这三座相连的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长江的船夫、现代学校、新军部队,以及清政府官吏,这使得武汉三镇成为政治和社会试验的敏感地区。革命的长远目标是推翻清朝,“复国仇”,“兴中华”。^⑩ 他们的短期战略就是渗透到新军中,与在这一地区有很强势力的各种秘密社会的成员协调政治行动。革命党向这些团体的渗透及为自己发展新成员都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缜密网络的掩护下进行的,这样就可以召开小型会议,展开个人间的交往。当某一会社受到当局的调查,革命党就将其解散,然后在另一个地区以另一个名字重新组织起来。到 1911 年秋,武汉三镇的各种会社已经在湖北的新军中吸收了五千到六千名会员,大约占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10 月 9 日爆炸是由于一群革命党人在位于汉口俄租界内的会议室里制造炸弹引起。与早年上海煽动反清的人一样,他们知道外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可以庇护他们不受清政府警察的管辖,但是这次偶然的爆炸招致了俄国租界当局的调查。当受伤最严重的谋反者被他们的同志送到医院时,清政府巡捕虽然受到俄国人的警告,还是搜查了革命党总部,发现了其他三名革命党,并立即处决。他们还获得了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和其他成员的名册。革命党明白,如果不立即发动暴动,他们的组织将会暴露,更多的成员将会丧命。

第一支采取行动的部队是驻扎在武昌的第八工程营,他们于 10 月 10 日清晨发动兵变,占领了弹药库。驻扎在城外的辎重营和炮兵营也加入到暴动行列。这些部队成功地袭击了武昌的重要要塞,这一天其他三支新军部队也前来支援。总督(满

人)和汉人“统制”已无力集结忠诚于清朝的部队守卫总督府,于是退出该城。10月11日,革命党成员渡过长江,在三镇之一的汉阳成功发动了暴动,并与第一营一同占领了汉阳兵工厂和铁厂。汉口的部队也于10月12日发动兵变。

当务之急是要一些声望卓著的人担负起暴动部队的领导职责,指导革命运动。因为孙逸仙本人还在海外,这一地区又没有同盟会的高级成员,也没有认为适合担当大任的当地革命党领袖,起义军推举省谘议局的议长,但被谨慎地拒绝了。然后他们又推举一位颇受有人望的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做督军。黎元洪本人虽然并非革命党(最初他在枪口之下不得不接受这一职务),但他似乎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军中颇受欢迎,在铁路风潮中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很受省谘议局头领们喜爱(他们同意在他的属下供事),而且他能说英语,这能安定武汉大量外国人的心。

清政府对这次危机的回应是强有力的,命令陆军部以两个镇的北洋军对武汉发动反攻。与此同时,满人又忍气吞声地召回袁世凯,从一个退職官员恢复到他1910年被逐时的职位。他们相信袁世凯凭借其长期统领北洋军的经历,以及与很多大臣密切的私人交情,能够平定南方的危机,并可以统合军队做清政府的后盾。但是精明的袁世凯直到确信局势可以掌控,才接受了任命。

局势迅疾发展,任何个人和政党都已难以控制。1911年10月22日,陕西和湖南省新军发动兵变。在陕西首府西安,大批满人被屠杀;在长沙,忠于清朝的军官被处死。在两个事件中省谘议局的首领们都倒向了革命。在10月的最后一周,另三个省也举起反清大旗。在山西太原,巡抚及其家人被杀,谘议局参加了新军的兵变。在江西省,商人、学生和教员联合议员和军官宣

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在边远西南的云南省,军官学校的教官与新军发动叛乱,攻击忠于清朝的部队。

十九世纪后期曾经争论不休的铁路的军事意义问题现在对于交战双方都变得不言而喻。当清政府利用京汉铁路快速向南调兵镇压武汉兵变时,山西的起义军从太原沿铁路支线东进,切断京汉铁路,断绝了清军的补给线。10月底,一位南方的高级将领拒绝清朝让他率军沿铁路线南下的命令,反而联合其他地区的一些军官,发表通电,向清政府提出十二条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在一年内召开国会,通过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理并由皇帝批准,取消皇帝掌握的生杀大权,宣布特赦所有政治犯,禁止满人皇室成员担任内阁大臣,所有国际条约在由皇帝批准前先由国会审议。

清朝廷在一周之内接受了大部分要求。11月11日,北京的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后的三天,朝廷签署了任命诏书,授命他组阁。袁世凯接受任命,几乎所有的重要位置都任命他的亲信担任。

这些举动显然是将中国推向满人主导下的君主立宪——这与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主张如出一辙——而非孙逸仙和同盟会要求的共和政体。孙逸仙的支持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在中国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1911年底的一系列事件发生时,孙逸仙本人正在美国募集资金,他在前往堪萨斯市的途中在丹佛市的报纸上看到武昌暴动的消息。孙逸仙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确保欧洲允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随后他在回国前奔赴伦敦和巴黎,与外国政府磋商。他说服了英国不再向清朝政府提供进一步的贷款,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

在11月里,袁世凯采取微妙的平衡手段,利用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同时向满人和革命党施压。清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夺

回了汉口和汉阳(虽然没有占领长江南岸的武昌),但是在各省纷纷倒向革命的形势下,这没有给清朝廷带来多少安慰。在同盟会领导人巧妙的发动下,孙逸仙的同盟会在民众中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支持。同盟会不断扩大组织,坚定目标,在倒向革命的江苏(11月3日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四川(11月22日宣布独立)和山东(12月12日宣布独立)三省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他地方,同盟会仍只是反清运动广泛联盟的一部分,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还是主要出自新军、省谘议局,有时候是当地的商人。

当满人和忠于清朝的军队12月初在南京经过几周激烈的战斗后被打败,清朝廷的地位更是急转直下。在14世纪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从那时候开始,它一直有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重要的象征意义。现在它的陷落又使中国人想起1645年福王军队的失败和1853年太平天国的伟大胜利。因而占领南京确实为同盟会巩固自己地位提供了全国性的基础。

五岁的皇帝溥仪的母亲现在出面商谈,促使现任的满人摄政大臣辞职,任命袁世凯以总理身份理政,皇帝仍然听政。但是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重新回到了慈禧太后的时代,所以这一妥协并未被广泛接受。

1911年圣诞节这天,孙逸仙从法国乘船回到上海。四天后,来自十六个省谘议局的代表在南京开会,一致推崇孙逸仙的领导地位和同盟会的影响,选举孙逸仙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职,宣告新的共和国诞生,此后采用西方公元纪年,以七天为一周,取代中国传统的十日为一旬的阴历纪年。这一天也是新年,孙逸仙给袁世凯发了电报,承认自己军事力量的基础还很薄弱。在这份电报中,孙逸仙说道,虽然他暂时接受了大总统一职,但“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①

中国现在有了两个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满人皇帝，这一僵局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1912年1月末，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袁世凯和几位满人亲王和将领的暗杀，满人保守派和野心勃勃的汉人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该月底，满人强硬派最顽固的代表——军谘府副军谘大臣被炸死，他试图竭力将禁卫军训练成满人精锐的军事中坚力量。

1912年1月底，北洋军四十四名高级将领将一份敦促在中国实行共和的电报送到北京的内阁，清王朝受到了最后的一击。一批负隅顽抗的满族亲王退到东北，准备在那里组织反抗，与此同时，皇帝的母亲及其亲近的辅臣则与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将领就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激烈的谈判。当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都同意保证小皇帝及其家人有权在紫禁城继续居住，拥有皇室财产，同时每年可以得到四百万元的岁用，保护满人所有祖庙时，朝廷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溥仪退位。清朝廷拒绝承认孙逸仙的地位，在一份简短的诏书中授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⑩与华中和南方的同盟会及其他反清力量一起建立统一国家。

就这样，简单的几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就画上了句号。在自治方法和制度上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国人民获得了在这个充满戒备和危险的世界里设计自己未来的机会。

注释：

- ① 汤普森(Roger Thompson):《未来的视野,当前的实情:1911年革命前夕的地方行政改革、选举政治与传统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第45页。
- ② 前引汤普森著第111页。
- ③ 邓琪(Ryan Dunch):《虔诚、爱国、进步:福州的中国新教与近代中国的发展,1857—1927》,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
- ④ 休内曼(Ralph Huenemann):《龙与铁马:中国的铁路经济学,1876—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 ⑤ 史景迁:《天安门》,纽约1980年版,第34页。
- ⑥ 贾士杰(Don Price):《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96—1911》,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
- ⑦ 伯尔纳(Martin Bernal):《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科内尔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 ⑧ 前引伯尔纳著第95页。
- ⑨ 前引伯尔纳著第117页。
- ⑩ 埃德蒙·方(Edmund Fung):《中国革命的军事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页。
- ⑪ 李剑农著,邓嗣禹(Teng Ssu-yu)、英格尔斯(Jeremy Ingalls)译:《中国政治史,1840—1928》,普林斯顿、新泽西1956年版,第260页。
- ⑫ 前引李剑农著第266—267页。